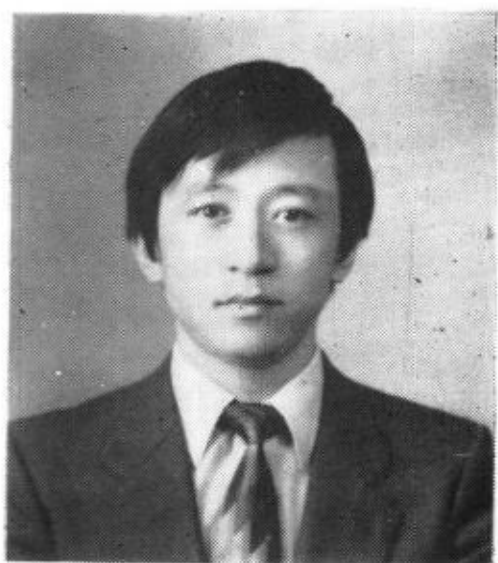


作者介绍



李廷江 1954年生于沈阳，1977年毕业于清华大学。1979年考入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政治研究所，后转入日本研究所。1988年毕业于日本东京大学，获哲学博士学位。同年，为日本亚细亚大学讲师。1991年任日本亚细亚大学国际关系系副教授。

1992年10月—1993年9月为美国哈佛大学日本研究中心访问学者。现兼任北京大学日本研究中心特邀研究员。

从事近代中日关系史、东亚国际关系和日本政治外交的研究。编著有《学问、信仰与人生》（合作）、《中日关系面面观》（主编）、《面向二十一世纪的中日关系》（合编）等，在国内外发表论文数十篇。

内 容 提 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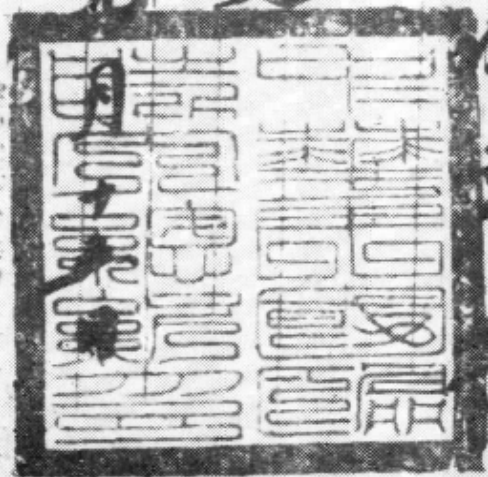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主要探讨甲午战争与辛亥革命前后日本财界在对华关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书中通过对日本财界对外经济战略，特别是辛亥革命前后与中国尤其是与孙中山等的关系，探讨了日本财界在推进“大陆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作者认为日本财界在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推进“大陆政策”方面发挥着不可低估的作用。他们的对华活动与军部赤裸裸的高压政策、大陆浪人的基层点火的运动方式相比，更注意于谋经济实惠，不拘形式。三者相互作用，构成近代中日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松方侯爵閣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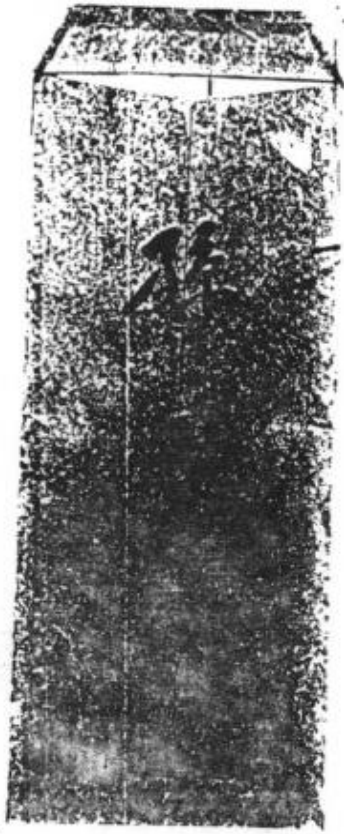
中華民國政府設主中央
銀行一事已為記阪谷博士
原口博士閣下此件一為此
閣下鼎助實為厚幸
候

孫文

中華民國元年元月



孫中山致松方正義委托书(1912年1月15日)



孙中山致井上馨信封(1912年2月3日)

府 社 總 國 民 華 中

紙 用 通 普 府 社 總 國 民 華 中

井上侯爵閣下由三井森君處
得聞

閣下贊助之良意感謝千萬今
後新政府其日本財政上之關係
凡百當從其

閣下之指導必有統一之辦法以全
最完滿之結果近日任命代表
來滬

貴邦報

閣下有以教之前以電信奉聞今

更由白減意區區不盡伏祈

亮察仰仗

鼎助無任拜禱即頌

起居

山縣村物公屬乞代

達詳忱乃荷

孫文叩

再者西園寺侯處未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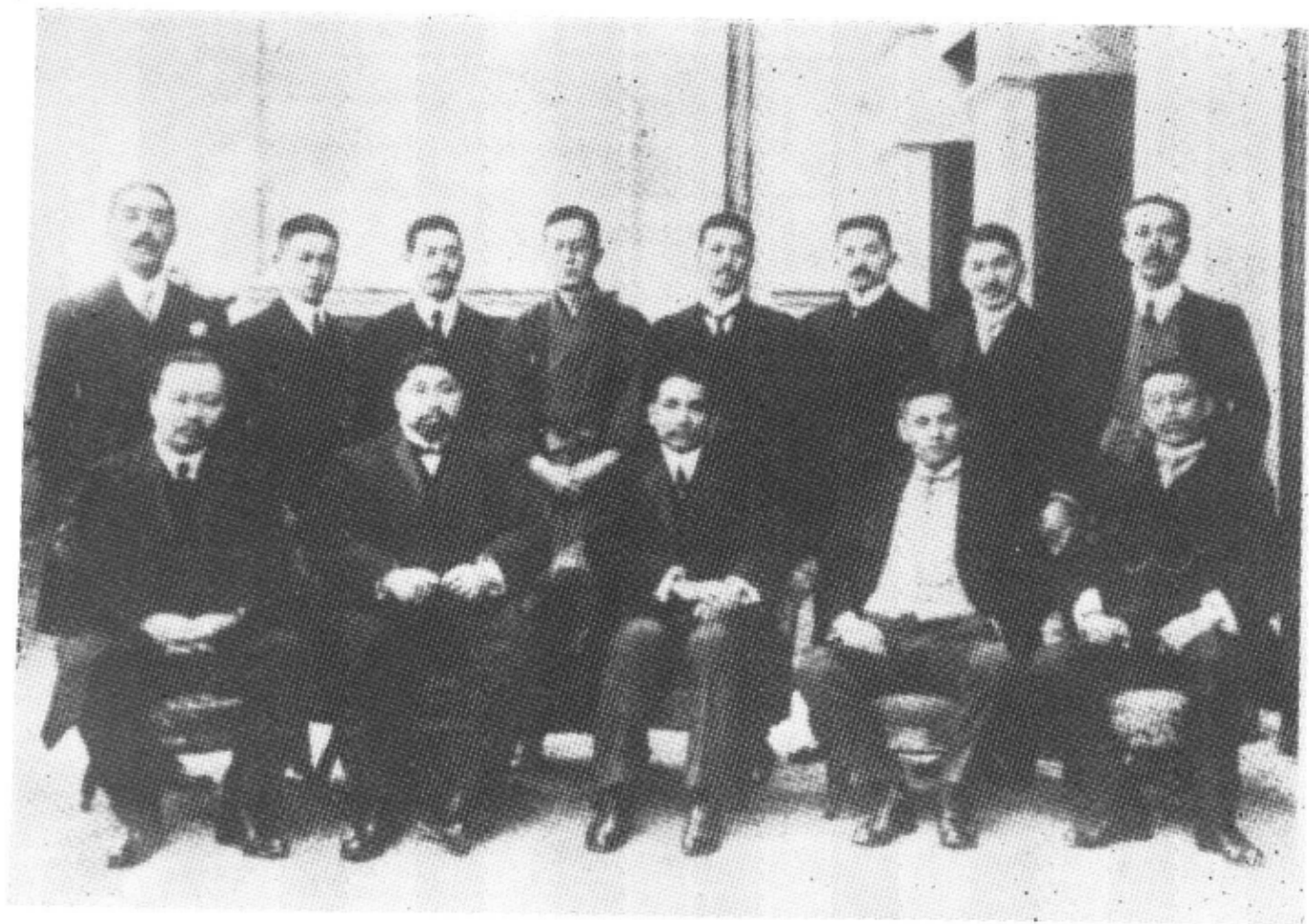
直接通函亦乞

代為致意

孫文叩

二月三日

孙中山致井上馨信(1912年2月3日)



孙中山、黄兴在上海正金银行(1913年2月)

大 本 營 公 用 牋

孫中山致溼澤榮一信

左 右 垂 敬 郵 懷

討 讓 所 及 尋 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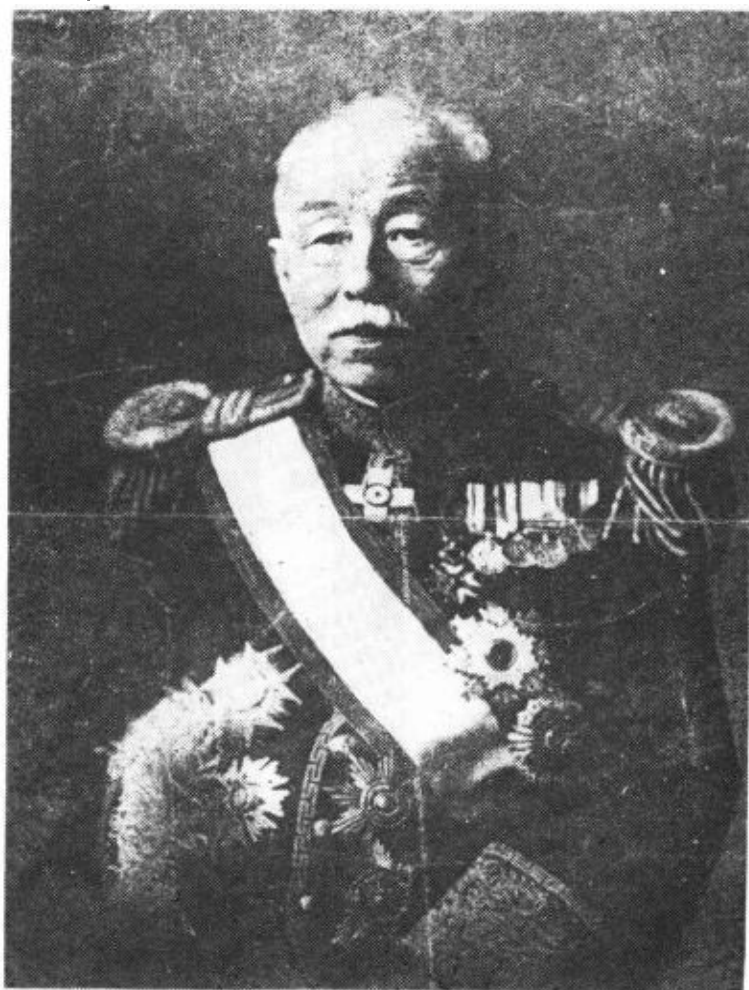
隨 時 接 洽 不 勝 馳 情 順 頌

時 祐 此 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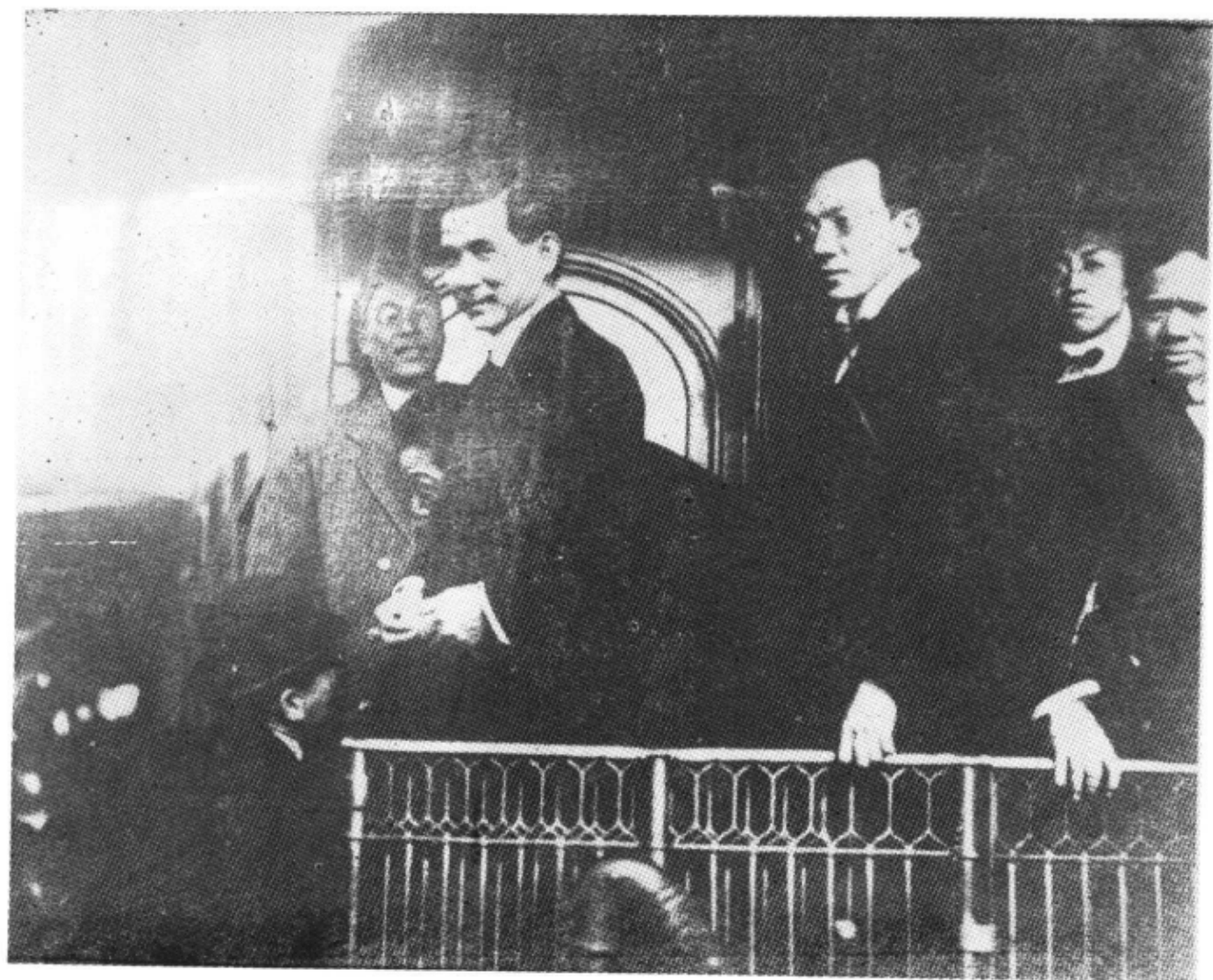
溼澤先生閣下

孫 文

中 華 民 國 十 三 年 九 月 十 八 日



阪谷芳郎



孙中山正式访日(1913年2—3月)



张之洞铁道顾问原口要在中国



孙中山出席三菱上海支店欢迎官崎寅藏宴会
(1912年4月6日)

拜啟者敬聞
執事在東京發起追悼黃克強先
生大會推本友誼為空前之盛
舉厚意深情存歿均感謹代表
誌謝併寄上黃先生遺照一紙
以作紀念專此即候
起居

主喪友人

孫文 唐紹儀 李烈鈞 蔡元培 柏烈武 譚人鳳

孙中山等人致追悼黄兴逝世的日本友人的感谢信



孙中山、黄兴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的代表(1912年4月)

澁澤先生惠鑒兄十去春在日諸辱

優遇至今心感 安東先生來奉

手書至為感荷詢志

道履勝常尤深慰頌故國人士對於棉業漸
知注重南通實業循序改進舊觀漸復重承
遠注均致奉

聞復請

大安

張謇上九筆堂四月十九日

前 言

本书的研究主题是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主要探讨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以来到辛亥革命后1914年期间，日本财界与近代中国的经济关系史。一般而言，国家与国家的关系可以有很多的层面，如政治、经济、外交、军事、文化、艺术等等。由于“同州同文同种”之特殊关系，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日两国相互交往频繁，内容丰富复杂，其关系之深，范围之大，绝非一二本书可全部包容的。因此，这本书仅着眼日本财界，侧重分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20年的时间里，中日两国的经济交往形态、内容。纵观清末民初的中日关系，大家都认为，1911年10月10日的武昌起义，把两国关系推到了最高峰。事实上，在本书论及的这段历史中，辛亥革命的确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与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采用的书名，或许也是适当的。

近代中日关系始于1840年的鸦片战争。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和1904年的日俄战争标识着日本对华侵略政策的开始与升级。就这样，一直到1945年止，近代中日关系的主线，基本上是以日本的对华侵略扩张为特征的。鸦片战争以后，帝国主义的侵略加速了中国的殖民地和半殖民地化，尤其是清朝政府的腐败无能促使国内阶级矛盾日益激化，整个中国布满了干柴，星星之火便可造成燎原之势。辛亥革命炮声，敲响了延续两千年之久的中国封建统治制度的丧钟，成为中国近代史上最伟大的历史事件。

辛亥革命与日本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

研究上，这一时期的两国交往具有特殊的地位。首先，辛亥革命时期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重要转折点。就中国近代史而言，辛亥革命结束了封建王朝的统治，从此中国进入了民国时代。就日本史而言，正是明治时代结束，大正时代的开始。另外，以辛亥革命为契机，中日交往深入到两个国家的各个层面，相互联系空前深广，由此带来了两国关系上的明显变化。其次，由于辛亥革命承前启后，因此不阐明这一时期的两国交往，就不能正确理解百年中日关系史。所以考察该时期两国交往的全过程，不仅将加深我们对这一时期中日关系的认识，也将有助于我们对近代和当代中日关系的理解。

有关辛亥革命与日本的研究迄今似乎已成不息的“热点”。国内外学界，研究成果之多不胜枚举。然而，在众多的研究中，关于日本财界的中国政策，关于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却较少有人问津，而被遗忘。尽管其中有这样那样的理由，但是鉴于日本财界在日本对华政策中的地位与作用，鉴于日本的对华经济活动始终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中的重要内容。因此，不了解日本财界，就很难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作出准确的评价，同样也就很难全面理解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以及近代中日关系史。正因为如此，本书研究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政策和活动，以填补研究史上的空白。事实上，只有多层次、多角度的研究，才能更为客观的准确的把握历史，揭示其内在的联系，还历史的本来面目。

对于中国学界来说，财界的概念还十分生疏。什么叫财界，日本的财界具体指什么？这是本书首先要探讨的课题。财界，是任何一个资本主义国家其经济社会的重要组成部分。财界一词，在日本司空见惯，几乎见于每天的报纸、电视、杂志上。但是，由于财界的概念过于暧昧、笼统，给其下个准确的定义，确实相当困难。比如说，有人认为，所谓财界，即是一“国中有代表性的资本家、实业家、金融家的社会”。也有人把财界称为“对政治

社会具有影响力的以大资本家为中心的实业家的世界”。尽管这两种说法都不全面，但是它恰恰指出了财界内涵的两个重要的侧面。首先，财界是由“经济界、金融界、产业界、实业界”组成的大资本家团体。其次，财界是“对政治社会、经济社会具有举足轻重影响的大资本家团体”。即财界包括政治、经济两个方面。就经济而言，财界掌握着一国的经济中枢。就政治而言，财界与政府关系密切，是可以左右日本内外政策的政治集团。此外，作为巨额政治资金的提供者，财界又能从更高的层次上影响政治，甚至被称为“第二个政府”。总之，日本财界是日本国内政治中一个十分重要的政治集团。财界代表社会产业资本的总体利益，直接指导日本资本主义的经济建设，不仅对日本经济，同时对日本政治具有巨大的影响力。

关于本书论及的1894—1914年间的日本财界，尚无专门详细的研究，笔者认为，此时的日本财界，主要由以下几部分组成。

(1)经济界、实业界、金融界的领袖和三大财阀的巨头。前者主要指经济团体的领导人。当时，日本的经济团体远不如现在之多，但也有几个较大的组织，即东京商工会议所、大阪商工会议所（1892年成立全国商工会议所）、工业俱乐部（又为工业协会，1916年改成日本工业俱乐部，也是日本经济团体联合会前身）、东京交易所（1903年改为全国证券交易所联合会）。此外，还有两个比较重要的日本银行业组织，即东京银行集会所和东京证券交易所。东京银行集会所于1881年成立，共代表41个银行。涩泽荣一任首任会长。东京证券交易所，选举涩泽荣一为委员长。这两个组织，作为银行协会，长期以来在日本银行发展史上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是极为重要的经济团体之一。

上述几个经济团体的历届会长、副会长及主要干部，是财界的代表。三大财阀的领导人即是名符其实的财界领袖，如三井财

阔的中上川彦次郎、益田孝，三菱财阀的岩崎弥之助、岩崎久弥、住友的广濑幸平、伊庭贞刚等等。

(2)政界元老，又相当于“财界总理”之类的人物。在当时的日本，具有这种资格和权威的，充其量也只有松方正义、井上馨等人。松方是明治维新元勋，他从政几十年，长期掌管大藏省，自明治18（1885）年起，两次组阁任首相，六次出任大藏大臣，他的对日本经济财政的意见被誉为“松方财政”。由于他长期主持财政，故在日本各界，特别是大藏省，享有至高无上的威望。井上馨也是君临财界“总理级”的重镇。此外，由于他始终通过益田孝对三井财阀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控制，被称为三井财阀的“总后台”。他既为财界的领袖，同时又是三井财阀的总代表，集两者于一身。还有一些元老，虽不常活动于财界，但对财界拥有很大的发言权，如山县有朋、桂太郎、伊藤博文等。

(3)特殊银行系统的首脑和大藏省局长、次官等高级官僚。所谓特殊银行，专指日本劝业银行、府县农工银行、北海道拓殖银行、日本兴业银行以及日本对外扩张时建立的殖民地银行，如台湾银行、朝鲜中央银行等。财界人的另一特点是，“从整体来看，银行家居多，尤其是特殊银行中地位较高者”。这说明，特殊银行在日本财界所起的作用是不容轻视的。至于大藏省的高级官僚，虽然人数较少，但是，由于大藏省的职能性质，使得这部分人与财界关系密切，他们的意见一般受到注意，常常被社会理解为是财界的意向。财界与大藏省的关系极为特殊，一般而言，大藏省的政策代表了财界的总体利益，所以将大藏省的高级官僚放入“财界人”的范畴，是有道理的。

那么，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始于何时？其行为动因与思想背景是什么？与辛亥革命又有怎样的联系？本书将从近代日本“亚细亚雄飞”的角度，首先探讨财界对外经济活动的历史背景，然后分析几个民间兴亚团体的对华经济政策，同时选择大仓

喜八郎、涩泽荣一、阪谷芳郎三人，从经济亚细亚主义、论语算盘主义、经济参谋本部等三方面剖析财界的“大陆经伦”。此外，拟就辛亥革命前日本财界与中国革命党人的关系，进行若干阐述。

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以辛亥革命时期为标识进入了新的阶段。日本财界与辛亥革命的关系主要表现在两点，第一、1912年初孙中山委托涩泽荣一、阪谷芳郎建立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问题；第二、1913年初涩泽荣一同孙中山商议成立中国兴业公司的问题。我认为，无论就那个方面讲，这两个事件，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都具有极其重大的意义。其理由有三：首先，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委托日本人建立民国中央银行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获取巨额借款，以维持新生革命政权，孙中山、黄兴等人对此寄予厚望。这一计划的成功与否，关系到革命政权的生死存亡。其次，辛亥革命后，中日双方共同成立“合办企业”，既是中日两国经济协力的新生事物，也是孙中山与日本财界在新形势下进行合作，希望借助日本力量，实现其“实业救国”的尝试。第三，这两次中日最高层次的交涉，时间虽仅隔一年。但却是这一时期中日关系中最大最重要的事件之一。它一方面反映了此间两国关系的最中心的议题，另一方面也集中了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活动的要求与主要内容。不仅如此，由于这两个事件，涉及范围广，参与人员多，所议课题又无不重大，为我们研究当时的历史和思考今日的中日关系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因此，尽可能的阐明这两个事件的全部过程，还其“庐山真面目”，便成为本书的中心课题。

当然，为了说明日本财界的对华政策和活动，本书拿出一定的篇幅论述日本政府、军部、大陆浪人的对华政策。围绕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也将涉及孙中山、袁世凯的对日认识的问题。我想，探讨这些问题，都将有助于我们加强对日本财界的认

识，促进我们对辛亥革命时期中日关系的整体理解。

以上就是本书的基本结构成和所要研讨的问题。

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领域，实在是太丰富多彩了。正因为其丰富多彩，其难度也大，更需要“板凳要坐十年冷”的精神。尤其是，每天面对中国百年挨打受难的历史，对于一个中国人来说，绝不是一件轻松愉快的事情。正因为如此，谁能说这不是一件光荣而艰巨的工作呢？至今，我不为选择了这一专业而后悔。尽管，我常常痛感自己才识浅薄，难以胜任。然而，这是一条没有退路的选择。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同时，我更喜欢一个战士的形像，胜利固然重要，坚持下去的精神更难能可贵。

当这本小书即将问世之际，我深感不安。愿这本不成熟之作，能够得到海内外学者的指正。

李廷江

1993年10月

目 录

前言	(1)
第一章 日本的财界与财界人	(1)
第一节 政商与财阀	(1)
第二节 财界团体的组织与活动	(12)
第三节 财界人的作用与特点	(18)
第二章 财界的“海外雄飞”	(39)
第一节 历史背景	(39)
第二节 几个民间“兴亚”团体	(45)
第三章 财界的大陆经纶	(79)
第一节 经济亚洲主义——大仓喜八郎	(79)
第二节 论语与算盘主义——涩泽荣一	(90)
第三节 经济参谋本部论——阪谷芳郎	(95)
第四章 财界的朝鲜政策	(108)
第一节 财界的大陆政策——挺进亚洲三部曲	(108)
第二节 财界的时局对策	(120)
第三节 战后经营	(126)
第五章 被遗忘的历史	(152)
第一节 孙中山革命运动与日本	(152)
第二节 孙中山的日本观	(157)
第三节 无私援助的真情	(161)
第四节 在财界仗义施财的背后	(167)
第六章 辛亥革命与日本各界的反响	(174)

第一节	日本舆论的反应和国内动向	(175)
第二节	日本的对华政策	(178)
第三节	财界的“时局对策”	(186)
第七章	中央银行设立案的成立过程	(196)
第一节	背景	(196)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203)
第三节	中央银行设立案的具体形成过程	(212)
第四节	中央银行设立案与日本国内的动向	(224)
第五节	元老政治与对华政策	(230)
第六节	大陆浪人、三井财阀、井上馨	(238)
第七节	孙中山与日本财界	(244)
第八章	辛亥革命后的若干问题	(270)
第一节	孙中山访日与日本财界的设想	(271)
第二节	中国兴业公司的成立	(294)
第三节	公司改组与涩泽荣一访华	(300)
第九章	结论——近代中日关系的特征	(326)
后记		(339)

第一章

日本的财界与财界人

考证“财界”一词，最初是何时见于日本的报刊杂志，又是何时取得学术用语市民权实在困难之极。1936年出版的《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为我们提供了重要的线索。据其所引，有人认为1886（明治18）年6月17日《东京日日新闻》题为《财界萎缩》的报道为其始。然依笔者之见，1880（明治12）年9月30日《朝野新闻》题名《藤田事件与警戒财界的混乱》一文，应更为早些。〔1〕不过，无论是前者还是后者，此时“财界”一词的内涵仅指“经济界”，同本书所述“财界”的定义略有不同。其原因，主要同明治前期日本“财界”的产生与发展有关。当明治时代接近尾声的1908（明治41）年，山路爱山著《现代金权史》，第一次较系统、客观地分析了明治时期出现的“士族的商法”、“政商的定义”、“最初的大藏大臣”、“现代金权史的元勋”、“保护政策的结果——财阀的发展”等问题〔2〕。但是，在这部至今仍不失其重要价值的著作中，“财界”问题，尚未被纳入考察的范畴。应该指出，忽视了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财界”的产生，以及“财界”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中所占据的重要位置，正是该书的不足之处与时代的局限。但是，我们还要看到，在今天的日本学界，仍然没能对“财界”的发展史、“财界”的组织与财界“人士”等一系列问题，做出令人满意的说明，这不能不令人感到遗憾。

“财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的必然产物，在明治以来的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中始终处于指导经济发展、影响日本内外政策制定的十分重要的地位。在这个意义上，现在还常常把“财界”称为“另一个政府”，也是有其道理的。本书在前言中，对“财界”的定义、“财界”的组织与“财界人”的类型，做了极为笼统的说明。可是，鉴于学术界对于“财界”问题研究的上述状况，加之本书是集中讨论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活动的专著，因此，有必要对日本财界的发展史，财界的团体与财界人等几个问题进行较深入地研究。本章拟从对外关系的角度，对明治时期财界的形成、发展等几个问题作一些研究与探讨，以期更好地理解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与辛亥革命的关系。

第一节 政商与财阀

要对财界的发展史做具体的描述，就不能不对财界产生的历史背景进行考察，对在日本资本主义发展过程中所出现的“政商”和“财阀”这两个与财界形成有关的问题做必要的分析和说明。

一、政 商

政商，是近代日本社会中的一个重要现象。所谓政商，在日本一般指通过接近政府、勾结有权势的政治家，从而肆无忌惮地获取经济利益的商人。政商的产生与活动，是明治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怪胎，它典型地反映了日本社会中经济与权力的结合以及由此而愈演愈烈的政治腐败。一方面，由于政商是由上而下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政策的产物〔3〕，所以，政商既是特权商人的代名词，同时，从积极的意义上看，在日本经济发展的起飞时期，政商承担了尚未成熟的政府中的一部分经济职能，发挥了不容忽视的作用。因此，有的日本学者认为政商是明治政府的社会支

柱，政商是财阀产生的前提。另一方面，政商有时也是财阀的同义词。从政商到财阀，这中间的确有着必然的联系。下表是当时被称为政商的10人简介〔4〕。

表1

明治时期政商简介

三井八郎右卫门	三井财阀
岩崎弥之助、岩崎久弥	三菱财阀
五代友厚	五代财阀
藤田传三郎	藤田财阀
大仓喜八郎	大仓财阀
广濑幸平	住友财阀
安田善次郎	安田财阀
涩泽荣一	涩泽财阀
古河市兵卫	古河财阀
川崎正藏	川崎财阀

关于政商的类型，日本学者楫西光速归纳为以下三种。

第一种类型，是传统政商。传统政商，从江户时代就已经同封建统治者勾结一起，成为特权商人。这部分蓄积了巨富，经过幕末维新的混乱时期，受到明治政府的保护，得到进一步发展的政商，三井、住友、鸿池，是典型的代表。

第二种类型，是新兴政商。这部分政商，主要指乘幕末维新的混乱，一跃而起，白手起家的人。他们多出身于士族、商人、医生等社会下层，于短期间致富起家，几乎与第一类政商拥有相等的财富。如大仓喜八郎、安田善次郎、古河市兵卫、藤田传三郎等均属于这一类的代表。楫西称这些人是最有代表性的政商。

第三种类型，是领袖型政商。涩泽荣一、五代友厚俩人是一类政商的代表。他们都是明治初期由官转商，从事实业建设的。他们作为政商并不具备上述二种类型所拥有的财力。但是，

他们是实业界举足轻重的领袖，他们亲自培养、扶植政商，发挥了其他人无法比拟的作用。比如，涩泽荣一原是大藏省（相当于次官）的高级官僚，后弃官为国立第一银行理事长，一生经营500多家企业，同时又是日本几个银行、商工组织的创始人，走过了一条从政商到财阀、财界领袖的道路〔5〕。

综观政商的形成与发展，主要有这样四个特征。

1. 政商，顾名思义就是勾结政党、官僚寄生权力，牟取利益的商人。同权力的结合，使这类商人的生意舞台广大，条件优越，相比其他商人，具有得天独厚的强势。有什么样的权力，就有什么样的买卖，权力的大小，决定了财力、利益的多少。因此，明治时期日本最大的政商，几乎都同最高权力具有千丝万缕的联系。任何时候，政商及其所代表的财阀的背后，无不同一个特定的政治集团或权力中心有这样那样的关系。这种政治背景使政商受到政府的保护、使其企业在你死我活的商业竞争中，能够处于不败的地位。在这一点上，最初的代表人物三菱财阀的创始人岩崎弥太郎，堪称是日本政商鼻祖。维新后，岩崎通过接近大隈重信，利用日本出兵台湾之际，拿到承办军用船舶的特许。战争后，政府保护三菱的海运，批准把三菱船作为政府船使用，在同日本国邮船的竞争中最终获得胜利，最后邮船解散，被三菱合并〔6〕。靠权力的保护起家，似乎就是每一个政商的必由之路。当然，树倒猢狲散，政治家垮台，政商随之遭殃的也不乏其人。

2. 大凡被称为政商者，首先是明治时期日本主要产业中具有相当雄厚财力的企业家、实业家（包括白手起家的巨商）和资产家。表2是1902（明治35）年，日本主要资产家的统计。我们可以看到表1中的10个除了已故者外，都位于资产规模500万元以上。

换言之，这些政商几乎都是日本社会的巨富，其雄厚的财力多半是靠寄生权力所牟取。同政治权力的结合为他们发家致富创造了绝好的机会，也为他们建立自己系统的企业集团——财阀，

奠定了坚实的经济基础。

3. 以上两点表明，政商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时期最大的成功者，同时也提示了政商的发展过程，说明了他们同明治以来日本垄断资本、财阀形成之间的必然关系。日本学者加藤幸三在论述“政商资本形成”的问题时指出：“政商向财阀的转化过程，是前期的（商业）资本，一边确立、发展产业资本，一边摆脱原来的陈旧性质并向产业资本以及近代商业资本转化；同时，从产业资本相互间的激烈竞争中产生垄断、垄断集团，形成财阀”的转化过程”〔7〕。这种把“政商资本”作为前期的（商业）资本向产业资本以及近代商业资本转化过程的必经之点，进而探讨财阀形成的方法是成功的。事实上，分析和把握政商向财阀转变的过程，是讨论日本资本主义形成过程中，占统治地位的财阀资本的关键所在。表3，正是对政商大部分演变为财阀的最好注脚。

4. 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性质，决定了政商的产生，从最初阶段开始到形成财阀的过程，或多或少总是同对外战争、对外经济扩张和侵略有着密切的关连。

这是因为内乱与对外战争为从事军需生产的政商带来了莫大的利益。另外，战时经济带来的资本集中，激化了企业集团间的竞争，使以政府权力为后台的政商利用接受“御用”的特殊地位，取得政府的资金援助与政策上的保护，迅速击败竞争对手，巩固与发展本企业集团。比如前述第一种类型的传统政商，能够顺利通过维新混乱时期的仅仅有三井、住友、鸿池，同期的小野组、岛田组则是破产者。这就是内乱带来的分化、改组。三菱财阀中的岩崎与第二类型新兴政商中的大仓喜八郎、古河市兵卫等均受益于政府的对外战争，从出兵占领台湾到中日甲午战争，他们从事军火交易，接受政府的指令，运输部队、军火，在日本军队对外战争中扮演后勤企业的角色，为后来的财阀、财界积极支持战争做出了榜样。即便是涩泽荣一、五代友厚这类的领袖型政商，

表3

日本主要财阀投资产业分布表

		船舶	铁道	纺织	制造 会社	其他	银行	总计	折合时价 (千元)
岩崎家	13	26,447	155,787	0	0	2,483	7,413	192,130	13,619
三井家	16	16,705	68,186	30,278	12,378	55	11,743	139,345	8,056
安田家	17	6,397	4,581	0	0	37,233	26,750	74,961	2,979
藤田组	18	8,903	7,329	1,600	0	2,072	1,800	21,704	1,039
浅野总一郎	9	10,378	300	0	2,218	728	300	13,924	440
大仓喜八郎	14	1,950	2,765	0	1,298	640	1,100	7,759	484
住友吉左卫门	12	596	9,694	0	269	100	941	11,600	996
鸿池善右卫门	16	8	4,163	0	31	1,420	1,120	6,734	544
合 计		71,376	252,805	31,878	61,194	44,731	51,167	468,151	
%		15.2	54.0	6.8	3.4	9.6	10.9		

注：出处《时事新报》（1897年3月29日—4月6日），见大石嘉一郎编《日本产业革命的研究》下，东京大学出版会，第116—117页。

在对外经济活动上也始终采取积极扩张的态度，他们的企业和企业干部很多是专门对朝鲜、中国东北地区、中国内地从事贸易、兴办合资工厂、开采矿山的。他们的对外经济活动，是与日本政府对外侵略与经济扩张的大陆政策紧密相配合的，在日本的对外侵略中，他们为日本大财阀垄断资产阶级谋求殖民利益。

另外，由于明治以来日本的中国政策，主要是由军事侵略和经济发展两个方面组成的，所以日本的对中国经济活动与日本的对中国军事侵略，具有同等重要的意义。如果说，军部是近代日本侵略中国的急先锋，那么政商、财阀、财界则是日本对中国经济扩张的主体。

二、财 阀

1966年著名经济学家有泽广巳主编的《百年产业史》中，关于财阀形成的部分，作了如下的定义：“以政府的直接保护和接受被处理的政府企业为支柱的主要资本家，于明治20年代分别奠定了其事业基础，在其后诸产业的发展过程中越来越扩大了投资领域，从而产生了财阀。这类财阀从明治末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形成了垄断的联合实体，在产业界具有支配的力量。”财阀的产生，不是日本独有的孤立现象，但是“财阀”的产生与“政商”的产生一样，都具有日本独自的特点。上述的说明，概括了从政商转变为财阀的过程。财阀大致可以分三类，即在矿工业、金融、商业等广泛的范围内具有支配力的综合财阀，以银行为主的金融财阀和以矿工业为中心的产业财阀等等。当然还有中央财阀和地方财阀之分。

考察财阀的发展史，应从以下四个时期着眼。(1) 明治初年(1868年)到中日甲午战争前(1894年)，这是财阀的形成期。(2) 经过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1914年)，是财阀的成长期。(3) 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到战后的经济萧条(1931年)，是财阀的飞跃发展时期。(4) 1932年到1945年，是大财阀从转换到解体的时期。由于本书重点研究明治中期以后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所以关于财阀的考察，下限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至于其后的财阀情况以及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将另文探讨。下面，按照上述的分期方法，对三井、三菱、住友、安田这四个最主要的大财阀集团作一简单的叙述。

1. 三井 三井同三菱、住友、安田是日本四大财阀之一。三井财阀是在江户以来豪富三井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在明治维新期间，三井把最大的赌注押在讨幕派一边，作为新政府的“金库”，同维新政府的财政经济政策紧密地结合在一起，这正是江

户时代的豪商三井成长为三井财阀的原点〔8〕。

通观从幕末到明治三井的成长史，我们可以看到，开发和把握住金融和贸易的垄断地位是其得以顺利发展的主要原因，在这期间，三井着重以三井银行为中心建立了金融王国，利用三井物产会在贸易方面取得了垄断地位。相对小野组、岛田组而言，三井的发展是幸运的，也是惊人的。这其中，我们不能否认，同是面临危机，由于三井能够最大限度地取得政府的保护和支持，才能够化险为夷，平安过关。1875年受大藏省抵押增额令的影响，同是面临破产的危机，由于三井的三野村四处奔走，并得到井上馨的协助，才躲避危机。小野组、岛田组则被迫宣布破产。井上馨通过这次挽救三井的事件，并利用向三井派出亲信益田孝进入其经营首脑部门，为其君临三井王国，成为三井财阀最大幕后指挥开辟了道路〔9〕。

中日甲午战争前的1893年，三井银行、三井物产、三井矿山联合组成三井集团，同时组成财阀本部的三井家同族会。进入1900年后，三井的三大事业取得惊人的发展，并开始对中国、朝鲜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活动。仅就对中国的事业而言，三井物产建立的在华纺、大冶矿山借款等都是在这一时期开始的。三井财阀，包括三菱财阀、住友财阀得以迅速发展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是财阀资本家与经营者专家的结合。或者说，就是吸取三井家族外优秀人才进入财阀的领导部门，委以重任，从事企业以及财阀的管理与经营。事实证明，这是一条成功的经验。另外，绝大多数的主要首脑，都具有国外生活经历。详见本章附注“明治时期日本财阀经营者一览表”〔10〕。

2. 三菱 岩崎弥太郎是三菱财阀的创始人。翻开岩崎的发家史，我们就可以看到一部生动的从“政商”走向“财阀”的演变史。明治前夕，岩崎受幕府派遣任长崎开成馆（主要任务是贩卖藩内的商品和购买兵器、船舶机械）的主任。与外国商人的接

触，促使岩崎经商的才干迅速增长，1869年（明治2年），他于大阪成立了“九十九商会”，后改为三川商会，1874年改为三菱商会。随后，把本部移到东京，改名为三菱蒸汽船会社。过了一年，当日本出兵台湾之际，他接受政府命令，承担军事运输。以此为契机，战后，三菱受到政府的优惠，从此进军海运界，几十年一直保持着霸主的地位，成为后来三菱财阀的主干事业。

总结三菱财阀从一个小小的九十九商会到与三井财阀争雄，成为君临日本产业界的两大垄断集团之一的发展史，我们不能忽视作为政商、财阀巨头岩崎弥太郎、岩崎弥之助的几个特点。

首先，岩崎是典型的“御用商人”。仅举其在海运界发展为例，在明治8年、9年、15年里就得到政府三次大的特殊补助，并无偿使用政府转拨的13艘汽船，这些对于岩崎海运业的初期发展是极为重要的。毫无疑问，能得到政府如此般的关照，除了岩崎本身对权力的依属外，也是与他的人际关系分不开的。同无数明治政要保持有极为特殊与亲近的来往，是岩崎系的特点之二。且不说岩崎同大隈重信、板垣退助、后藤象二郎、犬养毅、尾崎行雄等当时主要的政治家关系密切，连岩崎的两个女婿加藤高明、币原喜重郎，以后都成为日本政府的总理大臣。除此之外，与岩崎一同创办三菱的川田小一郎在1900年担任了日本银行第三任总裁〔11〕。在三菱会社时受川田器重嗣后进入日本银行的山本达雄，1911年出任第二次西园寺内阁的大藏大臣，成为第一位出任藏相的财界人。不仅如此，在岩崎周围还结成了形形色色的网络，成为三菱财阀控制日本经济的政治保证。经济与政治的结合可从岩崎家族谱系中窥见一斑〔12〕。岩崎第三个特点是同战争的关系。如前文所述，在明治时期日本政府的任何一次对外战争中，我们都会找到三菱集团活跃的踪影。政商财阀乘战争发家。关于这点，似乎无须重复了。

3. 住友 住友与三井有相同的特点，都是从江户商人基础上

发展成为大财阀的。明治前夕，住友是矿山、金融业方面的巨商。明治后，经过几十年的惨淡经营，住友又成为唯一的一个以大阪为基地的大财阀。1930年代初，三井的资产大约7亿、三菱为5亿、住友大约为2亿。在日本，无论是从资产、规模、还是整个政治经济影响来看，住友都是仅次于三井、三菱的第三大财阀。

住友王国的产业，主要以矿山、电器和钢铁业为主。1897年建立了住友铜场，1901年新建住友炼钢厂，开始了金属工业的经营多元化。由于金属工业同军工厂的关系而得到迅速发展，1905年后经过日俄战争又打下了牢固的基础。1895年成立的住友银行，也以大阪为基地，积极开展业务，进入1900年以后，其规模紧追三菱、安田，成为日本五大银行之一。

一般来说，住友的政商色彩远不如三井、三菱那么强烈。但是，这并不等于住友的发展离开了由政商到财阀的模式。回顾住友的创业、重建，特别是从重建住友最大功臣广濑幸平的经历，我们不难发现，尽管住友与政治权力的联系不如其他财阀，然而，无论是别子铜矿的查封事件，还是在住友家主的选定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政治权力的影响，都体现了没有政治权力为后盾，任何财阀都将一事无成。比如，当别子铜矿遭到查封时，广濑幸平与军方代表川田交涉，然后取得岩仓具视的许可方得以平安了事。另外在几代家主连续故去，由大管家广濑选择后任家主时，广濑独断决定迎接政界重臣西园寺公望之弟隆麿奉为住友家第十五代家主，用这样的特殊形式把住友同最高权力结合在一起。不仅如此，住友财阀经营的最大特点之一，是同政府、军部、日本银行建立密切的关系，接受来自这三个部门的人，作为该财阀的主要干部。这一点，是住友不同于三井、三菱之处。住友长期以来以关西为据点进行发展，在选拔技术与经营管理人才时，尤其注重优先采用东京帝国大学毕业生，这在当时来讲是少有的。著名的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家河上肇的伯父河上谨一曾任住

友财阀的理事，曾任东京大学总长经济学家矢内原忠雄，也是大学毕业后先在住友别子铜山工作了几年后，又转任到东京大学担任副教授的〔13〕。

4.安田 在日本通常说的四大财阀，即三井、三菱、住友，再加上安田。有时讲日本三大财阀，把安田与三井、三菱、住友区别开来的一个主要原因，不是由于规模，而是与上述三个综合性的财阀相比，安田是一个金融财阀。所以，在日本经济史上，安田财阀也常常被称为金融财阀。安田财阀的另一个特点是创始人安田善次郎同三菱财阀的岩崎弥太郎一样，是由小到大经过一代人的努力，才进入了日本巨大财阀之列的。

安田善次郎与涩泽荣一齐名，被称为明治的两大银行家。安田生于1838年，1921年被右翼暗杀，享年82岁。安田的一生，设立了无数的金融机构，安田银行就是后来的富士银行的前身。安田银行是日本最早的私立银行之一。另外1873年，国立银行条令公布，只留下了三个银行，其他全部解散，几年后，涩泽荣一建立了第一银行，横滨的原善三郎建立了第二银行，安田建立了第三银行。作为金融财阀的安田，除了参与银行、金融机构的设立外，还有一个显著的特点，就是在众多银行面临经营危机时，挺身而出，实行援助，通过救济，进行吸收，合并，扩大安田银行的势力。1884年，安田通过救济第九十八国立银行、第四十四国立银行、第七十五国立银行、第四十五国立银行、第七十八国立银行，随后把它们并入自己的势力之下，这个发家秘诀，当然少不了政府的支持和援助。安田与政府、军部的关系，是众所周知的秘密〔14〕。事实上，安田金融王国的主要支柱，基本是依靠同政府的特殊关系建立起来的。明治时期，安田财阀的发展史上，有两个重要的时期，一个是中日甲午战后，一个是日俄交战之后。战争为政商转变财阀提供了极好时机，这已成为日本财阀发展史上一个带有共性的因素。这对安田也不例外。

第二节 财界团体的组织与活动

一般来讲，财界具有两个主要的特征。所谓财界，主要是指总资本的代表，或实业界、经济界、金融界的共同代表。此其一。同时，所谓财界，也必须承担个别资本之间的协调任务，具有足以协调金融界与实业界之间的矛盾并达成共识的能力，此其二。所以，这里讲的财界团体，同样指的是具备上述两种职能的财界组织。在第一节关于财界产生的历史背景中，我们阐述了从政商到财阀的过程。从政商到财阀，这是一个带有规律性的现象，当我们探讨财阀团体的组织与人物时，我们就会发现，借用这一分析视角并结合财界的上述两个特征，对于我们的研究是十分有益的。

按照时间的顺序来看，明治时期的日本财界团体，大致有东京商法会议所（1878—1883年）、东京工商会（1883—1891年）、东京商业会议所（1891—1946年）、择善会（1876—1881年）、东京银行集会所（1881—1895年）、大阪商法会议所（1878—1890年）、大阪商业会议所（1890—1946年）、全国商业会议所连合会（1892—1927年）以及工业俱乐部（1900—1916年）、东京证券交易所（1879—1891年）、东京交易所（1891—1903年）、全国证券交易所联合会（1903—1925年）。如果根据其性质，把这些团体进行分类，基本可以分成四种类型（1）商法会议所——商工会——商业会议所——商工会议所系统。包括东京、大阪和全国连合会。（2）择善会——东京银行集会所银行金融业系统。（3）工业俱乐部——日本工业俱乐部系统。（4）东京证券交易所——东京交易所系统，包括大阪交易所和全国证券交易所联合会。另外，我们没有把一些行业团体、以及其他形式的全国或地方性的经济团体全部考虑在内（如前田正名组织的“五一

会”等)的主要原因,是由于上述四个系统的组织足以概括当时财界团体全貌的缘故。

应当指出,虽然不能简单地把财界的形成发展与财阀的形成和发展联系起来分析,模式化、单一化。但是,由于多数的财界领袖,即所谓财界人都出身于政商,又有一部分财界人(据原朗教授统计有三分之一)本身就是财阀领袖或来自于某一具体财阀,所以,我们仍能在财阀领袖与财界人身上找到一些共同的特点。遗憾的是,至今我们也没有一个好办法,可以区别财阀头目与财界领袖的异同,只有具体事例具体分析了。不过,需要说明一点,鉴于本书主题是讨论财界对中国的经济活动,并非专论日本财界发展史,因此,本章拟从组织活动与特点的两个方面,主要对东京商业会议所进行考察。

一、东京商业会议所

东京商业会议所是日本财界在明治时期的最主要的团体之一,是我们探讨日本财界对中国经济活动的最主要的对象。这是因为:第一,作为日本财界最早建立的组织,东京商业会议所的地位颇为重要,它的主要发起人和主要骨干几乎都是明治时期日本财界的主要头目;第二,它的组织形式及一系列对内对外的活动,颇具代表性。它的对外经济政策,既有先驱性的意义,同时由于它兼容经济的因素与政治的因素为一体,至今仍是日本财界的主要代表。

东京商业会议所是在东京商法会议所、东京商工会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它的成立是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产物。从国内因素来讲,明治维新同任何一个大的社会变革一样,既给近代产业发展带来了生机,同时也破坏了一般商工业者之间的传统的关系与习惯〔15〕。明治初期,尽管政府内设有通商局或商法司,后来又在大藏省内设置了劝商局,但是,其职能也只是局限于商业者的保

护与奖励上。如何适应形势发展，恢复与建立商工业者之间的联系，已成为迫切的课题。另外，当时日本政府所面临的“改正条约”的问题，也促使把建立一个商工业者团体的事宜，提到了议事日程。据发起人涩泽荣一回忆说：“围绕改正条约问题，当日本外交当局同英国公使交涉时，对方认为，日本没有舆论，也没有集中大多数商人的组织，因此，以舆论不同意的理由，希望改正（不平等）条约是站不住脚的。（中略）为此，当时的工部卿（大臣）伊藤博文、大藏卿大隈重信找到我提出要建立一个商法会议所（即今天的商业会议所）。”〔16〕就这样，1878年东京以涩泽荣一为发起人、大阪以五代友厚为发起人分别成立了东京商法会议所和大阪商法会议所。

其后，商法会议所改组为商工会，1890年根据政府颁布的“商业会议所法”发展为商业会议所。商业会议所以日本各重要城市为基地，由最初的两个（东京、大阪），到第二年增加了横浜、福冈、长崎、熊本、釜山，逐渐发展到1904年的36个，1914年的60个，几乎遍布整个日本〔17〕。

商法会议所和商工会时期的活动，包括商情的调查和报告、接受政府的咨询和对于重要的问题提出建议。在组织机构上，第一次集会时，设立了三个课（科），即内国商业事务、外国贸易事务、运输及船舶事务；到了1876年又增设了工业事务和农业事务课，几乎包括了整个的商工业部门〔18〕。尽管此时的商法会议所采取了英美商业会议所式的会员制任意团体，但是，它已经超越了个别行业的组合式的联合，成为财界共同利益的机构和舆论的窗口。

这五个课的委员名单如下：

内国商业事务委员

三野村利助 （杂货）

涩泽喜作 （生丝、米商）

益田孝	(三井物产会长)
涩泽荣一	(第一国立银行总经理)
竹中邦香	(米商会经理)
外国贸易事务委员	
大仓喜八郎	(西洋纺织商)
益田孝	(如前)
中山让治	(精工社社员)
岸田吟香	(药商)
堀越角次郎	(和服商)
运输及船舶事务委员	
岩崎弥太郎	(三菱会社)
吉村甚兵卫	(洋酒商)
川崎正藏	(造船商)
笠野熊吉	
岸田吟香	(如前)
工业事务委员	
松尾仪助	(起立工商会社长)
中山让治	(如前)
森村市太郎	(西洋纺织商)
林德左卫门	(洋纸制造商)
兼野传平	(东京日日新闻社主)
农业事务委员	
津田仙	(学农社长)
柴田守三	(兑换商)
米仓一平	(如前)
涩泽荣一	(如前)
涩泽喜平	(如前)

上述五个课的委员是基本的骨干，除此之外，会头涩泽荣

一、副会头福地源一郎、益田孝则是主要的负责人。通常所说的财界人，有财阀的首脑，有财界组织的头目。所谓财界组织的头目，有时仅指几个主要领袖，但是财界组织中各个部门的委员，有时被作为财界的代表或财界人。由于“财界人”没有很准确的定义，加之因时期不同对其认识标准也不一致，在当时，把这部分委员看为“财界人”是适宜的。

作为财界团体的组织活动，从商法会议所到改组为商工会期间，还仅仅停留在向政府进行各种建议上。据统计，这五年间一共提建议达37项。第一年1项、第二年12项，第三年9项，第四年8项、第五年5项。内容涉及工业、商业、贸易，主要送交政府的大藏省、农商工省、外务省和内务省等部门〔19〕。这个时期，商法会议所的一系列建议，反应了财界的时局认识。但是由于这些建议多半是提请政府注意某一方面的问题，敦促政府加强某一方面的工作的陈情和意见，它表明了财界初期的软弱的政治地位及其“无足轻重”的影响力。

由商工会改组为商业会议所后，特别是经过1894—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财界的政治地位呈现出明显的变化。商业会议所的成立，确立了其特殊法人地位，受商业会议所条例的保护。当时正值日本资本主义的形成阶段，商业会议所关心的是有关修改商法，中日甲午战争后经营铁路是否国有等全国性的问题。比如关于在日清战后经营的讨论中，东京商业会议所的方案，代表了财界的意见和利益，具有举足轻重的份量。关于民间的战后经营政策，主要提出，（1）国家经济的基本方针；（2）铁道国有；（3）营业税及其他诸税法的改废、修改等问题。那么，上述的三大类提案，具体涉及了哪些内容呢？现将第一、第二的主要部分摘录如下：

1. 关于确立国家经济基本方针 （1）关于战后的经济建设；（2）关于财政整顿的建议；（3）关于国家经济方针的建议；（4）关于

国家经济方针的建议（请愿）；（5）关于整顿经济的建议；

（6）关于奖励贮蓄的建议；（7）关于对清经济政策的倡议。

2.关于铁路国有问题的建议（1）历来的有关铁路问题的建议；（2）变私设铁道为国有的建议；（3）关于铁道国有的建议（请愿）；（4）关于实行铁路国有的建议〔20〕。

很明显，随着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财界在日本政治经济社会中的地位增强，发言权增大，关心的问题已涉及国计民生的根本大纲与国策。同时，不仅关心，还能够积极参与讨论，以局内人自居，把自己摆入到政策制定者的位置，以与政、官、军平等身份参与议政，登上了日本政治舞台。这是一个非常之大的变化，是日本财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日臻成熟的重要标志。

纵观财界的发展，基本上经历了下面三个阶段。（1）形成期，1878—1894年，以东京商法会议所的成立到中日甲午战争之前。（2）发展期，1894—1904年，从中日甲午战争到日俄战争的10年。（3）成熟期，1904—1914年，经日俄战争到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关于这三个时期的特征，可归纳如下。第一个时期财界的经济规模与政治地位还十分薄弱，尚未形成足够的组织力量，活动范围也相对有限。进入第二个时期后，财界作为一个政治团体，不断地扩大其活动范围，加强了对国策问题的关心，积极地参与讨论政治经济政策，向政府的陈情、建议态度较前强硬，越来越受到重视，政治地位越来越巩固，在日本国内政治舞台上，占据了一席应有的地位。第三个时期，是财界的成熟期。经过两次战争后（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财界逐渐强大，作为代表一大批新兴资产阶级利益的政治团体，在政治舞台上频频亮相，扮演了总资本代言人的角色。因此，无论是对内政策，还是对外政策上经常缺少不了财界的意见，财界俨然成了似乎可以同陆军、政府平起平坐的政治力量。我们在这个时期的报刊杂志上常常可以看到关于“财界首脑”、“财界意见”、“财界团体”等等。

都说明了财界作为日本经济发展中的经济主体的重要地位。这种政治格局的形成，可以看做近代日本政治结构的一大特点。

第三节 财界人的作用与特征

所谓财界人的作用，主要指的是它的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通常来说，这种经济参与和政治参与，一般由下面的几种组织形式而得到实现。(1)正规的全国性综合性组织，如东京商工会议所、银行集会所、工业俱乐部、东京证券交易所等。(2)行业性的中央与地方性的组织。如奥田正香和前田正名等主持的几个始终与地方保持联系的全国性农村产业组织。(3)非正式的、半公开的或者完全内部的一些组织。如拙棋会、和敬会、饗会等，尽管这类组织宗旨、活动内容有异，但是其成员的绝大部分是金融界、实业界的代表，他们采取“会餐”、“陈情”等方式，向政府施加压力。遗留到今天的什么“料亭政治”、“高尔夫球政治”（明治时是下围棋、跳舞）都来源于明治初期〔21〕。

财界组织的多样化，反应了财界人政治参与的多元化。作为财界的政治参与，在前期，无外乎是利用上述和第一、第二两种形式，提出一些政策性的建议和制造舆论，进而反映财界的意见。实际上即是从外部施加压力、影响政策、具有政治压力团体的性质。但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由于财界的实力大增，社会地位的提高，它作为一个政治团体，开始正式地加入政府的经济政策的制定过程。1896年召开的“农商工高等会议”，就是财界公开、正式介入政治的最重要的标志。

“农商工高等会议”是1896年作为农商务大臣的咨询机关，专门讨论中日甲午战后的“战后经营”问题而设立的。它被称作“实业界的参谋本部”。该会议每年一次共举办三年。会议的正式成员，由官僚、实业家和学者组成。这个会议的一个最大特

点，就是“实业家”的与会比重逐年增加，到了第三次，正式成员几乎全部是“实业家”。与会代表比例的变化，说明了日本资本主义在发展过程中，资本家、资产阶级地位的上升。这些“实业家”是三井财阀的中上川彦次郎、益田孝，三菱财阀的庄田平五郎，住友财阀的广濑幸平，安田财阀的安田善次郎，大仓财阀的大仓喜八郎等财阀巨头和主要商业会议所的如东京商业会议所会头涩泽荣一，大阪商业会议所会头土居通夫，横滨商业会议所会头原善三郎等〔22〕。

农商工高等会议的规则，主要是：第一条，在农商务大臣的监督下，就海外贸易事项，根据农商务大臣的咨问，陈述意见；第二条，就海外贸易事项，向有关各省的大臣提出建议。根据这个原则，这三次会议主要咨询了贸易、金本位的实施、海外金融机关的设立、引进外资、劳动问题等当时最重要的经济、社会问题。比如第一次会议上，讨论了下面七项问题：（1）派遣清国长江航路调查委员会；（2）海外金融机关的扩张；（3）海关监督保税仓库的设立；（4）扩大重要出口商品的销路；（5）海外通信；（6）海上保险；（7）职工的管理和保护。就这样，财界的代表，直接参与政策讨论、制定，把他们的意见变成政策，进而指导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23〕。

这种咨询会议，为财界参与政治、参加政策制定提供了一个很好的方式，是财界与政府权势结合的最佳渠道，也是财界公开发表意见、对政府施加压力的主要场所。在这前后，类似的组织有：货币制度调查会、生产调查会、水产调查会、经济事情攻究会、铁道国有调查会、经济调查会、工业谈话会等等〔24〕。

财界与政治的关系，还有很多种形式，比如公开的个人间交往，游园会等。个人间交往形式、频度因人而异。日本学者森川英正以涩泽荣一1899年的日记为依据，考察了其一年间的活动与人际关系。日记上反映了这一年里，涩泽荣一频繁接触日本政治

中的几位重镇的具体时间（包括访问或同座等）〔25〕。按日记统计与日本政府重要人物的接触，以日为单位计算，井上馨33日、首相山县有朋13日、藏相松方正义11日、伊藤博文10日。其中不包括访问时人不在，或日记中漏掉的例子。这四位都是当时日本藩阀的代表，涩泽同他们的公开接触，起到了联系政府同企业及财界团体之间的媒介机能，另外，一些纯属私人的婚丧嫁娶等场合，也是财界同政府首脑接触的机会。

除此之外，财界首脑的游园会，则是财界向社会显示实力，交好政界的一种手段。这类的游园会，同现在一年一度的财界四团体新年祝贺宴会相似。新年祝贺会，一千几百名财界、经济团体的首脑、大企业的经营者参加，邀请总理大臣、经济阁僚、外国的大使公使。一般由总理大臣作年初致词，然后四团体的首脑纷纷讲话，代表各自的团体作节日问候。开会时，四首脑在会场入口的金屏风前，接受与会者的新年问候，散会后，四首脑共同举行记者招待会，阐述新一年的政策和展望。气势庄重，规模庞大，常被舆论界视为财界每年一度的誓师大会〔26〕。明治时期的游园会，可以说是这类新年祝贺会的滥觞，当时除了组办人主要是以个人的名义之外，在规模声势等其他方面则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比如，每年，岩崎的游园会，涩泽荣一的龙门游园会等，都可以与现在的新年祝贺会相比拟〔27〕。

当然，财界与政治，与政府权力的结合，最根本的还是表现在财界的政治献金上。政治献金有几种形式，一种是政党开会，出售门票，比如政友会创立时，就向资本金5万以上的会社发出了请帖。财界利用高价买门票的形式，间接地支援主办的政党或政治家。直到今天，高价出售入场券，仍然是政治家获取政治资金的主要来源。另一种是组党，吸收财界人参加。在明治后期，政友会又建新党时，吸收全国会社社长（资本金5万以上）、银行总经理（资本金10万以上），商业会议所正副会头，还有律师、地

方绅士（大地主）等参加，为政党取得了雄厚的资金靠山〔28〕。更为隐蔽的还有，暗地里的勾搭，关于这一方面，有时是看得见的、半公开的，像益田孝送给山县有朋一栋位于京桥的深宅大院，外加一位日本名妓，这在当时人所共知。但更多的则是看不见的、秘密的，几乎是查无凭据。这种深层的，在根本利益上相互勾结与利用，是政治的最大腐蚀剂，同时，也是资产阶级政治的必然产物，难以根绝。从本质上讲，日本政府代表日本资产阶级的利益，即财界的根本利益，是财界的政治后盾；财界则是日本政府（保守党、执政党）的财政靠山、经济基础。如果说前者是日本国家的权力主体，那后者则是日本国家建设的经济主体，无论在什么时候，两者之间从来没有过原则性的分歧与冲突。

应该看到，正是由于长期以来财界从没有在根本问题上与政府唱过对台戏，借用战后经团连会长石坂泰三的话，即“战前的财界对政府一直是支持与协助的”〔29〕。因此，财界与政府之间，有时虽然发生过意见的分歧，但是仅就对外问题而言，财界一般比政府更积极、更为主动。这种自下而上，由民间到政府，财界的要求影响政府制订内外政策的情形，恰恰反映了近代日本社会发展中“二重结构”的特征。特别是在对外经济活动中尤其如此。这个问题将是本书所要涉及的一个主题。

关于财界的特征，特别是作为经济主体财界的作用，究竟怎样呢？对此，在这里详细的分析当然是不可能的。笔者只能就在对外经济活动中财界的特征进行简单的归纳。

我认为，日本财界在明治时期的对外经济活动中，产生了三个比较大的倾向，或者可称为特点。即“国益志向”、“对外志向”、“亚洲主义志向”。这三个倾向，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前萌芽产生，经第一次战后经营（中日甲午战争）到1904年的日俄战争前成长发展，又经第二次战后经营（日俄战争），到1911年至1914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业已基本成熟、成型。这种时

期的划分方法，与对财界成长时期的分析大同小异。其实，这并不足为奇。这是因为，上述的三种倾向，贯穿于财界的成长与发展的全过程，并且至始至终成为财界对外经济活动的内在的指导原则。但是，在效果方面，这三种倾向在明治时期财界的整个对外经济活动中所产生的深远影响的确是难以估计的。

“国益志向”是自称“财界人”以及被公认为“财界人”、“财界领袖”的这一类人的社会属性的基点。它说明了所谓“财界人”，必须是经济社会总体的代表，是社会总资本的代表。所以，不管是财阀的头目、经济团体的首脑，还是特殊银行的总经理们，作为“财界人”，他们的言行、奉行的政策，决不是个别的企业，具体的资本的利益。这一点似乎已成为这圈子里人的共识。也是因为这些财界人深知，只有这样，才能动员舆论，影响政策，形成财界整体的势力，实现日本国的繁荣和每一个具体的企业的发展。关于财界人的这种认识，我们可以从近代日本财界的“伟人”涩泽荣一的言行录中找到许多实证。甚至连身为三井物产的一个支店主任办事员的森恪，在与孙中山等交涉筹办中日实业公司时，也能大言不惭地宣称“这不是为了三井的利益，而是为了大日本的利益而干”之类的话。正是这些财界人团结一致，为了大日本的利益能够不计较本位得失，所以，他们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把日本民族的团体精神表现得至善至美。凭心而论，他们的上述精神是应该给予称道和评价的。

必须说明，日本财界人的“国益志向”所表现出的“财界人”的精神，固然与他们的社会地位有关，但也与日本民族的一致对外少搞不搞内哄的团体精神有关。严格地讲，“国益志向”，反映出“财界人”的“团队”本质。

如果把“国益志向”，定义为财界的组织本质的话，那么也可以把“对外志向”看成是体现在财界人身上的，近代日本经济建设经济扩张的本质特征。而且，财界的对外经济活动正是这种本质

的外在表现。

财界的“对外志向”，在财界的发展史中表现得十分清楚，这显然是由于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后起性、军事性所产生的必须更多地依存对外经济扩张、侵略有着极为密切的关系。我们应该看到，无论是明治政府五条誓文中的“求知识于世界”，还是明治以来经久不衰的“海外雄飞”、“振兴亚洲”的时代潮流，都反映出日本国策的特点和日本经济发展的特点。表面上，这种特点同福泽谕吉提倡的“脱亚入欧”截然不同，实际上，“振兴亚洲”只不过被财界一部分人看作是实现“海外雄飞”的必然过程，与前者殊途同归，两者都是服务于日本近代化建设、日本资本主义建设的。追源溯始，财界的“对外志向”之所以在财界发展史上占据了极其重要的地位，正是由于日本经济对外依赖性大，特别是两次战后经营所带来的战争景气，为日本成为亚洲强国创造了前所未有的良机。

强调“对外志向”，注重对外经济活动与发展的内在因素，是由第一期财界人的类型及第二、第三期财界人队伍的变化所决定的。第一，如上述，明治初期财界人中的相当部分，或长或短地具有海外留学、考察、工作等生活经历。他们不仅知道日本，同时也了解外国，清楚日本于世界中所占的地位。例如，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益田孝等，他们积极引进国外的先进的科学技术和进步的制度（涩泽荣一引进“株式会社”、“银行制度”），通过这种学习、模仿，促进了日本经济进步〔30〕。他们能突破狭隘的日本意识，扩大自己的视野，从世界经济的高度，考虑和规划日本的前途。说来令人惊奇，财界的资本主义建设纲领是“入亚赶欧”，与当时社会上的“脱亚入欧”成鲜明的对照。这种解释并非标新立异，而是二律背反的规律，正反和。这关系到东亚朝贡体系与西洋的关系，对财界来说，为了实现经济发展，他们选择了“入亚赶欧”的路线。从本质来说，这或许

也是日本财界主张对外经济扩张的动因。

另外，明治中后期，大量的官僚（外交官）、民间的大陆浪人加入“财界人”的队伍，致使这种“对外志向”越发强烈。虽然目前尚缺少这方面权威性的统计数字，难以清楚反映在“财界人”的队伍中，上述两部分人所占的比例如何。笔者引用《对支回顾录》和《续对支回顾录》两书中有关财界部分作了统计，近三百人中，大概有三分之一的人，出生于官僚与大陆浪人〔31〕。如小田切万寿之助（曾任上海总领事，后加入横滨正金银行）、松延弦（曾任天津、烟台领事，后加入三菱财阀）、仓知铁吉（原外务省政务局长，后任中日实业公司副总裁）、石原逸太郎（原长沙领事，后进入大仓财阀，主管鸭绿江采木公司）等等〔32〕。大陆浪人加入各大小财阀，从事实业工作的更不乏其人。这些人成为财界的一支骨干力量，他们的经历、知识丰富了财界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增大了“财界人”中国际派的成份，进而巩固了“财界人”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地位。

“财界人”的“对外志向”的思想基础，是明治前后风行于日本的“亚洲主义”思想。而“财界人”的第三个特征就是“亚洲主义志向”。“亚洲主义”思想，产生于1840年中国败于英国的鸦片战争之后。西力东渐，使岛国日本上下感到强大的威胁与不安。怎样应付不可避免的世界变局，有人主张攘外，有人主张日中联盟，有人主张效法西洋，不一而足，众说纷纭。这种围绕海防（即国防）问题而产生的意见分歧，最终演变成近代日本社会两种根本对立的思想。进入明治后，从上述的议论中就发展出以福泽谕吉为代表的“脱亚入欧”论和与中国携手、共同对付欧美列强的“亚洲主义”思想。关于“亚洲主义”思想的研究，是思想史研究领域中被众多学者所关注的课题，但是关于“财界人”的“亚洲主义”思想的研究，至今仍属空白。从思想史研究的角度上来看，这是一个值得注意，并很有意思的题目。不过，本文

的目的是把“亚洲主义志向”作为“国益志向”，“对外志向”的思想背景，通过考察“财界人”对外，特别是对华经济扩张，进而探讨这部分“财界人”的“亚洲主义”倾向在其经济活动中的具体表现和作用。这里，想指出以下几点。

第一，从经济关系上提倡中日同盟，建立以日本资金、技术同中国资源、劳动力、市场相结合的经济结构，是“财界人”“亚洲主义”思想中的一个重要部分，这也是有别于日本社会其它阶层的“亚洲主义”思想主张的。

涩泽荣一认为，日本的对华外交极不统一，基本上有四种形式：一是外务省的外交，瞻前顾后，常有“马后炮外交”之嫌。二是参谋本部的外交，立足于军事统治，时而偏激，受到中国国民与列国的警觉。三是大陆浪人的外交，左右摇摆，忽而支持南方举行革命，忽而援助北方，打击南方，总是介于其中，误导政府，遭到中国国民的厌恶。四是实业家的运动，主要主张日中亲善，以两国的经济提携与结合为最终目的〔33〕。他批判了外务省、参谋本部、大陆浪人的对华政策给中日关系带来的恶劣后果。指出，日中两国，“唇齿辅车”，日本对中国负有重大的责任。日本的对华政策应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保全领土为根本方针，并鉴于日本的东洋盟主的地位和日中两国历史上地理上的关系，应始终维护善邻友谊，实现相互提携之目的〔34〕。涩泽所主张的“亚洲主义”立足于两国的经济互助，源于两国间特殊的地理、历史、文化关系。他强调，以日中合办企业的特殊经营形式，坚持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保全领土的三项根本原则，则能够保证日本的优势和东亚盟主权。言外之意，这种“财界人”的对华政策，是合时宜，少偏颇，有利于两国国民的。历史地看涩泽所主张的财界的对华外交，“财界人”的亚洲主义思想，即“经济亚洲主义”，是后来所谓的“和平的扩张”的原则。

第二，财界人的“亚洲主义志向”，经过两次战争和辛亥革

命、尤其是到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形式与内容上都发生了不小的变化。最初，他们的日中经济同盟思想，主要从日本经济本身的考虑，企图以中国之长补其所短，同时包括改变日中经济关系中日本的劣势地位，保证日本产业革命的顺利发展。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财界人在考虑日中经济问题时，企图通过建立日中间的特殊关系，一方面能在国际竞争中，保持强有力优势，一方面希望建立大日本经济体系，对付西洋列强，对付第三国。辛亥革命后，特别是经过第一次世界大战，他们的日中联盟是要维护日本的东亚盟主地位。宫岛清次郎在谈到日中经济关系时说，“最近我国的产业陷入困境，因此，要打开出路确立产业立国的基础，最重要的是同邻邦支那在经济上提携，……支那大陆方面必须成为未来日本产业的新天地。（中略）总之，日本在东洋的地位及其关系应以‘非东洋之日本，乃日本之东洋’为前提。”〔35〕这番话，维妙维肖地合盘端出了日本财界所鼓吹的日中经济提携的最终目的。其妄图以经济为手段，建立日本东亚盟主地位的用意暴露无遗。

当然，“财界人”的“亚洲主义志向”的另一个用意，是企图通过两国实业界的对话，缓和清末民初中国民众的反日情绪。随着中日关系的恶化，日本的对华经济活动受到中国民众越来越公开、越强烈地抵制，排日运动遍及中国南北。如何才能找到解决问题的灵丹妙药，“亚洲主义”被一部分“财界人”拿过来，作拦箭牌使用。他们认为，日中间的矛盾，多半是相互间的误解，中国人误解了日本人的用意。日本的对华经济活动，谈不上扩张和侵略，经济活动本身对双方有利，只要这种关系紧密地发展，日中双方都会得到较大的实惠和利益。这时，鼓吹日中同盟来对付第三国，已经降为第二、第三需要。主要的目标则放在如何给中国的排日、反日运动降温，如何继续扩大日本的对华经济活动上。

第三，从思想深层来分析“财界人”的“亚洲主义志向”，

我们不能忽视儒学、汉学在近代日本社会的影响。

涩泽荣一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儒家经济人、财界首脑。他的另一个贡献，就是他从实业的角度对《论语》的解释以及在实践中的应用。对于儒学、汉学与日本实业发展的关系以及如何派生出财界的“亚洲主义志向”的问题，通过考察涩泽的言论或行动，我们或许可以得到一些启示。

著名的《论语算盘主义》，是涩泽荣一对经济道德合一说的高度概括。涩泽读书，能学以致用，他读《论语》能古中见今，又能雅中生俗。他注解《论语》，说明了“孔子与商业”的关系，阐述了论语主义与权利思想。他把儒教的伦理道德奉为人生哲学的根本，并强调儒学的伦理道德与种种的近代观念是相通的〔36〕。他指出：“由于学者从中的误传，孔孟之教到了日本，只成了士大夫之流的学问，与农工商毫无关系，因此，旧幕府三百年，汉学发达却与农工商无缘份。直到现在，幕府时代的越后屋、大丸等大商店，决不让其孩子们读汉书。这是被人误传的孔孟之道。”〔37〕涩泽认为，要循孔孟之教（即仁、义、礼、智、信）而行动，实业家、经济人绝不例外。经营企业亦同样。他告诫年轻的企业家，只有道德正义的企业方对增进国民的福利有所贡献。

正是基于这一原则，涩泽以身躬行，著《青渊百话》，批注孔孟之说，宣扬《论语》之道，俨然是近代日本最大的尊孔者。他请鸿儒三岛中洲博士制“论语算盘论”横幅挂于室内，举行《论语》、《孟子》等讲义，每月一至二次。念念不忘朝拜孔庙、孔府，在东京为孔子树碑，在日本实业界、日本社会影响极大。涩泽主张日中联合，其理由是“中国固有的仁义道德精神非常之可贵”，“中国与日本同文同种，回顾历史，中国可称为日本的师长之国”，然而“看到中国的现状，总有自己的老家遭受创伤之感”。为了扭转这种局面，涩泽以为“只要日中携手并进，大可不必步所谓先进国之后尘”〔38〕。

涩泽荣一认为，当前“日中携手并进”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两国经济关系的发展。其中，鉴于“东亚大陆开发是日本的国策”，因此，“开发中国的天然富源，乃我帝国与西邻中国的共同使命”。依涩泽看来，在儒家、孔孟之道的大旗下，日中两国实行经济上的联合，是天经地义的。“帝国的大陆经营”及“为实现这一大目标而进行的开发（中国）富源之举，同样是无可厚非的。所以，中国人对此有误解，实在遗憾”〔39〕。要解除中国人的误解，应该做哪些工作呢？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在谈到日本的对外发展的问题时，涩泽分析道：“就我经济界的未来而言，取决于战后的海外贸易如何，在诸多方策中，首先应该致力于东洋，特别是邻邦中国。因此，对于中国的排日情绪，我政府当局、一般实业家及一般国民，必须抓住时机竭尽全力，促进日中亲善”，“位于东洋的日本肩负率领中国，对抗西欧诸国的重大使命，值此之际，特别要守节义，表明与中国提携之诚意。反之，日中两国交恶，无论是对中国，还是对日本，都不是一件好事”〔40〕。

总之，涩泽荣一主张中日经济合作，其理论基础建立在“两国同文同种、唇齿相依”，加之“同奉孔孟之道”的特殊关系的认同上。其信奉孔孟，致力于日本对外经济活动的一生，时而得到中国人的理解，时而遭遇到中国民众强烈的反抗，究其原因，主要取决于日本财界的“亚洲主义志向”，其目的是要实现日本的东亚盟主、推进日本的对华经济侵略。“财界人”的“亚洲主义志向”，与军部、大陆浪人的“大陆政策”相比，尽管在手段、方法上有所不同，其侵略的本质是一致的。

【注释】

〔1〕 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编纂会：《新闻集成明治编年史》，第15卷，第207页，林泉社，1936年。同上，第6卷，第101页。关于《藤田事件与警戒财界的混乱》，见《朝野新闻》，1880年9月30日。即便如此，也很

难断言，“财界”一词，最初见于日本报刊杂志的确切时间。

〔2〕 山路爱山著：《现代金权史》，服部书店，1908年。本庄荣治郎编，1933年版的《改定日本经济史文献》中，山路一书被列为“财界”部分第一本。

〔3〕 关于明治时期的政商，山路爱山指出“（前略）在政府亲自干涉规划民业的发达下，由此而产生的阶层，我们称其为政商”。在这里，山路强调了政商是由上而下的日本资本主义发展政策的派生物。同前书，第33—34页。

〔4〕 这些位政商，是明治时期日本最著名的企业家，到中后期，几乎每人都有自己的经营团体，成为各财阀组织的巨头。虽然他们的资本有多少的差异，财阀组织有大小不同，但是在从政商成为财阀这一点上，他们都是成功者。

〔5〕 楫西光速：《政商》，第11—13页，筑摩书房，1964年。

〔6〕 参照实业之日本编辑出版《实业家人物评传》，1901年；土屋乔雄著：《日本的政商》经济往来社，1956年。

〔7〕 加藤幸三郎：《政商资本的研究》，见《日本经济史大系（5）》（近代上），第110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65年。

〔8〕 安藤良雄：《日本的历史（28）——资产阶级的群像》，第108—110页，小学馆，1976年。

〔9〕 同上，第129页。

〔10〕 明治期财阀经营者一览表（见下页）。

〔11〕 木村毅著：《人物财阀史——三菱、住友及其它》，实业之日本社刊，1946年。

〔12〕 同注〔8〕，第38页，表见第34页。

〔13〕 高桥龟吉著：《日本财阀的解体》，中央公论社，1930年参照。

〔14〕 楫西光速：《从政商到财阀》，筑摩书房，1964年，第94页。

〔15〕 森田良雄著：《我国的资本家团体》，东洋经济新报社发行，1926年，第15页。

〔16〕 东京商工会议所：《东京商工会议所八十五年史》上卷，1966年，第287页。

〔17〕 同注〔13〕，第24页。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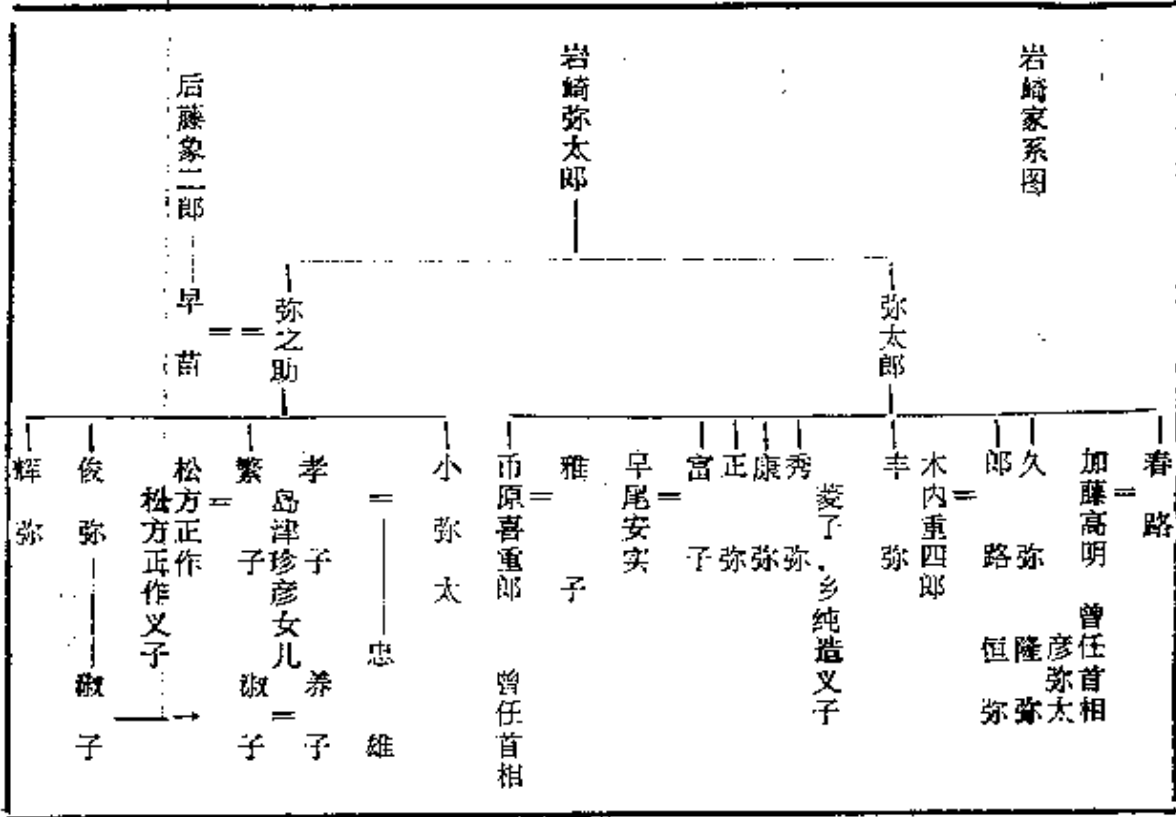
续表1

人	名	会社・明治期最的终职	生	年	学	历	前	职	出自	备	考
藤山	雷太	王子制纸专务取缔役	文久3(1863)	庆应义塾	庆应	农	县会议员	农	夫人为中上川夫人		
铃木	梅四郎	王子制纸专务取缔役	文久2(1862)	庆应义塾	农商	农商	时事新报记者	农商			
杉原	银次郎	王子制纸专务取缔役	庆应2(1866)	庆应义塾	农上	农上	海外新报记者	农上			
大田	重五郎	王子制纸专务取缔役	明治2(1869)	庆应义塾	高等商业学校		新闻记者				
〔三〕	〔三〕	〔三〕	庆应2(1866)	高等商业学校							
田川	平五郎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弘化4(1847)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庆应教师	儒医	弥太郎侄女婿		
部市	平五郎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嘉永5(1852)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弥太郎的表兄弟		
生清	吾美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安政2(1855)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谷田	震郎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安政5(1858)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田	次六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嘉永8(1853)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水原	治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嘉永2(1863)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三	平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嘉永元(1848)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三	平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万延元(1860)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三	平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安政2(1855)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江村	条一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庆应元(1865)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口島	弥太郎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庆应元(1864)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久田	秀道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庆应元(1865)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田	成二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安政6(1859)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延川	太郎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安政2(1855)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川	作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嘉永4(1851)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田	平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天保14(1843)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藤田	文一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嘉永元(1848)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永	省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安政元(1854)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近	正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嘉永5(1852)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浅	省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岩	省	三菱合资管管管(矿业部长)		庆应义塾	留学	儒医	官吏	儒医			

续表2

人名	会社・明治期的最终职	生年	学历	前职	出自	备考
小川 吉	日本邮船取締役	安政2(1855)		文部省官吏	士	
〔住友〕平刚	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店	文政11(1828)	育	官	农	广瀬幸平的外甥
〔伊田〕伊田河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弘化4(1847)	寺江户中	官	神	
〔河〕河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弘化4(1847)	寺江户中	官	士	
〔中〕中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安政3(1856)	寺江户中	官	士	
〔上〕上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文久元(1861)	寺江户中	官	士	
〔木田〕木田立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元治元(1864)	寺江户中	官	士	
〔川〕川	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住	庆应元(1865)	寺江户中	官	士	
〔保〕保	住友本店总理事	明治元(1868)	德国留学	官	医	
〔安田〕安田正	安田银行顾问	明治33(1870)	帝大法律系	农	商	
〔伊田〕伊田守	东京火災社长	天保13(1842)	江户中等教育	农	士	
〔武蔵〕武蔵	第三银行常务取締役	安政5(1858)	庆应义塾	农	士	善次郎二女婿
〔古河〕古河七	古河矿业理事长	嘉永5(1852)	寺子屋	官	商	
〔木近〕木近中	古河矿业理事长	安政4(1857)	寺子屋	官	士	
〔中〕中	横滨电业社长	明治6(1873)	高等商业学校	官	士	

岩崎家族谱系



[18] 同注〔14〕，第304页。

[19] 同上，第314—382页。

[20] 同上

[21] 同注〔8〕，第198—199页。

[22] 为参考起见，现将第一次、第三次会议的与会者名单摘要如下。

第一次会议：

农商工高等会议议长

枢密顾问官 伯爵 佐野常民

农商工高等会副议长

农商务次官 金子坚太郎

农商工高等会议议员（代表）

递信次官 男爵 铃木大亮

农商务省农务局长 藤田四郎

农商务省商工局长 安藤太郎

外务省通商局长 藤井三郎

大藏书记官	添田寿一
东京商业会议所	涩泽荣一
藤田财阀	藤田传三郎
大阪商业会议所	土居通夫
十五银行总经理	园田孝吉
三井财阀	中上川彦二郎
大仓财阀	大仓喜八郎
横滨商业会议所	原善三郎
住友财阀	广濑宰平
东京海上保险	益田克德
三井物产	益田孝
日本邮船	近藤廉平
富士造纸株式会社	森村市左卫门
京都商业会议所	滨冈光哲
合同瓦斯株式会社	井上角五郎
	山本龟太郎

第三次会议（第二次会议没有资料）

农商工高等会议议长	
东京商业会议所	涩泽荣一
农商工高等会议副议长	欠
农商工高等会议 议员	
藤田财阀	藤田传三郎
日本银行	高桥足清
大仓财阀	大仓喜八郎
安田财阀	安田善次郎
东京商业会议所	中野武营
日本邮船	近藤廉平
日本银行	山本达雄
横滨商业会议所	大谷嘉兵卫
三菱财阀	庄田平八郎
东京商业会议所	井上角五郎

东京海上保险	末延道成
	井上基太郎
京都商业会议所	田中源太郎
	山本龟太郎
大阪商业会议所	兼松房次郎
	铃本长藏
长崎酒商	松田源五郎
名古屋商业会议所	奥田正香
	远藤敬正
制丝商	佐野理八
筑丰铁道会社	仙石贡
爱国生命保险	岛田三郎
三井财阀	丰川良平
东洋经济新报	田口卯吉
	佐久间贞一
三十四银行	广海二三郎
	小栗富次郎
大阪商业会议所	土居通夫
京都商业会议所	滨冈光哲

资料来源：通商产业省編集《商工政策史》，第4卷，重要调查会，1961年通商产业研究社，第9页与第30—31页。

〔23〕 同上。

〔24〕 1893年，根据藏相渡边国雄的提议，设立了货币制度调查会，目的是要解决“经营价格变动对经济财政等问题的影响”，调查会由谷干城任会长，大藏次官尻稻次郎任副长，会员20名，除政界、农商务省、大藏省几个局长外，经济界有日本银行总裁川田小一郎、涩泽荣一，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园田孝吉，三井三菱的益田孝、庄田平五郎，详细见货币制度调查会编《货币制度调查报告》（见日本银行调查局编《日本金融史资料明治·大正篇》第16卷，1957年，第577页。

生产调查会是一个十分庞大的组织，1910年成立，到1912年11月27日，共举行五次会议，主要是调查、审议关于生产方面的重要事项，会长是农

商务大臣兼、涩泽荣一任副会长，当时任命的71名委员中，除了20名高级官僚外，其余的都是财界的代表，这是一大特点。1961年通商产业省编写的《商工政策史》第4卷重要调查会部分，着重介绍了生产调查会。其它的水产调查会，是1895年6月成立的。经济事情研究会，是1896年11月。工业谈话会是1896年7月，后为工业俱乐部。铁道国有调查会，是1900年3月。经济调查会是同年11月成立的。

〔25〕 森川英正《涩泽荣一——日本株式会社的创立者》，见官本又次、中川敬一郎监修、森川英正編集，《日本的企业与国家》（日本经营史讲座4），日本经济新闻社，1976年，第63—67页。

〔26〕 秋山哲：《财界四团体的组织与活动》，教育社，1978年，第7页。

〔27〕 1899年三井家的游园会于深秋11月18日举行，参加者有岩崎久弥，山本达雄日本银行总裁、相马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园田孝吉十五银行总经理，近藤廉平日本邮船社长、河岛日本劝业银行总裁、丰川良平、今村清之助，浅野总一郎、中野武营等日本财界、企业界首脑达200人之多，见1899年11月19日《中外商业新报》。另外，十五银行总裁浅野的游园会则规模更大，1897年4月5日，浅野的赏樱会参加者800余名。包括大山陆军大臣、陆奥外务大臣、渡边大藏大臣、野津大将、川上中将、伊东海军军令部长、德川公爵、前田侯爵、醍醐侯爵、蜂须贺侯爵、锅岛侯爵。楠本议长、涩泽荣一、三井三郎助、安田善次郎等。（见1897年4月7日《国民日报》）。

〔28〕 前岛省三，《资产阶级的政治进出》，见《岩波讲座·日本历史（17）·近代（4）》，1962年，岩波书店，第258—259页。

〔29〕 哈佛大学东亚问题专家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在同笔者的谈话中，几次提到当年他采访经团连会长石坂泰时，石坂一再强调：“战前的财界，对政府唯命是从，然而，战后的财界与政府是平起平坐的。”

〔30〕 涩泽荣一述、长幸男校注，《雨夜谭》，岩波文库，1984年。此外，三井财阀培养接班人的一个主要途径，就是将年青人送往欧美学习或视察，开闢他们的眼界。

〔31〕 参见《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上、下），《对支回顾录》（上、下），《续对支回顾录》（上、下）。

〔32〕 关于官僚进入企业、财阀集团的现象，是近代日本遗留至今日的传统，俗称“下凡”。战前财阀视外交官为涉外企业的宝贵人才。此外，军人退役成为企业家也是一大特征。参见铃木茂三郎著《财界人物读物》，第24—42页，春秋社，1937年。

〔33〕 涩泽荣一：《关于对支政策》，见《龙门杂志》，第352号，第26—28页。

〔34〕 同上。

〔35〕 官岛清次郎：《关于日支的经济关系》，第25—26页。

〔36〕 涩泽荣一：《论语与算盘》，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六，谈话2，第51—54页。

〔37〕 同上，第49页。

〔38〕 明石照男：《青渊涩泽荣一——思想与言行》，龙门社出版，1951年，第72页。

〔39〕 涩泽荣一：《对外发展策的要义》，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七，谈话3，第202—203页。

〔40〕 同上。

第二章

财界的“海外雄飞”

第一节 历史背景

——日本的“亚洲雄飞”与“亚洲主义”

1853年培理率领的美国舰队，打开了日本的国门。此后，由于日本民族主义思想高涨，“亚洲雄飞”的构想作为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目标，开始正式地出现在日本社会。

1854年（安政元年）《日美亲善条约》签订之后，日本一些有识之士开始有意识地把被迫的“开国”转变为主动走向世界的第一步。如何实现“海外雄飞”成为社会上各种议论的热点〔1〕，人们的注意力很快集中到“亚洲雄飞”的问题上。“亚洲雄飞”的构想，内容驳杂、无所不包，从主张国家、民族独立的要求到对外发展扩张的计划，应有尽有〔2〕。它们为日本近代国家的建设，提示出了两条截然不同的方向。“亚洲主义”作为一种时代潮流，正是在这种时代背景中形成与发展起来的。

探讨“亚洲主义”的发展史，并非本文的目的，但因为“亚洲主义”思想的产生、发展及其演变的过程，直接影响着明治时代日本海外殖民思想的形成，故有必要对“亚洲主义”的起源，初期形态略作分析，从而为进一步考察日本财界的对华认识与对华政策提供必要的历史背景材料与思想背景的材料。

一、亚洲主义的由来

(一) 鸦片战争的冲击

中国清政府在鸦片战争中败北的消息传到东瀛，日本朝野上下无不为之震惊。日本和中国同处亚洲，面对西方各国的威胁，日本应该如何自卫，一时众说纷纭。在当时影响比较大的两种意见中，就有“亚洲主义”即亚洲各国联合起来抵御西方侵略的思想。

危机感的增长

对于1840年以前的日本来说，中国是文化上的先进国家，是“尧舜以来的礼乐之邦”。可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失败，却给日本以强烈的冲击。因为它意味着连清政府的“天朝帝国”也不得不败给西方列强的强大军事力量与经济力量，因而极大地动摇了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

台湾政治学者许介麟，在谈到鸦片战争给予当时日本知识阶层思想上的影响时说：“所谓的‘西洋的冲击’，对日本武士的思考方式，最先而最大的打击，要算是鸦片战争了。大清帝国战败而缔结城下之盟《南京条约》，这消息令日本幕府以下的武士及知识阶层大为惊讶，当时的心理反应，可以用愤激、恐怖、深忧、警戒等词来形容。”〔3〕

涩川六藏于1841年8月15日写给幕府老中水野忠邦的意见书，代表了当时日本知识阶层对鸦片战争的最初反应。最早知道鸦片战争消息的涩川在意见书中说：“近来清国、英吉利两邦，因交涉而战，据传闻云，清国恐难逃失败。”流露出一种极大的不安和危机感。佐久间象山在受到这一冲击后也说：“风传唐虞以来礼乐之邦，已化为欧罗巴之腥秽，令人丧叹。”〔4〕

然而，日本人在当时的反应并不仅仅是惊讶和感叹。吉田松阴于1858年编写的《清国咸丰乱记》一书中，不仅对中国形势表示出深深的危机感，而且对“夷狄”的侵略也抱有了一种强烈的

戒心。同时他还更多地谈到了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主张日本应引以为戒：“夷所侵之地，满清土崩瓦解，此事姑且不论。然仓惶赔款请和而后止，其间不见复出举义之士，其衰弊何其甚也！盖因纲纪废弛，不登贤士、操练不精之故也。呜呼，前车之覆，后车之鉴，吾邦不可不戒。”接着，他还指出，“惧夷贼，不以金钱与之义勇，此广东败于夷人之所以也。”〔5〕

这类论说，点出了清政府的软弱无能，也带来了日本人心目中的中国形象的剧变。

中国形象的剧变

涩川六藏透过鸦片战争，把清国看成是日本防御外来之敌的反面教员。他指出：“政治不良则民心易动，清国之骚乱可归根于政治之失当。（吾人）切不可掉以轻心，当以行善为天下之大义。”〔6〕从研讨鸦片战争中清国的失败，进而讽喻，评论日本的政治，是当时日本人议论鸦片战争时的最具代表性的意见。而中国在日本人心目中的地位，也从理想的天朝帝国一下子沦为不能效法的坏榜样。那末，当时的日本人到底是从哪几方面来探讨鸦片战争失败原因的呢，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又发生了哪些变化呢？我们大致可以归纳为以下三点。

（1）儒学的非实用性

清朝的儒学纯属纸上谈兵，缺乏实用性。这一点，佐久间象山早在鸦片战争刚刚结束的1842年（天保十三年）就提出来了：“清儒之学问，考证虽精密，毕竟多纸上空谈，不堪实用。近来大败于英夷之手，且为世界万邦所耻笑，亦为此之故也。”〔7〕这种认识里，实际上已包含了对西洋物质文明优越性的认同。但是，中国为什么对西洋文明和世界形势视若罔闻，认识不足呢？这种认识上的迟钝究竟来自何处呢？随着对西方物质文明优越性认识的深化，日本的知识阶层开始从中华思想以及中国对西洋文明的无知上来探讨中国在鸦片战争中失败的原因。

(2) 中华思想导致中国无视西方文明

1847年（弘化四年）斋藤竹堂撰写《鸦片始末》时，是这样论述清政府的失败的：“堂堂的圣贤大国清国为何竟败于丑虏之国英国，究其原因，无非是清国以中华自夸，蔑视海外诸国，无视外国机械进步之故也。”〔8〕横井小楠也曾列举过种种理由，来说明中国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中国作为亚洲之大邦立文明于万国之先，却视外国为蛮夷，完全是古时的观念〔9〕；中国之所以堕落，主要根源就是“中华思想”以及由此派生出来的中国的“国体失堕”，再加上对世界局势的无知。

(3) 官僚的腐败和民众的麻木

1848年，吉田松阴在谈到清朝败于英国的教训时，曾指出，“纲纪废弛、不登贤士、操练不精”是其主要原因。对于纪律松弛和人才问题，福泽谕吉的批评更加尖厉：“支那的政治，可用西洋语Despotic（专制主义）来描述。唯高位者是从，此风一长，国中之人皆滋生公差之习性，人人应付公事，真心为国家思虑者少，终至蒙受外国之侮。”〔10〕这样，在福泽那里，产生政治体制腐败，人心涣散，并且终于导致对外战争失败的原因，统统被归结到昔日最高文明的儒教道德上，归结到中华思想的保守、落后性上。

当时的日本人，通过以上三个方面对中国战败原因的种种探求，改变了迄今为止的对华认识。同时，中国在鸦片战争中的败北，也使日本人日益强烈地感受到，来自欧美的威胁已成为十分现实的问题。1855年到1865年的短短十年里，日本先后同美、荷、俄、英、法等国缔结了多项通商条约，即所谓“安政五国条约”。但这种外交上的努力，并没有使知识阶层减弱对外来侵略的警惕，更多的知识分子开始摸索怎样才能不蹈清王朝覆辙，解决危机的途径。在众多的议论中，两种最有代表性的意见：日中“唇齿相依论”和“日本盟主论”逐渐成为主流。

（二）日中唇齿相依主义论

鸦片战争后，面对欧美列强咄咄逼人的攻势，日本民族经过彼此力量的对比，一方面既认识到欧美列强是值得模仿的先进国家，同时又担心日本总有一天会被西来洪水所吞蚀。抵抗欧美列国侵略态势的主张也应运而生。抵抗主张的出现，一方面产生了对外膨胀的意识，另一方面又促进了与同受欧美列强压迫、又同为亚洲文明邻邦的“东洋各国”尤其是与中国实行联合、合作意识的萌生。当时日本人对欧美列强的危机感和与中国联合合作意识，大致有以下几个内容：（1）日本与中国同为欧美侵略的对象，命运相同；（2）为此，日本有必要同“太国”中国实行联合；（3）日中联合，日本就得到了中国这个抵御西方列强进攻的“屏障”〔11〕。

所谓“日中唇齿辅车论”，正是揉合了这三个内容。

在上述涩川六藏致老中水野忠邦的意见书中，涩川还认为：

“清国同我邦乃唇齿之国，日本应该同地理上仅一衣带水之隔的邻邦中国保持携手合作、互相帮助的关系”〔12〕。同样的认识，在高杉晋作那里也可以找到。高杉晋作1862年访问中国，回国后他在叙述自己的观感时曾说过，日中两国是“唇齿辅车之关系”；这大概就是用“唇齿辅车”这个惯用语来比喻中日关系的喻矢〔13〕。他在分析了中国衰败的原因后还指出，为了抵御西洋势力的东渐，形同唇齿的中日两国必须结成一体，同时，东洋各国（即亚洲各国）自身也必须强大起来。高杉晋作之所以把日中关系比作“唇齿辅车”，之所以对中国寄以特别的关注，这完全是由于他自幼受儒家思想的影响，以中国封建传统思想“忠孝”为行动准则，崇奉东洋文明、东洋道德的缘故。可以看出，日本一部分知识分子，面临西力东渐的世界局势，也萌发出了以东洋文明为基础，日本与中国及亚洲各国进行合作的念头。

应该指出，鸦片战争虽使日本人对中国的看法发生了很大的转变，但仍然有人认为，中国虽然国力减弱，毕竟不失为大国。因此，

这部分人坚持日本只有与中国携手合作，才能抵御压境的外敌。

佐藤信渊在其《存华挫夷论》一书中主张要把中国看作日本的“屏藩”：“若清国之势日益式微，西夷贪得无厌，祸水东渐，恐至本邦。故愚意以为，当使满清之君臣，逐去西夷，令东洋无其余类，永为本邦之西屏。”〔14〕这就是立足于把中国当作日本“屏藩”观点而提出的“日清提携论”的雏形。

可以看出，这种日清提携论，完全是出于维护日本的独立、解除日本的危机的考虑，始终围绕着日本的自卫问题而展开的。但另一方面，这种主张里也含有中国和日本同受“西洋”的压迫，两国命运与共，中国是日本反抗西方压迫时必须予以联合的盟友的意思。“亚洲主义”中的日中唇齿相依的思想，正是这样酝酿成熟的。

（三）日本盟主论

涩川所提出的日中之间唇齿辅车的关系，至少含有下述三个方面的意义：

首先，是反映了日本自身在当时的危机感，这种危机感，颇近似于现在人们经常提到的“多米诺效应”。其次，正如涩川所强调的，清政府如果败北而垮台，作为唇齿之邦的日本，将不得不进行自卫。再次，日本为了自卫，必要时也可以中国为屏蔽。以上这些，其最首要的意义是为了抵抗西方列强对亚洲的企图而十分自然地采取的对策，他们认为中国败在西方列强手下，对日本自己来讲也是十分危险的事情，所以才在考虑日本未来命运的时候不得不将中国的命运也联系在一起。因为一旦中国失败了，日本能不能依靠自己的力量实行自卫，更多的日本人还是疑惑重重的。因此，在这种考虑下，为了振兴亚洲，亚洲各国必须协同一致，共同抵御西方列强的意识高涨起来，只不过主张的核心内容已变成由日本取代中国，实现以日本为中心的亚洲联合而已。而此后的日本历史和中日关系，也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按照这个方向发展过来的。所以，涩川六藏在受到鸦片战争冲击后提出来的日中“唇

齿辅车论”，应当说就是后来盛极一时的日本盟主论的理论先驱。

第二节 几个民间“兴亚”团体

在本部分，我们考察几个民间“兴亚”团体：玄洋社、东亚同文会（后改为东亚同文书院）、东邦协会、日清贸易研究所、日韩通商协会、朝鲜协会共六个组织。前三个组织，主要以大陆浪人为主，活动多种多样，他们的活动范围，偏重于中国大陆。日清贸易研究所、日韩通商协会、朝鲜协会是从事经济、贸易为主的团体，其中日清贸易研究所重点乃是中日经济问题，后二个组织则主要经营日朝两国的经济贸易。同前四个组织不同的是，后两个组织，完全是以财界人为核心的经济贸易“兴亚”团体。

需要说明的是，亚洲主义思想正是这几个民间“兴亚”团体的理论纲领。我们考察这几个兴亚团体的活动，首先要加强对其时代背景的认识。由于他们以振兴亚洲、解决亚洲为共同的纲领，追求日本的“海外雄飞”、财界的“海外雄飞”，加之他们在组织上又有很多重复会员，所以，尽管相互间有同有异，但是在大的问题上，几乎常常是一致的。选取这几个组织进行考察，我们可以通过他们在国内外的活动，了解日本民间团体、日本财界各种力量追求“海外雄飞”的过程。同时，力争客观地阐述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这些团体与个人是怎样有分有合、有主有从，各自扮演不同角色的。

一、玄洋社

玄洋社是1881年（明治14）由平冈浩太郎及头山满等人在九州福冈创立的国权主义者的组织。作为最早奉行标榜大亚洲主义的行动团体，玄洋社在近代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玄洋社的宗旨是：

“第一条，须敬戴皇室；第二条，须热爱祖国；第三条，须固守人民之权利。”〔15〕

玄洋社社名的由来，据说是“意在表明欲跨越玄海滩之波涛远征亚洲大陆之抱负”〔16〕，显而易见，这个团体的创立目的，首先是针对着亚洲大陆的。

玄洋社的成员，几乎都是出身福冈地区的下层武士，有的人参加过幕府统治末年的尊王攘夷运动，也有的人参加过19世纪70年代士族的反政府运动。他们认为，对外问题的本质是一个爱国的问题，所以《玄洋社社史》一书的序文开宗明义地表达了他们的信念：

“筑紫之地（指福冈一带）自古对外就有甚为密切之关系，筑紫人对满（中国东北）、韩（朝鲜）之观念，乃祖先血统之传承。……夫对外之观念，实为爱国心之反映。譬之若掌，表则为爱国心，背则为对外之观念，故其之发露，无一不基于爱国之至诚。”〔17〕

此外，序文还明确地指出，玄洋社的一切目的，就是在于提倡和实践日本海外发展的方针：

“玄洋社之志向，向来不在国内之政治斗争而在清、韩，清、韩素来为其关注之最主要之目标。然而，国内事端多发之时亦不妨坐视，时而亦在内地试行其活动。”〔18〕

玄洋社所主张的“国家人民之权利”，实际上就是为士族争参政权。呼吁伸张民权，建议开设民选议院等活动，都是围绕这一目的而进行的。同时它所宣扬的“爱国”，即是伸张国权，宣扬国威，积极对外活动。而对外活动即是对外侵略扩张，侵略的主要目标是亚洲大陆，首先是朝鲜，并通过朝鲜进入中国的满蒙，与日本政府的“大陆政策”的扩张目标几乎相同。玄洋社主张以日本为盟主的大亚洲主义，它曾策划过在朝鲜的颠覆活动，进而吞并朝鲜。正如木下半治所说，他们是“在日清、日俄两战

争及朝鲜问题——主要是日韩合并问题、侵略满洲问题上，以所谓民间志士身份进行了诸多活动”〔19〕的一批人。玄洋社自成立以来，从明治初年到明治20年代，就始终在背地或公开的场合，围绕着日本的内政、外交问题，发表强硬言论，从事激进活动。他们的活动大部分是幕后性质的工作，其手段也充斥着阴谋式、武装式甚至暴力式的东西。

玄洋社就是依靠着这样一些活动，对近代日本国家的发展发挥着无名英雄式的作用的〔20〕。他们的活动方式，多为后来的国家主义团体所接受继承。

在近代日中关系史上，民间人士、民间团体、民间活动、民间外交等等，是一种十分奇特的存在，它们是由于玄洋社的出现而滋生的，并发挥了越来越大的作用。关于“民间”这个辞汇的特殊含义，头山满曾经作过这样简单而明确的说明：

“人真是不可思议，在民间的时候怎么看都让人觉得是个男子汉，有前途的人，一进官场这个特殊的社会，就变成了一文不值的、断了脊梁骨的幽灵。不管是官吏还是军人，没有官衔，都是敢说敢做的汉子，可就是一当了官，立刻成了窝囊废。见了元老们就像老鼠见了猫，只会奉承拍马，再也没有了自己的主见。张嘴就是奉承话，毫无羞耻地吹捧，礼貌应酬无可挑剔，连职业帮闲都做不到的种种丑态比比皆是。国家的干城墮落到了这般地步，怎不叫人失望、凄凉！”〔21〕

因此，作为民间团体的玄洋社，在对外事务上，是可以拥有比政府官员、军人更多的自由度，从而能够基本上按照自己的意愿来开展活动的。头山满本人大概也正是出于这个考虑，才始终甘居在野的地位，指挥玄洋社的大陆浪人的。这种特点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个重要特征。

玄洋社的活动，偏重于实际行动方面，有时甚至不惜使用武力。暗杀是玄洋社的传统，狙击过大隈重信的来岛恒喜，就是玄

洋社的“英雄”〔22〕。对于朝鲜和中国问题，玄洋社主张日本应当实行积极地武装介入，以达到目的。明治27年，朝鲜亡命政治家金玉均在上海被暗杀的事件，给玄洋社介入朝鲜问题提供了口实〔23〕。他们组织了“天佑侠”，潜入朝鲜，一边挑动战火，一边支持东学党的农民军，以“民间外交”的强硬姿态，抗衡政府的“软弱外交”。

玄洋社的这些活动，乍看与日本政府的政策相矛盾，但实际上正如玄洋社在其宗旨中所表明的那样，玄洋社的目的与日本政府基本上是一致的。只不过是玄洋社作为民间的团体，在追求这些目的时特别是在日本的对外侵略扩张上，其主张与所采用的方法都更加强硬而露骨罢了。

为了实现日本向亚洲大陆扩张的目的，玄洋社随时都在注视着政府的外交政策，关心着国内的政治问题。有时他们引导舆论，对政府的政策进行抨击，有时又采取暴力行动，强制性地将政府推向既定的轨道。从这个意义上说，玄洋社的活动，是扮演了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扩张的别动队作用。

玄洋社另一个方面的重要工作，就是集中全力搜集有关中国的主要是军事方面的情报。另外，在对中国进行实地调查方面，玄洋社的活动丝毫不次于日清贸易研究所和东亚同文书院等等。不仅如此，甲午战争之际，内田良平甚至还屡次以“献策”的形式向日本陆军提出自己关于时局的“个人意见”。民间人士采取“意见书”、“献策”的形式参与、影响日本政府的政策，在近代日本政治史和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屡屡发生，这也可以说是近代中日关系史上的又一个特征。

二、东亚同文会

玄洋社是个把据点设在日本而以对外扩张为目的的团体，而东亚同文会则不同，它是一个从开创时就把据点设在中国，并且

以此来推进日本大陆政策的民间团体。

东亚同文会是在1898年由东亚会和同文会两个组织合并而产生的团体。合并之前的东亚会，成立于1897年春，是由最热心中国问题的东京大学“同明会”、早稻田大学“同人会”的一些成员再加上陆羯南、福本日南、三宅雪岭、志贺重昂、池边三山等学者、新闻界人士、犬养毅、平冈浩太郎等政治家以及小幡酉吉、井上雅二等人组成的集团〔24〕；而同文会则是以近卫笃磨为会长，以汉口乐善堂荒尾精率领下的宗方小太郎、井手三郎、中西正树还有日清贸易研究所出来的白岩龙平等人为核心成员的团体。

两个会的宗旨基本相同，而且各自拥有对方的一部分交叉会员，为了便于接受政府提供的资助。1898年10月，双方实行了合并，更名为“东亚同文会”，推举近卫笃磨为会长。11月2日，东亚同文会在芝公园的红叶馆举行成立大会，发表了自己的纲领和宗旨书，其内容如下：

纲领：“一、保全支那；二、帮助支那、朝鲜之改革；三、研究支那及朝鲜时事，以期实行；四、唤起舆论。”

宗旨书：“日清两国之交久矣。文化相通，风俗、教化相同，以情而论有兄弟之亲，以势而论则有唇齿之形。其玉帛之往来，自古不渝，正可谓出于天理之公、发于人道之正之故也。岂彼等环宇列国，朝婚夕寇，互相攘夺者可此也。……两国士大夫即为中流之砥柱，须以诚相交，讲明大道，以助上律下，同致盛强也。是乃我东亚同文会设立之所以也。请两国士大夫同生此洲、同志于此时者，赞此意，入此会，戮力于此！”〔25〕纲领和宗旨书，反映了东亚会和同文会的主张。“保全支那”是一个最具代表性的纲领。

另外，东亚同文会还设立了“会友制度”，就是说孙中山、康有为等人虽不能参加该会，但可以因此而享到会友的待遇〔26〕。

东亚同文会创立时的会员约有60人左右，近卫笃磨、陆羯南、池边吉太郎、佐藤宏、井上雅二、田锅安之助等六人被选为负责人。

第一任会长由近卫笃磨担任，副会长是长冈护美，干事长陆羯南（实），评议员则有犬养毅、池边吉太郎、伊泽修二、星亨、神鞭知常、谷千城、根津一、内田康哉、陆羯南、佐佐友房。清浦奎吾、岸田吟香、平冈浩太郎等人出任〔27〕。为了开展搜集情报、创办学校、发行报纸杂志等工作，东亚同文会还在中国的北京、上海、汉口、福州、广州五个重镇设立了支部，由中西正树、井手三郎、宗方小太郎、中岛真雄、高桥谦五个人分别担任各支部的主任。凡是搜集来的比较重要的情报，都直接递交总理大臣、外务大臣、参谋本部、海军军令部及陆、海军省等有关机构〔28〕。

会长近卫笃磨是个很早就抱有强烈的国家主义信念，以“有骨气、有见识、有力量”而知名的少壮华族政治家〔29〕。他一直关心东亚问题，并且和很多同时代的国家主义者一样，也认为日本的独立与中、朝两国命运紧密相关，格外强调“保全支那”、“扶助朝鲜”的急迫性，呼吁日中之间提携、合作。他最关心的事情是东亚全局的安危，他最大的“功绩”是将有志于复兴亚洲和日中提携的人集合、组织到了一起〔30〕。

近卫笃磨在意识上经常把“西力之东渐”看作白人对东方有色人种的人种上的歧视，东亚同文会成立之前，他就在《太阳》杂志1898年1月号上发表题为《同人种同盟及研究支那问题之必要》的论文，主张“日清同盟论”，有些欧美人因此而认为他是一个“排斥白人论者”。他所主张的“日清同盟论”，其内容就是一旦各国联合起来准备瓜分中国的时候，日本决不可盲目行动，轻易陷入（西方）各国的谋略中。十个月后同文会成立时，他又在《中外时论》上发表文章说：“东洋乃东洋人之东洋。东洋问题

之处理，固属东洋人之责任。清国国势虽衰，弊在其政治而非在其民族，（彼与我）共同携手以从事保全东洋之大业决非难事”〔31〕，这就是他所提出的“支那保全论”。

近卫的“支那保全论”，是他长期以来主张的“同人种同盟论”、“日清同盟论”的延长，是为了日本的国家安全、国家利益而提出的与中国“同盟”，“保全”中国的构想。近卫以为，亚洲和西洋的对垒，实际上是黄、白人种的对垒，在这种情形下，“支那人也好，日本人也好，都是白色人种的仇敌”，所以他提出：“支那人民的存亡，决不是他人的休戚安危，而是与日本人自身利益相关联的东西。”〔32〕因此他才坚持认为日本为了自己也必须与“清国”携起手来，必须使日本身边有一个“健全的支那”。近卫的“支那保全论”，实际上是继承了鸦片战争之后佐藤信渊提出的把中国变为日本的“屏障”的“中国屏障论”思想的产物，同时与后来内田良平提出的“日本盟主论”也有惊人相似之处，即只要中国免遭西洋瓜分，即使它再腐败、再衰弱、待日本的国力增强之后，就可以保住日本及亚洲的安全，所以，当前最首要的任务，就是日本向亚洲大陆的“雄飞”和振兴亚洲。

近卫对中国问题的这些认识，就成为早期东亚同文会的宗旨并被实际加以贯彻执行。日俄战争前夕的1904年1月，刚满40岁的近卫因病而死，此后，东亚同文会的会务活动江河日下。相反，倒是东亚同文书院的活动日见起色，获得了一定的发展。

日俄战争爆发时，东亚同文书院的第一、二届大部分毕业生都参加了军队，担当随军翻译。1907年，外务省又向他们提供了3万日元的中国内地旅行调查经费，并要求他们把调查的结果写成报告书，提交参谋本部、外务省和农商务省〔33〕。

为此，东亚同文会首先设立了调查编纂部，后来又设立了事业部，分政治、经济、社会、历史、地理等各个方面调查、研究

中国的情况，并将其公布于日本社会。所以正像《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一书所说的那样：东亚同文会从创立到1945年为止的47年间，始终如一地致力于搜集中国及亚洲问题的各种情报、资料，这些记载将会长久地留给后人〔34〕。

此外，以甲午战争为契机，东亚同文会不仅注意培养日本学生，还创设了专门培养中国学生的“日本留学生部”。东亚同文会的另一个最重要的事业，可以说就是培养当地的中国学生和编辑、发行有关中国问题的资料这两大项。从1901年（明治34年）到1922年（大正11年）的20年间，东亚同文书院一共培养出了864名中国学生，他们每年的毕业人数如表一所示。

表1 东亚同文书院中国学生毕业人数统计表

年度	1901	1904	1905	1906	1907	1908	1909	1908	1901	1902	
	1903										
毕业人数	49	22	1	28	48	114	61	91	75	33	
年度	1913	1914	1915	1916	1917	1918	1919	1920	1921	1922	合计
毕业人数	146	70	40	12	10	1	43	7	10	5	864

资料来源：外务省记录文书，《东亚同文会关系杂件》第1卷，引自《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63页。

东亚同文会主办、发行的出版刊物大致有以下几类：

一、报纸：

《同文沪报》(上海)、《汉报》(汉口)、《闽报》(福州)、《咸报》(天津)、《盛京时报》(北京)。

二、杂志

《亚东时报》(上海)、《东亚时论》、《东亚同文报告》、《东亚同文支那调查书》、《支那》。

三、书籍

《支那经济全书》、《支那省别全志》、《新修支那省别全志》、《特种条约汇纂》、《清国商业总览》、《支那政治地理志》、《支那工业总览》、《支那年鉴》、《支那人名鉴》等等〔35〕。

三、日清贸易研究所

日清贸易研究所是早在明治中期间世于日本社会的一个亚洲主义团体，岸田吟香和荒尾精为这个组织的创始人。

岸田吟香(1833—1900年)出生于冈山县，是位精通汉学、兰学(西洋近代科学)的秀才。1866年来到上海，此后30多年间，他以专门贩卖眼药水的“乐善堂”为据点，帮助许多从日本来华的民间人士的活动〔36〕。身为财界的一员，岸田吟香也是大陆浪人的先驱，岸田最重要的活动和贡献，应数向日本介绍中国的情况和由他提议而开展的培养日本的研究中国问题的人才这两个方面。岸田详细地研究过西方势力在中国渗透的实际状况，为亚洲行将面临的危机担忧，为了日本的未来，他认为当时最紧迫的任务，就是日中的经济提携和开发中国。后来，他和年轻的陆军军官荒尾精相识后，俩人所见略同，情投意合，开始把日中提携这一“东亚大业”付诸于实践。

荒尾精(1858—1892)是尾张藩藩士义济的长子，年幼负芘京华，受到菅井诚实的影响，很早就开始注意中国大陆和朝鲜问题。

1878年他进陆军教导团学习，1883年毕业后升为陆军少尉。他认为，唯有中国大陆，方是用武之地，为此，他曾多次考虑过

辞去军职，也曾以一个小小的少尉身份面见陆军大臣大山岩，当面陈述了自己对中国、朝鲜问题的意见。明治19年4月荒尾在上海与岸田吟香的相遇，成为改变他一生命运的转折点。此后，他在岸田的资助下在汉口开办了一个“乐善堂支店”，把在中国各地漫游的日本浪人们召集到自己身边，组织他们进行搜集中国情报的工作。聚集在汉口乐善堂的日本浪人有30多人，他们以“梁山泊”自称，在当时颇有一些名气〔37〕。

1899年，荒尾精向参谋本部提交了一篇2.6万余字的意见书，总结了自己在华三年间的工作，并对今后日中关系的发展提出了若干建议〔38〕。他在意见书中强调“清国之地势，与我国有唇齿相保、辅车相依”之关系，清国之状即我国之忧，非手足之疾而实为腹心之疾也”，强调日本和中国是一个命运共同体〔39〕。对于中国的现状，他认为清政府“腐败而无振兴之望，（即使采取）‘和亲’政策，亦恐徒费时间而无效果，反予列国以可乘之隙”〔40〕。但是，对于强硬派的武力解决中国问题的意见，他持理相争，极力反对。认为，东洋之所以陷于如此可悲的境地，主要是日清之间贸易未得到发展的缘故；所以当前最紧迫的任务，应该是振兴贸易；但日本目前缺少从事日清贸易的适用人才，为此他提出了创办一所“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建议。

荒尾精认为，设立日清贸易研究所的主要目的，是要服务于日本发展对华贸易的事业。当时两国间的贸易，主要掌握在中国人手中。他指出，不改变眼下这种以中国人为中心的日中贸易现状，不但日本对外贸易的发展无从谈起，甚至连日本军备的扩张也是纸上谈兵。“弘扬国威”将难以实现〔41〕。荒尾精的思路，实际上就是要通过日本在中国商权的不断扩大，建立同西欧各国之间的经济提携网，进而实现共同的富强，达到保卫东亚安全之目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新设的日清贸易研究所，与专门从事武力及骚乱的玄洋社确实有大不相同的一面。这一点是值得人们注

意的。战后出版的《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一书，甚至把荒尾精这种依靠经济提携来实现东亚防卫的主张，誉之为“超凡脱俗”的“远见卓识”〔42〕。

日清贸易研究所成立之际，得到了来自日本政界、财界以及陆军等方面的支持。当时的首相黑田清隆、大藏相松方正义、农商务相岩村通俊曾先后表示了坚决支持的态度，陆军参谋次长川上操六和陆军次官桂太郎甚至提供了陆军医院和警官训练所让荒尾精使用。一次，荒尾精为招募来的学生检查身体的费用没着落而发愁时，是川上帮助他搞到了4万日元的内阁机密费〔43〕。1893年（明治26年）9月，日清贸易研究所正式成立，第一批150名学生入学〔44〕。但是，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寿命并不长，1896年6月不得不宣布解散，前后存在了不满三年的时间。

不过，在这短暂的三年里，日清贸易研究所于中日关系上和日本的中国研究上发挥了极大的作用。首先是他们编写了一部至今仍被奉为近代日本研究中国问题的经典著作《清国通商总览》。这部三卷二千数百页的宏篇巨著，在实地调查的基础上记录了当时中国的商业地理、运输、交通、金融、产业、商业习惯等各个方面的情况，可以说是明治时代出版的有关中国问题最详尽的、经典式的百科全书〔45〕。

日清贸易研究所的另一项主要工作，是向日本政府、军部及其他各界提供有关中国的情报。这些情报主要集中在经济、贸易方面，如：《清国通商总览》等等，此外，明治26年7月设立的“日清商品陈列所”颇值得一提。这个陈列所是大阪豪商冈崎等人出资在上海河南路修建起来的，由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毕业生在那里展销各种日本商品，观察、记录中国人的反映，然后将其报告日本国内〔46〕。这就是所谓“工欲善其事，必先利其器”的作用〔47〕。提供这类情报，实际上，为日本拟定对华经济侵略计划，确实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日清贸易研究所第三方面的作用，是唤起了日本人对中国问题的关心。荒尾精死后，有这样一幅悼念他的挽联：“世人称君之功，多举君率同志、弟子从‘征清之役’（指甲午战争），于国大有效力云云，此实乃君功之一端耳。夫举世滔滔醉心欧美之时，君大声疾呼，提倡东亚经纶，唤醒天下对清之意识，此之伟功与征清之役时相比，其轻重大小固不可同日而论。”〔48〕这种评价，应当说是有一定见地的。近代日中关系史上，民间团体、民间人士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而民间团体、民间人士所从事的培养人才、出版书籍、提供情报等几项主要活动，都是从日清贸易研究所这里发源的。不管从人员、事业内容及思想认识的哪一个方面来看，日清贸易研究所都可以说是东亚同文会和东亚同文书院的前身，他们的活动、他们对中国的认识，对同时代的其他日本人也产生了较大的影响。荒尾精死后，在东京赤坂灵南坂上阳泉寺以及筑地本愿寺为他举行了隆重的葬仪，从出席葬仪者的名单中，人们就不难断定，日清贸易研究所的活动，实际上早已得到日本社会的注目〔49〕。

四、日韩通商协会

日韩通商协会于1894年9月成立，它是近代日本社会的第一个以国际经济问题为中心的财界团体，也是中日甲午战争中，日本获胜的产物。当时的日本，正处于明治维新以来第一次击败亚洲强邻大清帝国，逐步加紧资本主义的发展过程中。战胜中国后，乘胜奋进，跃入世界贸易的舞台，是日本财界有志之士创建成立日韩通商协会的最大动因。

“征清连胜的结果，东方日出国民，作为东亚伟大胜利之国民，受到世界的欢迎。现在，将迈出第二步，登上世界贸易的舞台，战胜万国的大胜利者，迎接着令世人欢呼的命运。”〔50〕

1894年夏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在对华战争进行之中，朝

治的日本领导者、财界领袖，已经开始思考着下一步战略，描绘起“冲出亚洲，走向世界”建设日本帝国大业的蓝图，循序渐进地推行着“先亚洲，后欧美，先朝鲜，后中国”的“大陆雄飞”的战略。要取得未来商战的胜利，日本国民在“与欧美通商”、“殖民南洋”等众多事业的选择面前，从何处着手，“日韩通商协会”的组织者们拟定了“从一衣带水的清韩两国入手的顺序”〔51〕。

协会的发起人吉田文三，在《日韩通商协会设立趣旨》中指出：“今日东洋当务之急，莫过于通交邻邦，日深交往，然而……世间往往置对朝鲜交往于考虑之外，怪哉怪哉。”〔52〕在当时的日本，很多人认为与中国争夺朝鲜半岛的权益，主要是出于政治、军事、战略上的考虑。但是，在战败中国夺得对朝鲜的控制权后，想大力发展日本对朝鲜的经济贸易的人逐步增多，开始认识到朝鲜问题的重要。日韩通商协会适时打出发展对朝鲜贸易的口号，鲜明地提出日本帝国向外发展的方向。

吉田认为，迄今日本与朝鲜的交往与贸易上，存在着诸多问题的主要原因，来源于缺乏“通两方事情”的“媒介机关”。吉田说“我等设立《日韩通商协会》的目的，就是要弥补这个缺陷，日韩通商协会是由日本财界组成的振兴对朝鲜经济贸易的民间团体〔53〕。为了有效地推行对朝鲜经济扩张政策，他们同玄洋社、东邦协会一样，念念不忘强调日韩间的特殊关系，强调在同盟基础上发展贸易同利的重要性。吉田的上述观点，在《“日韩通商协会”创立及协会报告发刊之趣旨》中阐述得淋漓尽致。“日朝两国同属蒙古人种，语言、文字、宗教相近，按某地质学家之说，日朝两地实为日本海（我邦之北海）下沉分离之故〔54〕。由于日朝两国在人种、历史、文化、地理上有着极为特殊的亲密关系，促进两国贸易相利关系的发展，乃大势所趋。

于西力东渐的19世纪末，呼吁亚洲各国同盟一致对抗西方的

建议，并不新鲜。从本质上说，日韩通商协会对日韩关系的主张，同当时日本盛行的“亚洲主义”，实乃异曲同工。财界人思想中，虽然更多的是专注经济贸易的考虑，但是在最终日的追求，与玄洋社、东邦协会经营大陆的主张乃一脉相承。可是，玄洋社在朝鲜问题上，以捣乱破坏为主，《日韩通商协会》则强调发展贸易、实业。相比之下，两者外在形式不同，后者是隐蔽的，其亚洲主义思想是渗透于其整体的行动之中的。虽然，作为重于实际的财界团体，在后来的活动及协会报告中，没有对亚洲主义思想做更多的阐述和解说，但是该协会视朝鲜与日本为“唇齿辅车”的关系，恰恰是“亚洲主义”朦朦胧胧的意识外化。仅此而言，“日韩通商协会”虽有亚洲主义思想的成份，可是同玄洋社等组织是有区别的。协会奉行的是“实业亚洲主义”。

在这种“实业亚洲主义”思想指导下成立的《日韩通商协会》，其目的是奖励、诱导日朝间的通商，主要工作如下：

第一，赴朝鲜实地调查、弄清楚朝鲜各港贸易、内地行商、工业、矿业、渔业、农业、金融、运输、交通等现状，研究、预测其未来的发展。

第二，出版发行刊物。把协会的研究报告，活动情况，及与朝鲜有关的事件，有参考价值的社论，收集、编辑、发行《日韩通商协会报告》。每月一刊，赠送给会员。

第三，于朝鲜国主要地设置商品陈列所。

在完成上述三项任务时，协会还开展了咨询服务业务，为会员对朝鲜经济贸易扩张活动提供方便。

会员共分特别会员、名誉会员、普通会员三种。协会为会员提供下列方便：

- (1) 每月寄赠月报（会报）。
- (2) 接受来自会员的关于调查通商、工矿渔业等的委托。
- (3) 可申请在商品陈列所内，陈列商品样品及租用场地。

(4)赴朝鲜时,若事先联系,可提供通办(翻译、向导)。

(5)路经朝鲜各协会支部所在地时,可享受该支部提供的方便。同时,可根据其需要,安排食宿(按内部价格)。

(6)在朝鲜,作为助成员,按照本协会调查报告创办事业时的规定,可借用该事业的部员〔55〕。

日韩通商协会开展这些既琐碎又麻烦的服务性业务,目的就是要促进日本商人、财界人士,对朝鲜开展大规模的经济、贸易活动。从日韩通商协会的业务范围、内容来看,颇像今天日本的贸易促进会。

协会发起人吉田文三,冈山县人,曾任仁川、汉城的邮电局长。日中甲午战争爆发后,吉田认为有机可乘,四处奔走,说动神户、下关、东京、大阪的财界人,发起成立了这个充当日韩贸易媒介机构的组织〔56〕。吉田认为:“成立日韩贸易协会,就是要达到两个目的。一是成为日韩贸易的媒介机构,二是振兴日本国运隆盛。”因此,协会的组织,特别是主要干部完全是按照吉田的上述想法,配备了第一流的实力派。会长为大鸟圭介,评议员有大仓喜八郎、奥三郎兵卫、渡边洪基、加藤正义、园田孝吉、佐久间贞一、涩泽荣一、理事吉田文三〔57〕。

日韩通商协会成立后,起到了政府与工商界之间的中介作用,做到上情下达、内情外达。为了更好地达到这个目的,协会于日本、朝鲜两国的主要城市中,设立了协会的本部、支部的事务所。初期共四个事务所,日本分关西、关东,关东为本部。朝鲜分仁川、汉城支部。协会成立两个月内又于釜山、元山设了支部〔58〕。

协会成立后,重点抓了组织发展,出版杂志,筹建商品陈列所等几项主要工作。

在组织发展上,协会采取国内国外齐头并进的措施。首先是尽可能地在必有的地区,建立支部、发展会员、设立事务所。日本方

而继东京、大阪外，几个月里，又在名古屋、神户、横滨等地设立了支部。朝鲜方面，又新建了釜山支部、元山支部〔59〕。同时，理事吉田文三几乎每个月都要外出，到神户、大阪、下关、名古屋、静冈等地进行演讲，视察工作。协会的其他干部，同样不错过各种机会，为协会做宣传〔60〕。协会的评价员、东京商业会议所会头涩泽荣一到全国商业会议所联合会议上，专门介绍《日韩通商协会》的情况，动员更多的人，关心日朝问题，参加协会〔61〕。事实证明，协会成立初期就能拥有会员420多名，以及后来的迅速发展，是同协会干部的努力工作而分不开的。

其次，协会格外重视出版发行会报的工作，即“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现有资料证明，自1894年9月发行《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第1号以来，至1897年12月，共发行38号〔62〕。同任何一个团体的机关报、机关杂志一样，《日韩通商协会报告》即是协会的一面旗帜，同时也是协会发展的最好的历史的见证。

从《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的文章来看，杂志经历了一个由表及里，由浅入深的过程。但是同一般的杂志不同，由于协会本身发展速度快，杂志的转换期、时间极短，很快从较简单的情况介绍进入高水平的接近学术研究杂志的程度。进入第10号后，每一期的杂志里，调查报告、访问记、讲演、社论、资料统计等，内容丰富多彩，学术研究与现状结合，成为当时关于朝鲜问题的最权威的综合性杂志。

在短短的时间里，日韩通商协会通过近500名会员的工作，利用《日韩通商协会报告》，成为日本社会研究朝鲜经济问题的最大的组织并拥有最有影响的杂志。在日本对朝鲜的经济扩张中，发挥了不可低估的作用。

但是，从经济活动本身来讲，《日韩通商协会》的一项最大的、最有意义的工作，应该数筹建日本商品海外陈列馆株式会社一事。

筹建日本商品陈列所，作为“日韩通商协会”的一个重要事

业，被明确地写在协会成立宗旨中。《日韩通商协会报告》自第3号起至第5号，就未能及时公布关于筹建商品陈列所一事，做了反复说明。有关陈列所章程的公布问题原因很多，其中筹建经费久久没能落实和未经理事会审议属关键。为此，协会会员冈田来吉、桓川常吉、高松伊助三认为，照此长期拖下去，将误失独占韩国贸易的良机，于是三人自筹资金，并请理事吉田协助，在原协会附属商品陈列所设立案的基础上，成立一个规模更大的独立的组织〔63〕。虽然该会社的成立脱离了日韩通商协会，但是，在创立宗旨，组织成员上，两者关系密切，彼此相互照应，无你我之分。换言之，说其是协会的副产品，更为妥切。

冈田、桓川、高松、吉田等人急于另立炉灶，一个最大的原因，是看到了自朝鲜局势平定后，清国的商人陆续返回，一度出现了清韩贸易盛况，日本在韩贸易发生危机。他们担心清国商人站稳脚跟，清朝贸易会立即发生良性转机，《日韩通商协会》为之奋斗良久的日韩贸易必将受到严重威胁，甚至垮下去。在此关头，他们认为，“与其临渊慕鱼，不如立即结网”。设立商品陈列所会社的目的，就是不给“排日风潮弥漫，朝令暮改的韩民以翻手为云、覆手为雨的机会”。〔64〕所以，“哪怕机会极少，也要排除千难万险，征服对方，在我名誉的高旗下，卸其盔甲”。四位发起人于《日本商品海外陈列馆株式会社设立宗旨》中，再度强调了日本海外军事战争的胜利，“战胜余威，波及疆外，东方日出之国的光辉照耀万邦”，极力要抓住对清战争胜利带给日本向海外扩张的契机。同时又指出，“日本向海外出口的产品却没能倍增其量，销路反呈现停滞不前的倾向”。因此，要解决这个问题，尽快地在朝鲜设立日本商品陈列馆，万分火急。设立商品陈列馆，使日韩之间“随时可见实物，随时可进行交易”，只要建立这样的商品交易会，就能够保障用经济的发展，巩固军事胜利的果实〔65〕。

就这样，冈田等四位协会的会员与理事，不失时机地筹集资金，创建日本商品海外陈列馆株式会社，弥补了日本对朝鲜贸易的缺欠之处，也从根本意义上贯彻了日韩通商协会对开展日朝贸易的计划。因此，必须说这个会社的成立，恰恰是协会开展朝鲜贸易的最大成果，也标志了日本的对朝鲜贸易活动，已经进入了新的阶段。

考察日韩通商协会成立、发展的全部过程，是近代中日关系史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本节虽没有对此做全面论述，但是上述的探索，为我们了解日本财界实现“大陆雄飞”，积极向朝鲜进行经济扩张，提供十分重要的事实。

綜上述，我们发现，在日韩通商协会活动的整个过程中，抵制“清商”的发展，取代清国在朝鲜的优越地位是贯穿协会宗旨、活动始终的主线。

协会成立的目的，明确指出，是巩固日朝贸易的成果，就是要阻碍清国商人重新进入朝鲜市场。

《日韩通商协会报告》在介绍仁川港的贸易时，把该港的贸易历史分为四个阶段。即（1）日韩贸易时代；（2）日韩、清韩、洋韩贸易时代；（3）日、韩、清贸易时代；（4）日韩贸易时代。认为“自1883年始，朝鲜贸易长足长进。可是，在日本启蒙、开发下的该港贸易，该港的日韩贸易，却逐渐被清商蚕食，取而代之。自1890年以后，迄今，仁川港进口贸易几乎被清商垄断，此情不堪容忍。……我等开发经营的（朝鲜市场），受他邦商人蹂躏，（我等）为他人做嫁衣裳，此事岂仅伤我商民之脸面，归根结底于国家利益关系重大”。因此，“日清干戈后，清商望风逃窜，至7月，清商的进口为零，展示出日韩贸易的新天地……虽然称此阶段为日韩贸易新时期有夸大之嫌，但是，借东风，扩张我商权，乃日清战争后，形势赋予我们的时代使命。”〔66〕

显而易见，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清国是日本对朝鲜贸易的

强大敌手，竞争对象。成立“日韩贸易协会”就是要于日韩贸易的不断发展中，击败清国，建立日本的牢固地位。

因此，协会在开展对朝鲜贸易活动时，时刻注意清商的动向，经常以比较的形式，提醒对清商的注意，强化日本财界的紧迫感。事实证明，中日甲午战争，日本军事的胜利，破坏了清国对朝鲜的控制，为日本商品进入朝鲜市场开辟了道路。随后，日本对朝鲜经济、贸易的不断发展，加强了日本对朝鲜问题的发言权，致使清商于朝鲜境内的卷土重来，处于绝望的状态。

五、朝鲜协会

1902年3月，为促进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财界的一部分实权派组织起来，成立了朝鲜协会。朝鲜协会是继日韩通商协会后，又一个对韩经济事务的组织。从组织纲领、活动内容及所承担的作用来看，是适应日本对朝鲜经济贸易发展的要求，成为日本对朝鲜实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机构。

朝鲜协会与日韩通商协会的共同之处有两点：第一，协会的宗旨相同。无论是朝鲜协会也好，还是日韩通商协会也好，两者都公开宣布以经济、贸易，通商为主体，推动日本财界实业界行动起来，加速对朝鲜的经济侵略。第二，主要任务相同。两者主要从事对朝鲜有关的调查研究工作。两个协会在组织机构、运营方针及其事业内容的规定上基本一致，但朝鲜协会具有浓厚的官方色彩。

强调日本与朝鲜“地理相接、文化相近、于今日政治经济发展上休戚以共、利害相关”是朝鲜协会打出的一面旗帜。“朝鲜与日本一衣带水，古来玉帛相通，往昔文化受益颇丰，近时自缔结修交条约后，局面一新，两国交往日愈亲密，（日本与朝鲜）唇齿辅车。”〔67〕这段话，是朝鲜协会成立趣意书的前言。

由于“朝鲜气候温和，风景秀丽，海陆产丰富，各地藏有足以供（日本）需要的各种宝贵的矿物资源，这些宝库面临着迟早

将被开发的命运”〔68〕。因此，不仅在修建“其他制作工业设施”，在通商贸易的打张发展上尤需日韩两国人士共同协力经营，而且作为文明先进的日本对于“共同开发朝鲜负有不容推辞的责任。”〔69〕

但是，就如何摆正朝鲜开发事业在日本帝国对外经济战略总体中的地位时，协会明确指出有关朝鲜开发问题，必须在日英同盟的前提下，必须在制定日本对亚洲整体战略中给予考虑。协会成立的趣意书指出：“要在日英两帝国同盟下，在保证东洋和平的框架下，不失和平良机，扶植与发展日韩两国经济关系，以全善邻友谊，增进双方利益。”〔70〕这就是时势对日本的要求，也同样是朝鲜协会的重要任务所在。

正因为朝鲜协会以财界、实业界人士为中心的、“调查研究朝鲜经济事情，开发资源，促进日韩通商发展为目的”〔71〕的经济团体，朝鲜协会是一个财界、实业界发展对朝鲜关系的同盟集团。协会的主要干部与会员，绝大多数是在某个方面同朝鲜有着千丝万缕关系的人。会长是岛津忠济、副会长细川护成、涩泽荣一、会计监督大仓喜八郎、理事长日下义雄。理事、评论员等名单如下。

理事：押川方羲，国友重章，望月龙太郎，小川平吉，中井喜太郎，上田俊一郎，曾我祐准，岛津珍彦，松平正直，前岛密，佐佐木高美，和泉邦彦，井上角五郎，原敬，原田赳城，户水宽人，大谷嘉兵卫，渡边福三郎，加藤增雄，神鞭知常，河野广中，高野源之助，恒屋盛服，室田义文、白井哲夫，陆实，工藤行干，益田孝，马越恭平，小松原英太郎，近藤廉平，江南哲夫，寺尾亨，佐佐友房，柴四朗，杉田定一相谈役，近卫笃磨，西乡从道，大隈重信〔72〕。

成立初期有会员114人，至6月迅速发展到了287人。朝鲜协会的发展，主要有两个原因：(1) 协会的主要干部大多是日本政

界、财界的代表人物，在日本社会有着巨大的号召力、影响力，如涩泽荣一、益田孝、原敬、杉田定一、河野广中等。(2)为争取全日本国民赞同协会的宗旨，吸收更多的实业者入会，协会大力开展组织发展工作，采取积极劝诱的形式，扩大队伍。比如，“自4月初至6月底，协会仅向朝鲜各地的日本各领使馆，发出劝诱入会信达三千封之多。”〔73〕

关于协会主要任务，涩泽荣一在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做了明确指示，同时大隈重信也从日本政府的角度具体指出了下述五点内容。即“一、改良朝鲜的农业、开垦荒地，增强朝鲜国民的购买能力”。其理由是“近年来，我国人口迅速增长，然而农业进步缓慢，年年粮食不足，即便丰年也不得不依赖进口外国米，食品的供应越来越陷入依赖外国的进口。但是，朝鲜人口稀少，耕地面积广大，如开垦之，进口其麦谷，扩大本邦进口，将大大地帮助了日本，同时也必然促进彼此贸易进步”。“二、开采矿山，尽管涩泽荣一、浅野总一郎已经进行充分调查，并获得韩国内的矿山开采权，但是，这在朝鲜国内仅占一小部分，朝鲜矿藏丰富……开矿乃是增进两国利益的最大当务之急。三、铺设铁路。京仁铁路已由日本铺设，可是，京釜铁路、京元铁路更为重要。……如果，仅由朝鲜来干不仅危险，还将危及我邦，因此，这两条铁路必须要日本人铺设。四、改正货币制度。五、设立金融机关。”〔74〕

大隈重信的讲话，强调了朝鲜问题在当时日本对外经济发展中的重要地位，并提出了具体的任务。实际上，对于朝鲜协会来讲，如何按照日本国家总体发展战略来制定对朝鲜的经济扩张，业已成为协会建立的重要课题。为此，协会明确规定了下面四项任务：

第一，关于朝鲜境内农工商业各种情况的调查。

第二，为日朝两国的“相互”移住、通商提供方便。

第三，疏通我在朝鲜居留民与内地官民之间的了解，为居留

民的经营提供方便。

第四，为日朝两国国民所应从事的事业，进行调查与中介的工作〔75〕。

总括朝鲜协会的工作，基本包括对内（日本）、对外（朝鲜）的两个侧面及宏观制定政策，微观技术指导的两个层次。那么，就让我们来看看朝鲜协会的几项主要工作。

对内，朝鲜协会开展多种活动，以提高日本国民对朝鲜问题的关心，鼓励商人对朝鲜贸易的热情与信心，增加他们对朝鲜情况的了解，发动各方专业人才赴朝鲜调查，为日本国内各方人士可能全面地了解朝鲜而提供大量的信息。如，协会定期举办讲演会，请驻朝鲜公使介绍朝鲜情况，请政治家介绍访朝鲜观感〔76〕。此外，协会还借用“游说”的形式，四处派人做专题报告。协会成立之初马上派干事赴熊本、大阪、北海道、鹿儿岛活动〔77〕。这还不够，为了得到政界的更有力的支持，协会主动做日本政党、议会的工作。主要干部定期向几个主要的党派：宪政本党、立宪政友会等介绍朝鲜国内情况、汇报协会的中长期的计划及工作，以求理解与支持。这种经常性的走访汇报，成为保持与政界联系的纽带。必要时协会的主要干部，就朝鲜问题在国会上答辩，促使政府表明立场、态度，速下决断。协会的这些活动，充分反映出日本财界积极向外扩张的急切心情。

在对朝鲜方面，协会采取上下兼顾，里应外合的战术。下即同朝鲜财界、实业界同行经常联系，上即直接向朝鲜政府以至国王施加压力，进行政策说明，以求得承认。协会在向日本国内派遣“游说员”的同时，选派富有与朝交涉、贸易经验的干部赴朝鲜游说，并面见国王。协会的这一系列活动，引起了朝鲜方面的重视，这完全是由于朝鲜协会具有强烈的官方色彩的缘故。

但是，正由于朝鲜协会具有财界团体与官方背景的双重性质，才导致了它做出了日本政府想做而不能做的事，起到了任何

一个官方机构所不能起到的作用。从这个意义来考察和评价朝鲜协会的工作，大致可归纳为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在日本国内，向所有关心朝鲜事务的人提供大量的信息、情报，发行杂志，从事调查，举办讲演会、报告会、游说会等，成为日本社会最权威的朝鲜问题情报中心，成为日本财界、实业界向朝鲜进行经济扩张的“综合调查研究机构”同时，影响政府的政策制定。

第二，利用协会本身的半官方色彩，从细微处入手，为日本国内的商人咨询，起到一个贸易交易所的作用。

协会成立后，收集有关朝鲜问题的情报，如派专人调查、委托朝鲜境内的日人代办。但大部分的情报收集工作，主要靠在朝鲜境内的领使馆、日人商业会等组织。下面是一则有关征集朝鲜问题资料的通知“本年6月30日起，为收集有关朝鲜的各种条约、布达、告示、规则及书式等，（朝鲜协会）已向在朝鲜公使馆、领事馆、领事分馆、居留民总代役场、商业会议所，通渔组合本部等各方面，发出了承办手续，现正在陆续回收。”〔78〕这份通知说明，朝鲜协会收集情报的主要途径及协会在日本国内的政治地位。

协会还曾就朝鲜的现状及将来的发展向在朝鲜的日本使领馆等发出了调查公函。不到两个星期马上收到日本驻木浦领事馆、镇南领事馆、仁川领事馆发回的报告。同日，协会就甲斐绢在朝鲜的进口量、销售途经等发出的通知，马上收到了6个单位附有表格、单价、统计数字一览表的详细报告〔79〕。如果没有政府的背景，难以想象。一个财界组织能对驻外领使馆发号施令。

第三，通过奖励向朝鲜进行经济扩张和渗透，从整体上加速日本对朝鲜政策的步伐，使日本对朝鲜的控制进一步加紧，为日本吞并朝鲜打下了基础。

第四，培养人才，培养精通经济问题的“朝鲜通”。

朝鲜协会的主要理事中井喜太郎，对朝鲜问题极有个人之见，十分活跃，几次赴朝鲜进行游说，一直是协会的“干将”。由于在协会里的卓越表现，第二年，中井喜太郎被聘为朝鲜汉城日本居留民会会长，兼任汉城新报主笔。中井到了汉城后，如虎添翼，成为名符其实的朝鲜问题专家〔80〕。多次上书，建议广开渠道，抓紧对朝鲜的控制。中井的众多建议颇受日本政府当局的重视，1902年，他的一份建议被列入外务省关于朝鲜政策建议汇集的首篇〔81〕。

朝鲜协会作为一个经济团体，却常常就政治问题发言，积极参与日本政府对朝鲜政策的制定，发挥令人不可忽视的重大作用。

首先，充分利用协会手中的工具、杂志等，及时发布有关日朝间的政治动态、政治事件、不遗余力地维护日本帝国的利益。

其次，站在日本帝国对外发展的总体战略上，用政治手段，推动经济贸易发展，经常向朝鲜政府施加压力。以“劝告书”的形式，向朝鲜政府展开“政治攻势”。这是朝鲜协会介入政治的外化表现。

会员江南哲夫、大内畅两人认为：“专心致力于日朝两国间的经济关系，不干预政治外交问题，系协会的宗旨，然而，观察朝鲜国情，深感政局变幻不定，缺乏巩固财政之政体。因此，要消除上述障碍，势必要修改本会章程。为此，本协会除扩张一般会务外，要适时向朝鲜当权者进言并上奏国王。从根本上对国体实行一定的政治改革，取得经济财政上的利益。此议题需作为本协会重要议题而熟悉之。”〔82〕不拘泥于经济团体的局限，关注并参与日朝间的政治课题，以政治来推动经济贸易，是朝鲜协会长期来的重要任务之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到，朝鲜协会于短短的时间里，做了大量的工作，是日本对朝鲜进行经济扩张的“参谋本部”、“协调部”、“后勤部”，发挥了相当大的作用。同时，通过以上的活

动，朝鲜协会一步一步地剥夺了中国在朝鲜经济贸易的地位，破坏了历史上中朝间传统的政治上和经济上的关系，为日本帝国称霸亚洲迈出了坚实的一步。

六、东邦协会

玄洋社于明治中期提出了“远征亚洲”的设想。玄洋社的成立及后来的发展，唤起了日本各方人士关心亚洲政略，抗御西力东渐，推进日本的对外扩张，实现亚洲联合。仅就日本向亚洲扩张的意义来说，玄洋社开时代风气之先，聚集了一批关心日本之外大事的亚洲主义份子。其后，雨后春笋般建立起的五花八门的各种民间组织中，无不或多或少地留下了玄洋社影响的痕迹。

在这类众多的向外发展的组织里，从经济事务上关注亚洲问题的，还应该提到1890年成立的东邦协会。

东邦协会的创立过程，经过了近一年的筹备工作。据《东邦协会报告》称，1889年1月，在小泽豁郎、福本诚、白井新太郎的发起下，得到小山下武、山口宗义、陆实、矢野文雄、箕沛胜人、久岛焯德、小村寿太郎、斋藤修一郎、高桥建三等人的赞同。11月5日，于东京星冈茶寮举行协会成立大会。12月5日于富士见町召开第二次会议，翌年5月设立临时事务所，同月发刊机关杂志。7月7日召开第一次总会〔83〕。第一次登记会员共102名。主要会员有著名的政治家、军人、实业界代表、报界主笔、外交官等关心亚洲事务的社会名流。如板垣退助、伊东已代治、犬养毅、冈崎行雄、星亨、河野广中、加古贞太郎、谷干城等等〔84〕。从这些主要会员的地位、身份，我们可以看到东邦协会是一个范围之广、力量之强的全国性组织。

东邦协会建立初起就形成了一个庞大的队伍。5月设立临时事务所时，便引起了舆论界的强烈注意，称其是“总括东洋、南洋诸地域的调查研究机构。”〔85〕

东邦协会的成立，是日本国内日益高涨的关注亚洲事务思潮的产物。该会“设置趣旨”中指出：“人人皆曰，当今已非锁国之天下，然朝野热衷于寸利之争，无视运筹宏大经论，其结果是，谈国防者不详宇内兵势，殖产兴业者不知海外商情，高谈遥远西洋事物者大有人在，综述东洋诸邦局势者寥寥无几。实为怪哉。君子上大夫既为国家至高事务，却唯国内庶务是图，无视国外周围局势，（此种现象）乃政纲未清，国是未定之故。”鉴于上述种种时弊，“趣旨”继续阐述“国家兴亡不决定兵力强弱，士气兴衰、经济起落至为重要。无远虑者必有近忧。……因此，以东洋先进自负的日本帝国需详查近邻诸邦之近况，向外界扩张实力，谋振兴东亚，抗衡泰西诸邦之大计。”〔86〕在这里，东邦协会打出了考察东邦诸国近况，向外扩张日本帝国实力的大旗。这同玄洋社的“跨越玄海滩之波涛，远征亚洲大陆之抱负”是同出一辙的。不同的是，玄洋社的活动内容，以“对外硬”的各种破坏、煽动工作为主，东邦协会则偏重于调查研究，为日本帝国的对外扩张、经济发展服务。

东邦协会的主要事业，包括下述八项重大内容。

(1)研究东洋诸邦及南洋诸岛的地理、商情、兵制、殖民、国情、近世史、统计。

(2)研究国际法及欧美各国的外交政策与殖民贸易。

(3)研究成果作为报告公布于世。

(4)收集东南洋方面的通信、新闻、杂志、著述、古文书。

(5)进行实地考察，向各地区派遣探险队员。

(6)设立学堂，培养人才。

(7)举办讲演、座谈会，介绍研究成果。

(8)待时机成熟，设立资料馆或博物馆〔87〕。

如此宏大计划，令舆论界、日本社会各界重视是有其道理的。就上述八项内容来看，称其为日本政府的对外研究机构是当

之无愧的。仅举东邦协会机关杂志为例，其篇幅之大，论及范畴之大，持之以久，即可窥其规模之一斑。

东邦协会的机关杂志分两种，《东邦协会报告》1—38号与《东邦协会会报》1—231号（1892年4月创刊至1914年7月），共269期。

既然东邦协会是应日本社会“亚洲雄飞”之运而生的产物，也就不难理解协会为何能在短期内云集了一批关心亚洲问题的人。最高潮时达1200人，后大致保持600—700人上下。据《东邦协会报告》统计，第一期102人，第二期191人，第三期303人，第四期366人，第五期407人〔88〕。这种直线上升的增长趋势，充分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对亚洲事务的重视。

另外，东邦协会不仅仅是集中了日本社会的各种力量，更重要的是这些所谓撰文或作讲演，积极加入到协会的建设以及制定“雄飞亚洲”战略的讨论中、实践中的人士有历任总理大臣的大隈重信、原敬、加藤高明、内田康哉，曾任外务大臣的小村寿太郎、金子坚太郎、林权助、任文部大臣的木场贞长、镰田荣吉、后藤新平，任陆军大臣的石本新六，财界领袖的涩泽荣一、添田寿一，大陆浪人代表的末永纯一郎、荒尾精，艺术家冈仓天心等等。这些明治时代日本的建设者们纷纷登场，既反映了东邦协会的权威性，同时也说明了东邦协会的议论吻合着日本社会的主要思潮，在日本社会、舆论界占据举足轻重的地位。

正是由于东邦协会组织庞大，拥有层次不同的会员，正是由于协会的活动于日本社会有着不同一般的影响，协会成立后的第一个任务，便是动员了日本社会更多的人开始注意东邦事务。其次，于短短的几个月内发展壮大成为日本首屈一指的亚洲经济事务团体，形成了一个中心。也正是基于上述两个原因，东邦协会的活动有着极为鲜明的特点。

第一，逆崇欧媚美的时代潮流而动，鼓吹亚洲中心论，公开

打出东邦联盟的大旗。

明治维新后的日本社会，事事以西洋价值观为准绳，事事以欧美文明为楷模，全盘西化论甚嚣尘上，更有甚者提出日本人种改良，以适应社会发展。面对此种步欧美后尘，推进文明开化的时代风气，东邦协会于杂志的创刊号中首先指出：“此种文明开化，其后果不堪设想。以现状论之，此等专致于开发上层社会智力的（努力），必将丧失、搞乱（社会进化）的自然顺序，陷入浮文虚饰之端，考究远邦事物，对近邦实势漠然置之，巴结无关痛痒的泰西，放弃休戚与共的东邦。”〔89〕实在是可痛可悲之极。此类现状不可坐视、非急起改之不可。

为此，提出新的“东邦”概念，呼吁东邦诸国提携同盟，以对付西力东渐的大势，克服日本社会崇洋媚外的种种弊端。

所谓“东邦”，究竟包括哪几个国家与地区呢？对此协会方面既无人进行认真探讨，又从未下过准确的定义，所以协会成员中的中国公使与朝鲜公使之间，认识不一。东邦协会于成立说明中东邦主要是同日本毗邻的诸国，如朝鲜、中国、香港、澳门等。可是，中国公使李经方于协会成立时致词中说：“东邦即贵国（日本）与敝国（中国）。”朝鲜公使于随后的讲话中纠正“东邦应为日本、中国、朝鲜”三个国家〔90〕。尽管对于“东邦”内涵意见分歧不一，但是，考虑东邦协会的历史，似乎可以肯定地说，认为“东邦”包括或专指日本、中国、朝鲜者居多。强调“东邦”结盟，即指日、中、韩三国携手，关于这一点，在协会日后的活动中得到了充分的贯彻。

第二，注重实际，研究经济问题，这也是东邦协会有别于玄洋社的另一个特点。从1891年始到1914年，东邦协会共举办讲演会125场（仅限于杂志上的统计）〔91〕。其中有关“东邦”经济贸易问题的讲演共有64篇，占50%强。这些讲演主要是谈及日、中、韩三个国家间的政治经济发展现状及趋势。当然，同样是讨

论经济、贸易问题，也有一个由浅入深的过程。初期的讲演不如后期的讲演具体，初期的讲演者不如后期讲演者有实践经验与专业知识。但是，总的来讲，东邦协会注重实际工作，经济问题是同协会成立宗旨，为实业者服务有密切关系的。

关于为实业者服务问题，协会的监督副岛种臣在协会的成立大会上强调：“说到底，本会考究东邦之地理、考察历史、考察统计，进而言之，考察国际关系，其目的当然是为了纯粹的学术。当然是为了引道未开（化）之疆，扶助不幸之国。但是，创立本会之目的，就是寻求将考察结果，付诸实业之路。”〔92〕

何谓实业之路？协会的宗旨中最后阐明：“兴办东邦协会，考察东南洋事物，我等的目的不“取悦舆论”，协会的追求，“小则为移住、贸易、航海者提供资料，大则为实践域内（东邦）之经纶及国家公道尽微薄之力，贡献于东洋人种全体之命运。”〔93〕

这段关于协会宗旨的宣言，虽然没能系统说清协会的活动与实业之路与东邦联盟的关系，但是，作为倡导以实业为主的亚洲中心主义的初期形态，具有深刻的意义。其后派生出的由实业家为主的“清韩协会”、“朝鲜协会”等，恰恰是完全继承了东邦协会中关于发展经济联盟的精神〔94〕。

东邦协会拥有数量可观的清谈书生，不乏活跃于日本政界的头面人物，但是，同玄洋社相比，会员多样化，不少人是财界、实业界的领袖与骨干，如涩泽荣一、添田寿一等。

东邦协会建立后，从实业角度出发，广泛进行调查研究，发行杂志，鼓励兴办实业，有力推动了日本各界对亚洲事务的关心，为日后日本大陆政策的推行，做好了人员、思想与舆论上的准备。

几年后，东邦协会中的财界、实业界会员组织起来，陆续成立了“朝鲜协会”、“清韩协会”，在东邦协会中发展实业，实行东邦经济结盟的思想逐步具体化，展开了具有财界特色的“大陆经纶”。

【注释】

- [1] 植手通有：《对外观的变换》，《近代日本政治思想史》，I，有斐阁，1968年，第52页。
- [2] 韩相一：《日朝近代史的空间》，日本经济评论社，1984年。
- [3] 许介麟：《日本政治论》，台湾联经出版事业公司，1977年，第154页。
- [4] 大塚史学会：《东亚近代史研究》，御茶水书房，1967年，第94页。
- [5] 吉田松阴：《琼杵环田津话书后》（1848），《吉田松阴全集》第2卷，岩波书店，1934年，第49页。
- [6] 涩川六藏：《未竟事业》，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及大分县臼杵市图书馆所藏。
- [7] 佐久间象山：《致山寺源太天函》天保13年11月30日，见信浓教育会：《象山全集》，第221页。
- [8] 斋藤竹堂：《鸦片始末》，引书同（2），第40页。
- [9] 横井小楠、山崎正董编：《横井小楠遗稿》，日新书院，1942年，第40页。
- [10] 福泽谕吉：《民办国尽》，见《福泽谕吉全集》第1卷，第594页。
- [11] 同注〔6〕。
- [12] 同注〔3〕，第13页。新村出编：《广辞苑》，岩波书店，1955年，第1111页。
- [13] 卫藤沈吉：《日本人看中国——高杉晋作》，见《仁井田升博士追悼论文集》第3卷，《日本法与亚洲》，第64页。
- [14] 佐藤信渊：《存华挫夷论》，见《佐藤信渊家学全集》，下卷，岩波书店，1927年，转引自注〔4〕，第98页。
- [15] 《玄洋社史》，第225页。
- [16] 木下半治：《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 [17] 同注〔15〕，第3页。
- [18] 同上，第5页。
- [19] 同注〔16〕。

〔20〕 木下半治：《日本国家主义运动史》。

〔21〕 同注〔15〕，第68页。

〔22〕 据说，来岛恒吉受了头山满等人的影响，去暗杀大隈重信。玄洋社高度评价来岛的义举，于《玄洋社社史》的开头，刊登了来岛的肖像、坟墓和暗杀大隈时身穿的衣服和使用的短刀。

〔23〕 关于这两个事件，黑龙俱乐部编《国土内田良平传》（原书房复刻版，1933—1936年）十分详细。

〔24〕 《东亚同文书院大学史》，第43—46页。

〔25〕 同上，第46—49页。

〔26〕 同上，第48—49页。

〔27〕 同上，第49页。

〔28〕 《东亚同文会与东亚同文书院》，见竹内好《日本与亚洲》，筑摩书房，1966年，第378页。

〔29〕 同注〔24〕，第51页。

〔30〕 《中外时论》。

〔31〕 同注〔24〕，第49页。

〔32〕 《太阳》第4卷，第1号，1899年1月1日。

〔33〕 同注〔24〕，第63页。

〔34〕 同上，第66页。东亚同文会的出版刊物和研究著作，为近代日本的中国研究打下了基础。玄洋社及后来成立的黑龙会，这两个组织的刊物远不能同它相比。东亚同文会的众多出版刊物以介绍为主，有些东西实证性强，很有价值。

〔35〕 同上，第66页。

〔36〕 同上，第13—15页。

〔37〕 井上雅二：《巨人荒尾精》，东亚同文会，1910年，第1—10页。

〔38〕 同注〔24〕，第15—22页。据《巨人荒尾精》载：1890年，荒尾在博多的演讲中，强调制定兴亚之大计，必须掌握亚细亚之商权。（见该书第26—31页）。

〔39〕〔40〕 同注〔24〕，第19页。

〔41〕 同注〔37〕，第38页。

〔42〕 同注〔24〕，第23页。

- [43] 同注〔24〕，第24页。
- [44] 同上，第47—49页。
- [45] 同注〔28〕，第385页。
- [46] 同注〔27〕，第192页。
- [47] 同上，第72页。
- [48] 同上，第126页。
- [49] 同上，第130页。参加荒尾精的葬礼的有近卫笃磨、副岛种巨、松正方义、板垣退助、谷干城、三浦梧楼、益田孝、神鞭知常、头山满等各界名流千余人。
- [50] 《日韩通商协会创立及协会报告发刊之趣旨》，见《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第1号，1895年9月，第1页。
- [51] 同上，第1页。
- [52] 《日韩通商协会趣旨及规约》，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十六卷，第643号。
- [53] 同上。
- [54] 同注〔50〕，第6页。
- [55] 同上，第4—5页。
- [56] 关于吉田文三的介绍，见《中外新报》，1884年10月9日，第3783号。
- [57] 同注〔50〕，第125—126页。
- [58] 同上，第126页。
- [59] 《釜山支部设置》，见《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第2号，1885年10月，第92页。
- [60] 见《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第2期，第93页；第3期，第91页；第10期，第68页等。
- [61] 同注〔59〕，第92页。
- [62] 樱井义之编：《日韩通商协会报告总目录》，（韩）第2卷，第9号，1973年。
- [63] 《日本商品海外陈列馆株式会社的成立》，见《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第8号，第1—2页。
- [64][65] 同上。

- [66] 《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第1号，第7—8页。
- [67] 《龙门杂志》，第166号，1902年，第40页。
- [68] 同上，第41页。
- [69] 同上，第41页。同样内容《本会设立趣意及诸规则》，登载于《朝鲜协会会报》第1回，1902年，第46—47页。
- [70] 《朝鲜协会设立趣意书》，《朝鲜协会会报》第1回，第47页。
- [71] 同上，第47页。
- [72] 《朝鲜协会会报》，第1回，第46—47页。
- [73] 《劝诱入会状的发送》，见《朝鲜协会会报》，第1回，第46页。
- [74] 《朝鲜协会的创立》，见《中外商业新报》，第6038号，1902年3月11日。
- [75] 同注〔70〕。
- [76] 参照《朝鲜协会会报》中的《本会记事》，第1—10回。
- [77] 同上。
- [78] 仅《朝鲜协会会报》，第1回登载了9个单位、个人寄赠的资料39部。关于帝国图书馆的优待，见《朝鲜协会会报》第3回，第34页。
- [79] 《朝鲜协会会报》，第3回，第33页。
- [80] 同上，第4回，第14—25页。
- [81] 《朝鲜内地行商的奖励》，见《朝鲜协会会报》，第8回，第23页。
- [82] 《江南哲夫、大内畅三两君提出的建议案》，见《朝鲜协会会报》，第10回，第10页。
- [83] 《会事报告》，见《东邦协会报告》，第1号，1892年，第35—37页。
- [84] 《东邦协会报告》，第1号中公布了第一次登记入会者名单。
- [85] 《东洋南洋诸地域的研究调查机构》，见《日本新闻》，1892年5月9日。
- [86] 《东邦协会成立趣旨》，见《东邦协会报告》，第1号，1892年，第1—4页。
- [87] 《东邦协会事业顺序》，见《东邦协会报告》，第1号，1892年，第5—6页。
- [88] 安冈昭南：《关于东邦协会的基础研究》，见《法政大学文学部纪要》，1977年，第80页。

- [89] 《东邦协会报告发兑的理由》，见《东邦协会报告》，第1号，第8—9页。
- [90] 《会事报告》，见《东邦协会报告》第2，1892年，第2—3页。
- [91] 参照安冈论文第81—89页。笔者在安冈调查基础上作了统计。
- [92] 《东邦协会报告》，第2号，1892年，第2页。
- [93] 《东邦协会报告》，第1号，1892年，第4页。
- [94] 《清韩协会》与《朝鲜协会》均为日本财界、实业界的对外调查研究的团体，主要代表为涩泽荣一等。

第三章

财界的大陆经纶

第一节 经济亚洲主义——大仓喜八郎

大仓财阀的创始人**大仓喜八郎**，是近代日本财界的重镇，其一生始终站在财界向亚洲开拓的最前线，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经济扩张中，大仓喜八郎独树一帜，鼓吹日中共存共荣的经济亚洲主义，为推动近代日本的经济发展和对外经济扩张，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大仓的轨迹及大仓财阀的发展史，成为近代日本对外经济侵略扩张的缩影，是我们考察日本财界“大陆经纶”的最佳案例。

一、日本商界提倡文明开化海外发展的尖兵

大仓喜八郎生于1837年9月，1928年去世，经幕末、明治、大正、昭和四个时代。因为他常年献身于日本财界的发展建设，生前获得昭和天皇授予旭日大纹章特旨从三位的荣誉。

大仓是越后新发田右大名主的三男。幼年丧父母，1854年10月，18岁的青年大仓喜八郎只身闯天下，来到江户，当了一家鱼片店的雇员，开始了走向实业界的生涯。

三年的雇员生活与实践，积累了丰富的经验，为其以后独自开业经营打下了基础。三年后，21岁的大仓创立了出售晒干蔬菜的“大仓组”。大仓经营富有极强的时代意识，经营的内容也随之转变。1865年大仓组转向，成为出售枪炮火药的“军火商”〔1〕。

军火商大仓，以其经商于乱世的聪明与才智，周旋于敌对两

军之间，迅速扩大了大仓的事业。1872年日本政府《废藩置县》令下，表明了明治新政府基础的确立，同时也标志着一个商战新时代的到来。大仓喜八郎认识到，“我日本帝国制定了开门进取，广交世界各国的目标。随之而来的必将是和平的战争。和平的战争就是贸易的竞争。不能于这次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就不能同世界各国同等相处，更不能增进国力。总之，要完成维新大业，建设日本，除对外贸易无他可言”〔2〕。从此，他逐步形成了以商战为目标的大仓式的进攻型的企业思想，在其经商的一生中，无时无刻不体现了他的这种“国家主义”的长远考虑。

1872年4月，大仓开始了为期一年多的欧美考察。这次出访欧美，在他的一生中，至少具有两个重大的意义。一是通过耳闻目睹，大仓接触了欧美的政治制度与文明，大开眼界，获得欧美资本主义企业经营的宝贵体验；二是在伦敦，结识了岩仓具视使节团一行，同政治权力的结合，为政治商人大仓实现振兴实业抱负，提供了政治上的盟友和保证。当时，作为商人的大仓是第一位出访欧美的。1873年回到日本后，马上效仿欧美先进国家的会社组织，组成了日本的第一个商会“大仓商会”。1874年，在伦敦设立了日本企业的第一个海外支店。尔后，在同中国的交往中，大仓第一个于中国本溪成立了日本的公司，同时，向汉冶萍借款30万，首创日本企业对华借款的先例。就这样，大仓作为日本财界中欧美文明的第一位受惠者的同时，又成为日本经济向外扩张的尖兵。

不难看出，借鉴于欧美先进资本主义国家的经验，制定其海外事业内容是明治初期大仓事业的发展主题。他认为，“维新后，日本的衣食住将有突飞猛进的变化，这种变化的动力及榜样来自于西洋。因此，商业必须适应、满足民众生活的变化，投入设备，扩大生产”。经他提议，大久保利通立即成立了罗纱工厂。大仓设立在银座的洋行，销售伦敦的西装，成为上层社会开化的窗口。大仓把自己的事业同日本社会的发展紧紧地联系在一

起，逐步确立其在近代日本对外经济发展，对亚洲经济侵略的海外发展型企业中的领袖地位。

在对华经济扩张中，大仓喜八郎主张日中共存共荣的经济亚洲主义，这种思想是从他最初所坚定不移地信奉与躬行的“脱亚入欧”思想转变过来的。如前所述，三次出访欧洲，给大仓的冲击极大。欧美的先进技术，“文明开化”大大地激发了大仓振兴贸易的雄心壮志。他亦步亦趋地紧跟当时以“鹿鸣馆”所象征的事事学欧美、赶欧美的时代潮流，全力投入开发新产业、同外国建立经营贸易的努力之中。19世纪的日本，走向文明开化道路的本身，就意味着同落后的亚洲、落后的中国绝缘。所以，此时大仓的思想中带有浓厚的蔑视亚洲的色彩是不足为奇的。1872年，大仓第一次视察欧美，历经长达19个月的学习、取经，使他充分地认识了欧洲文明的价值，得到有形、无形的收获，确立了其后一生立志于开展对外贸易的职业选择〔3〕。

身为经济人，大仓的“脱亚入欧”思想，不仅具有时代的特征，同时还包含着精密的利益打算和对明治日本未来基本国策的深思熟虑。维新后，1871年岩仓视察团出访欧美，随后，大批的政治家、文人、留学生纷纷涌向海外，可是经济界商人的出访考察尚属“头号新闻”，晚年的大仓，在回顾毅然进行第一次海外之行时说过，“百闻不如一见，只有了解欧美的现状，才能制定正确的对策”等类的话。大仓此举，体现了他坚持一贯的“知己知彼，方能百战不殆”的儒家思想的实践特点。同时，坚定了他走欧化道路，建设新生日本的思想〔4〕。

大仓带着翻译，于4月乘陈旧的阿拉斯加号外轮离开横滨，经过海上26昼夜后，抵达旧金山。从登上美国的第一天，大仓一行无时无刻不为宛如另一个世界的新文化、新天地所吸引、所震惊。从饭店的壮丽、雄伟，餐厅的灿烂灯光，上百只洋蜡烛，服务员精致的燕尾服、白手套，到刚刚开通的横贯美国大陆的蒸汽机车，

面对奇观异景，再打量身着旧衣破衫，背着和式箱子，带着油纸等日本礼物，火车上被芝加哥一商贩误认为是同行的一行随从，感慨无限。他明白了不实行开放，就没有前途的道理〔5〕。

大仓目光敏锐，他从美国人民生活中、日常衣食住的文明开化，痛感开发国力与资源，发展生产与增强对外贸易的重要与迫切。旅行中，大仓极大地充实了自己对外国的认识，刻苦思考，逐步形成了他对日本经济发展的计划。他在欧洲苏格兰的一次讲演会上，提出了振兴日本贸易的两条腿走路的政策。即：守住家，走出去的方法。他断言：迄今为止，在东洋，日本与支那的贸易都是守住家的作法。但是，随着世界各国的通商、贸易的发展势不可挡，为此，守住家贸易的国家衰落，实现对外贸易的国家兴盛，已成为历史发展规律〔6〕。在整整19个月的海外视察里，他的思想完全集中到如何开拓日本经济，走向国际市场上。事实证明，大仓预见今后日本几十年的发展道路。他同木户、大久保强调了建立生丝被服厂，1878年向政府提出“直接向荷兰输出稻谷”的建议，统统基于这一发展外向贸易的考虑。这次视察奠定了大仓其后近10年的学赶欧美的事业基础〔7〕。

我们可以看出大仓提出的外向型贸易主张，其实在思想上同后来福泽谕吉提出的“脱亚主义”一脉相承，1885年3月16日，福泽谕吉于《时事新报》上发表了著名的《脱亚论》，指出“于亚细亚全洲中，打出一个契机、主义唯在脱亚二字”。认为，同落后的亚细亚绝缘，走新路是日本文明化、近代化的主要条件。

“脱亚论”所主张的“从心中谢绝亚细亚东方的恶友”之说，是10年前大仓宣布的“走外向贸易”道路的理论总括与归纳。谁能说，第一次西行后的大仓不是一个具有先见之明的最典型的“脱亚入欧”论者的财界人士呢。〔8〕

但是，10年后，大仓的思想发生了重大转变。1884年，为促进日本茶叶的出口，大仓第二次考察欧美。这次出访，大仓更进

一步认识到，唯有赶上欧美前进的步伐，才能有日本发展的可能。美国同行故意排斥日本茶叶的进口，给日本贸易造成损失，尽管大仓意识到其背后有种族歧视的因素，仍然没有影响其坚定不移走改革日本旧制度，完全欧化的决心。在美期间，经过一番苦心奋斗，圆满解决了茶叶问题。回到日本后，他起草了《贸易意见书》，进一步阐述了对贸易、商业制度、内地杂居制三大问题的看法。《意见书》系统地提出了基于商工立国主义下的贸易振兴政策。他明确指出：“要实现富国的大业，除完全、彻底西化外，别无它途”，并第一次向商工业者提出了“要关注国际形势，注意发展东洋经济的问题”。大仓提出的东洋经略问题，就是后来他主张的日中共存共荣论的思想内核。〔9〕

大仓从“脱亚论”转向“亚洲主义”式的对华经济扩张，其间经过了以下几个阶段。（1）1874年的日本出兵侵占台湾；（2）釜山开港后，朝鲜发生恶性饥荒时期；（3）1894年日中甲午战争及1900年的中国义和团运动时期。这三个时期是日本明治维新后进行国家建设、发展产业的主要阶段，同时也是日本向海外侵略扩张的最初阶段。大仓本来就是维新前起家的军火商。在日本这三次对外侵略扩张时他积极地并迅速开始了他向海外的扩展，不断成熟了他期待已久的对亚洲进军的构想。

出兵台湾时，大仓受命带领民工，出色地完成了保证军需供应的任务，受到了政府嘉奖。对于开发台湾，大仓认为，仅得到一个台湾还不够，应向南洋诸岛进军，开展贸易。然而，北京条约签订的结果，日本仅以获取80万两抚恤费告终，为此，大仓极为不满。

釜山开港后，他认为日人不注意开发朝鲜，不注意朝鲜经济界的现状，不打开对朝鲜贸易窗口乃国家之不幸。他说服新任驻朝鲜公使，携众多杂货赴釜山，办展览会，做广告，推销商品，一举成功。打开对朝鲜的贸易渠道，大仓又深刻体会到以日本国力为后盾，运用西方文化知识，占领亚洲市场的重要。后来，他

又同涩泽一起在朝鲜办起了第一家银行〔10〕。

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及后来的义和团运动，是大仓完全从“脱亚入欧”思想倾向“亚洲主义”的转折时期。

在这个转折过程中，有两个主要因素不可忽视。一是1875年4月，日本占领台湾，得到了第一块海外领土，开始了台湾殖民地的经营。二是日本的海外发展，遇到了与在中国境内的各帝国主义之间争夺权益的现实问题，以及日本如何解决国内产业发展中所出现的人口过剩的问题有着直接关系〔11〕。

大仓认为，“当今日本，人口每年增长，不要多久，因人口过剩，出现生计困难之时即将到来，那时，日本版图内，我日人可移之处除台湾、北海道外，无地可寻”。依大仓来看，中国乃世界三大国之一，人口四亿之多，资源丰富，缺少的恰恰是文明国的开发。日中结合正是互补长短。另外，日中邻邦，唇齿相依。日中亲善是实现日中共存共荣的前提，只有中日携手，才能增进两国利益，维护东亚和平，抵抗西力东渐的大势〔12〕。要完成这一神圣的任务，唯一的办法就是尽早实现日中两国的经济合作。就这样，大仓把上述几个问题的解决办法简单地归结于日中经济合作上，并以其独特的方式进行了不懈的努力与实践。其实，此时，他对自己所宣称的日中共存共荣论没有足够的认识，更说不上具有令人信服的哲理。但是，正如涩泽荣一评论大仓时说，大仓不善空谈，是一个行在前，说在后的实干家。事实上，也正如涩泽所说的那样，大仓先打起了他的经济亚洲主义的大旗，并在其实践中丰富了这一思想。

二、日本向外经济扩张的急先锋

大仓喜八郎下属的企业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即它是伴随日本对外扩张侵略而发展壮大的，大仓财阀的企业多在海外，特别是在中国东北地区，这是与大仓本人的政治主张有关的。大仓把自

己这种经营企业的特点称为“攻击型”。大仓及大仓企业的这个特点，集中表现在下面三个方面。

大仓是个忠实的御用商人。1875年，日本出兵侵略台湾，大仓组接受总督府命令，负责运送粮食、军需品及人力夫。大仓喜八郎亲任总管。4月6日，大仓率领着500名人力夫，离开横滨港。到战争结束圆满完成任务时，回来372人，128人丧生。大仓就是这样忠实地执行政府的委托，出生入死，不惜任何代价地接受任务，并从中牟取巨额利润〔13〕。

大仓靠发战争财起家，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在日本企业界里臭名昭著。大仓的信条就是要向外拓展，大仓的事业在向外拓展中发展，具有强烈的冒险精神。他多次不无得意地赞扬大仓组是日本最有实力的“攻击型”企业。沿着大仓事业发展的轨迹，我们可以发现，大仓所标榜的“攻击型”企业至少有这样两个内容。一是一般的企业，在向外发展中，总是瞻前顾后，愿稳扎稳打。大仓则不同，他的作法是，立足于对政治时局、经济利益现状及前景的基本判断，采用酷似军事上的突击队形式；又如旧时代的跑马占荒圈占在先，经营建设在后。这种好为日本海外经济发展充当突击队长的方式，贯穿大仓财阀枯荣的始终。二是大仓财阀以商业经营为主，兼顾土木建筑，开采矿山的垄断财阀。其最大特征是，对外扩张，特别是对中国大陆的扩张极为活跃。纵观大仓的全部发展史，一个最明显的现象，即是大仓财阀发展的每一个重要阶段，无不同“中日战争”有关，无不同日本的海外殖民地经营有关。日本战败后，殖民地丧失殆尽，给大仓的经营基础带来了巨大损失。同经过解散财阀打击下，又重建其企业集团的二井、三菱等其它财阀不同，大仓财阀伴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崩溃而衰落，并从此一蹶不振，失去了往日的辉煌。日本的殖民地经营，从1875年出兵占领台湾开始，至吞并朝鲜占领中国东北为一高峰。仅以朝鲜问题为例，大仓从扩张商业势力出发，经营日

韩贸易，积极主张并率先加入在韩建立金融机构，共同出资设立银行（后委托第一国立银行代管）牢牢地掌握了朝鲜的金融命脉，并为日后向中国大陆进行资本输出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近代日本社会里，同大仓相近的财界人物，多半都有这样一个特点，首先，他们积极地为日本对外侵略服务，直接充当政府、军部海外侵略的出资人、经济后台。其次，在这种对外经营的过程中，尽可能地从中渔利，充实自己的财阀本体，确立其个人与财阀在日本经济界的地位。同时在日本对外经济扩张中，这些个别的组织往往以某种形式建立横向的联合，他们结成一个强大的经济利益团体，代表整个财界发表政见主张，在日本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扮演举足轻重的角色。

大仓喜八郎对日本海外殖民经济侵略的政治主张是：日本要实现雄飞亚洲的目标，必须走日中共存共荣之路。尽管在近代日本，亚洲雄飞、日中共存共荣等口号，把整个日中关系搞得乌烟瘴气，但是，作为财界的代表，大仓所鼓吹的基于亚洲主义的日中共存共荣的思想，的确是近代日本对华经济侵略，近代中日关系中一股不容忽视的潜流。作为实业界的巨头，身为一个经营者，大仓所标榜的日中共存共荣的思想，多表现在开拓大陆市场的具体行动上，理论上的严密论证与说明相对薄弱。但是，我们通过考察他从事的各项事业的记录及他本人的回忆，完全可以清晰地看到一位财界人对“亚洲主义”的追求。

大仓同三井、三菱等大财阀的最大不同之处是，它具有强烈的个人事业的色彩。在海外投资上，较同前者，大仓组的所有行动，更多地体现了大仓喜八郎个人的海外经营战略。大仓绰号是“战争财阀”、“死的商人”，1894年日中甲午战争时，“石头罐头事件”淋漓尽致地反映了大仓喜八郎为赚钱、不择手段的“政商”形象〔14〕。但是，在对华、对韩等海外事业中，因风险、赔损远远高于获利，实际上，大仓组的海外公司少有黑字，

因此，大仓的行动是不能简单地用“赚钱”二字来解释的。大仓及他的部下把这些行动统统总结为“为国家利益，不计得失”的亚洲主义思想的结果。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后的第一年，大仓计划于旅顺、大连、金州设支店失败时起，到1928年逝世，大仓在中国（包括台湾）筹建公司、经营借款等活动近100次之多〔15〕。同时，大仓同中国政界要人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在其一生中，大仓先后五次受到清政府及民国各政权的授勋嘉奖。1912年清政府授予其二等第二双龙宝章，1915年袁世凯授其二等嘉禾章，1919年获得一等大绶章，1925年获一等大绶宝光嘉禾章。这些嘉奖授勋，完全说明了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对华侵略与经济扩张中大仓财阀扮演了极为重要的角色，并且赢得了中国统治者的青睐。

在对华经济扩张中，大仓又提倡“互通有无的贸易原则”，下面让我们看看这一“原则”到底包含了些什么内容。

首先，大仓在推出互通有无的贸易原则时，特别强调了文明发展的问题。他认为，中国虽然号称世界上仅有的几大国之一，但是，从中国的现状来看，尚缺乏开发丰富自然资源的国力与条件，中国的资源正在等待文明国人的开发。然而，具备能够开发中国资源能力的邻国日本并没有足够的热情去协助中国，共同开发。他认为，这是最可悲的。因此，眼下，至关紧要的是教育日本财界人士、企业家，立足于中日亲善，携手并进，完成经济上的结合。他总结了中日经济结合的条件，有二点：一是日中属亚洲唯一的两个（完整意义上）国家。中国落后，日本有责任帮助；二是日中唇齿辅车，由于“今日我经济上的活动重点不在内地，所以必须首先大力开发支那、南洋及台湾等海外事业”〔16〕。“在海外事业中，在中国，可大有作为，有很多事情都是我想亲自干一番的”，中国尚未开发的资源所具有的极大吸引力，促动了大仓建立中国市场的决心。把中国视为日本的商品市场及原料

供给地，是大仓强调日本经济合作的首要因素。

其次，考虑对华经济合作时，大仓明确地指出日中双方的优劣，认为所谓经济合作，主要是日本的资金、技术与中国的人力与资源。大仓认为，这样的分工，体现了共存共荣主义，体现了“相互平等”的原则，是对互通有无的具体化。考察大仓几十年来兢兢业业地经营的所有对华合作项目，上述的“互通有无的原则”几乎发挥到了登峰造极的程度。

再次，大仓的互通有无的原则是有着严格的前提和条件的。由于日本人是投入资金、技术，帮助中国开发资源、建立市场，那么，在日中合作中，日本人掌握经营权，是天经地义的。同样，在分配利益上，首先考虑日本人的得失，在这个根本问题上，已见不到什么“相互平等”的原则，所反映出的只是资本家与殖民者的掠夺本质。

除此之外，大仓以其丰富的对华交涉经验，在开拓中国市场、发展日本海外经济事业中，总结出一套独特的行之有效的经营方式。

尽管大仓喜八郎的经营方式没有使其立于永久的不败之地，但是考察他的创业史，无人不惊叹他那一套自成系统的经营方式，不仅具有浓厚的殖民地统治气味，同时，又是典型的东洋人办产业、做生意的样板。而且，这种独特的经营方式，又是深深扎根于他终生所追求的实现日本帝国的海外发展，实现东亚经济一体目标的经济亚洲主义思想之中。

向权力靠拢，官商结合是大仓在华经营方式的最突出的特点。在漫长的对华事业中，他走遍了中国的南北，同中国的政界、军界、财界有着密切的关系。《大仓鹤彦翁》一书中，专门设大仓与中国官民友谊一节，概括地介绍了大仓与中国权力集团的个人交往。下面举两个例子。1911年，大仓77岁生日时，袁世凯、孙中山、黎元洪、徐世昌、那桐、盛宣怀等中国的政界上层人物，

纷纷献诗献词，为其祝寿。12年后，值大仓88岁生日时，以徐世昌、段祺瑞为发起人，中国朝野一流名士84人，连名向其祝贺寿词洋洋千言，极尽歌功颂德。近千言的寿词中，几乎列举了大仓在华的所有事业，包括在东亚（朝鲜等）的经营，以及他投资办学、收集东亚艺术品创立大仓美术馆等驰名海内外的公共慈善事业，称颂其维护东洋商权，顺应世界大势。建立东亚和平的“功绩”。仅从这两次祝寿的中国朝野政界头面人物的登场，我们可以看出，大仓以一民间商人，同中国权力阶层建立如此广泛的个人交往，博得中国权力阶层如此重视和称颂，在近代中日关系史上，实属罕见。

同权力结合，同政治势力结合，是大仓自走上实业界道路，在日本国内经营军火，充当御用商人实践的经验总结。当时，日本处于资本主义发展的上升时期，大仓的经验有着其必定成功的现实土壤。清末民初的中国，外受帝国主义的侵略，内遭各种政治势力混战之乱，国内民族资本的发展步履艰辛缓慢。此时打着东亚一体论旗帜，率先进入中国内地的日本企业家，受到中国内部各派政治势力的欢迎也同样是必然的。加之，大仓是日本财界向中国进军的急先锋，因此，中国权力阶层竟先与其结纳，也是十分自然的。

大仓在日本国内开办企业同权力结合，获得了极大的成功。这一经验，移植到中国，在相当长的时期里，大仓在华进行殖民地产业经营，如大仓财阀在“满洲”的企业，其中一个重要的特征，就是合资，经营的中方代表全部限于中国政权机构〔17〕。因为，第一，大仓财阀在中国的所有企业以控制中国资源，供应日本国内为原则；故大仓的会社多半是木材、煤矿等。第二，中国的矿山、森林多半归属地方政府所有，是地方军阀的财政基础，因此，大仓会社的经营内容也决定了其合资对象必然限定在权力方面。大仓熟知中国内情，他的选择完全是从中国这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这一政治实际情况出发的。大仓非常熟悉殖民地经营之道，与国内统治阶层的政治利益结合，使其得到日本政府的支

持；与殖民地的权力阶层相勾结，在经济上给予小恩小惠，从而可为其攫取超额利润，控制掠夺矿产资源铺平道路；在殖民地榨取最大的经济利益，促使大仓财阀全力以赴的经营和发展海外企业，故其事业的兴衰，与日本帝国主义兴衰，紧密地联系在一起。随着第二次世界大战日本的战败，大仓的海外事业也随之消亡了。

第二节 论语与算盘主义——涩泽荣一

涩泽荣一1840年生于关东平原血洗岛村（现埼玉县境内）一个世代务农的家庭。在其长达92年的生涯中，他作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者和创业者，经历了日本社会发生天翻地覆变化的几个重要的阶段。

涩泽自己的资金并不十分雄厚，与三井、三菱相比，也许只有其二十分之一到三十分之一〔18〕。但是，这并没有影响他成为指导日本资本主义建设的产业领袖，“财界重镇”，“经济界之神”〔19〕。著名的“论语算盘主义”，就是涩泽式的日本资本主义的建设原理，也是他于理解融汇东西文明，长期以来所构筑的新的价值体系。涩泽的“论语算盘主义”作为财界向中国进行经济渗透、扩张的指导方针，同军部的大炮、坦克相比，有其独自的作用。“论语算盘主义”是涩泽东西文明观的产物，同时也跟他本人所体验过来的近代日本历史的激荡变化息息相关。

涩泽是时代的宠儿。他出生的那年，正是鸦片战争爆发之际，鸦片战争虽然动摇了一部分日本知识分子对中国的认识，但在日本社会上，中国文明依然拥有极大的影响。涩泽荣一的父亲涩泽晚香，是一个对儒学、俳谐都有一定造诣的乡村知识分子。涩泽荣一很小的时候，就在父亲督导下通读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等汉籍古文，十一二岁时又开始读《十八史略》、《史记》、《汉书》等书〔20〕。可能是受到这种教育的

缘故，后来的涩泽就成了一个强烈的攘夷论者。1863年他到江户时，听到了下关事件和萨英战争的消息。当事件以萨摩的妥协而告解决时，他就愤然说过：“使我神州为洋夷所轻”之事，乃不可忍受之耻，“彼纵有坚舰巨炮，而我有以大和魂冶铸之日本刀之锐利，抓住彼当全数斩尽杀绝”〔21〕。

1866年，他作为出席法国1867年博览会的德川昭武的随员，得到了一次出访外国的机会。初次的海外旅行，对涩泽来说，不光是一次拓宽自己知识领域的机会，而且使他可以用与以往不同的比较客观的立场从海外来观察祖国日本。就是在这个时候，他断言说：“观国家之现状，幕政之衰微既已如此，不远之将来发生一大政变亦必然之势也……不拘其结局将如何，随政体之变化，跟外国之交际亦必益加深也”。曾经是攘夷主义者的他，就是在这次法国逗留中，产生了“今后外国之学问日益重要当可无疑也……故今日就须定此志向，修得充足之学业”，以备将来“为国家之用”〔22〕。这样，他对欧美的评价，已经发生了根本的变化。

从法国回来，他就着手创办实业，首先在静冈建立了最早的商业公司。1870年，受明治新政府大藏省大辅大隈重信的推荐，他又参加了大藏省的工作。此后，他就一直站在领导者的立场上规划日本的资本主义建设，并且在意识形态体系上也提出了他的独特的论语算盘主义。

一、论语与算盘——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建设原理

明治时代的日本，把欧美奉为近代化的楷模，为了尽早加入欧美列强先进国家的行列，他们首先提出了与落后亚洲脱离关系，克服亚洲生产方式和东洋文明思想的政策。福泽谕吉的“脱亚入欧论”和“鹿鸣馆文明”最典型地代表了这种思潮。但是，涩泽身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的带路人，却反时代潮流而行，他主张以“论语主义”为货殖致富的方针，高度评价了东洋文明思

想。涩泽认为，主张日本只有脱离亚洲，遗弃东洋文明，方能实现近代化之说，是“极大的误解”，是“读论语而不知论语”，而产生误解的原因，则是其对论语的“解释方法及意义的理解方法”所致〔23〕。他认为，“从实业家之立脚点看论语，可于儒者未曾发现之所在读出非常之妙味”。接着，他分析了孔子学说中以往总被人们误解了的“仁义王道”和“货殖富贵”的关系：“常听人说孔子以为‘富贵者无仁义王道之心，欲作仁者，首先需留意舍去富贵之念，等等。但翻遍论语二十篇，根本找不到这样意义的话。非但如此，孔子之学说，实际上正是为货殖之道而设的”。他解释说，孔子的根本主张，就是他在《大学》中所说的‘格物致知’”，所以，“货殖之道，就是经世的最根本的主义”。涩泽的这些见解，与明治日本的欧化风潮截然对立，也成为他重新发现东洋文明的起点。他认为：作为东洋文明精髓的孔子思想，“既不是时代之遗物，也不是旧道德之残骸”，号召日本的经济界人士要将其作为“处世训言”和“指针”来加以学习。因为只有心领神会了“论语与算盘”的关系，并立志“将其作为致富经国的根本，才算有了真正的意义”。所以，对于大多数人所抱有的“论语主义缺少利权思想”的想法，涩泽针锋相对地强调：“论语也明白地包含有文明思想中的利权思想。”例如，“孔子说‘当仁不让其师’，就是论语中也含有利权思想”的一个确切证据，“只要合乎道理，就一定要把自己的意见坚持到底”，这类话中，涩泽认为确实已闪耀着权利观念。另外，他又批评说：“即如福泽先生所倡导的独立自主，或许也有些过份主观的东西，”所以他提出自己的人生观，是“并非为一己之身，而是为国家、社会”，并把这个叫做客观的人生观〔24〕。

这样，涩泽荣一从东洋文明思想中重新发现出了积极的内容，并将其发展为涩泽式的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国家的建设原理——“论语算盘主义”。以上述东洋文明的认识为基础，涩泽对于国

本的对华关系，日本财界向中国大陆扩张等问题，也表明了自己独特的意见。

二、涩泽荣一对中国问题的主张

涩泽荣一对中国的关心，早在1878年就已经开始，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更加强了其对中国问题的重视。在此之前，涩泽关心的重点和活动的重点，是日本国内经济的建设和发展，而中日甲午战争、义和团事件的冲击，使日本的对华贸易额骤然减少，国内经济也受到了重大的打击。从这个时候起，他更痛感到对华贸易及中国问题的重要性。

在中国问题上，涩泽荣一主要有以下两大主张：

（一）支那保全论

涩泽荣一主张的“支那保全论”，与其说是从政治、外交的角度出发，不如说是从经济的角度出发，完全是为了日本工商业的利益而提出的思想。例如他说：

“北清事件向何处去，以何种方式告终，乃外交、政治上之问题，自不容我辈赘言。但我辈从商业上之意念出发，唯望不拘使用何种方式，保全支那，以推进商工业之利益。不仅鄙人本身，想一般商工业者亦皆持此愿望也。”〔25〕

为什么要保全中国，涩泽也进一步指出，即列强借义和团事件对中国的侵略，会威胁日本的中国市场，必给日本的对华贸易及输出等以沉重打击。当时日本的对华贸易虽然还局限在棉纱输出等项目上，“但自前年以来，对华之输出已有较大之扩张，此次事件一起，中国北方自不待言，对中国南方之输出亦已中断”。中国市场是世界各产棉国输出的第一大目标，日本竞争对手的英国、印度、特别是美国，“近二三年来发展非常之快”，至义和团事件爆发的前一年，其规模已达到98万枚纱锭，照此下去，日本纺织业在和平时代苦心经营所打下的基础很可能会由于战争和

动乱而败于同美国的竞争中。所以，在如何对待与美国、印度、英国的竞争的问题上，他特别强调“支那保全论”和“应付和平时期战争的准备”的重要性，呼吁财界人士更多地关心海外的事情，反复强调日本经济的发展，“非但会因内地的原因而引起如此之变化，亦与海外即东洋诸邦之事情有极大之关系”〔26〕。

因此，他长期以一个财界人士的身分，积极鼓动日本对中国的经济渗透。从1894年（明治27年）到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明治四十四年），他参与了13个以上对华企业的创办或经营活动〔27〕。另外，他不光自己带头积极开辟大陆市场，同时，还带动、建议东京商工会议所、银行协会等财界组织注意中国、朝鲜问题，强调经济进军大陆，乃大势所趋，切不可错过良机。涩泽身为几个对中国朝鲜经济协会的发起人，他把“支那保全论”进一步发展，总结为“日本东洋盟主论”。

（二）“日本东洋盟主论”

涩泽荣一的“日本东洋盟主论”，主要包括：扩大海外市场、牟取海外资源、设立海外基地三个内容。他说：

“故吾辈每一个人都须知晓：吾辈不仅为我国商业之中心，至少还应是东洋商业之中心。须发展工业，向东洋各国扩展商品销路，同时以吾国力量左右东洋商品之价格，尔后向邻邦敷设铁道、采掘矿山”〔28〕。

但是，为了实现这样一个目的，就必须打破东亚各国沿袭至今的贸易体系、朝贡体系，重新组建一个新的体系。也就是说，日本必须破坏中国历来所保持的统率东亚经济的机能，建立以日本为中心的新的统率机能。因此，日本必须作东洋的盟主，必须进一步向中国大陆扩张经济势力。他又说：“吾人愿日本战后之经营，以在东洋大力扩展商工业为重，使吾国成为东洋之中心。而达至希望之关键，在对支那关系如何，此类事也无须吾人赘言”〔29〕。

1905年1月，涩泽又发表了一篇《我经济界两大紧急任务》的

文章，认为在日俄战争中打败了俄国的日本已经取得了对抗欧美列强的资格，他认为：“从地理上或从历史关系上说，我国都必须成为东洋之盟主，以开拓清、韩之富源，扶翼清、韩之文明，决不可仅满足于今日之京釜铁路、京义铁路或长江航行权等等。尤须注意者，是战后欧洲列强皆更着眼于东洋，拼命扩张其商权，而我国有鉴于此，当更明确意识，我国不但须在利权竞争上不弱于彼等，还须更进而超出彼等一头地也。”涩泽还强调，对外渗透的重点应放在银行的设立上。作为大银行家，他非常重视金融机关在国家经济建设中的作用，主张“为了日本国家，应使韩国银行接办第一银行支店（之事业）”〔38〕。从而为日本吞并朝鲜和“朝鲜之开发”等作出贡献。简而言之，他所主张的，就是以金融机关先行，推动日本财界对大陆的扩张，进而走向建立东洋盟主地位的一条道路。

日本财阀集团在海外实行的经济扩张，推动和影响了日本政府的对外政策的形成。涩泽荣一在近代日本经济界是一位既有理论思想，又有实干精神的领袖人物，被誉为日本近代资本主义国家建设中的“经济界之神”。在日本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及经济扩张中所扮演的又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角色。本书仅只是对其经济思想、对华的政治主张，做了一点简要的介绍。

第三节 经济参谋本部论 —— 阪谷芳郎

日俄战争，既是日本“武力”上的胜利，又是对日本国力、经济实力的一次大检验。整个战争期间，日本的财政经济都保持了极其稳定良好的状态。这其中虽然有多方面的原因，但以阪谷芳郎为首的一班战时财政首脑们，能够始终不失时宜，精心运营筹划，不能不说是其中的一个重要原因。

日俄战争的第二年，由于战争的需要，日本政府又计划募集

新的外债。当时的大藏次官阪谷芳郎派高桥是清作财政特派员到伦敦，在国际市场上计划募集2亿日元公债。新公债的募集大获成功，总额为16300百万英镑，几乎是原计划额的11倍之多。在美国募集的公债也有5亿美元左右，达原计划需要额的七倍。所以贝尔茨赞叹这是“令人惊异的日本财政”，是“大大强化了日本地位，使其具有持续战争力量的新内外债方面最辉煌的成果”，“日本的外交官及财政家们，其手腕之高超完全不劣于它的将军们，整个借债过程，十分清楚地表明了他们巧妙地利用了德国募集公债的申请，压制了英、美财团，使英、美方面于慌忙中提出了对日本意外有利的条件”〔31〕。

日本筹措战争经费，在欧美发行公债所取得的成功，主要应归功于阪谷芳郎与高桥是清。阪谷芳郎作为近代财政家对日本内外经济政策所发挥的作用，同明治政府的任何一名将军相比，也是毫不逊色的。

一、时代骄子

阪谷芳郎是日本最早的近代财政家。他和著名的银行家添田寿一同期毕业于东京帝国大学。随后，进入大藏省，登上了迈向高级官僚的阶梯。他47岁出任大藏大臣，是大藏省第一代高级官僚。阪谷历经明治、大正、昭和三个时代，在日本金融界始终处于领导位置，为近代日本资本主义国家建设作出了贡献。关于阪谷芳郎所生活的时代对他个人个性形成所起的影响，可以举出以下几点。

阪谷1863年出生于备中（冈山县）后月郡西江原村寺户兴让馆，幼年时勤奋好学。他的父亲阪谷素（号朗庐）是位儒生，也是“明六社”成员。1872年，阪谷芳郎随父亲到东京生活，翌年满10岁时进了有名的私塾“三叉学舍”学习，师事箕作秋坪。箕作是阪谷芳郎父亲朗庐在刘门塾时代的同学，也是当时屈指可数的“洋学家”，后来成为西洋史大家的箕作元八即是秋坪的第

四个儿子。津山出身的平沼淑郎、平沼骐一郎兄弟也是当时秋坪最亲近的友人。曾任总理大臣的平沼骐一郎曾经这样叙述过三又学舍的教育方法：“这个三又学舍，用今天的话说，相当于初级中学，但它实行的却不是死板、单调的教育，而是一种精英教育。对于聪颖的学生，甚至让他们读巴勒的《万国史》，一直到史密斯的《国富论》。”〔32〕

明治8（1875）年九月，阪谷芳郎考进开成学校的预备校——东京英语学校。和他同期进入该校的，还有添田寿一、内村鉴三等人。阪谷精通英文、汉文，学习成绩相当优秀。明治九年时在班级里排行第12名，翌年就跃到了26人中的第四名。

明治13年6月，阪谷从预备校毕业，翌年7月考进了东京大学的本科，专攻经济。在东京大学学习的四年中，阪谷竟选修了33个科目。后来连他的孙子阪谷芳直在列举祖父学过的科目时，也不得不说：“我在东大法学部时代，三年选修了18个科目，已经是焦头烂额了。祖父的时代，……所有的答案还必须用英语来写，四年间不但选修了33个科目，而且获得了优秀的成绩，可以想见其之不易”〔33〕。明治17（1884）年6月，阪谷芳郎以总分第一名的优异成绩毕业于东京大学文学部政治学理财专业。后来阪谷芳郎曾这样叙述过自己选择经济学的动机：“自我邦赴外国游历，一踏足欧美之土地，第一之感觉，乃与欧美经济相比较，我国经济规模如何之狭小，港湾、道路、市街、住宅、工厂等社会一般如此不完备，如此粗陋……此感觉实乃促使余从事经济学之研究、又是促使余产生无论如何亦须打破此不均衡之念的动力。苦心思虑之至，余脑中竟无一日闲暇。”〔34〕这种建设、改革后进日本的意欲，正是使阪谷成为近代日本财政家的思想动因。明治时代的日本人中，像阪谷这样忧于国事，赶超欧美或为了对抗欧美而把注意的目光转向中国大陆的人确实不少。阪谷之所以成为日本最早的近代财政家、推进日本国内建设和海外扩张

的日本官僚、“时代骄子”，也是与明治时期日本所面临的国内外情势有着密切的关系。

阪谷成长的时代，与明治维新取得成功，日本开始着手建设近代国家的时期正好重合，他正是乘着这个时代的大潮长成的。三叉学舍时代、东京英语学校时代、东京大学时代，他有幸于当时一些著名的知识分子门下求教，吸收了在那时最进步的知识修养。例如，在三叉学舍，福泽谕吉是他们英语课的教员；在东京英语学校、东京大学也有大森俊次、金子坚太郎等名师为他们授课。在学期间，阪谷还积极参加各种活动，结识了许多后来活跃在近代日本国家建设舞台上的同龄人，如落合裕二（后改名为藤山裕二）、山田直矢、青山直教、箕田享、平沼淑郎、添田寿一、加藤弘之、田尻稻次郎、冈仓觉三（号天心）、太田（新渡户）稻造、早川千吉郎、内田康哉、林权助等等。阪谷就是在这样一种时代潮流中，沐浴着明治维新后“文明开化”的欧风美雨，刻苦学习，掌握了近代科学知识，最后终于走上了推动、领导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财界首脑的地位。

进入大藏省后，阪谷先后担任过主计官、参事官、主计局长、总务长官、大藏次官等职务。特别是在担任大藏次官的时期，正值日俄战争爆发，他协助大藏大臣曾弥荒助主持战时财政，战后又担任临时国债整理局长，为重建财政而刻意规划，实际上所起的作用已经远远超过了大藏大臣。1906年，年仅45岁的阪谷终于当上了第一次西园寺内阁的大藏大臣。从22岁到47岁的25年间，他一直置身于日本财政的中枢，建立了诸多的业绩。

二、阪谷芳郎对中国问题的主张

阪谷芳郎的二十五年大藏官僚生活，是其漫长的财政生涯中最重要的时期。同时这二十五年也是日本对外经济扩张活动最活跃的时期。在这个对外经济扩张活动中，大藏省作为政府机关所

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这期间作为大藏省最高干部的阪谷芳郎对中国问题的认识和主张，也是值得注意的。

（一）宣扬武力征服的“国旗先行论”

明治20年代后半期。三井物产的益田孝曾于1895年（明治28年）写下了著名的《棉花论》，主张占领中国市场，认为这是日清战争结束后日本向外发展（尤其是通过输出棉纱的方式）的绝对必要的条件。从那以后，三井物产乃至整个三井财阀，云集在这面旗下，开始抓紧对中国大陆实行具体的渗透。三井财阀是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扩张的急先锋，益田孝的意见也代表了日本财界的全体意愿。

跟益田孝一样，阪谷也认为对华经济渗透、扩张具有以下几点重要意义：（1）“清国”和“韩国”是日本扩张工商业的最重要的地域（即资源供给地和商品市场）〔35〕。也就是说，随着日本经济的发展，商品的销路必然也会出现成倍的增长，到那时，清、韩两国就是日本商品最适宜的市场。（2）现在列强各国间虽然口喊门户开放主义，但它到底是以武力均衡为前提而得以维持的。考虑到将来这种均衡有可能受到破坏，日本从现在起就应建立必要的秩序，开展贸易，建立对清、韩关系的新格局〔36〕。

日本财界是从中日甲午战争前后，开始关注中国经济的。但是，从表面上看，直到日俄战争爆发前，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扩大、渗透主要是三井、三菱以及横滨正金银行这几个“大户”，但他们的活动慎重有余。当然，这是同该时期日本财界的对华重点，集中在朝鲜市场上有关。所以，给外界的印象，不免认为财界对向外扩张，反应不积极。当时，政友会的领袖原敬，曾在中日甲午战争开战后不久的日记中写道：“一般国民中，惟实业家最厌恶战争而又无公开将其表露出来之勇气。”特别是，积极鼓动财界更踊跃向外扩张的大藏官僚，对此极为不满。1903年12月，大藏次官阪谷芳郎对财界犹豫不前的态度，极为愤慨；与日本军

队之奋战相比，“日本商工业界既无秩序，又少士气，为何如此不振？实为遗憾之至也”〔37〕！他丝毫不留情面地，谴责日本一部分财界人士对向外经济扩张所持的消极态度，同时大声疾呼对中国、朝鲜进行经济侵略渗透之必要，抛出了著名的“国旗先行论”。他说：“为推进我国对于清、韩二国商工业之经营，第一需要者乃武力也”；宣扬只有对外武力征服“才能确保日本商工业者之秩序、联合”。又说：“以今日之国情，又不能不以国旗为先导，商工业随行，而求有顺序发展”。〔38〕剖析阪谷的“国旗先行论”的本意，其实质就是要日本以武力为财界积极向外经济扩张开路。同时阪谷坚持认为，在对外经济扩张活动中，日本财界必须结成一体，必须全力投入其中。为此，在方法问题上，阪谷进一步提出了一个他思虑多年的方法即所谓“参谋本部论”。

（二）“参谋本部论”

阪谷芳郎曾在《国家学会》杂志上发表过一篇题为《对清、韩之经营》的文章。文中他论述了日本对清、韩“经营”的具体内容、方法之后，又提出了一个必须建立日本财界对外扩张的专业银行方案。他说：“欲在清、韩二国开矿山、敷铁道、辟航路，不可无资本，又不可无提供资本之机关，故吾人以为当此之际，有必要开办一曰清银行。此曰清银行之资本可由政府贷与，或由民间募集，清国人亦可加入。有一千万元乃至二千万即可成立一大银行。此银行提供资本，令人开办事业，各事业可以股份或其他方式建立，因此铁道公司、矿山公司等自然不会难产，股票自然不难卖出，股票卖出后，将借款还给银行，银行又可将钱贷给欲办新事业者。银行实质上即为实际经营之实业家提供资本之参谋本部式机构。相互目的一致，则各事业进行也有秩序，从中不难得到极大之方便也。”〔39〕阪谷的想法，目的是要推动日本向中国、朝鲜两国的经济扩张，作为其手段应成立一个陆军参谋本部那样的机构。这个机构最合适的存在形式，是一个特

殊银行。设立了这个大银行，日本就可以主宰对中国、朝鲜的经济扩张，也可以向整个财界进一步发出拓展对外扩张事业的号召。

建立一个财界对外扩张“参谋本部”的方案，不光向人们提示出了特殊银行在日本对外经济扩张活动中的重要性，而且也向我们提示了认识阪谷在中国问题处理方针上的一把钥匙。阪谷在大藏省任职期间，曾经整理过一份《有关对华问题文件目录》（“目录”附本章后的注释）〔48〕这个《目录》当然并不一定能概括出阪谷所参与过的有关中国问题的全部活动，但通过这些文件，大致上可以了解阪谷及日本财界对中国问题的态度及其处理方法。

另外，阪谷之所以高度重视银行的重要作用，并将其比作“参谋本部”，可以说主要有以下两个方面的理由。

第一，他历来认为决不能忽视资本的重要性。简言之，在海外，“开矿山、敷铁道，辟航路，不可无资本”，银行如同人体的心脏，所以诸事开头时，都需要一个提供资本的银行。

第二，但为什么一定要搞一个大银行呢？阪谷的主要想法是，当时的日本，已经实行了金本位制，但中国的货币制度跟日本及列强各国不同，是银本位制，而且各种货币同时流通，极不统一。这对于所有的经济活动都是一个障碍，当然，更妨害日本的对华经济扩张。由于银本位制不但在贸易上还是在日本的经济控制力上，都极不方便，所以必须想方设法改变中国、朝鲜的银本位制。就像当年日本把采用金本位制当作确立日本资本主义经济的最大目标一样，阪谷把在中国以及朝鲜实行金本位一事，也当作了建立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扩张基础的最主要课题。

第三，通过日本方面设立银行、改革币制等多方面的努力，使日本能够在同列强竞争中，处于有利地位〔41〕。

追溯阪谷芳郎的轨迹，他作为日本第一代的近代财政家，在甲午战争前后，逐渐开始关心中国问题，并将其与日本财界的对

外经济扩张联系起来，进行整体考虑。另外，他对福泽谕吉的文明开化论、涩泽荣一的“论语算盘主义”十分欣赏。但是，作为一个财政家，他习惯于从日本政府整体利益的角度出发参与财界对外经济问题的决策。他执意要设立大银行的计划，是日俄战后他对中国、朝鲜政策长期思考的结果。但从表面上看，这个计划与陆军及一部分强硬派大陆浪人的主张不同，是一个以“联合”或“提携”为基础的怀柔政策。

在日本的对华经济扩张方面，大仓也好，涩泽也好，阪谷也好，与国权主义者大陆浪人中的理论家和实干家相比，在对外侵略的实质上没有什么原则区别。不同的只是，大仓喜八郎、涩泽荣一和阪谷芳郎，作为财界人士，重点在对中国的经济侵略。涩泽的“支那保全论”、“日本东洋盟主论”，都带有强烈的亚洲主义色彩，又均以对华经济扩张为目的。而阪谷的“国旗先行论”则更加暴露出殖民主义的真面目。所以他们所关心的“中日关系”或“中国问题”，都是围绕着这一中心构思设想的。在中国某一时期，日本支持或援助某一派政治势力的作法，也是从其总目标出发的。阪谷芳郎在辛亥革命时期，积极为孙中山领导下的南京临时政府筹划建中央银行一事，即是最明显的一个事例。

【注释】

〔1〕 竹内好、桥川文三编：《近代日本与中国》上，朝日选书（14），1974年，《大仓喜八郎与山本条太郎》，第73—92页。

〔2〕 鹤友会编：《大仓鹤彦翁》，1924年，第65页。

〔3〕 同上，第87—88页。

〔4〕 同上，第56—58页。

〔5〕 同上，第62—64页。

〔6〕 同上，第75页。

〔7〕 《大隈文书》，第3192页。

〔8〕 《福泽谕吉全集》第10卷，第239—240页。

〔9〕 大仓财阀研究会编：《大仓财阀的研究》，近藤出版社，1982年，第109—110页。

〔10〕 同上，第101页。

〔11〕 《台湾协会报》，第1号，第207—210页。

〔12〕 同注〔2〕，第221—226页。

〔13〕 同上，第94页。

〔14〕 楫西光速：《政商》，筑摩书房，1963年，第174—175页。

〔15〕 同注〔8〕，第880页。

〔16〕 同上，第112页。

〔17〕 关于大仓组织在满州地区建立公司情况可见104页表。

〔18〕 涩泽荣一述、长幸男校注：《雨夜谭》，岩波书店，1984年，解说，第334—335页。

按当时的币值，三井十一家家族共拥有股份36280万日元，岩崎五家家族拥有的仅三菱本社的股份就有24000万日元，占公司总资本的46%，而涩泽家庭拥有的资本只有1000万日元。

〔19〕 同上，参见第335页。

〔20〕 《雨夜谭》卷之一，第14—34页。

〔21〕 同上，第35页。

〔22〕 同上，第145页。

〔23〕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纂刊行：《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6，讲话2，1968年，第51—52页。

〔24〕 同上，第52—56页。

〔25〕 同注〔18〕，第330页。

〔26〕 《银行通信录》第177号，明治三十三年八月，经济时事谈、涩泽荣一男谈：《不权衡——经济界之发达》，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6，讲话2，1968年，第290页。

〔27〕 这十三家企业如下：

1895（明治二十八）东华纺织公司

1895（明治二十八）上海纺织公司

1901（明治三十四）东洋万国公司

1902（明治三十五）清韩协会

满洲地区主要的日中合资企业 (1926年底)

名 称	设立日期	事业内容	出 资 者
札免采木公司	1922.6	林业	满铁、黑龙江省、西复亲科商会
本溪湖煤铁公司	1911.1	煤炭、钢铁	大仓矿业、奉天省政府
天图轻便铁路公司	1918.3	铁道	太兴联合
中东海林采木公司	1924.1	林业	日本纸器制造、吉林省政府
鸭绿江采木公司	1908.9	林业	日本政府、中国政府
华森制材公司	1918.10	林业	王子制纸、吉林省政府
大新矿业公司	1914.8	石炭	满铁、中国政府
丰材公司	1918.11	林业	大仓组、中国
吉省兴林造纸公司	1921.11	林业	大仓组、中国
天宝山银铜矿	1915.12	矿业	太兴联合
弓张岭铁矿公司	1918.12	矿业	饭田延太郎、奉天省政府

(见《大仓财阀的研究》，335页)

- 1902 (明治三十五) 湖南汽船公司
- 1906 (明治三十九) 东亚制粉公司
- 1906 (明治三十九) 南满铁道公司
- 1906 (明治三十九) 营口水道公司
- 1907 (明治四十) 日清汽船公司
- 1907 (明治四十) 满洲兴业公司
- 1908 (明治四十一) 东洋拓殖公司
- 1909 (明治四十二) 日清起业调查会

1909（明治四十二）东亚兴业公司

参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8卷，88—92页。

〔28〕、〔29〕 同注〔22〕，第289页。

〔30〕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6，讲话2，1968年，第325页。

〔31〕 《阪谷芳郎传》，第270—280页。

〔32〕 阪谷芳直，《三代系谱》，三笃书房，1979年，第152页。

〔33〕 同上，第153、155页。

〔34〕 阪谷芳郎，《论日本经济之未来》，《进步党党》，明治三十六年，第4号。

〔35〕、〔36〕 《阪谷芳郎文书》。

〔37〕 阪谷芳郎，《对清韩之经营》，见《国家学会杂志》，第60卷，第191号。

〔38〕 同上。

〔39〕 同上。

〔40〕 《有关对华问题文件目录》内容如下，

1. 内阁关于贷付清国汉阳铁政局资金二百万元议案 明治32年3月

2. 外务大臣、农商省大臣关于上件致和田制铁所长官及小田切领事的训令 明治32年3月

3. 大藏大臣致正金银行训令案 明治33年2月

4. 大冶矿山贷款条件。

明治36年大冶矿山问题贷付三百万日元 男爵笔记 明治36年

5. 大冶矿山贷付资金筹措顺序 男爵笔记 明治36年

6. 关于贷付清国某矿山资金及融通方法

附录：参考文件 自松尾臣养处

7. 与（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相马氏关于大冶矿山贷款问题谈话纪要 男爵笔记 明治36年10月14日

8. 关于大冶矿山贷款问题致外务大臣书简底稿

9. 关于大冶矿山贷款问题与兴银添田总裁谈话纪要

明治36年10月19日

10. 关于大冶矿山贷款问题致外务大臣书简底稿
明治36年10月21日
11. 关于大冶矿山贷款问题致农商务省总务长官书简底稿
明治36年10月23日
12. 关于大冶矿山贷款问题致外务大臣书简底稿
男爵笔记 明治36年10月2日
13. 明治38年7月20日关于大冶矿山借款问题与珍田、中村、
阪谷三人协议备忘录 男爵笔记
14. 关于汉口铁政局及萍乡煤矿借款问题给外务大臣复信
明治38年7月22日发
15. 小村外相关于汉口铁政局及萍乡煤矿借款问题给汉口领事的
训令
明治38年5月24日发
16. 清国事变明治33年
17. 自明治33年6月至34年3月清国事件日记
18. 北京条约
19. 各国要求偿款金额表 4月底
20. 清国事件费用（预算及偿款金额）
21. 内田康哉氏关于清国事件费用书简（复制件） 明治33
年8月26日
22. 各国要求偿款金额 外务省调查
23. 清国公债偿还书
24. 关于清国事变费用紧急敕令案
（废案一乙案）
25. 阪谷氏就清国事变元银换购事致后藤新平书简底稿
明治33年6月22日发
26. 北清驻军配置图
参谋本部 明治34年7月22日
27. 白岩龙平氏关于招商局书简一册
28. 李振铎氏关于招聘顾问事
明治35年6月18日

29. 关于赴外国政府任职之文官进级一事内阁议案
30. 关于支那“直东银行”奖金贷付事正金总经理相马氏致藏相的呈文

明治35年6月18日

31. 曾弥藏相关于上件呈文之答复
32. 关于直东银行及铜钱之记录

明治35年8月6日—23日男爵笔记

33. 阪谷芳郎氏关于直东银行之意见（明治35年9月17日）
34. 佃一豫氏关于中国银行及其他等事书简四件：（明治35年5月26日发，7月7日发，6月10日发，8月16日发）。
35. 关于上海、南京铁道事小田切领事致小村外相书简（明治35年6月25日发）
36. 关于清国货币政策日记

男爵笔记（明治36年1月13日—1月23日）

37. 清国货币政策 明治36年1月17日 照会外务大臣者
38. 天津借款文件（袁世凯240万元借款事）
39. 关于直隶总督借款日记（明治38年1、2月）
40. 关于直隶总督借款与外务省商讨纪录（协议案甲号）男爵笔记（明治38年1月27日）
41. 松尾臣善氏关于直隶总督借款提议（协议案乙号）明治38年1月28日

[41] 同注 [37]。

第四章

财界的朝鲜政策

第一节 财界的大陆政策

挺进亚洲三部曲

从1894年中日甲午战争起，至1911年辛亥革命后，日本财界的大陆政策，主要包括三个内容。(1) 朝鲜政策，(2) “满洲政策”（即中国东北），(3) 中国政策。从时间上来看，日本在推行上述三项具体的大陆政策时恰恰以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辛亥革命为标志的。在近20年的时间里，以中日两国为中心的东北亚国际关系，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其特点是，中国日益衰败，日本称霸亚洲。

考察日本大陆政策的历史，我们似乎可以断言，在这20年中，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还是日俄战争以及武昌起义而带来的清王朝崩溃，每一次巨大的政治力量冲撞、变动都为日本向亚洲推进大陆政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简言之，1894年的中日战争打破了中国的华夷体制，中日两国武力交锋的结果，确立了日本对朝鲜的控制地位。《马关条约》中，清王朝表示放弃与朝鲜的领属关系，这本身就意味着日本对朝鲜政策的成功。1904年的日俄战争，是两个后起的帝国主义，为争夺中国东北权益而在中国领土上进行的一场狗咬狗的非正义之战。日本击败俄国，从根本上表明了，日本为确保日后对华的全面扩张，完成了其大陆政策的第二个阶段。1911年的辛亥革命，中国国内的政治变

动，为日本对华扩张侵略，提供了可乘之机。同时，由于革命党人与清王朝双方对日本程度不同地依赖，构成了日本对华政策多元化的外界因素，鹬蚌相争，渔翁得利，其结果，使日本大陆政策顺利地进入第三阶段。日本财界大陆政策的三个主要内容，正是以这三个时期为特征，得以实施推行的。

本章拟考察财界的大陆政策演变史、财界的大陆政策同日本的对外政策紧密相联，因此，作者拟以中日甲午战争、辛亥革命二个时期为重点，剖析财界的朝鲜政策、中国政策，在尽可能的条件下，对上述两个方面进行说明。（日俄战后的日本满洲政策，基本上是第一时期朝鲜政策的延续，故省略。）

日本学者北冈伸一在阐述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时，从铁路问题、金融问题、经营机构问题入手，形成了他独特的研究体系，颇有见地。但是从中日关系史角度来探讨日本财界的大陆政策时，似乎需要新的视角。本章从“占领经营”“政府主导经营”及“合资合办经营”的三个侧面，阐述财界的大陆政策。

下面，我们从上述三个侧面出发，重点分析铁路问题、金融问题、经营机构问题。这样的视角对我们进一步理解、说明辛亥革命前后的财界大陆政策，也许具有较为重要的参考价值。

一、中日甲午战争起因再考

1894年至1895年的中日甲午战争，在东北亚近代史上揭开了新的严重的一页。这次历时八个月、以日本挑衅开始，以日本获胜告终的中日交锋，无论是在中日两国的历史发展上，还是在东北亚地区国际形势的发展上，都是一个极其重大的转折点。

1895年4月17日，于日本下关签订的中日议和条约《马关条约》，主要包括以下几个内容：1. 否认朝鲜的独立，2. 把辽东半岛、台湾以及澎湖列岛割让给日本，3. 赔偿军费二万万两，4. 新设湖北沙市、四川重庆、江苏苏州、浙江杭州为通商口岸，5. 中

国给日本的贸易以最惠国待遇。对于日本来说，《马关条约》的签订，有三层意义。首先是否认了清国对朝鲜的宗主权，清除了日本向朝鲜扩张道路上的障碍。其次是改变了1871年《日清修好条规》所规定的互有领事裁判权的体制。再次，日本在实际控制朝鲜的基础上，开始对中国进行经济扩张。

这场战争带来的直接后果表现在，中国进一步陷入半殖民地的深渊，而日本却以此为契机，跻身于与列强诸国在中国境内相互争夺的行列之中。第二，《马关条约》为帝国主义由商品输出转入资本输出大开绿灯，为他们敞开了在中国兴建企业、修筑铁路以直接掌握中国经济的大门。

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有着深刻的历史必然性。日本学者井上清指出，“日本的统治者，自1884年日清于朝鲜的冲突以来，就准备和策划了即将来临的日清战争”，认为中日甲午战争是日本产业资本主义发展的必然结果〔1〕。明治维新以后的日本，明确地打出了拓荒四海的对外侵略扩张的国策，朝鲜、中国首当其冲地被列入日本海外发展战略的第一个目标。1871年，明治新政权后的“征韩论”之争，最充分地说明了日本这个后起的资本主义国家所带有的军事扩张本质，所谓的“南进”、“北进”论争就是对这个问题的最好注脚。同时，在日本甚嚣尘上的“亚洲雄飞”“大陆经纶”正反映了日本覬覦亚洲地区、特别是对朝鲜、中国的垂涎之心。

中日甲午战争前夕，立足于“富国强兵”基础上的明治维新政权，在完成了废藩置县、改正条约的两大内外目标后，对保护日本民族的独立，充满了自信。1894年日英条约的签订，日本自认为已成为列强中的一名正式成员，急欲加入列强对世界扩张掠夺的行列。上述种种有利于日本的国内外局势的发展，使日本感到，在中日两国围绕朝鲜问题一触即发的情况下，日本对朝鲜出兵的时机业已成熟。

中塚明教授于《日清战争的研究》中，强调1890年的恐慌所带来的日本产资本对于争夺朝鲜市场的炽热化，是导致日清战争爆发的一个重要原因〔2〕。把日清战争放在日本近代化起步的历史进程中进行考察，也是我们认识这场战争本质的一个有益的视角。

迄今为止，很多学者指出了“朝鲜权益”只是中日两国冲突的一个重要起因。但是，以上这些研究更多地注意了关于中日两国的朝鲜支配权的问题，而具体地从经济贸易角度，探讨中日冲突直接原因的文章为数甚微。从这个意义上讲，重新考察日清战争的意义，说明导致这场战争爆发的中日两国经济贸易上的利害冲突，是我们了解日本财界朝鲜政策的一个必要课题。

本节拟着眼于经济问题，从财界的海外战略的朝鲜政策入手，进一步探讨中日甲午战争中的经济因素。

（一）亚洲雄飞第一站

明治政权成立后的新领导人，明确地把“对外和亲、开国进取”和“弘扬国威”作为“今日之急务，永世之基础”的国策。1868年3月所公布的“五条誓文”，更具体化了日本对外政策的方针“不问一身之艰难辛苦……开拓万里波澜，振国威于四方，欲置天下于富岳（指富士山）”，毫无掩饰地表露了积极向海外扩张的野心〔3〕。

既然方针已定，那末在如何分阶段地统筹完成向外发展的探索中，邻国朝鲜首先被视为应第一个占领、夺取的阵地。1871年，西乡隆盛等人的“征韩论”，最典型地反映了当时日本社会的这种欲称霸世界，必先征服近邻的“远亲近攻”对外战略的实质〔4〕。

岛国日本，自走上资本主义发展后，无论是从资本输出、还是从占领海外市场、掠取主要的原料等方面考虑，重视朝鲜的战略地位，决定先置朝鲜于日本的统治支配之下的战略，得到朝野一致的认同。1988年岩波书店出版的日本近代思想大系的《对外

观》的资料中，专论及朝鲜问题的文章达10篇之多，（见注释〔5〕）其作者多为日本明治维新时期政界要人，当时日本对朝鲜问题之关注，由此可见一斑。

日本在朝鲜问题上，经过了一个认识的变化过程和准备实力的过程。江华岛事件，是近代日本对朝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是日本以不平等条约的形式，从政治、军事、经济等方面公开地大规模地向朝鲜侵略、扩张的开始。

明治3年，岩仓具视提出了关于朝鲜政策的三条意见。认为迫使朝鲜开国，即是“天下之通情、宇内之公理”，也是“施皇威，降服朝鲜同清国等的重要步骤”。此后的一段时间里，日本对朝鲜政策的中心议题，一直是扩张国权、对抗清国，同朝鲜签署条约，以“达与清国比肩同等”之目的。基于这种观点，由于朝鲜拒使及“江华岛”事端，日本朝野倍感受辱，欲兴问罪之师，打荣誉之战〔6〕。到了明治13年，江华岛条约的签订，加之日本国内局势的稳定，国际地位的上升，日本对中国局势日益严峻。在对朝鲜方面，认为促使朝鲜独立等于建立起一座对抗清国的“万里长城”〔7〕。榎本武扬于《日朝修好条规》签订时，上书外相寺岛宗则强调朝鲜政治上、战略上的位置，要求把釜山作为渗透朝鲜、扶植日本势力的桥头堡〔8〕。

但是，围绕“壬午军乱”（1882年7月）及两年后的“甲午事变”的处理上，中日两国间的对立，刺激了日本朝野的抵触情绪，对清强硬论，充斥朝野，强调“日本的朝鲜政策同宗主国清国的国家利益势不两立，不远将来日清一战，难以回避。”〔9〕1880年，山县有朋提出的《近邻邦兵备略表》、福岛安正的《邻邦兵备略》和1883年山县的《关于陆海军扩张的财政意见》，正是立足于上述认识的基础上的。这些有关朝鲜问题的主张，基本上停留在强调尽快解决朝鲜问题于日本对外军事、战略上的迫切性的一般论述上，是明治初年“征韩论”的延续。

日本与朝鲜一衣带水，历史上的联系与地理位置相接，更决定了两国政治、经济、军事关系的特殊性。1876年，日本同朝鲜签订了《江华岛条约》、《日本朝鲜修好条规》。这两个不平等条约的签订，标志着日本对朝鲜政策的成功，同时也掀开了朝鲜进入殖民地化的灾难深重历史的第一页。条约签订后，日本在随时保留着对朝鲜进行全面干涉权利的同时，把对朝鲜政策的基本方针放在逐步扩大日朝间通商关系上。由重视政治、军事关系到注意通商贸易问题，是日本对朝鲜政策重点转移的象征，也是日后中日两国竞争、角斗时，日本终能立于不败之地的重要因素之一。

在此之前，明治3年，岩仓认为“朝鲜固陋未开，物产寡少”〔10〕。明治9年，榎本也说“朝鲜对于日本来说，在经济上的实际利益微乎其微〔11〕。”低估朝鲜贸易的地位，忽略从经济上认识朝鲜问题，是当时日本朝野人士的普遍倾向。然而，江华岛事件前后及上述两个条约，意味着日本已经从经济、贸易上重视与朝鲜的关系，开始从日本资本主义对外发展的观点上调整日本的对朝鲜政策。比如，《日朝修好条约》中日本要求朝鲜政府“改正海关税、废除米谷进出口令、对日本内地商人给予方便”等条款〔12〕。这种变化，更增加了江华岛事件在近代中日朝三国关系史上的重要性。

在以中日朝三国关系为中心的近代东亚政治史上，江华岛事件及其后的两个条约至少具有下述两个重要意义。(1)日本动用武力，出兵炮击朝鲜炮台、占领永宗岛，迫使清国承认朝鲜为独立国，确立了日本同清国平等的地位。此条约第一条的朝鲜国的自主独立，对于日本来说，恰恰意味着否认同清国的宗属关系以及“朝鲜低日本一等的”关系的确立〔13〕。(2)共12条内容的条约中，除去前三条和后一条外，中心部分的八条，即是两国的经济、贸易问题、通商问题。从此，朝鲜开放了釜山等三个港口，同日本进行贸易，规定了日本单方面的领事裁判权，和无关税特

权。〔14〕该条约，是近代日本仿效欧美，以武力为背景，对外签订的第一个不平等条约。以江华岛事件为契机，确立了朝鲜作为日本向亚洲进军的第一站、最前哨的地位，也增加了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利益的竞争与敌对。从此，日本对外侵略扩张的野心大增，这一切，都为日后的中日甲午战争的爆发埋下了伏笔。

（二）中日对朝贸易的对立

自1876年的江华岛事件到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中国同日本围绕朝鲜的统治和对朝鲜的经济贸易，展开了几次大的较量，其间日本经历了对朝贸易垄断和被迫卧薪尝胆的两个时期之后，为了确保《江华岛条约》所获取的在朝鲜的利权，日本同中国之间的矛盾和争夺，终于导致了1894年的中日甲午战争。

1876年2月的《江华岛条约》缔结后，到1882年上半年的5个年头里，是日本垄断朝鲜贸易时期〔15〕。日本对朝鲜贸易之所以能于5年内连续占垄断地位，首先是日本商人依据《江华岛条约》所获得的诸项特权的必然结果。与此同时，中国却是内忧外困，无力顾及朝鲜问题，让日本商人有机可乘，得以迅速发展。

关于《江华岛条约》于中日朝三国关系的意义，为数众多的研究中，一般认为“23年前在美国柏利舰队压力下被迫开国的日本，这次竟以同样手段强迫朝鲜开国，并以1858年《日英修好通商条约》为样板，把一个不平等条约强加于朝鲜”，其卑劣作法，令人发指〔16〕。另外，这个条约否定了清帝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破坏了东部亚洲华夷制度下国际格局〔17〕。这种强调该条约对改变后来东亚政治格局的意义，固然不错。但是，从真正意义上讲，所谓否定清帝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只不过是根据条约内容所作出的一种解释。说到底，并没有得到宗主国清王朝的实质上的认同，因此，说其徒具条约之形式，无实质约束力量当为更妥切。所以，考察其后出现的“日本垄断对朝贸易的五年”，笔者认为正是由于江华岛条约的签订，满足了缔约前日本

大政大臣训令全权办理大臣“以缔结和约为主”使朝鲜答应日本的“修睦和好、广开贸易”的要求，才带来了日本对朝鲜经济扩张与垄断贸易的成功〔18〕。

研究朝鲜近代经济史的学者指出，“《江华岛条约》及《朝日修好条约附录》、《朝日贸易章程规则》，为日本商人肆无忌惮地进入朝鲜境内经商贸易提供了法律保证，为日本商船进入朝鲜港口简化了手续，免除了船税，同时更为日本商品大量流入朝鲜市场，大开方便之门，其结果给朝鲜商工业的发展造成了一大危机。”〔19〕

另外，江华岛事件后，日本对朝鲜贸易发展的事实可看到近代日本在“国旗先行”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日本海外经济扩张的特点。事实上，日本以军队逼压朝鲜签订条约，开拓了日本经济发展的市场。可是当清帝国意识到日本经济、政治势力发展膨胀的危险所在后，乃竭尽全力，阻止新兴日本对朝鲜的野心，从政治、外交、军事、经济等领域，堵塞日本对朝鲜的蚕食与渗透。因此，1882年壬午事变后，清帝国对朝鲜干涉的强化，直接触及日本的朝鲜政策，令《江华岛条约》成为一纸空文，失去了任何法律制约力和实际意义〔28〕。仅此也充分反证了所谓《江华岛条约》，否定了清帝国与朝鲜的宗属关系一说，只是对一时的假像而作出的论断。

不过，在考察明治9年至15年期间，日本对朝鲜贸易空前发展问题时，特别应注意两个方面。1. 有组织的经济团体、贸易组织，究竟占多大比例；2. 高涨一时的日本对朝鲜的贸易基础是否扎实、计划性是否合理、发展是否平衡等问题。江华岛事件后，日朝贸易间的繁荣，很大程度上有偶然的因素，即清国无暇顾及朝鲜问题，加以由于清商的撤离而日商取而代之。因此，尽管条约为日本商人、日本商船、日本商品涌入朝鲜创造了“千载难逢之良机”，但是，就经济问题而言，由于日本商品中棉制品、日用杂货比例极大，加上大多数日本商人为小本利商贩，这些近乎

赤手空拳的小商小贩，一旦遭受到1882年壬午事变的冲击，即溃不成军，致使日本对朝鲜贸易出现灭顶之灾的损失〔21〕，恰恰是这个挫折，促进了日本于卧薪尝胆时期，动员大量民间资本，打入朝鲜市场，使以后的对朝鲜贸易有了扎实的发展。

1882年的“壬午军乱”和1884年的甲申政变的两年，是中日两国围绕朝鲜问题进行抗争、较量的两年。其结果，以日本的失败告终。旗田巍在《明治期日本与朝鲜》一文中指出：“这两次抗争，日本失败的主要原因：一、朝鲜民众对日本扩张的反抗；二、列强诸国对日本垄断突进的抵制；三、清帝国重新调整对朝控制，明确对朝的宗属关系，决意按照中国模式对朝内阁进行改造。从而大大削弱了日本的势力。壬午事变后，在对朝鲜政策上，清帝国主要从几个方面取得了相对的优势。其一，明确了中国对朝鲜的宗主权关系，又签订了《中朝商民水陆贸易章程》；其二，强迫朝鲜按照中国模式改革政治机构，接受中国所推荐的顾问，参与政策制定。清国的这一系列措施，对于日本来说如同晴天霹雳。”〔23〕然而，从当时日本的国力来讲，虽无力抗拒清国，但就日本国家利益来说又不甘就此罢休。所以，井上毅主张，要虚实结合，避重就轻，主张回避与清帝国正面对立，暗里扩大军备，以防未来的中日之战〔24〕。山县有朋肯定了当时日本的选择，称其为“立足于实力外交基础上的，根据他方变化随机相应的，无一刻放松对长远目标追求之举。”〔25〕这正是近代日本外交中，避实就虚、扬长避短、卧薪尝胆、坚持实力外交的成功时期。

表1说明了日本对朝鲜经济渗透所取得的成功。10年之间，在清帝国势力控制下的朝鲜，日本竟能获取如此多的利权，足以说明日本经济穿透力之强，同时也反映了清帝国不务实利，只图虚名的对外交涉的愚蠢与无能。

明治21年6月1日，日本外务书记官小田切万寿之助，就如何发展扩大日本在朝鲜仁川的商业事业意见书中，主张要以同清帝

表1 1883—1894年日清两国在朝鲜获取利权一览表

年 月	内 容	国 名
1883年1月	釜山海底电线敷设权	日本
1885年6月	仁川义洲间电线敷设权	清国
1885年12月	釜山、仁川间电线敷设权	日本
1886年1月	釜山野岛貯炭所	日本
1888年9月	沿岸捕渔权	日本
1891年1月	仁川月尾岛貯炭所	日本
1891年3月	庆尚道沿岸捕渔权	日本
1894年7月	京釜铁道敷设权	日本

转引自高秉方《近代朝鲜经济史的研究》雄山阁42页⁽²⁶⁾

国对抗为基轴，排除清商，支持日本实业者，认为在日本资本主义脆弱的条件下，只有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的精神，坚持发展日本海外经济，方能达到富国强兵之远大目标〔27〕。

在当时，日本为争夺朝鲜，正秘密准备一场对中国的战争。无论是政府，还是军部，还是财界，还是民间，对同中国决一胜负的认识，基本一致。伊藤博文说：“清国对于朝鲜的要求只是历史的东西，在清国的历史上，朝鲜被作为一个朝贡国。（中略）日本对于朝鲜的要求是经济的。日本不要求于朝鲜的法律权限，只是从人口的不断增长的需要，把朝鲜作为补充国内稻米生产的最佳基地，同时作为安排日本后代就业的最理想场所而利用朝鲜。”〔28〕

山县有朋出于对日本国际战略的考虑，提出要注重日本主权线和生命线的观点，他在《外交政略》中指出：“朝鲜是日本的‘利益线’，我国利益线的焦点实际在朝鲜。因此，不是口号，（应以）实力扩充陆海军，进行爱国教育为根本”〔29〕。强调加强对朝鲜的控制准备未来的对清战争。

日本对朝鲜的政策，注重经济、贸易的发展。甲申政变后，按照甲申条约，日本又获得了对朝鲜问题与清国一样的出兵权。这个权利，正好为10年后发生的东学党之乱时，日本出兵干预，提供了法律依据〔30〕。

但是，日本对于朝鲜的这种露骨的经济扩张，引起朝鲜方面的强烈抵抗与清国的警惕。来自朝鲜与清国方面的抵抗和阻力，一方面是缓和了日本扩张的速度，另一方面激化、尖锐了中日两国间的矛盾，使两国的经济对立转向军事较量的可能性日益增大。

1889年，朝鲜政府单方面发布了禁止向日本输出大豆的通令。其结果，给已提前向朝鲜生产者付了款的日本商人带来了14万元的损失。为此，日本几次向朝鲜要求赔偿。但是，由于控制朝鲜税关的清国委员会的干涉，直至1893年，日本也没能得到赔偿〔31〕。

1893年4月1日《东京日日新闻》列举了清国对朝鲜铸币一事的干涉，指出“至今清国仍把朝鲜视为属国，袁世凯公然责令朝鲜把新货币上的‘大朝鲜’的‘大’字取下，‘蛮横粗暴’令人发指。”同时，由于清国干涉，致使日本对朝鲜各关税的联系几乎全部中断。随着日本对朝鲜权益要求的扩大，清国势力在朝鲜的存在越来越成为日本推行其对朝鲜政策的障碍，这一点似乎已成为日本社会的共识。朝鲜是日本对外发展的前哨阵地，也是向中国进军的跳板。同财界、政府、军部、大陆浪人有着密切关系的，被称为明治时代大陆政策实行者的山座圆次郎，1892年到达釜山时，与室田领事的一席谈话，也反映了当时社会的情绪。室田问“在朝鲜想干什么？”山座回答，“为了日本的发展和东洋的‘和平’，必须实行朝鲜独立。因此，要开发朝鲜，应该立即修筑釜山、京城间的铁路。”立足经济，牢牢控制住朝鲜的思想溢于言表〔32〕。

1893年8月，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前一年，日本民间成立了《日清协会》。其宗旨是，了解清国的诸般事物及中日两国关

系〔33〕。大陆浪人更是活跃，刻意从经济上参与中国事务。第二年就任农商省次官的金子坚太郎，在回顾大陆浪人杉山茂对中国经济的兴味和抱负时说，“（杉山）主张日本要先在支那发展经济政策，后扩展到欧美的想法，这在壮士（浪人）中颇有新义，我感到是位志同道合的友人。”〔34〕

事实证明，中日甲午战争的背后，存在着两国为争夺朝鲜权益，特别是经济、贸易方面的根本冲突。山边健太郎在其《日韩合并小史》中也指出了中日甲午战争的经济原因，即能否获得和巩固朝鲜市场，是关系到日本产业资本“生死存亡”的大问题。

由此可见，指出中日甲午战争产生原因中，经济问题的比重，是我们认识这场战争的性质，理解近代东亚国际关系史的需要。早在1930年初，日本的一些学者和朝鲜、苏联的学者，就已经注意到了这个问题。《历史科学》第2卷第4号，《日清战争专集》中的几篇文章，分别从不同的角度来探讨中日甲午战争的本质，认为“从明治17年到27年里，日本对朝鲜贸易增加了10倍，日本诉诸于战争目的之一就是为了确保经济贸易的利权。”在这里政治与外交，只不过是手段〔35〕。李北满也强调了“中日甲午战争，实质上是表现在经济，特别是贸易上的中日两国对朝鲜的争夺战”。几十年后，甚至连不愿过度强调中日甲午战争中经济问题比重的山边健太郎的《日韩合并小史》，也颇费7页篇幅，从获得“经济市场”，“日清贸易变化”和“清国商人进出”的三个方面指出了在中日甲午战争发生前，中日两国在贸易、经济上的对立事实〔36〕。

从另一个方面讲，日本资本主义的发展，为寻找出口市场、原料及粮食供给地，日本政府对大陆，特别是朝鲜早已垂涎三尺，而为了转移国民对低工资、低米价政策的不满，向朝鲜进行扩张，即成为日本统治阶级推行大陆政策的首要目标。

中日两国围绕朝鲜在贸易与经济上的对立，终于走上了军事

较量之路，日本借“东学党之乱”，向大清帝国发动战争。

第二节 财界的时局对策

1894年7月27日，日本政府出兵朝鲜，突然向清帝国宣战，日本财界的反响，同当时日本国上下的好战气氛相比，有过之而无不及。财界的主要首脑，纷纷发表声明，坚决支持政府对华开战的决定，成立各种各样的组织，发广告，捐款捐物，筹措资金，召开形式不同的集会，动员财界、实业界以实际行动支持对华战争。还主动承担军队的义务服务队，无偿或低价提供船只，保障运输，捐献大量前线急需物资，发挥了极大的作用。此外，财界基于对日本大陆政策的根本考虑，逐渐形成了比较系统的战时对策和战时经营政策，一边全力以赴支持政府的战争，一边有组织、有计划地完善战时经营，为日后的战后经营奠定了基础。本节拟探讨日本财界的时局认识，战时对策和战时经营所包括的主要内容。

一、“报国会”成立的前后

“报国会”是1894年7月30日，以涩泽荣一、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福泽谕吉、东久世通禧五位财界头面人士（福泽不算入财界人）为主，发起成立的响应政府对华战争，动员国民募捐报国的财界组织。该组织虽持续几个月，但由于属全国性团体，且发起人为日本社会财界名流，影响颇大，因此在全面支持政府的对外战争，特别是在动员国民的忠君爱国，募捐献金，加强国民的向心力等方面，发挥了不可忽视的作用。了解“报国会”成立前后，日本财界的认识，是我们进一步了解财界的战时对策、战时经营及战后经营的一个重要的线索。

战争爆发后，日本各界呈现出异常的狂热，欢呼“中日对抗

是“文明”（日本）“野蛮”（中国）之战”〔35〕的情绪充斥岛国上下。福泽谕吉在他主持的《时事新报》上发表的题为《应表国民一致之实》的文章中指出：“日本国民应无官民朝野之别，同心同力，服务于国事”，强调“此场战争乃开国之大举”〔36〕。财界首脑，一马当先，除率先表态赞同此次以文明日本打击野蛮之中国的战争外，还以各种形式，动员各层力量，发动国民，全力以赴，从认识、行动上对政府的选择给予支持。呼吁“只有以勤俭继军资，方可保全我大日本帝国之权利。（中略）愿四千万同胞奋起赞同之，以表忠君爱国之至诚。”〔37〕

7月29日，福泽谕吉又于《时事新报》上发表《大力筹措军费》的社论，号召国民捐款，并首先拿出1万元。7月30日，三井八郎右卫门、岩崎久弥、涩泽荣一、福泽谕吉、东久世通禧等为发起人，在各大报刊登出通知，订于8月1日，召开支持政府对华开战，筹措军资大会。他们号召，值中日开战之际，全国有志之士，要筹措军资，捐献政府，尽一国民之义务。希望华族、富豪带头，积极响应〔38〕。

财界的多数领导者认为，如何推进和保证这场首次的大规模的对外战争顺利进行，筹措军资乃当务之急。财界的主要任务，应该是调动民间资本，协助政府，以渡难关。财界首脑集会，进一步明确筹措军资，“日中两国交战后，为尽国民之义务，三井、涩泽等5人发起，广告全国有志之士征收军资之相谈会”〔39〕。

8月1日，下午5时，协议会（相谈会）开幕。京滨附近到会60名实业者，均为财界的成员〔40〕。会议首先由发起人代表福泽宣读发起宗旨，做了40分钟的演说。涩泽说明了筹资方法，对此与会者一致举手赞同。会上还决定了各自可捐献的数额。由东久世通禧动议，会议正式起名为“报国会”。一共设30名委员，其中5名发起人，25人为一般委员。会议重点讨论了筹措军资的方法和手续。会上选出的25名委员，名单如下：渡边洪基、庄田

平五郎、安田善次郎、西村舍三、园田孝吉、大仓喜八郎、阿部泰藏、中上川彦次郎、森村市左卫门、大江卓、柿沼谷藏、堀越角次郎、奥三郎兵卫、米仓一平、菊池长四郎、前岛密、杉村甚兵卫、雨宫敬次郎、渡边治右卫门、三浦安、原善三郎、原六郎、渡边越三郎、茂木德兵卫、左右田金作。8月4日，报国会又召开全体委员会议，地点在东京银行集会所，五名常委和二十几名委员参加，主要商议了下面四项内容：1.报国会趣旨书，2.报国会规约书，3.军资筹措方法，4.常委的选定等。五名发起人被一致推为常委〔41〕。报国会的主要任务是筹积军资，五位发起人，原估计最少要1500万，但是，后来感到，照这样动员下去，1千万满有把握〔42〕。

8月25日的《大阪朝日新闻》，公布了报国会的10项宗旨。(1)本会为报国会，临时事务所设在东京板桥区坂本町银行集会所内；(2)本会目的，于日清交战之际，募集捐款，以供帝国之军资；(3)赞助本会者为会员，会费根据需要，由会员征收，以维持本会；(4)响应募捐者，将于下列银行内获得优惠存款；(5)捐款者姓名及金额随时公布于报纸，终结时，通过报纸或其他方法报告颠末；(6)由会员中选举30名委员。各委员以负责本会事务，再由会员中互选出7名专务委员办理本会事务；(7)专务委员任命书记及其他委员，办理本会的常务，重要的事务，经委员会决议执行，需要时召开委员会大会；(8)委员中出现缺员时，由委员会内选出，专务委员中有缺员时，由委员中选出；(9)本会委员的任期及存续期限，暂不确定，会员大会改选委员，并决定解散本会；(10)本会捐款结束时，特制个人捐款名簿，保存于纪念馆以资永远纪念。

关于报国会成立的经过，涩泽荣一于1917年回忆说：“福泽先生认为战争（中日甲午）关系日本国家将来的命运，正是所谓生死存亡之秋。因此国民要齐心，组成出征军队之后援，要求与我

面议此事。见面后，先生说，日本国民衷心希望战胜，要取得战争胜利，唯有举国一心，全民一心”〔43〕。报国会成立适时，确实起到了调动民众一致对外的作用。

报国会是日本财界支持政府对外发动侵略战争最典型的事例。无论是三井，还是涩泽、福泽都是从完全肯定政府出兵的立场出发，以财阀资本为主，广为募集民间财力，弥补政府战争经费之不足。日本大财阀支持日本军国主义势力向外扩张侵略，在中日甲午战争中得到充分的反映。

日本的大资产阶级及其政党社团的代表人物，为开拓海外市场及占有原料产地，借口发展日本的生存空间，大力鼓吹亚洲主义的大陆政策，以中日甲午战争为契机，竭力煽动强硬的对外政策和扩张情绪，形成明治中期一种强烈的民族主义思潮。以大财阀、国权主义者、在野政党的扩张主义分子为核心推动这一思潮，坚决主张对中国使用武力，形成被称之为“国民运动”的狂热舆论导向，一步步地把日本推向军国主义的道路。中日甲午战争同以后的日俄战争，是近代日本畸形发展的一个重要特征。从本质上分析，日本的对外战争反映了日本财阀势力对外扩张的要求，它们迫切希望在武力保护下开拓海外市场和占有殖民地。

继报国会之后，日本各界的忠君报国，义捐活动十分踊跃。7月29日，东京商工相谈会发出了慰问在朝鲜军人捐款广告。东京商工相谈会，就募捐、慰问在外军人的广告中说：“韩山风云变幻，雄赳赳的武士忍受三伏的酷暑，风餐露宿，辛苦之至，其艰辛非坐高楼摇扇，卧大厦息凉者可想像……，今乞广大商工业有志者之赞助，义捐金圆，以陆军恤部队，寄赠必需物品，聊解在韩军人之劳。”〔44〕后来，商工相谈会接连多次登出这个广告。

8月5日，大日本水产会发出募金广告，决定义卖罐头，将其收入捐给政府，以慰劳军人。大阪成立的青年报国义务，设立了事务所广向社会募捐，药商送药，酒店送酒，茶叶组合赠茶。

大阪市西区的军火商秋山仪四郎，毅然将手中存有的5600支枪全部献出来，引起了社会上极大的轰动，这批枪是按合同给英国商人订制的〔45〕。海运商人安田忠兵卫、善次两人，与军方签订契约出动全部船只，参加战时运输〔46〕。为输送赴朝鲜军人、军需弹药，日本各铁路公司、汽船公司、红十字会，达成协议，决定承担义务，于战期免费运输。这些公司有：铁道局、日本铁道会社、关西铁道会社、阪界铁道会社、山阳铁道会社、伊豫铁道会社、九州铁道会社、参宫铁道会社、两毛铁道会社、甲武铁道会社、大阪铁道会社、赞岐铁道会社、日本邮船会社、大阪商船会社、共荣汽船会社、平和岛运输会社、伊豫商船会社、尾崎汽船共同组、山本组汽船会社、朝日运输商店汽船会社、内国运输会社，共21家〔47〕。5日下午，神户贸易商俱乐部召开总会，讨论了交战期间的注意事项和手续，决定一切服从于政府开战的要求和需要〔48〕。

7月19日，大阪《朝日新闻》报道了中国煤炭紧缺，已开始计划从各地调购的消息后，日本煤炭联盟大会，再次重申不准向中国出口的禁令，违者除名。为此，神户煤炭组合30余人，为打击出现违反协议，秘密向中国出售煤炭的卖国行径，警惕和防止给中国商人可乘之机，坚决不让一粒煤流入中国。同时，大阪盐商取消了同中国的所有合同〔49〕。

8月15日，日本政府发布勒令第143号、144号，决定募捐公债，以筹军费。事实上，涩泽荣一等财界首脑是日本军债的实际上的赞同者和支持者。

报国会成立后，当时的总理大臣伊藤博文特意请涩泽去，询问财界、民间募款的情况。涩泽讲：“此次战争关系帝国命运，身为国民，应尽诚意，当好后援”。伊藤博文表彰了涩泽、福泽的报国热情，指出：“如不能很好筹款，有挫伤国民斗志之忧，莫不如发5千万军事公债，更有意义，效果更好。”涩泽赞成改

募捐为军事公债，觉得若发行公债，有把握筹措5千万元。就这样，涩泽把伊藤博文的意见转告福泽，并向所有银行的主要负责人做了说明，决定于适当时期解散报国会，全力投入到积极响应募集军事公债上〔50〕。9月8日，涩泽致函伊藤博文就招募军事公债事，请其直接向银行家们做动员说服工作〔51〕。从涩泽的上述回忆以及后来的史料证明，日本政府于8月中旬决定发行军债，很大程度上是受到了报国会的影响，并在其基础上推行这项庞大的军事公债募捐的。

第144号军事公债条例，大要以5千万为目标，第一期为3千万。条例中详细规定了具体的方法和利息、年限〔52〕。8月18日的各大报纸上详细地登载了有关军事公债第一次募捐的四项规定、总额、支付次数、价格、利息等。第一次总额为3千万。

从当时的日本经济状况讲，要完成政府规定的指标，并不是一件轻而易举、乐观的事情。能否取得金融界、实业界的支持，是关系能否保证军事公债发行工作圆满完成的关键。8月18日上午10时，大藏大臣渡边召集关东同盟银行干事第一银行董事长涩泽荣一，第15银行总支配人山本直成，第三银行董事长安田善次郎的代理长谷川千岁三等3人，要求各银行团体干事尽早落实军事公债的认购指标。涩泽荣一表示，决不辜负政府对银行界寄予的期望，愿竭尽全力，贯彻政府号召，紧急转告同盟银行〔53〕。22日，继18日大藏大臣同涩泽荣一等人的会晤后，大阪同盟银行干事银行代表第四十二银行董事长田中市兵卫，第十三银行董事长草间贞太郎，东北同盟银行干事银行代表第八十一银行董事长横川善三郎，中国同盟银行干事银行代表第140银行董事长镰田房次，九州同盟银行干事银行代表第九银行董事长中村才马等6人专程赴东京面见大藏大臣。大藏大臣要求各银行家及同盟银行资产家，至诚爱国，以国民、各地区的名义，为国效忠〔54〕。

进入9月，报国会专务委员7人，登出了报国会募集捐款广

告，公布了十一条章程以及111个负责办理接受捐款的银行支店，分店，派出所的店号与地点〔55〕。9月8日大阪，9月19日釜山等地分别掀起了大规模响应募捐购买军事公债的高潮〔56〕。

涩泽荣一自公开招募军事公债后，他所在的银行先后认购100万以上〔57〕。1897年天皇亲赐银盘一个，以表彰涩泽在对中国战争中立下的功劳〔58〕。

报国会广招军事公债，是保证日本对中国战争十分重要的财政措施，为以后的日本对外战争筹集战争经费提供了极其宝贵的经验。

第三节 战后经营

1895年4月17日，中日双方签订了《马关条约》。条约签订后，带来了两个直接后果，一是使日本对朝鲜的侵略合法化，二是为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大开绿灯。之后，日本对朝鲜的政策出现了质的飞跃，日本财政的战后经营正式进入轨道。

战后经营，实际包括两个方面，第一是国内部分，第二是国外部分。国内部分主要指财政计划大纲，扩大军备等项目，这是战后经营的骨干部分。国外部分，主要指朝鲜、中国东北等地的殖民地经营问题。从当时日本所处的国际形势来看，中日战争结束，《马关条约》的签订，日本独占如此巨大利益，招致列强诸国的反感，“三国干涉还辽”，给日本以沉重的当头一棒。日本不得不忍气吞声，以卧薪尝胆之精神，开始日本海外殖民地经营。

为了实现日本对亚洲的野心，必须巩固用武力夺到手的利权，发展扩大对中国、朝鲜的经济渗透，在这样一个宏大的目标下，日本财界同政府、军部密切合作。伊藤博文于1898年遍访中国东北回来后，涩泽荣一组织东京商业会议所，东京商工会谈

会，经济研究同志会及日本经济会等财界的主要团体，同三井的岩崎久弥、大仓喜八郎等6人为发起人，召开隆重的大会，为远途归来的伊藤洗尘，请其介绍关于如何进行战后经营的设想。涩泽在致词中说：“作为我日本战后之经营，向东洋扩张商业，成为东洋之中心，乃我等众人之希望所在。要完成这一目标必须搞清同支那有何重大联系。伊藤侯爵的远见卓识，是我辈商工业者的指南针、方向盘，有益于我们事业的发展。”〔59〕涩泽荣一的这番话，代表了整个财界的想法，同时也流露了他对伊藤博文的尊崇之情。为了发展对外战略，不仅是伊藤，连那些驻外的外交官、军人也是涩泽等财界人士规划经济大纲的主要知音。

财界的对外扩张，包括两个部分。首先是巩固扩大对朝鲜的经济既得利益，其次是加强对中国东北的经济扩张。对朝鲜问题的战后经营中，大致可分三个方面，（1）乘战胜之余威拿到铺设铁路之权利，实行占领经营；（2）建立中央银行，对金融实行具体的干预，为日本殖民地经营奠定基础，调动资金，实行国家主导型经营，即财政家阪谷芳郎提出的“经济参谋本部论”；（3）兴办日朝合资合营企业，以共同经营的形式吸收朝方的资金，以共存共荣为招牌，同后来大肆渲染的大亚洲主义合拍，演变成为一种日本殖民地企业经营的新方式。

从结果上讲，甲午战争后，日本财界的战后经营是成功的。1906年，涩泽荣一概括了10年间日本战后经济发展的成绩，列举了几个主要部门的具体数字，肯定了这期间，日本经济的增长和成果是突飞猛进的，可喜可庆的。他认为：“从统计数字上反映出日本经济的进步是巨大的，惊人的，”“试看明治27（1894）年，与去年明治37（1904）年，民间所有船舶吨数及船舶吨位的大小进行比较，的确是天壤之别”，“其他方面，如铁道事业，金融机构事业及各种制造工业，都出现了巨大的进步”，“外国贸易由明治6（1893）年的1亿8千万上涨到1903年的6亿6百万日元，达三倍

之多”；“铁道铺设也由当时的1千9百哩增长为4千2百哩，为2倍多”〔60〕。纵观10年经济的发展，平均增长近3倍，日本战后经济的发展，财界的确发挥了极其重要的作用。

下面，拟通过对京釜铁道铺设过程，朝鲜中央银行构想及其建立的二事例，从“占领经营”、“国家主导型经营”、“合资合开经营”等三个视角探讨财界战后经营的具体内容。

一、占领经营——京釜铁道

“以武力为后盾，开展实力外交”，是近代日本对外政策的最显著特徵。坚持占领经营，向海外扩张日本的经济势力，又是战前日本对外经济扩张、侵略的又一重要手段。中日甲午战争期间及其战后，日本强迫朝鲜政府同意其铺设京釜铁道，就是一个最典型的实证，从本质上说，日本获得在朝鲜铺设铁路的权力，是其朝鲜政策的最大战果。

在筹划、兴建京釜铁道的过程中，涩泽荣一为首的日本财界头面人物，自始至终扮演着极为重要的角色。军部、政府、财界、民间人士配合默契，逼朝鲜政府就范，把修建铁道的权力拱手交给日本。在获得朝鲜政府的许可后，为了解决资金不足又是经涩泽荣一等人的努力，从山县有朋处拿到一笔数日可观的军事机密费。同时，在股分的分配上，这些大企业代表，各自率先认购1000股，以民间资本补充国家资本的不足。从种种意义上讲，京釜铁道的筹建过程，为财界对朝鲜的经济侵略，以及后来的对中国东北、中国全境的经济扩张提供了可资借鉴的蓝本。

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日本于朝鲜境内铺设铁道，无论是在军事上，还是在经济上，都有着无法估量的重大意义。中日开战前4个月，即1894年3月，内阁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在其《外交政略论》中指出：“国家独立在自卫之道，（自卫）有两大关键，一曰保护主权线，不容他人侵犯；二曰防护利益线不失自卫优势，……”

我国之利益线焦点在朝鲜”。19世纪下半叶，沙俄修筑西伯利亚铁道的计划，给日本朝野以极大的冲击，由于“西伯利亚铁道已进入中亚，不出几年，可望竣工，自俄帝都出发，不要十数日，便可饮马黑龙江畔，吾人切不可忘，西伯利亚铁道完成之日，便是朝鲜多事之时。朝鲜多事之时，即是东洋发生大变动之机。”〔61〕山县预见西伯利亚铁道建成，东亚地区政治格局将会发生的重大变化。那末，如何保证于危机中，日本主权线不受侵犯，重要的问题是要开辟一条可以防御的利益线，因此，日本不惜破釜沉舟也要同中国决一死战，以求对朝鲜的控制。

同任何一个帝国主义国家一样，要取得一块新的殖民地，进行经营，并以其为基地，拓展更大的计划，修建铁路乃是头等重要的大事。对于当时的日本来说，为抵制北部沙俄的东进，为保证与中国之战的胜利果实，牢牢地把朝鲜抓到手中，在朝鲜境内修建铁路，对日本来说至关重要。因此，日本政府、军部、财界急于把在朝鲜建铁路当成关系到帝国生死存亡之事提到议事日程之上。

（一）川上操六参谋次长的建议

据当时的驻釜山领事室田义文回忆，1892年4月，川上操六参谋次长首先提出：“修一条汉城—釜山间的铁道，希望进行测量调查”〔62〕。接受川上的旨意，经井上胜铁道局长推荐的铁道技师河野天端带助手西尾政典，受榎本武扬外务大臣之命，8月16日从神户港出发，19日抵釜山，25日开始调查。室田总领事特命熟通朝文的巡长村房次郎专程向导，当翻译，经过两个多月的详尽考察，10月6日，完成一份釜山至京城铁道线路调查报告书〔63〕。报告书共九个部分，包括一份线路图。河野案预计该铁道全程2400里，总耗资1800万日元，平均每里75000元〔64〕。可见，建设一条贯穿朝鲜境内的铁路干线，需要何等庞大的资金。同时，也说明了日本执意要建设的铁路在日本的对外军事，

经济扩张事业中占据着何等重要的地位。然而，中日交战前，日本还不具备实力可以无视中国的实力威胁，朝鲜政府也几次强硬地回拒了日本方面要求修建铁路的要求。

可是，战争给日本带来了绝好的契机。1894年7月末，中日甲午战争爆发后，修建铁路，以适应对中国作战，已成为日本军事上的迫切要求。9月，第一军司令官山县有朋在平壤面见伊藤博文首相，再次强调修筑朝鲜铁道在日本对外战争中的重要意义〔65〕。接着，11日山县上书，声称“一旦东洋事起，不可贻误良机”，“要称霸东洋，永远称雄于列国之中，必须趁此机夺取京釜，京义线的特权”〔66〕。由于战争越来越向有利于日本的方向发展，内外局势，迫使长期来拒不就范的朝鲜政府，不得不正视日本的要求。

8月1日，日本驻朝大使大鸟向朝鲜政府提出了《日韩暂定合同条款》〔67〕，兴建京釜、京仁铁道作为内政改革的第2条正式纳入日程，并得到朝鲜政府的认可〔68〕。在形式上，条款写明希望朝鲜自主建设，实际上“关于京釜、京仁铁道的铺设，在朝鲜政府资金不足时可与日本政府签定条约后动工”〔69〕。日本图谋已久的修路计划，趁甲午战争日军取胜之机，顺利地获得了朝鲜政府的承认，并明确地列入《日韩暂定条款》中，强大的军事背景，为财界日后经济扩张，创造了条件。

但是，从下述的经过，可以看到，如果没有涩泽荣一等财界重镇历时几年的不懈争取，是不会有京釜铁道的顺利成功的。占领经营，讲的是以军事为背景的经济扩张。此时，军事占领是前提条件，经营亦同样重要，经营是主体，是目的。涩泽荣一等财界人士正是承担了这一主体部分。

（二）列强的干涉

《马关条约》签订后，日本从中国获得了3亿元的战争赔款，同时逼使中国开放沙市等几个城市，扩大航路。条约中，对

中国领土的要求，充分暴露了日本帝国主义比任何一个列强更为贪得无厌，企图一下子成为东亚盟主之野心。由于日本的过分贪婪，破坏了诸列强瓜分中国“利益均沾”的原则，《马关条约》引起了俄德法等国的不满。1895年4月23日，《马关条约》签订后的第5天，俄德法三国公使，走访日本外务省，提出如果日本占领辽东半岛，后果严重，将造成（1）朝鲜独立将有名无实；（2）妨碍欧洲各国商业上的利益；（3）威胁清国首都；（4）妨碍东洋的和平。要求日本放弃辽东半岛。〔70〕

在三国的干涉下，日本政府被迫让步，内阁会议决定放弃辽东半岛，5月8日，日本全权代表伊东已治在芝罘同中国全权代表伍廷芳交换了批准书〔71〕。

三国干涉的直接后果，迫使日本收敛其欲一口吞下朝鲜的气焰。原计划铺设京釜铁道一事，也由于朝鲜政府的迟迟不动而拖延下来。

1895年10月8日闵妃被杀一事，导致了朝鲜政府内亲日势力的垮台，随之登场的亲俄势力掌握了政治实权，日本对朝鲜的影响力日益减退〔72〕。1896年，朝鲜把修建京仁铁道的权力让给了美国人莫尔斯，在这种状况下，如何巩固日本在朝鲜的实力，保持实质上的优势，日本政府听取了驻朝公使小村寿太郎的建议，实行政府退居二线，民间势力打头阵的办法，来解决铺设京釜铁道的悬案，涩泽荣一发起的《京釜铁道发起人会》应运而生。

（三）京釜铁道发起人会

1896年6月，《京釜铁道发起人会》在东京成立。该会的成立，打破了日朝两国就修建京釜铁路而出现的僵局，为日本政府获得京釜铁道的权利赢得了可贵的缓冲之机和希望。由民间企业家，财界头目组成的《京釜铁道发起人会》，在大三轮长兵卫、竹内纲、尾崎三良三人的倡议下，说服伊藤博文首相，涩泽荣一、益田孝、中野武等财界领袖，组成了150人的发起者名单〔73〕。

此事的原委如下：

最初，大三轮等人于6月7日访问伊藤博文首相、陆奥外相，要求同意成立京釜铁道株式会社创立发起人会，以发起人的名义向朝鲜政府请愿，施加压力，促使朝鲜政府尽快同意修筑京釜铁道。伊藤、陆奥二人对他们的想法颇表难色。认为国内经济状况不允许，在经济萎缩，股分难以招募的情况下，风险太大。加之，无在海外经营铁道的经验；同时修建京釜铁道，必将引起其它列强的敌视，不可不慎重处之。陆奥特别强调，此事关系重大，成功希望渺茫〔74〕。

伊藤、陆奥的反对，并没有影响大三轮长兵卫等人的热情。8日，竹内纲再一次访问伊藤博文，提出两点要求，希望予以考虑。竹内说，“只要政府同意，我们首先保证可动员一大批经济界最有力者为发起人，其次为向朝鲜政府申请特权，我们将在全国范围内募集股分，一定能够全部完成，如果上述两个条件达不到，我们将撤回请愿”。竹内进一步强调，如果政府不允许我们的请愿，放弃暂定条约中的既得权利为外国所获，此问题将于本年国会上引起众参两院的关注，追究其责任。修建铁道，事关重大，望三思而行〔75〕。伊藤沉思再三回答说“商议后做答复”〔76〕。三天后，伊藤召见竹内，表示同意成立发起人大会，条件是必须动员百名以上的财界人士参加。〔77〕难关就这样攻下来了。

7月6日，召开《京釜铁道创立发起人总会》。涩泽荣一为主席，同时选举了8名发起委员〔78〕。

这次会议上决定了如下事项：

1. 制定发起人规章，每个发起人付150元为筹建费。
2. 向外务大臣请愿，要求向朝鲜政府提交修建京釜铁道申请书。
3. 经船越已代动议，京釜铁道发起人为8人，内一名为主席

(涩泽荣一)，其他7人由主席指名。发起委员：涩泽荣一、尾崎三良、竹内纲、前岛密、大江卓、中野武营、大三轮长兵卫、井上角五郎〔79〕。

总会从下午1时开始到晚上6时结束，出席者50多人，会址在日本桥银行俱乐部。除了上述决定外，会议还确定了今后的活动日程表。初步计划3年内动工，10年内建成。为促进尽快得到朝方许可，先向日外务省提出要求。同时决定会后派尾崎三良、大三轮长兵卫二人到朝鲜进行交涉，待同朝鲜政府签约后，再决定会社发起人，组成株式会社〔80〕。

由于涩泽荣一任主席，主持发起人会，修建京釜铁道一事，出现了极大的进展。7月8日，发起人委员代表155名日本企业家、财界人士向伊藤内阁递交了关于铺设京釜铁道的请愿书。7月16日，西园寺公望外务大臣指令驻朝鲜公使原敬，命其照会朝鲜政府，递交涩泽等人关于修建京釜铁道的请愿书〔81〕。指示原敬“大鸟公使于1894年8月20日在京城同朝鲜签订了关于京釜铁道合同，按此合同，日本政府或日本会社有权同朝鲜政府签订合约，关于涩泽等发起人的请愿书及事业计划，将由总代表尾崎三良、大三轮长兵卫两人专程赴朝鲜面叙详细，请予关照接洽”。〔82〕

接到政府的训令后，原敬公使于7月18日后几次面见朝鲜外务大臣谈判，但都被对方拒绝。理由是，(国内)暴徒未净，治安不稳〔83〕。对此，原敬分析，理由有二，一是不想轻易把利权让给日本，二是担心铁道建成后，在日的朝鲜政治逃亡分子返回作乱〔84〕。17日，尾崎、大三轮两委员抵达汉城。原敬于18日，陪同两人会见外务大臣李完用交涉，仍无效果〔85〕。

21日，原敬派人询问原因，朝方以(1)此为伤国王感情之事，(2)内阁认为于京仁铁道完成后再考虑不迟，(3)政府财政困难等为由，再次回拒〔86〕。

7月30日，原敬受国内之命，又一次以电文形式通告外务大

臣李完用，说明“东京及大阪府主要实业家发起人要求修建铁路一事，朝鲜一再拒绝，有违反条约之嫌”。8月10日，原敬又提出可否先签草约。对此，8月15日，朝鲜政府回复原敬公使，指出4日条文无日期问题，日实业家涩泽等人要求难以满足。总之，由于朝鲜方面千方百计不接受日方的要求，原敬公使也认为是否等形势转变后，再行商议，更为适宜〔87〕。但是，涩泽等人于8月24日，第二次递交请愿书。27日西园寺外相命原敬再行交涉。涩泽等人在请愿书中指出：朝鲜政府8月15日的答复，以秩序不稳为由拒绝，欠说服力。对美国人、法国人可以行，唯独对日本的要求，进行刁难，是有意延误合同。强调1894年的合同，建京釜铁道有助于朝鲜殖产兴业，请速回答〔88〕。财界的强硬态度，使朝鲜的反应更为冷淡。11月7日，朝鲜政府公布勒令，明文一年之内不给任何外人修建铁道的权利〔89〕。

建路事拖延了一年，直至1898年1月，日俄两个帝国主义以朝满(中国东北)为交换条件，达成了一笔肮脏交易〔90〕。9月9日，朝鲜政府始与京釜铁道发起人之间签订了京釜铁道契约〔91〕。

为了获得修建京釜铁道的权利，日本财界所表现出的积极主动的坚决态度，反映出新兴的日本大资产阶级，向海外扩张及占有殖民地的强烈欲望，并在一定程度上给予日本政府以极大的影响。

(四) 京釜铁道株式会社的成立

1901年6月25日，京釜铁道株式会社正式成立。投入日本资本，筹建朝鲜铁道，在日本产业资本的确立和向帝国主义转化中，具有重要的意义。京釜铁道株式会社不同于以前建立的京仁铁道(后来京釜铁道合并京仁铁道)，无论是就其规模、资本及其战略意义来讲，都是第一个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海外铁道会社，也是规模空前的“国策”会社。该会社的成立至少具有以下三个意义。

第一，朝鲜境内京釜铁道的修建，以及后来满铁(南满洲株

式会社)的建立,成为由日本连接朝鲜——中国东北的最重要的干线。重视铁道权利是帝国扩大海外势力范围的首要条件,京釜铁道的修建,无论是在军事上、经济上、政治上都为日本向朝鲜进行全面渗透,向中国东北扩张,以及同列强诸国争夺中国权益,奠定了极为有力的基础。另外京釜铁道被称为满铁的雏型。

第二,从日本国内来看,1898年9月8日签订京釜铁道契约到1901年该会社的正式成立前,日本没有在外国修建铁道的经验,涩泽等人克服各种困难,成功地获得政府的支持,制订了关于在海外修建铁道的法律,提交众议院批准。同时,就京釜铁道本身的筹建,制订了专门的法律,给予特别保护。为了开拓海外市场,修建海外铁道,首先必须齐备国内法律,整顿国内环境,以利海外事业的顺利发展。从这个意义上讲,京釜铁道株式会社的成立与运营,为后来满铁等的成立,提供了成功的经验。

第三,这是一个以民间金融机构为中心,以民间资本为主的民间企业。调动民间资本补充国家资本,推动大陆政策,开展对亚洲的经济侵略,该会社是第一个成功之例。

此外,还应该指出修建京釜铁道,在军事战略、政治、经济三个方面的意义和作用。

中日甲午战争之后,日本在总结这场战争的经验时,认为:“从兵力和战备的总量来看,日本远远不如中国,但是,在具体的每一个战役所动员的兵力和装备方面,几乎所有的场合,日本同中国相比,始终占据优势。由于国家机构的落后,通讯手段的不发达,中国军队在机动性方面相去甚远,相比之下,日本的铁道等运输手段,远比中国发达,动员、输送、集中兵力极为迅速。总之,依靠国家经济的相对近代化和巧妙的战术,日军方得以战胜中国军队。”〔92〕如果说,日本铁道等运输手段的发达,是甲午战争日军取胜的一个重要原因的话,那么,京釜铁道对于后来日本统治朝鲜和中国东北所具有的军事战略意义,同样是不

可低估的。

当京釜铁道合并了京仁铁道后，与陆军机关——临时铁道监部管下的京义本支线及马山线合二为一。日俄战争爆发后，修建京釜铁道的工作日夜兼行。同时，京义铁道及马山线，直接归属军部指挥。输送军队是朝鲜铁道的第一任务。日本在朝鲜修建铁道的战略意义，首先基于日朝两国《国防共卫经济共通》的原则。另外，考虑到以后同中国及其西伯利亚铁道的连结，在修建京釜铁道时，否定了狭轨狭轮方案，这些都是出于日本统治中国东北，侵略亚洲等战略上的考虑和未来战争上的需要。

除了军事、政治方面的作用外，京釜铁道在经济方面的意义同样是不容忽略的。关于这一点，发起人之一的竹内纲认为：

“1894年，我国同中国开战获全胜，在经济上的优势得到了国际上的承认。此后，我国的当务之急，就是要确保中国、朝鲜的领土完整，维护东洋和平。建立这样的国策，首先要开辟两国交通。近邻我国的朝鲜釜山港为天然良港，其次为仁川港。此两港口连接京城（汉城），再由京城至平安道义洲，连通朝鲜，满洲交通，这是增长我国经济实力刻不容缓的要务”。〔93〕

那么，开辟了铁道后，究竟从那个方面来发展对朝鲜的经济与贸易活动呢？涩泽荣一指出“讲工艺品，日本产品占优势。但是，朝鲜的稻谷，是颇受欢迎的。进口朝鲜原料稻谷，加工生产，出售优质产品，在这方面日本经验丰富。廉价购买朝鲜农作物，是保证大量出口我产品的根本，实现交通之便乃为保证我产品畅通无阻的重要措施。”〔94〕这种日朝贸易基础的“稻米交换体制”，即朝鲜以稻米交换日本产品。实质上，京釜铁道为日本对朝鲜的经济剥削压迫，巩固其两国间的不平等“稻米交换体制”提供了保证。日本学者村上胜彦从另一个角度出发，将京釜铁道的经济利益概括为下述三点。首先是铁道线路选定在历来被称为朝鲜宝库的土地肥沃、人口稠密的全罗南北道。其次，实行

商品经济，根据该铁道的特点，采取廉价运费，商品低价化，加速商品资本的周转率。再次，据1900年到1909年的统计，旅客人员从155万增到193万人，运货吨位从22万吨增到71万吨。铁道开通后，日朝间原材料，工业品的大量进出口，刺激了商品的流通生产，保证了“稻米交换体制”，吸收殖民地资金，确保了朝鲜铁矿石的供应〔95〕。正因为京釜铁道经济因素之重要，1900年2月6日，星亨等7人于众议院第14次会议上提出了关于京釜铁道速成的建议，其中特别肯定了该铁道所具有的经济价值〔96〕。

尽管背后有帝国政府的全力支持，有军部提供巨额机密经费供勘探用，然而，由于京釜铁道规模空前，耗资巨大，民间资本筹资的任务艰巨困难〔97〕。1899年4月，发起人委员大江卓率领技师十儿人经参谋本部大佐的配合，历时50多天的调查，提出了大致300里长的线路计划，预计耗资2500万元〔98〕。7月，发起人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丰川良平、尾崎三良、竹内纲等儿经讨论后报请参谋本部、外务省，经同意，最后定下资本金2500万。资金分三部分，一部分自筹，一部分借外债，一部分政府援助〔99〕。7月29日到8月，明确500万元由民间募集（政府补助利息）。另2000万元由政府作保借外债，实际上，成为完全以国内民间资本为主的组织。京釜铁道会社，具有以下几个特点：日本最大的政商几乎全部参加了京釜铁道的投资，反映出日本财阀资本对殖民地经营的积极性。另外加上大地主阶层的投资又构成铁道修建资金的重要组成部分，这样就加强了该会社与政府的联系。而铁道会社的经营，又紧密的与日本的对朝鲜政策联在一起，成为日本在朝鲜进行殖民统治的“国策”会社。尤其是修建铁路计划于中日甲午战争前夕，完成于日俄战争之后，其整个过程，反映了以军事、战争为背景而发展起来的日本资本，具有明显的帝国主义特点。特别是由于涩泽兼任京仁、京釜两社社长，1902年12月30日，两社合并。翌年10月，京釜接收京仁。一个月

后，又获得马三线的修建权。这样，京釜铁道株式会社，负责建设和经营朝鲜半岛京城以南的所有铁道建设，其力量之大，非任何会社可比拟，是日本向朝鲜经济扩张的大本营〔100〕。

京釜铁道株式会社是日本国策会社的先驱。京釜铁道确立了官民军一元化的经营朝鲜体制，为占领经营，向亚洲经济侵略开辟了道路。

二、国家主导经营朝鲜中央银行

如果说，建设京釜铁路计划特权是日本“战后经营”的一个主要内容的话，那么，如何控制朝鲜通货金融，建立必要的行政指导部门，则是“战后经营”的另一个主要部分。金融之重要，被称为经济发展中的血液，能否及早地取得对朝鲜经济的控制，很大程度上要看日本能否把金融等问题抓到手中。对于这样一个恰如人体血液般重要的问题，日本财界一直把其放在首位来考虑的。

甲午战争后，日本财界即提出，要建全朝鲜金融机关，加强对其影响，为扩大对朝鲜贸易与对朝鲜的经济扩张服务。1895年9月，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等为发起人的日韩通商协会成立，其宗旨明确地把调查研究朝鲜的金融现状作为协会的主要任务〔101〕。该协会认为“金融机关于商业界之重要，宛如人身体上之血液。金融机关健全，则商业膨胀，金融机关贫乏，则商业萎缩。因此，欲展鹏翼于外国贸易，则必先完备金融机关。然而，多年来，日朝贸易墨守陈规，久无长进，”其原因关键在于“开放港口金融机关的不健全”。协会呼吁中小商社团结一致，尽快在朝鲜三港增设金融机构。因为，增设金融机构，如同增添日朝贸易的血液。只有增设金融机构，才能清除日朝贸易前途的阻碍〔102〕。此一设想，由于“三国干涉”而中断，直到1900年，才又一次经多方提出，被正式纳入日本对朝鲜经济政策的日程上。

1900年3月，大藏省主计局局长阪谷芳郎和理财局长松尾 臣

善，向内阁提出了一份关于日本向朝鲜经济扩张问题的意见书。意见书由于出自阪谷芳郎、松尾臣善这两位大藏省重要官员之手，因而具有格外特殊的意义，特别是该意见书是日本对外（尤其对朝鲜）进行经济扩张的较早的提案，反映了日本政府、财界向朝鲜实行经济扩张的基本构想。意见书强调了金融机关在日本海外殖民地的地位和作用，强调了以“国家主导型经营”的思想，是我们了解日本对朝鲜金融政策的一份重要资料。意见书全文约二千字左右，现摘录如下。

1900年3月23日

阪谷主计局长，松尾理财局长

关于扩张对朝鲜经济事业的意见书

（我国）对朝鲜经济事业已逐步展开，目下，釜山、京城、仁川间之电线，各地邮政，沿岸定期航线，京仁铁道已经由我国人士之手得以落成，京釜铁道即将开工，其他诸如银行等各业也大抵掌握在手，此诚为可喜之大事也。但是，我之事业尚须再扩张，我邦之移民亦须倍增也。我之利权区域更待扩展，此皆最必要之事也。何况近年英美人等频频（动作）颇重视对该国输出资本，我亦有必要与彼等讲求互相提携，利害与共之方法。其他应办之事，如设立吸收其金银以使我发行之兑换券获得更高流通地位之设施等等，亦不胜枚举。然而，在该国境内，民间竟无一足以代表我邦（利益）之人物，万事皆须依赖我公使，方可进行，是以运转不灵，颇妨碍（我事业）之进步。故此，余等认为，目前最必要者，乃委托我邦资本、经验、信用皆最佳之第一银行在彼地创办分店。并任命富于财政经济经验、有信誉之人物担任其店长以与我公使表里相应，专办财政、经济开发管理任务之事。日前，余等奉次官之秘令，调查各国设立驻在官员之

事。而朝鲜之财务官员，目前，似以民间人物代行其责为佳。此次，林公使致外务大臣之来函中，也提出与本文相同之意见，由是余等特提出如下对第一银行之命令草案，仅供裁夺。

另，命令书第八条之拨款拟从国库经费中拨划。

命令书草案

第一银行

第一条 该银行应在韩国京城设立支店。

第二条 京城支店之建筑须相当壮大，务有坚固金库，还须附设金银鉴定所。

第三条 京城支店之资格应渐次占据朝鲜中央金融机关之地位，着手统一货币之流通，以期达到整理、改良之目的。

第四条 金银鉴定所须着重信用，以输纳人之便利为宜，以期广收金银。

第五条 京城支店长之人选，当以精通财政之经纶，富于才略信用为标准，事先须与大藏省密商。

第六条 大藏省委托京城支店长提出关于国家资本运用方面所必须之财政经济通信报告。

第七条 为吸收黄金，大藏省指令日本银行融通部分必须之黄金，与之方便。

第八条 有关通信报告之费用，大藏省每年拨款三千元交付该行。

第九条 大藏欲废除此命令书时，当提前六个月提出通知。

第十条 此命令书虽不含外交之意义，但若公示天下也将（对日本）带来不利，故该行须严守秘密；另大藏省方面若欲公示此命令书，事先亦须通知该行。上述各条在承诺之后须修正提出〔103〕。

可以看出，阪谷、松尾两人的意见书，论述的主要内容，是企图控制朝鲜的金融。其中，期待第一银行京城支店发挥中央银行的作用。

几乎是同一时期，受日本政府秘令，赴朝鲜考察的酒勾常明博士在报告书中，列一顶金融条款，强调无论干什么事情，资金乃最强大的动力，我第一银行等在朝鲜金融界所起的作用，虽应大加赞扬，但是，尚未发挥金融机关应有的主导作用。应设日朝银行，或日清（日中）银行，兼管朝鲜，负责借贷，如扶助铁道及陆运事业，汽船等水运事业、农业、矿业、工业、商业等〔184〕。在这里，酒勾也提出了中央银行的问题，建立中央银行的目的，简言之，就是要垄断“朝鲜半岛经济上的主权”，使其“全部掌握在日本手中”，届时日本人谋求半岛利源，“必能无所不达其目的”〔105〕。

铁道建设确立了日本在朝鲜的殖民经济地位，使朝鲜成为名符其实的“日本利益圈”，而巩固并发展这一统治地位，建立银行金融机构便成为重要的措施之一。正如朝鲜协会一名主要成员对于如何经营日本对朝鲜的实业问题所说：随着日本对朝鲜贸易的急速增长，“居留朝鲜从事贸易者已达2万人之多”，促进朝鲜诸港城市之发达已成当务之急之大事，眼下，“阻碍朝鲜半岛贸易发展的最大原因，即为金融机关的缺乏，我第一银行虽在京城及诸港有支店，但其组织，业务方法远不能满足日朝贸易之需要，仅从农业来讲，于今日朝鲜建一大银行已势在必行”〔106〕。

与此同时，日本驻朝鲜公使林权助也致函外务省指出，在对朝鲜进行经济扩张的宏大事业中，要倍加重视银行所承担的中心作用。他说：“我资本家不应再如以往单独、个别活动，而必须在协调之基础上创立‘辛迪加’企业；我在朝鲜之银行亦不应每日以平均利率为基准，专注重于营利，亦须如汇丰银行在清国之活动那样，主动创办一中心之‘辛迪加’，建立进取之方针。此

乃最要紧之事也。”此外，为了加速这种经济扩张，林权助还认为，此时极为重要的是，应该涌现出能够对日本政府的政策心领神会，竭力相助的财界领袖〔107〕。

同年10月2日，林权助又向外务大臣发出了一份《关于朝鲜货币制度》的报告。林在报告中，主要强调了三点：（1）日本政府必须对朝鲜的货币制度予以足够的重视；（2）必须使日本的银行家作为主要交涉人参与此事；（3）应当让具体的金融机关第一银行来主管经营〔108〕。可见，上述这些意见反映了在设立中央银行这一问题上，日本政府和财界的意见是一致的。阪谷等人以及林权助的意见书，代表了日本统治者的意向，在决定对朝鲜政策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此后对朝鲜的金融政策，正是沿着这一脚本规划的方向发展的。

1903年前后，日本政府以强硬的军事力量镇压了朝鲜人民要求回收主权的反日运动。日俄战争以后，更乘“圣战”之余威，对朝鲜展开了大规模的经济侵略，为将朝鲜变为自己的殖民地铺平了道路〔109〕。财界和阪谷芳郎等极力主张的关于建立朝鲜中央银行的建议，终于被提上行动日程。1909年（明治42）7月，日本创设了韩国银行，开始对朝鲜的银行制度进行改造。

三、朝鲜中央银行的成立

日俄战争以后，日本把朝鲜视为“利益线”。所谓“利益线”的概念，就是使朝鲜在军事上、政治上、经济上从属于日本国。1904年5月31日，日本政府通过了《对韩施設纲领》，其后，8月签定第一次日韩条约，确立了顾问在朝鲜政治的地位。翌年8月乙巳条约签定，日本对朝鲜的殖民地统治进一步得到了加强。

关于财政的问题，《对韩施設纲领》中规定：“应尽速物色适当之日人顾问一着手改良征税法，改革货币制度，以期终将朝鲜之实权收于我手之中……为朝鲜开辟新财源，同时亦为达到

我扩张之目的，须将其（即朝鲜之金融）置于帝国政府管理之下。”〔110〕

为了保证对朝鲜经济统治的顺利进行，必须首先建立一个受日本控制的朝鲜中央银行。阪谷于1903年制定的《关于设立朝鲜中央银行之方法》，成为1904年3月22日发布的《朝鲜中央银行条令》的雏型〔111〕。而阪谷芳郎的这个构想，可以说是与他此后在清末提出的设立大清中央银行构想，辛亥革命时期提出的设立中华民国国立中央银行的构想，1917年中华民国的币制改革，1930年的伪满洲国中央银行与东亚中央银行等等计划是一脉相承的。

探讨阪谷芳郎起草的设立朝鲜中央银行的计划，对于后来实际建立的朝鲜中央银行起到了什么影响，将有助于我们了解财界对朝鲜金融的政策。

1903年阪谷芳郎之所以要提议建立朝鲜中央银行，是因为他认为当时日本在朝鲜的金融机构，已无法满足今后对朝鲜经济扩张的需要。关于设立朝鲜中央银行的目的，阪谷芳郎首先指出：“在朝鲜所设立中央金融机构，可称之大韩银行，其存在时间可订为二十年，但按总会决议并经政府许可后亦可延长”。“大韩银行资本金一千万元，可分为十万份股，每股金额百元”。

关于设立银行方面的具体内容，阪谷将其划分为“筹款”、“运营”、“管理”三个方面，而日本必须掌握其“运营”的权力。在“筹款”方面，阪谷提出，资本中的“十分之三（三万股）优先获得权属第一银行，另三万股归日、朝两国政府认购，余下之四万股在公众中募集。”关于股东总会，“股东之表决权，以十股为一票，但十票以上之限额，不适用日朝两国政府所持股分”。按此规定，日本政府实际上享有与朝鲜政府相同甚至更加优越的发言权与地位，成为银行的实际支配者。

关于“运营”，“大韩银行之股票一律采用记名方式，不许

转让于日、朝外第三人”，“第一银行认购之三万股，享受红利八十年，并予以年息六分之优先权”，“大韩银行创立之际，第一银行以法人资格任其股东”。关于“管理”，阪谷提出：“大韩银行设总裁、副总裁各一人，由政府任命，任期五年；理事设三人以上，由持百股以上股东中提出候选人，政府任命，任期三年；设监事三人以上，由股东总会选出，任期二年”。此外，“有关银行券之发行，价格算定方法，概依第一银行之例为准”等等〔112〕，这些规定，对于第一银行是特别有利的。按照此等条令建立的朝鲜中央银行，其本质不过是日本对朝鲜进行金融控制的工具罢了。

阪谷的这一方案，实际上是按照日本的法律来制定朝鲜的中央银行法，是彻头彻尾的殖民地中央银行的设立方案。按照这个方案建立起来的朝鲜中央金融机构的朝鲜中央银行，实际上只能从属于日本。

日本的多数学者认为，阪谷的这个构想只是大藏省内部争论时的一个材料，没有公开发表过，所以对当时大藏省制定的重新编制朝鲜中央银行的方案未必有太大的积极作用。但是如果把1909年设立的朝鲜中央银行的总纲——《关于朝鲜中央银行备忘录》与阪谷的方案加以对照，可以看出两者有许多方面是一致的〔113〕。朝鲜中央银行设立之际，阪谷的方案实际上是被全面采用了。

简言之，建立一个置于日本统治下的朝鲜中央银行，有利于日本牢牢地掌握对朝鲜的金融支配，进而控制朝鲜经济命脉，巩固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阪谷芳郎关于朝鲜中央银行的意见，在日本对朝鲜的统治中，始终占据指导性的地位，并在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中得到了实施。在这个意义上讲，其先驱性的指导意义是不容低估的。

【注释】

- 〔1〕 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1968年参照。
- 〔2〕 中塚明，《日清战争的研究》青木书店，1968年，中村尚美《亚洲侵略论与日清战争》，《社会科学探究》19卷1号，第27—29页。
- 〔3〕 《对外观》日本近代思想大系，岩波书店，1988年，第464页。
- 〔4〕 同上，第324页。
- 〔5〕 反映当时日本对朝鲜认识的意见书，有下述10篇。（1）《朝鲜论稿》（柳原前光）（2）《关于遣使朝鲜的意见》（大久保利通、大隈重信）（3）《关于桦太问题、朝鲜问题的意见书》（榎本武扬）（4）《榎本武扬关于朝鲜政策的书简》（5）《柳原前光关于内外形势的书简》（6）《朝鲜政略意见案》（井上毅）（7）《关于甲申事变处理意见案》（井上毅）（8）《外交政略论》（山县有朋）（9）《弘扬国威的宣言》（10）《答外务省关于朝鲜政策的三点意见》。
- 〔6〕 同上《对外观》，第330页。
- 〔7〕 同上《对外观》，第336页。
- 〔8〕 同上，第45—46页。
- 〔9〕 同上，第478页。
- 〔10〕 同上，第13页。
- 〔11〕 同上，第45页。
- 〔12〕 同上，第337页。
- 〔13〕 同上，第13页。
- 〔14〕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年表并主要文书》上，原书房，第65页。
- 〔15〕 金锡淡、崔润奎著、梶村秀树等译，《朝鲜近代社会经济史》龙溪书店，1978年，第21—22页参照。
- 〔16〕 山边健太郎，《日韩合并小史》岩波书店，1966年，第35页。
- 〔17〕 信夫清三郎编，《日本外交史》上卷，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159页。
- 〔18〕 同上，第158页。《日本外交文书》第8卷第146页。
- 〔19〕 高秉云，《近代朝鲜经济史的研究》雄山阁，1970年，第19页。
- 〔20〕 森山茂德，《近代日韩关系史研究》，东京大学出版会，1987

年，第11页。

〔21〕 四方博，《朝鲜社会经济史研究》下，国书刊行会，1976年，第200—201页。

〔22〕 旗田巍，《明治期日本与朝鲜》、《国际政治》、《日韩关系的展开》，有斐阁，1963年参照。

〔23〕 同上，第11页。

〔24〕 森山，前掲书第12—13页。

〔25〕 同注〔20〕，第83页。

〔26〕 同注〔19〕，第43页。

〔27〕 《日本外交文书》21卷，第230页。

〔28〕 《巴巴拉·诺曼全集》，第309—310页。

〔29〕 同注〔3〕，第483页。

〔30〕 姜万吉著，小川晴久译《韩国近代史》高丽书林，1986年，第191页。

〔31〕 同注〔3〕，第315页。

〔32〕 一又正雄编著，《山座圆次郎传—明治时代大陆政策的实行者》，原书房，1974年，第255页。

〔33〕 《朝野新闻》1893年8月15日。

〔34〕 同注〔22〕，第57页。

〔35〕 福泽谕吉，《时事新报》1894年7月29日。

〔36〕 福泽谕吉，《应表国民一致之实》，《时事新报》8月16日。

〔37〕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28卷，第440页。

〔38〕 《时事新报》7月30日，《东京经济杂志》8月25日。

〔39〕 《中外商业新报》7月31日。

〔40〕 8月3日的《读卖新闻》在《报国会成立》一文中，登载了56位出席者的名单。

〔41〕 同注〔37〕第28卷，第442页。

〔42〕 《大阪朝日新闻》8月2日。

〔43〕 《龙门杂志》第353号，1917年10月25日，第72—73页。《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28卷，第443—444页。《大阪朝日新闻》8月5日，福泽于“报国会”成立会上，进行了40分钟的讲演。

- [44] 《中外商业新报》7月29日，8月4日。
- [45] 《大阪朝日新闻》8月15日。
- [46] 同上，7月7日。
- [47] 同上，7月24日。
- [48] 同上，8月5日。
- [49] 同上，7月22日。
- [50] 同注〔37〕，第28卷，第444—445页。
- [51] 同上，6卷，第373页。
- [52] 《中外商业新报》8月17日。
- [53] 同上，8月19日。
- [54] 同上，8月23日。
- [55] 同上，9月1日。
- [56] 同上，9月8日—9日。
- [57] 同注〔37〕，第28卷，第499页。
- [58] 同上，第441页。
- [59] 同注〔37〕，第23卷，第678—679页。
- [60] 涩泽荣一，《我经济界的二大急务》，《银行通信录》，第3卷第231号，1905年1月转引自《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六，谈话二，第324—325页。
- [61] 山县有朋《外交政略论》，参照注〔37〕，第81—86页。
- [62] 井上勇一，《围绕京釜铁道建设的日俄关系——作为日英同盟成立主要原因的铁道问题》，见《国际法外交杂志》80卷5号，第43页。
- [63] 同注〔18〕，第29卷325号文书，日本驻朝鲜公使小村寿太郎致陆奥外务大臣信，第625—628页。
- [64] 同上，第628页。
- [65] 朴宗根，《日清战争后的日本对朝鲜政策——以日本在朝鲜的经济利权为中心》见旗田巍先生古稀纪念会编《朝鲜历史论集》下卷，龙溪书舍，第104页。
- [66] 同上，第109页。
- [67] 同上，第44页。
- [68] 同上。

〔69〕 同注〔8〕，第105页。

〔70〕 同注〔17〕，商务印书馆，1980年，第283页。

〔71〕 同上，第285页。

〔72〕 同注〔3〕，第45页。

〔73〕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16卷，368页。发起人名单如下。

涩泽荣一	中野武营	大仓喜八郎
牟田口元学	大江卓	矢岛作郎
中泽彦吉	米仓一平	汤山柳雄
前岛密	大三轮长兵卫	竹内纲
尾崎三良	梅浦精一	佐佐田懋
真中忠直	柴原和	田中平八
织田升次郎	冈崎邦辅	关根亲光
盐田奥造	井上角五郎	山口太兵卫
松本武平	玉井重次郎	船越卫
渡边洪基	益田孝	大须贺庸之助
佐羽吉右卫门	井野柔吉	伊东荒吉
岩出惣兵卫	今井宗三郎	岩崎由次郎
石见权兵卫	石崎政藏	饭田重兵卫
池上伸三郎	岩谷松平	伊能权之丞
伊藤幹一	今井文吉	今村清之助
井上隆治	五十岚敬止	今井多七
今井势兵卫	春木彦七	林有造
半田庸太郎	服部镇三郎	滨田辰之辅
羽间市藏	丹羽长平	西村喜三郎
堀直树	堀谷左治郎	德田孝平
殿井弥平	小野金六	奥三郎兵卫
小山田信藏	大河原三四郎	大野清敬
犬久保不二	冈内重俊	冈本善七
大沟茂郎	冈崎荣次郎	小仓幸
渡边又三郎	绵贯助次郎	渡边大次郎
若原观瑞	和井田佐七	风间金八

加川	东井	德久	三宣	数江	三左	卫门	笠井	爱次	郎
加藤	野安	敬五	郎三	川日	关之	助三	柏村	庸	
梶野	内元	正三		川端	芥三	郎三	笠原文	次郎	
竹中	丑太	郎三		笠原	惠		田中	武兵卫	
高木	祖米	助三		泷川	政平		高山	豊次	
椿本	庄一	秀三		田代	坦之		田村	早次郎	
根津	元雄	吉三		鹤冈	助次郎		土田	政次郎	
中川	清行	太平		塚原	周造		根津	嘉一郎	
浪岛	藤恭	与七		中山	金三郎		中山	文树	
中野	越泽	兵卫		中井	新右门		中岛	行孝	
马松	上吉	助三		中村	竹松		中村	弥六	
渊小	林依	吉助		梅冈	正吉		村上	太三郎	
肯木	部孝	富三		野村	抵悟		山本	新助	
阿三	枝守	郎三		曲木	如长		町田	孝五郎	
阪上	平次	助三		松冈	要次郎		藤本	清兵卫	
木谷	伊一	郎三		富士	田九平		小杉	伊兵卫	
北村	英一	助三		古贺	国太郎		笃田	六三郎	
岛田	庆久	藏七		阿部	彦太郎		秋田	太郎兵卫	
庄野	嘉久	藏七		新井	米造		里吉	时次郎	
关口	银七			萨摩	治兵卫		左右	田金作	
				三枝	光太郎		佐久	间贞一	
				喜谷	市郎右卫门		喜多	村果吉	
				木原	五郎九郎		三浦	逸平	
				築田	三郎兵卫		下城	弥一郎	
				森本	清兵卫		森村	熊藏	
				铃木	源十郎				

〔74〕 同上。

〔75〕 同注〔16〕，第356页。

〔76〕 同上，第365页。

〔77〕 同上。

〔78〕 同上。

- [79] 同注〔16〕。
- [80] 同上，第367页。
- [81] 注〔4〕，第636页。
- [82] 同上。
- [83] 同上，第637页。
- [84] 同上，第638页。
- [85] 同上，第638—639页。
- [86] 同上，第639页。
- [87] 同上，第642—645页。
- [88] 同上，第651—652页。
- [89] 同上。
- [90] 丁名楠等著：《帝国主义侵华史》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59页。
- [91] 日本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31卷第1册98文书。
- [92] 岩井忠楠《军事、警察机构的确立》，《日本历史》15，近代2，岩波讲座，岩波书店1967年，第207页。
- [93] 同注〔16〕，第384页。
- [94] 同上，第413页。
- [95] 同上，第296—297页。
- [96] 同注〔16〕，第396页。
- [97] 同注〔45〕，第299页。
- [98] 同注〔16〕，第385页。
- [99] 同上。
- [100] 同注〔45〕，第299页。
- [101] 《日韩通商协会创立及协会报告发刊之趣旨》，见《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第1号，第4页，1895年9月。
- [102] 《开港场的金融》，见《日韩通商协会报告》第17号，第5—6页。1897年1月。
- [103] 《关于朝鲜问题文件集》，见《阪谷芳郎文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
- [104] 洒勾常明：《清韩实业观》，第123—124页，农务局，1902年。

- [105] 《对韩实业上的经营》，见《朝鲜协会会报》，1903年第9回第4页。
- [106] 同注6，第3—4页。
- [107] 《朝鲜中央银行关系》，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 [108] 同上。
- [109] 中冨明：《近代日本与朝鲜》1909年，第94页。
- [110] 同上，第80页。
- [111] 高岛雅明：《朝鲜殖民地金融史研究》，太原新生社。
- [112] 《关于朝鲜中央银行设立方法》，《阪谷芳郎文书》506。
- [113] 波形昭二：《朝鲜银行法的制定与币制改革》，涩谷隆一编著，《明治期日本特殊金融立法史》，早稻田大学出版部，1977年，第223页。

第五章

被遗忘的历史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孙中山是与日本联系多且深的人物。他于近三十年的漫长革命生涯中，在日本生活近十一年之久，先后出入日本达十四次之多。其中或长期逃亡、或短期逗留、访问。有人统计，其间与孙中山有过直接交往的日本人达四百人以上〔1〕。但是，实际上，恐怕远远超过这个数字。孙中山同日本的关系起源何处，后来又是怎样发展的呢？本章拟就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与日本，孙中山的日本观以及孙中山与日本财界的关系做一简单地探讨。

第一节 孙中山革命运动与日本

孙中山与日本的关系，始于他革命活动初期的1895年，终至他病逝前夕1924年底对日本的访问。在1894年的《上李鸿章书》中，他首次提及日本。1894年时，在夏威夷相遇的菅原传，是他结识的第一位日本人。1897年广州起义失败后，他与陈少白一起乘日本货轮抵达神户。经菅原介绍，陈少白见到了曾根俊虎，又经曾根俊虎的介绍，宫崎滔天登门拜访了孙中山。这次相见，是孙与宫崎滔天两人伟大友谊的开始，同时也是孙中山同日本各界人士交往的起点。〔2〕

孙中山在《上李鸿章书》中，提倡效仿日本明治维新，进行“富国之大经，政治之大本”的改革。他认为，改革的根本在

“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日本之维新政治为日虽浅，今日之成功已大有可观。”〔3〕根据孙中山后来的回忆，可以肯定孙中山以对明治维新高度评价为基础的日本观，是“要以三十年前日本变革其国的办法来变革中国”完成中国的改革大业。后来，孙中山通过与日本民权主义的接触，开始以日本为基地进行革命活动。

辛亥革命前，孙中山在日本，汇集革命同志开展反对清王朝统治的革命斗争。在这些活动中，许多日本人或是为理想主义所驱使，或是为沙文主义所驱使，投入到协助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斗争之中。这些人甘为革命军中马前卒，与中国革命党人甘苦与共，不惜英勇献躯。无数可歌可泣的事迹，谱写了中日关系中最美好、壮丽的一章。1897年到1905年6月，是孙中山在日革命活动最频繁的时期。下面，我们以日本大陆浪人等为线索，来再现孙中山这段革命活动的梗概。

孙中山直接领导的革命活动，可举1899年对菲律宾独立运动的援助和1900年的惠州起义。

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是指当时孙中山对以阿奎那为首的对美国侵略菲律宾的独立军提供武器及人力援助的事件。孙中山曾在东京见到菲律宾独立军的代表彭西，跟他约定送一批兴中会会员去菲，并在日本代菲军购买武器运往菲律宾〔4〕。孙中山将购买武器的任务交给宫崎滔天、平山周，宫崎、平山又找日本国民党党魁犬养毅商量。犬养认为菲律宾将来有可能成为日本向中国发展的跳板，于是答应为之斡旋。他找到了陆军次官中村雄次郎、参谋总长川上操六。几经反复，孙中山得到了武器。这批武器首先由陆军处理给大仓组，再由大仓组转卖给中村弥六的旧友。武器搞到了手，后来又购买了货轮“布引丸”，以运送武器。“布引丸”航海所需要的燃料煤则由内田良平出面说服了平冈浩太郎的弟弟平冈常次郎，由其无偿提供。不幸的是，“布引

丸”在前往菲律宾的途中，遇暴风雨而沉没〔5〕。虽然，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的计划以失败告终，但孙中山通过这一事件，同日本友人之间建立了信赖关系。

1900年10月的惠州起义，是日本大陆浪人援助孙中山在中国国内举行的一场武装暴动。在整个起义过程中，日本志士积极为革命军募集资金，一批生而忘死的浪人组成义勇军，投入到第一线。山田良政陪同孙中山访问了陆军大将、台湾总监儿玉源太郎和民政长官后藤新平，希望日本政府和陆军，对革命起义给予协助。内田良平、末永节、中野德次郎各自出资3千日元或5千日元。“布引丸”事件后，孙中山同内田良平之间交往陡增。惠州起义计划确定后，孙中山和滔天马上给正在海参崴的内田打电话，告诉他准备举事的消息，请他速回日本。内田接到电话后，立即回到日本，组织了一支三百余人的别动队，成员主要是以玄洋社为中心的福冈青年，由“天佑侠”成员高田二元、伊东知也、葛生能久等人指挥。〔6〕

孙中山面见儿玉、后藤时，向他们提出了希望得到武器弹药援助的要求。当时，儿玉就表示，陆军曾有占领厦门计划，由于政府的反对而不得不中途停止，因此没有办法马上提供武器等方面的援助。但是如果孙中山通过自己的努力能够先扰乱厦门，为日本出兵制造借口，那么日军进入厦门后，就可以提供武器〔7〕。

这样，孙中山在日本方面表示提供武器弹药援助的许诺下决定起义，命令在惠州的指挥官郑士良发难，然后向厦门前进〔8〕。但是，孙中山盼望已久的由菲律宾独立军转让的250万发子弹，由于“政商”中村弥六和大仓组从中作祟，而无法到手。10月19日成立的伊藤内阁又严令台湾总督禁止向革命军输送武器并且禁止日本军人加入革命军队伍，对孙中山的态度发生了急剧的变化〔9〕。孙中山的革命运动丧失了日本的支持，如同蒸汽机车失去了煤与水。结果，孙中山和平山周被迫撤离台湾，惠州起义夭折。回想起来，最初，孙中山发动惠州起义的一个最大前提，是日本

陆军及政府保证提供援助，结果由于日本政府转而反对，而导致失败。

这两次革命运动，虽遭失败，但是，日本民间人士、大陆浪人的仗义舍财的高尚情谊，给孙中山以鼓舞。其最大意义在于，孙中山对以日本为基地，开展革命运动进行了一次有意义的尝试。革命的失败带给人们的是失望，但是日本友人出于诚意的合作也给孙中山带来了极大的期望。这种期待，在以后孙中山的对日认识中占据相当大的比重。

日本志士对孙中山早期革命活动的支援，下述两件事情尤为重要。一是1898年，促进孙中山与康有为联合携手一事，二是1905年7月20日，促成孙中山与黄兴相识一事。

简单说来，戊戌政变失败后，康梁逃亡来到日本。后来，宫崎滔天向康有为介绍了孙中山，希望他们俩人能够通过面谈实现联合，但这一建议遭到康有为的拒绝而未能实现〔10〕。

另一方面，1905年7月19日孙中山到达横滨，由宫崎滔天的介绍会见了留学生的领袖黄兴。孙黄相识，给东京的革命运动带来了生机。7月28日，孙黄两人共同主持召开了第一次会议。与会者就中国现状、革命势力及革命团体统一问题各抒己见，充分表明了各自的态度。7月30日在内田良平家举行第二次会议，来自各省的七十余名留学生到会。全体出席代表一致通过了孙、黄起草的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的大纲，并在誓约书上签名。这就是后来8月20日成立的“中国同盟会”的筹备会议〔11〕。事实证明，此时期孙中山与康有为分手，与黄兴结合意义深远。孙中山同黄兴的结合，迎来了同盟会的诞生。

孙中山与黄兴的结合，确立了孙中山在中国革命势力中的领导地位，同时对于近代中国革命运动，有极为重大的历史意义。宫崎滔天、内田良平在为两人结合上，牵针引线，煞费苦心，功劳之大，不可抹煞。

同盟会成立之后，孙中山在东京积极进行革命运动和武装起义的准备工作。1905年11月22日发刊的机关杂志《民报》，在发动革命舆论方面发挥了重大的作用。另外，在黑龙会的帮助下，许多同盟会员还跟流亡日本的俄国革命家拉舍尔学会了制造炸弹的方法〔12〕。

1907年初，日本政府屈于清政府的压力，禁止孙中山停留在日本境内。可是，孙中山离开日本后，仍然通过日本的志士，继续以东京为基地，领导发动了数次武装起义。而许多日本志士，在此期间也协助孙中山从事武装起义的准备活动。如萱野长知，最初跟随孙中山一起离开日本，周游安南、新加坡。为了筹措武器、弹药，萱野数次返回日本，先找到陆军参谋次长福岛正光希望予以支援，遭到拒绝后又与神户的三上丰夷一起搞到汽船“幸运丸”。他在宫崎滔天、吉田正平等人帮助下买到手枪二千支及子弹。三上丰夷则帮助解决了购军火费用不足的部分。另外，萱野又从犬养毅那里搞到五十把日本刀，供起义时指挥官使用〔13〕。这一时期，萱野主要承担孙中山与日本之间的联络员工作，为筹措资金、武器等立下了汗马之功。

1907年镇南关起义，池享吉参加了突击战，亲临现场，回国后写成《支那革命实见记》，在《大阪朝日新闻》连载发表。这是池享吉应孙中山“请为革命志士澄清天下误解”的要求而写下的记录。这个记录，作为第一本反映中国革命战争的历史记载，为后人留下了珍贵的第一手资料〔14〕。到了辛亥革命，日本“志士”，对于中国革命的援助，更是广泛深入，这些都是致使孙中山对于日本的依赖程度日益加深的原因。

孙中山之所以选择日本为中国革命的海外根据地是有其深刻的思想根源的。其中起决定因素的就是他的亚洲主义思想，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同他的对日认识，到底有着怎样的关系？这个问题至今仍是众多学者们的兴趣所在。

第二节 孙中山的日本观

辛亥革命前后，亚洲主义思想是孙中山日本观的主要内容。对日本抱有过高的期待，又是此时孙中山亚洲主义思想的主要特征。形成这种日本观的思想背景，大致有以下四点：

一、模式论——对明治维新的评价

清末中国知识分子对日本明治维新的看法可分两派：守旧派“视维新为恶政、（断言）其改革不久必定失败。二十年内必有动乱”；改良派、革新派则与此相反，高度赞扬日本维新改革。如黄遵宪的《日本杂事诗》、《日本国志》、康有为的《日本变政考》，都认为维新后日本近代化是“善行”，充分肯定了维新后的新政〔15〕。客观地评价这两种对日观的影响，是否可以这样说，前者始终为少数，影响时间较短。后者于较长时间里占据中国对日认识的主流，并奠定了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对日认识的基础，形成仿效日本革新拯救中国的日本模式论。以建立新中国为己任的孙中山，在对日认识上，属于后者的范畴。

1919年6月，孙中山在回答《东京朝日新闻》记者采访时说：“夫中国国民党者，即五十年前日本维新之志士也。……亦欲步日本志士之后尘，而改造中国，予之主张日本亲善者以此也〔16〕。”

简言之，学习日本，按照日本维新，去建设中国，是孙中山日本观的第一个基本内容。

二、同文同种论——反清排满的主张

孙中山的日本观，始终是与他所追求的反清革命的目标相辅相成，互为一体的。他提倡在同文同种基础上的中日联合，带有

十分强烈的种族论的色彩。

1905年，孙中山周游夏威夷、美国、欧洲之后来到日本，在东京成立了同盟会，并把“驱逐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作为同盟会的口号。当时孙中山革命的主要目标，首先是争取列强的中立和支持。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张，在当时根本没有被提及。这可能是孙中山出于集中力量于排满，并尽可能避免外国干涉的考虑。所以在排满反清的活动，他对日本寄予很大的希望。

《革命军》是清末影响最大的革命小册子，邹容撰文阐述了民族（人种）是造就历史的一大因素，指出要革命就必须先排除外来民族（人种）势力〔17〕。而邹容认为中国汉民族中，也包括有朝鲜、日本在内。邹容的这个观点，在当时中国知识阶层引起了很大共鸣。似乎可以说孙中山的日本观，在反清排满的人种主义认识上与此是一致的。

三、命运共同体论

命运共同体论，是孙中山日本观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命运共同体论的早期表现，是拒俄联合论。进入近代以来，中国北疆不断受到俄国的野蛮侵略，所以忧心于国事的知识分子无不为一清政府在沙俄扩张主义面前的软弱无能而激愤。无不痛感，照此下去非但东北几省，就是中国全土也有被俄国鲸吞的危险。1903年，孙中山就曾说过：“……无何，露人旋变其手腕，而收旅顺、据大连，而列国则以为固然，无复有异议者矣。今之要求，何异于昔之密约？不独此也，将来露之收蒙古、举新疆，天下亦若视为固然矣。甘于弃地，日就削亡者，清国之趋势也。所谓以国势而论，无可保全之理者此也〔18〕。”

另外，在孙中山领导下，1907年夏由张继、刘光汉等人主持成立的亚洲和亲会，也是以亚洲的革命党为中心组织的。该会以反抗帝国主义，“期使亚洲已失主权之民族各得独立”为纲领，同时

亦把亚洲各民族在民族独立运动中的相互支援作为目标〔19〕。这些都反映出孙中山为对抗帝国主义在亚洲的侵略，寄希望于亚洲各民族的联合，特别是寄期望于中日两国的联合的思想。

四、对日本的期待

1900年8月中旬，孙中山与横滨某人的谈话中曾经这样说：“迄今为止，我一直在东京注意观察日本的外交方针和政治状况。但近日国内的动乱，经各国公使出面，似已告一段落。同时，推断日本的外交方针已大致确定。根据这种情况，目前打算去视察本国情势，并与本国同志进行种种磋商”〔20〕。

同年5月广州起义之际，孙中山向犬养毅、菅原传分别发出求援信，请求日本方面提供武器、经费、以及陆军士官等几个方面的援助〔21〕。

另外，1903年孙中山在《支那保全分割论》中还说过这样的话：“东人之倡保全者曰，支那为日本辅车唇齿之邦，同种同文之国，若割裂而入于列强，则卧长榻之侧他人鼾睡，将来列强各施其保护税法之政策，如佛之于安南，米之于飞岛，必将今日自由争竞之极大商场尽行阖销。……为日本计，是宜保全支那，而保全支那即自保也”〔22〕。这里，孙中山借日本支那保全论者之口，告诫日人，日本支持中国革命，其实正是保卫日本自己。孙中山长时间里一直认为：日本人为了其本身的利益，实现中日联合，支援中国革命，这并非是过高的奢望，更不是幻想。

简而言之，上述四点，是孙中山日本观中的重要部分。这些主张与日本亚洲主义者的想法在内容上有许多是相同的。宫崎滔天等本来就是出于对自由民权主义和亚洲大同理想的追求与孙中山相识的，在追求亚洲民族独立解放的愿望上，他与孙中山的思想一脉相承，一拍即合。宫崎敬佩孙中山的伟大人格，从孙中山身上看到了“武装起来的英雄的牺牲精神”〔23〕，俩人志同道合，

他同孙中山的相识，坚定了他援助、献身中国革命事业的信念。
列出孙中山在日本的友人名单，简直就是一部日本社会的

山田良政先生墓碑

山田良政先生弘前
人也庚子又八月革
命軍起惠州先生挺
身赴義遂戰死嗚呼
其人道之犧牲與亞
之先覺也身雖殞滅
其志不朽矣

民國二年二月廿七日

孫文敬書

孙中山为山田良政亲书之墓碑文（1913年）

“名人录”。这些人中包括国会议员尾崎行雄，对外扩张主义者头山满、平冈浩太郎、神户的实业家三上丰夷等人。他们运用在日本社会的各自的影响力，从不同方面声援了孙中山的革命事业。政治家犬养毅，主要在政界，支持孙中山；拥有九州煤矿的平冈浩太郎在经济上出力；运输公司老板三上丰夷则为运送武器东奔西波。惠州起义时，山田良政在向香港撤退途中，被清军捕获杀害，成为第一个为中国革命献身的外国人。孙中山称赞山田良政“其人道之牺牲，兴亚之先觉也；身虽殒灭，而志不朽矣。”这些日本志士、浪人、财界人士，在支援孙中山的革命活动中，均曾起过各种不同的重要作用。

第三节 无私援助的真情

综上述，可见，在孙中山同日本漫长的几十年的交往中，有一批真心实意地与他的信仰共鸣，把自己的一切，以至一生全部贡献给中国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对于孙中山来说，这些人的友情像金子一样珍贵。

众所周知，孙中山的一生始终被革命资金的拮据所困扰。这个问题，在日期间尤为突出。当时日本友人对孙中山革命事业的援助，尤显得可贵。以往有关这方面的史事记载散见各处，多为人所忽略，在有关史书专著中，所涉到的，往往多是一些已为人所熟知的如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犬养毅、头山满、内田良平等与孙中山的交往，而一批曾经给过孙中山革命活动以支援和赞助的日本朋友，却为人们所忽略。本节重点叙述日本友人对孙中山的经济援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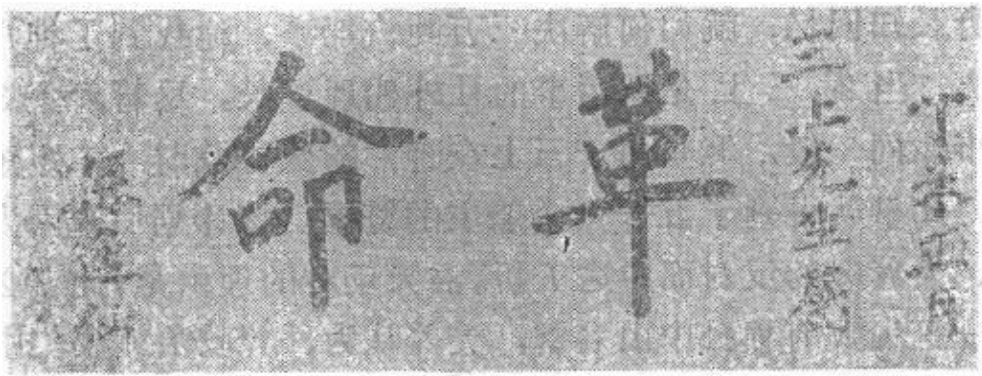
孙中山逝世6周年时，当时的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总干事马伯援先生举办座谈会，邀请一些孙中山的好友，追忆孙中山同日本交往几十年的往事。连续五次的座谈会，到会者所谈主

题十分集中，几乎所有的人都不无感慨地回忆了孙中山是如何在极端艰苦，资金匮乏的情况下展开革命活动的情形。最早在日本翻译出版《孙文伦敦被难记》，后又同平山周一一起去中国、香港寻找孙中山的可儿长一回忆说：“孙中山刚到日本时，受犬养毅的介绍，住在东京牛込鹤卷町高桥込的一处房子里。当时很困难，一面有警视厅早晚监视，一面又为生活费发愁。不过在当时有位好义之士，名叫渡边元，他是个矿主，生于长崎，他直接间接在物资方面帮助孙文”。〔24〕另外，中野德次郎也给了孙中山等很大援助。中野德次郎也是个矿主，生于福冈，与玄洋社的“浪人”交往甚密，素来关心东亚大局，不惜投私财以助“义举”。可儿提及的渡边与中野，均为日本实业家，他们在孙中山、黄兴等人逃亡日本期间，屡屡出巨金，雪中送炭，以解革命活动之急〔25〕。

在这部分从经济上援助孙中山及中国革命事业的日本友人中，还包括着一批相当数量赞同孙中山等人革命事业的日本经济界人士。由于这部分人地位特殊，他们的援助常常能起到相当大的作用。例如三井物产社员泽田实、日本邮船会社神户支店长佐藤寅次郎就是这样的代表。泽田实毕业于京都帝国大学法学院，入三井物产后马上到上海支店工作。在上海期间，泽田与黄兴、汪兆铭等南方的革命党人有交往，经常以各种秘密方式援助革命。辛亥革命时，他调驻香港，经常为过往停留的中国革命党人提供方便。因此，孙中山曾郑重地表示过感谢。泽田认为，“只有援助孙中山革命党，才能一扫支那陈习，实现日支提携，确立东亚的永久和平，达到日中间最重要的经济合作”〔26〕。佐藤寅次郎，毕业于庆应义塾。在学期间，受福泽渝吉影响，毕业后入日本邮船会社，其间留学伦敦，日俄战争期间任日本邮船会社营口出張所所长，后调升国内任神户支店长。黄兴逃亡日本期间，他全面负责照顾其生活与安全并特意专程接送，以保护安全。为

回报其友谊，黄兴手书：“云淡风轻”四字以资感谢〔27〕。这些任职于日本大公司、企业的高级职员，倾心于中国革命，从经济等方面帮助中国革命党人，其主观动机可能是多种多样的，但在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初期的活动中，在客观上所起的作用，却是积极有益之举。

孙中山在日活动地区，主要有东京、神户、横滨三地。这三个地区，都有真诚爱戴孙中山，无私援助中国革命事业的经济界人士。孙中山同神户海运会社社长三上丰夷有过一段友谊。三上丰夷属于神户海洋运输方面实力雄厚的一个较大会社社长，在关西地区及日本海运界占有一席之地。三上同孙中山的交往起于何时，现无从查起，《国父全集》现存有两件有关三上丰夷的书



孙中山1907年赠送三上丰夷的手迹



孙中山赠送三上丰夷手迹

简，一件是有关在神户武器的处理问题，一是关于同萱野长知的

联系事〔28〕。另外，三上遗族珍藏有孙中山赠送的“革命。丁未正月。三上先生属”的横幅。据现有资料看，孙中山在日期间几个重大的活动中，几乎每次都有三上丰夷参加。辛亥革命前几年，孙中山以河内为根据地策划了几起军事暴动。当时，为了解决革命运动的资金问题，孙中山及其日本友人曾经筹划成立“共和汽船会社”。成立共和汽船会社，主要有两个目的。首先是通过办实业解决资金，创造财源，来支持革命运动。其次，是为革命活动的开展秘密运送武器、为革命党人进出日本等地创造方便条件。成立方式采取中日合资形式，名曰日华合资公司。日方以实物贷款参加，想办法筹集三万吨的汽船，中方由华侨方面负责流动资金。孙中山大力支持，欣然地命名为“共和汽船会社”。据萱野长知回忆，就如何解决三万吨汽船事，他找到了神户的三上丰夷，当时三上是海运事的社外船理事长。尽管筹集3万吨汽船事非同一般，但是由于三上在神户的威望及财力，短短的时间里，此事就得到了五一六个船主的赞同。该计划后来因为宫崎滔天、犬养毅的反对而中途夭折。滔天反对的理由是，此事必须慎重，一旦失败有损孙中山名誉。犬养认为，“政治就要集中考虑政治大事，政治问题与经济问题要截然分开，因经商而败坏政治名声，实不可取。”就这样，他们打电报给孙中山，取消了这个即将实施的设想〔29〕。如果，计划付诸实施，三上将是日方的代表。

在1907至1908年，孙中山、黄兴组织进行的几次起义中，三上丰夷同样是扮演了十分重要的角色。此时，三上丰夷的主要任务是负责从日本运送武器、弹药，每次的任务，基本相同。1907年9月，宫崎滔天向三上丰夷转达孙中山的委托，三上出面租借了“幸运丸”（2800吨）装满武器、弹药，企图协助许雪秋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后因事败被清官员发现，而把武器弹药全部投入海中。三上在援助孙中山时再三强调“中山的大业势必成功。我对此坚信不疑。尽管要等到我的儿子或孙子的时候。随着时代

的发展，理想终将会实现的。”〔30〕

日本学者藤井升三指出：“在援助孙中山革命运动的日本朝野各界中，大多数人追求日本国家利益和个人的利权，真正与孙中山革命理想共鸣，不惜无私协助与支持的日本人为数极少，梅屋庄吉、宫崎滔天、萱野长知等是这批数量极少的日本人的代表”〔31〕。梅屋庄吉也是同孙中山结识最早的日本人之一，他在1895年于香港认识了孙中山后，便被孙中山的浩然正气所倾倒〔32〕。此后，直到1925年3月孙中山逝世，自始至终地真诚援助，保护着孙中山。长期以来，由于资料等其它原因，孙中山与梅屋的这段交往鲜为人知。几年前，梅屋的遗属公开了梅屋家保藏的大批历史文物、资料，因而，使我们有幸触及这段史实，重现日本实业界人士无私援助孙中山的历史。

梅屋庄吉比孙中山小四岁，1868年生于长崎，父亲是商人。15岁时，搭乘父亲的船到过上海。据说，这一次海外旅行，使梅屋树立了要振兴东亚，扶助邻邦的雄心大志〔33〕。后来，他主要从商，经营过贸易，管理过矿山，跑过香港、厦门、朝鲜。同大井宪太郎一起下南洋，计划移民。梅屋是以在东亚地区经商发家，他于釜山、元山、仁川、汉城倒卖优质稻米，获巨利。后来在事业上几经挫折，他选择了摄影业，成为日本电影界的开山鼻祖。（电影在日本被叫做“活动写真”，“写真”即照相、照片）当时，“活动写真”在日本刚刚出现，设在东京新富座的影院，场场爆座，一夜就可轻而易举地获五千元利润。梅屋也很快进入日本实业家的队伍，与日本社会上层建立了交往。事业的成功，为梅屋后来援助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了资金来源〔34〕。《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有关梅屋庄吉的词条称“梅屋是日本活动写真的创始人，他为电影界努力奋斗，其志在东亚。他在实业界大显身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得到资金”。车田让治在他写的第一本关于孙中山与梅屋的书中指出：“1895年，梅屋见到孙中山

后，他就约定要援助孙中山。”梅屋庄吉属于日本民族中那种为既定事业不惜赴汤蹈火的“壮士”，孙中山则是几千年中华文明所培育出的为民族正义敢于开天辟地的“巨人”。梅屋与孙中山一见如故，并决心终生助其事业的一个最大原因，是由于孙中山对中国问题、日本问题、东亚及世界问题的精辟分析，使其折服，从而对孙中山的革命事业，给予全力支持。

下面的一段引文，反映了梅屋同孙中山是怎样由相识而相知，并很快结成志同道合的亲密朋友的。“1月15日，孙中山经过在港一位老师介绍，访问梅屋，俩人在梅的书房，长谈良久，就各种问题交换了意见。梅屋叙述了他多年来追求日本与中国的结合，打着办杂货的招牌，从事收集有关中国情报，寻找反对清朝政府同盟军的种种坎坷经过。他时而激动万分地述说，当看到中国人受辱，欧美诸国扩大在华租借地，为非作歹，专横霸道时，而感到不可容忍的耻辱的心情。这是因为身上流淌着与中国民族同样的东洋民族的血液。时而又声嘶力竭地表白，东洋人应该联合起来的迫切情感。孙中山说‘我的老师告诉我，你热爱中国，忧虑东洋人的将来，我相信，这完全是真的’。孙中山指出：‘欧美人称中国人是沉睡的狮子，是否是狮子，姑且不问。你不觉得中国人中沉睡者，被厚鳞遮目而不察觉的人太多了吗？我所说的“厚鳞”，指的是清国的政治，就是清国政府本身。不除去厚鳞，支那名存实亡，最终将摆脱不了沦为欧美列强、白色人种奴隶的命运。’孙中山言辞激烈，怒发冲冠，深深地感动了梅屋”，梅屋为孙中山反清革命拯救民族的抱负所倾倒〔35〕。这一次历史性的相见，奠定了梅屋与孙中山永志友谊的基础。

梅屋庄吉对于中国革命的最大贡献就是他作为实业家，为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提供了一笔笔数目可观的资金。曾有人粗算了一下，几十年里，梅屋庄吉为中国革命而提供的款项，折合现在的日元，可能远远地超过10亿以上。仅从这一点来看，孙中山称其为

革命的“贤母”〔36〕。是孙中山对梅屋一生的高度概括和评价。

其实，梅屋对中国的援助的确是无法估算的。据梅屋日记，1895年12月，孙中山离开日本赴夏威夷时，梅屋提供了1300美元作旅费〔37〕。支援菲律宾革命运动，孙中山指示从日本电汇资金，梅屋兢兢业业去办，所需的手续费全部由他承担。1905年孙中山重返日本，成立中国革命同盟会，11月创办了《民报》。梅屋见到黄兴，得知办报事。数日后，为该报支出了一大笔钱。还有，1907年日本政府迫令孙中山离日，由梅屋做中介，东京股票商人铃木久五郎赠款一万元〔38〕。辛亥革命时期，有邻会派出的医师团的费用，以及后来制作孙中山电影的经费，寄赠孙中山铜像等等，此类援助，不计其数。梅屋对中国革命、孙中山的需要有求必应，成为孙中山革命运动的一个重要的资金来源。

然而，梅屋本人把钱财看得十分清淡，无论付出多大的代价，从来没有任何期待，不要丝毫的报酬，并从不张扬，甘为寂寞。他唯一关注的就是中国革命的进程，就是孙中山事业的成功。孙中山逝世时，梅屋悲痛欲绝，致唁电云：“承电告令翁病中因养生不宜，于十二日溘然长逝，殊深惊愕。昨见报载北京电，半信半疑，特电询问，始悉其真，更增悲感，诚不胜悲伤哀悼之至。中山先生为贵国革命之大恩人，亦实世界的伟人，今一朝长逝，洵为贵国之不幸亦东洋全体之不幸也。呜呼痛哉！”〔39〕梅屋的讣文，表露了他对孙中山的一片纯真情义。

第四节 在财界仗义施财的背后

孙中山领导中国革命的活动，一些同情中国革命和景仰孙中山革命理想和抱负的日本人，的确以各种形式给予了革命党人以援助和支持。他们真诚无私的情谊，是中日两国人民友好关系史上光辉的一页。但也应该看到，在支持孙中山革命活动的日本

朝野各界人士中，也不乏国权主义者，他们把支持孙中山的革命活动，看作一种为将来日本在华扩张侵略获取特权利益的政治投资。这种援助，从来都不是无私的，是使小钱谋大利的政治赌博和押宝。以大仓喜八郎为例，其所属企业大仓组，对外经营项目中包括军火武器，是日本陆军部门特许的商社。辛亥革命前它与清政府，民国建立后与北洋政府及各派系军阀均有密切关系。同样，辛亥革命前大仓组与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也有往来。对大仓来说，经营军火，无论对清政府还是革命党人，主要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为大仓集团在华事业的拓展，为大仓组的利益考虑，同时也为日本对华的扩张侵略政策服务。因为对外供应军火武器，也是日本对华政策中的重要手段。如大仓组当年曾为孙中山援助菲律宾独立运动，承担过军火武器供应。1900年孙中山组织领导的惠州起义失败后，计划当年9月再次起义。孙中山委托宫崎滔天、犬养毅等向大仓组购买曾为菲律宾独立运动准备的军火武器时，因这时日本内阁明确表示，要对中国华南地区保持政治上军事上的中立政策，所以大仓组高岛副董事长以“时机不利，不能供给”为理由，拒绝提供援助〔40〕。在这里大仓对中国革命运动援助与否的准则是十分明确的。孙中山对此当然清楚，只是革命运动需要资金与武器，除了向这些曾经表示支持他的日本政界、财界有权势实力的人士求援外，别无他途。所以每当重大的革命行动急需援助时，孙中山往往由于这些“友人”的背信弃义而失望。

如前所述，日本政界、财界一些人士，在援助孙中山时，常常把这笔支出看成一种长期的必要政治投资。九州矿业主安川敬一郎曾对人谈及头山满政治上“拨大算盘”的精明时说：“世人皆知‘ $3 \times 5 = 15$ ’，头山的算法是‘ $3 \times 5 = 40$ ’的人”。在这里安川非常形象地指明了头山满在政治上的野心与抱负。在一部分有亚洲主义思想的政界、财界人士中，他们支持中国革命援助孙中

山，说到底就是在政治上“拨大算盘”。“拨大算盘”一语道破天机，暴露了隐藏在仗义施财背后强烈的功利主义思想。安川认为“打算盘的人未必懂得算盘，不打算盘的人反而知道算盘的真谛。尤其在今天，日本以世界为对手，所谓拨大算盘，目的是要登攀古今未有的大舞台，所以，要有大胆无畏，有胆量拨‘ $3 \times 5 = 80$ 或 100 ’的大算盘”〔41〕。

安川敬一郎是头山满的朋友，兼头山满的“金库”、“财政大臣”。安川认为“头山从事的正是他想干又未能干的大事业，所以，谁在前台，谁在幕后，是无关紧要的。他每月拿出一万元给头山做活动经费，鼓励他援助中国革命。武昌起义后，头山满、犬养毅及一批浪人首领赶到中国为孙中山壮威。临行前，日本政府力劝头山等三思而后行，说：“你等大鲸，逆扬子江而上，一旦潮水下落，必将失去回身之地，与其落魄而归，不如趁早断此念头。”头山不以为然，回答说“大可不必为我担心”。随即启程赴汉口，访北京，又经中国东北回国〔42〕。大日本头山精神会的藤本尚认为：“头山与安川的关系非常人能理解的”，他们援助孙中山事出有因。援助中国革命的目的，在于帮助孙中山实行中国统一，然后日中携手，将东洋民族从白种人的残暴压制下解脱出来，这是忧国之士的共同大业。同时，又由于孙中山主张的亚洲主义与他们信奉的亚洲主义有共同点，他们认为，只要孙中山的革命成功，就有可能在中国实现日本雄飞大陆的目的。二次革命失败后，头山满不顾山本内阁政府的反对，把孙中山从神户接到东京，安顿在自己的隔壁，打通隔墙，使孙可以自由往来。安川敬一郎则连续四年每月为孙中山提供五百元的生活费〔43〕。不难看出，头山、安川所抱有的“打大算盘”的功利主义思想，在援助中国革命的名义下，包藏着推进日本大陆政策的祸心。日本一部分人士支持孙中山，正是由于他们看到中国的革命很可能成功的缘故。辛亥革命爆发后，内田良平赴朝鲜，向

日本驻朝鲜总督寺内正毅游说，内田对寺内说：“从形势上看，这次革命必定会成功，如不趁此时机解决满洲问题，会失去天赐良机，将来必召致大患”。但寺内反对革命，内田的游说未取得任何结果。为此他又去拜访警察总监明石元二郎。陈述拜会总督的经过，并征求他的意见。明石表示赞成，他说：“在邻邦出现了共和国虽然是令人不快的事，但是解决满洲问题，确实是有了机会”。他还说，“清朝一旦没落，我们把宣统皇帝控制在手里，可以建立受我们保护的满蒙帝国，免遭俄国的掠夺”。内田以欣喜的心情与其就将来运动的作法达成了协议”〔44〕。后来内田在回忆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孙中山革命党人的援助时，有如下的一段记载：“这时头山满、犬养毅、寺尾亨、副岛义一、宫崎滔天、萱野长知、尾崎行昌和其他多数同志都前往上海，给予孙、黄以直接援助。我在东京援助远方的宋教仁，不久经宋教仁之手送来了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先生发给的外交顾问嘱托书。同时，并委托我制定筹措军费的办法。……于是，我会晤了小美田隆义和大江卓，并把过去在下关寄信给益田孝之后所留下来的事情告诉他们，请他们劝说益田，为了支持革命政府要向三井财团交涉借款。益田接到了我的信后，意识到清朝必将覆灭，为此找到井上馨侯爵谈起此事，井上对此事也有同感。怀着援助革命军的意志，小美田、大江接受了进行交涉的任务，在征得井上侯爵同意之后，访问了桂太郎公爵，转达了井上侯爵的意见。并求得公爵的同意，又和公爵一起去劝说西园寺总理大臣。这样就使政府承诺了对（中国）革命政府的援助。三井（财团）发放了由我申请的三十万日元的贷款。随后又令上海支店接受孙文申请的三百万日元借款。当时，优柔寡断的西园寺内阁之所以能够放弃了对北京政府的支援，而尽力支持南京的革命政府，主要是因为益田孝搬动了井上、桂这些势力强大的人物，并使西园寺总理同意借款。可以说，益田实在是援助中国革命的一位鲜为人知而功勋卓

著的人。”〔45〕

上述引文与前内田良平对寺内正毅与明石元二郎就解决“满洲问题”的游说，是内田对其在辛亥革命时期所从事活动的回忆，他非常坦诚地自我说明了日本财界、政界人士，在当时之所以“援助中国革命”的真实目的。

【注释】

〔1〕 萱野长知在《中华民国革命秘笈》（帝国地方行政学会发行，1940年）中指出，与孙中山有关连的日本人，大约有百人以上。就此笔者根据《秘笈》以及东亚同文会编写的《对支回顾录》、《续对支回顾录》作过统计，总数远远超过四百人。

〔2〕 藤井升三：《孙文研究》，劲草书房，第12—13页，1966年。

〔3〕 野泽丰：《孙文与中国革命》，第25—26页，岩波新书，1966年。

〔4〕 本村毅：《布引丸—菲律宾独立军秘话》，恒文社，115—126页，1981年。

〔5〕 同上，第167—200页。

〔6〕 韩相一著：《日韩近代史的空间》，第224—225页。

〔7〕〔8〕〔9〕 同注〔4〕，第34页。

〔10〕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东洋文库版，155页。

〔11〕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34—35页。

〔12〕〔13〕 黑龙会：《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卷，第382—397页。

〔14〕 池亨吉：《支那革命实见记》，东京金屋文渊堂，明治44年。

〔15〕 佐藤三朗：《明治维新后日清战争前支那人的日本研究》《历史学研究》第10、11页。

〔16〕 《民国日报》1919年6月24日。

〔17〕 岛田虔次、小野信尔编：《辛亥革命的思想》，筑摩书房，1968年，第48页。

〔18〕 《支那保全分割论》，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22页，中华书局。

〔19〕 竹内善作：《明治末期中日革命运动的交流》第74—90页，见《中国研究》第5号，1948年9月。

〔20〕 《与横浜某君的谈话》，《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198页，中华书局。

〔21〕 《致犬养毅函》，见《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00—201页，中华书局。

〔22〕 《致宫崎滔天函》，《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18页，中华书局。

〔23〕 史扶邻：《孙中山与中国革命的起源》，第123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

〔24〕 马伯援是湖北枣阳人，1909年早稻田大学毕业，参加了黄花冈起义和辛亥革命。1924年赴美留学，1919年主持东京中华留日基督教青年会。又曾计划在东京青年会建立规模宏大的中山堂。1930年1月13日、2月5日、2月12日、3月7日、3月27日召开座谈会，邀请孙中山旧友犬养毅、头山满、萱野长知、平山周、水野梅晓、清藤幸七郎、可儿长一、内田良平等追忆孙中山同日本的往事。见陈固亭著《国父与日本友人》，第121—156页，幼狮书店印行，1965年。

〔25〕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第351页。

〔26〕 同上，第638页。

〔27〕 同上，第629页。

〔28〕 陈德仁、安井三吉《孙文与神户》，神户新闻出版中心，1985年。

〔29〕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第373—374页。

〔30〕 俞辛焯《孙文的革命事业与日本》，第122页。三上丰夷十分尊敬孙中山，当1925年孙中山逝世的噩耗传到日本，他在给孙科的唁电中写道“孙科先生，接令翁孙中山先生之讣音，不胜哀悼，深感年来之厚谊，遥祝冥福。”后来，又与夫人一起参加了孙中山先生葬礼。

〔31〕 藤井升三：《梅屋庄吉与孙文、宋庆龄》，引自《孙文与梅屋庄吉》。

〔32〕 车田让治《国父孙文和梅屋庄吉》，第4页。

〔33〕 黑龙会编《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下卷，第408页。

- [34] 同〔33〕，第408页。
- [35] 同注〔32〕，第6—9页。
- [36] 中村义《“贤母”庄吉と人と孝リ》，引自《孙文和梅屋庄吉》。
- [37] 同注〔34〕，第60页。
- [38] 同注〔32〕，第43页。罗家伦《国父年谱》，第176页。
- [39] 同上，第115页。
- [40] 宫崎滔天《三十三年之梦》，宫崎龙介、卫藤沈吉校注解说，第48—49页，东洋文库，1982年。
- [41] 藤本尚则《头山精神》，第78页。
- [42] 同上，第49页。
- [43] 同上，第91页。
- [44]、[45] 内田良平：《日本的亚洲》，1911年。转引自《近代史资料》，总66号。

第六章

辛亥革命与日本各界的反响

1911（明治44）年10月10日，驻防武昌的清朝政府新军发动了起义，紧接着全国各省相继独立。翌年1月1日，中华民国在南京成立。这场革命，给在日俄战争中取得胜利，完成对朝鲜的合并正在捕捉向中国大陆扩张机会的日本带来了冲击，迫使它在对华问题上面临新的重大抉择。这一时期日本大陆政策的内容，首先是确保在满洲的日本权益，然后再向长江流域英国的权益圈中伸展势力。如何针对中国的革命确定相应的政策，对当时的日本来说是一个最重要的问题，但是，由于对中国革命的认识不同，日本的反应出现了复杂的局面。

当时日本的对华政策受以下两个条件的制约。首先，这一时期，日本政局正面临重大的转换期，“日俄战争以后，随着政府官僚、资本家阶级、陆军等新生诸势力参与的多元政策决策过程的逐渐出现，取代着支配了大半个明治时代的藩阀实质上的统治权”〔1〕。但是，由于这些势力中任何一方都没有取得决定性的统治地位，所以随着这种前所未有的复杂局面，政策的决定，特别是对华政策中呈现出多元的倾向。其次，从国际形势来看，日本政府不可能无视列强各国的反响而轻举，列强各国对中国局势的任何表态，无不对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重大影响。

为了解日本财界和大陆浪人对中国形势认识的时代背景，本章以日本舆论的反响和国内各种政治集团为对象，考察1911年10

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到翌年1月1日中华民国成立期间的日本对华政策。

第一节 日本舆论的反应和国内动向

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各界产生了各种各样的反应。如《大阪朝日新闻》，1911年10月到1912年3月间共发表了十四篇有关中国问题的社论和三百篇左右的文章〔2〕，可见其反应之强烈。“华中革命动乱，乃近代东洋破天荒之骇然大事。清帝国之命运日短一日，东洋或可出现空前之一大共和国”。此类言论，正是当时日本人的关注所在〔3〕。

在日本近代史上，国民舆论能在正当意义上对对外政策的形成起重大影响的事情是极为罕见的，但辛亥革命前后，舆论恰恰发挥了这个作用〔4〕。当时的新闻、杂志大量报道有关辛亥革命的动向，唤起了日本国民对邻国革命的关注。1911年末《日曜画报》以临时增刊的形式发行了辛亥革命特集——《支那革命画报》。博文馆出版的综合杂志《太阳》从1911年12月到1912年3月，共刊载有关辛亥革命的报道14篇，每期还增刊了一些中国革命战场的照片，图文并茂，生动活泼。真实地介绍了中国革命的进展与实况，引起了日本国人的极大兴趣。评论家稻叶岩吉（君山）在1912年1月20日甚至说：“当今日本的新闻，简直已变成了革命党的机关报。”〔5〕

日本舆论界对于辛亥革命如此异乎寻常的过热报道，决非偶然。细究起来，大致有下述几个因素。第一，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大正政变”几乎发生于同一时期。这是经过日俄战争，日本政局中新的政治势力不断崛起的时期。这充分“证明辛亥革命唤起了打破阀族、拥护宪政的运动”〔6〕，受辛亥革命影响，增设二个师团的问题成为人们注意的中心，在辛亥革命的冲击下纵横

议论打倒藩阀的文章也大量充斥报纸、杂志。

第二，试图更积极地推行大陆政策的各种政治势力，一方面利用各自的组织直接或间接地向官僚、财界、军部的实力人物施加影响，另一方面也在利用舆论以获取更多的支持者。

第三，军部、财界（包括实业界）等新兴政治势力，为了推动向中国的扩张酝酿并提出其独自的政策。而各种舆论中，代表军部、财界意见的意见，更引人注目。

第四，民间人士以及大陆浪人十分活跃。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胜利，刺激了日本国民中民族主义的滋生，使他们对邻邦中国的革命运动产生一种特殊的情感。大陆浪人对于在自己长期支援下坚持活动的革命派的大举起事，更是充满了满足感、责任感和期待感。到这个时期，他们主张的亚洲主义中的日中提携论就发挥了主导的作用。

除了考察当时的电信、电报、新闻报道之外，日本报刊当时所发的社论也是值得注意的。吉川尚曾以明治末年有代表性的报纸——《东京朝日新闻》和《东京日日新闻》为对象，分析了它们1911年9月到11月初发表的十三篇社论，结果发现日本的舆论是逐渐向同情革命军的方向发展的。然而，如果仔细看一下当时的社论，就可以知道，不仅有吉川氏所指出的同情革命军的舆论，另外还有诸如积极干涉论、不干涉保全论、仲裁讲和论、不干涉静观论以及南北分立论等等，各执其是，无法统一〔7〕。“北袁南孙”这一提法，已经揭示了当时日本人对孙中山、袁世凯认识的种种不同。

以下，简单分两个类型考察一下日本舆论对辛亥革命的具体反应。

一、不干涉保全论

武昌起义后的10月17日，法学博士有贺长雄和文学博士三宅

雄二郎在《外交时报》上分别发表了《我官民对华中动乱之态度》和《支那动乱与日本的态度》的社论、评论，主张不干涉保全论。他们认为，对于“此次清国中部发生的革命动乱”，我官民之态度“首先应表明者，乃我政府及各第三国政府应采取之不干涉义务也”〔8〕。因为第一，“若坐失千载难逢之良机诚为千秋之恨，而盲然轻举助实力薄弱之清廷，则更遗邦家百年之悔”〔9〕；第二，“我王政维新之际，欧美各国亦执不干涉之义务，未敢援助德川幕府，故我国民应对此原则深致谢意矣”〔10〕。两个人的论证方法均以明治维新时欧美的反应为例，强调不干涉之重要和国际法原则，上述两篇文章均出笼于武昌起义爆发一周前后，是较早的具有代表性的不干涉论。

11月6日，《东京朝日新闻》也在题为《日清关系》的社论中主张：“清国之治乱，与我国国运消长关系极大”，“故对清国之方针应始终一贯持不干涉内政，外面向列强诸国而取保全主义（之方针）”〔11〕。

12月初，政治学者浮田和民在《太阳》杂志发表《青年支那党之命运如何》的论评，认为从立宪主义者的立场出发，日本也应致力于健全立宪政治，一扫支那干涉论，坚持不干涉论的原则〔12〕。在另一篇论文《东洋第一个共和国》中，他主张国体的是非“应依各国民之历史习惯”决定，关键在于确立“限制政府权力，保护人民之自由”的立宪代议制，所以强调不要干涉辛亥革命。

力主不干涉论者，主要基于下述一个基本判断，即“支那的前途对发展我国商业关系重大，此间贸然干涉其政体，必招致支那大多数人民即汉人之反感，使彼等成为日本永久之敌”（尾崎行雄语）〔13〕。这应当说是不干涉论的最重要论说根据。所谓不干涉论，说穿了，完全是着眼于占领中国市场，立足于未来对华经济扩张的慎重论。后面我们将要看到，当时日本经济界、财界的绝大多数，都是出于这个考虑，最终企图是在中国获取利权。

二、积极干涉论

另一方面，日本也有人积极主张对中国革命进行干涉，但这类人在表面进行活动的数量却有限〔14〕。主张干涉论的最主要报纸是《国民新闻》、《报知新闻》，德富苏峰是其主要鼓吹者。《报知新闻》在11月11日、14日曾两次刊出专文宣传干涉论，认为“清国之祸乱与我国荣枯盛衰关系极大”，“为将清国祸乱抑止于最小限度，杜绝彼我各国之危机”，日本应当实行干涉等等〔15〕。

干涉论者的论据主要有三点：一是维护天皇制的观点，即出自于“清国新设之共和政体，与我帝国国是之皇室中心主义果真不会冲突？”的疑虑；二是帝国主义的观点，如1911年10月27日《大阪朝日新闻》所表明的，认为日本在此之际，若对他国叛乱示以同情，则必定对新附（指日本吞并朝鲜）之鲜民带来诸多恶劣影响。他们担心辛亥革命对朝鲜、台湾的影响，出现多米诺效应。三是与日本国内政治的关系，即元老、军部都企图乘中国革命之机进行军备扩张，增设两个师团。而只有积极干涉，才能给他们制造借口。

综上所述，日本各界出于各自不同的立场，对于辛亥革命的反响，多种多样。这些差异对于其后的中国形势尤其是对于日本的对华政策，产生了较大的影响。

第二节 日本的对华政策

日本与英国是同盟国〔16〕。一般而言，同盟国之间，在处理类似对华政策这样重大的问题时，应该互通情报，尽可能保持一致。然而，两国对于辛亥革命的态度，从初期阶段开始，就极为不同。后来，无论是在对君主制的认识、对袁世凯的评价，还

是对革命军的政策等基本问题上，意见仍时有差异。英国认为不管中国采取什么政体，袁世凯的领导都是绝对必要的，所以始终采取了支持袁世凯的“中立”政策。日本则在清政府与革命党人之间玩弄权术，牵制英国，力争对华外交上的发言权，以谋巩固与扩张日本在华特权利益。与此同时日本一部份势力与俄国幕后密谋瓜分中国的东北与内外蒙古地区〔17〕；总之，此时日本的对华政策，无论从国际关系或国内关系看，它都一直在协调与自主之间摆动，表现出政策的两面性。

一、对清朝政府的军火援助

武昌起义一星期后的10月16日，内田康哉取代林董就任外务大臣。内田上任伊始，立即指示驻华公使伊集院彦吉：“帝国政府了解清国政府为讨伐革命军迫切需要枪炮弹药事，已决定由本邦商人提供上述物资，予以充分的援助，并已采取了各项必要措施。提供如此之援助，帝国政府也深感责任之重大……”〔18〕。既然向清政府提供武器，日本方面也必须要求清政府改善迄今的对日关系，承认日本在满洲和中国本土的权益。在这种背景下，日本与清政府签订了第一次军火交易契约〔19〕。

必须指出的是，日本对清政府进行军事援助的方针，是与对当时中国时局的判断相关连的。其目的无外乎是通过军援，加强日本对清朝政府的发言权和影响力。但另一方面，后来日本的行动屡屡受到列强各国特别是英国政策的约束，又不得不进行经常性的调整。内田外相这封电报的背后，就隐含着日本在与列强进行协调的同时，欲展开自主政策的意图。

上述对清政府的军火援助以及下面将要提到的财政援助，反映了日本在对华政策上想努力达到予期目标的积极态度，它与以英国为首的列强所采取的慎重的“中立”态度，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二、财政援助

10月18日和19日面临财政上极度困难的清政府，曾两次向四国银行团提出了借款二百万两的要求。对此，英国格林外交大臣听从了驻华公使朱尔典的意见，决定暂取静观方针。其他法、德、美三国也大体赞成英国的意见，认为“现阶段对清国进行借款等财政援助为时尚早。”〔20〕

在同四国银行团交涉的同时，清政府几次向日本提出财政援助的要求。仅10月下旬日本就收到了邮传部盛宣怀经汉冶萍公司提出的六百万两、以湖南铁路为抵押的二百万两和东三省赵尔巽提出的五百万两的三项借款要求〔21〕。10月24日，伊集院公使向内田外相请求，对邮传部盛宣怀的借款，尽可能予以善意的考虑。26日，驻伦敦的代理公使山座圆次郎与英国方面商议了对清政府的财政援助问题。格林的答复是：“英国不准备在财政上援助清政府，法、德、美三国也不会积极”〔22〕。

英国等列强的消极态度，牵制了对清政府借款要求反应积极的日本。再加上同月26日盛宣怀受资政院弹劾已被迫辞职的消息传来，日本不得不中断对盛氏的借款。

但是，此后中国形势突变。官、革双方为了取得优势，分别通过民间各种渠道，向日本提出了巨额财政援助的要求。日本决策机构的上层人士，由于没有完全掌握日本国内各利益集团对华交涉中的具体内容，所以在作出最后决定时的态度极其慎重、暧昧。12月末，民间人士同情、支持革命军的倾向日趋明显，他们在军事、财政、道义上对于革命军的公开支援，形成一股巨大的压力，迫使日本政府不得不调整对华政策。日本对华政策之所以能在1月上旬开始发生了较大的转变，应当说与上述国内政治局势的变化不无关系。

1月以后，日本对华活动主要以民间浪人、财界等对革命军方

面的财政援助为主。后面我们将要叙述的中央银行设立构想的形成过程，就是一个具体的案例。然而，在当时，如没有列强诸国的首肯，就不会有日本独自的对华政策，这也是当时的国际环境所决定的一个特点。

三、关于出兵问题的交涉

有些学者认为，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表现在日本“一方面追随英国，以图在中国本土发展经济权益，另一方面又努力获得俄国的理解和支持，以图解决满蒙问题”〔23〕。但实际上日本对华政策与英国间的关系还没有达到许多研究者所说的“追随”，充其量只是“协调”名义下的相互影响、相互牵制而已。在这个问题上有必要指出的是，英国一贯坚持援助袁世凯的政策，主要来源于英国外交官们对中国的认识、理解，而日本由于国内政治状况复杂多变，对华交涉的窗口、对象时而是军部、时而是大陆浪人，时而是财界，呈现出一种不规律的多元外交的情形。从结果上看，应该承认，顺应中国“大势”的英国外交取得了主动权，而始终固执君主制的日本外交以失败告终。那末，日英外交差异在何处呢？日本的对华政策的具体内容是什么呢？下面，让我们看一下日本企图出兵干涉的始末。

10月13日，在内阁会议上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向与会者提出了一份要求出兵干涉中国革命的意见书。伊集院驻华公使在此前后，也屡屡向日本政府要求派遣军舰、军队〔24〕，陆军省方面甚至都制订好了完整的出兵计划。陆军省军务局长的特使田村大尉曾持有一份《关于对清国用兵之事》（1911年10月13日）的文件，其中指出：

“未来武昌附近之暴动，将频繁发生。清国统治之动摇，已造成列国干涉之良机。兵力之使用已属迫不得已。当此之际，我国自政略、国情、地理、交通以及其他关系上而

言，都必须如北清事变（指义和团运动）时那样，须独立于列国间主宰之地位也”〔25〕。

这个计划，在具体作战部署上还设想：“关键一点乃在于在战略上予敌首脑部以一大打击之同时，要占领在战后可作担保用之政略上、经济上最有利之要地”，反之，“我国虽为主宰，亦徒然陷于困境，使列强居其间，徒反获渔人之利”。日本和列强间围绕着中国动乱的竞争，实际上就是以实力来抢夺中国利权的斗争，这份计划的制订者确实清楚地认识到了这一点。

与此同时，美国驻日公使夏衣拉也在关注、警惕着日本的动向。10月15日，他曾说：“日本正在期待着清朝提出镇压革命的请求，如果列强劝告日本援助清朝的话，日本早就采取迅速而有效的行动了。而且，假如满洲也发生了叛乱，日本不等列国的谅解，立刻就会出兵的”。〔26〕后来，夏衣拉面见了日本外务次官石井，劝告日本在没有跟美国商议之前不要冒然行动，进而牵制了日本的出兵。

英国也在观察着日本的动静。11月初，它公开宣布拒绝日本出兵加强京奉线守备的要求。11月5日，朱尔典公使向伊集院等各国公使提议为了确保北京和上海间的交通，各国军队共同警戒北京——天津——山海关之间的京奉铁路〔27〕。对此，日本方面强烈主张山海关以北至奉天间的京奉线应由日本单独守备。英国则以日本如果占领关外线，俄国在北满洲难免也会采取同一行动为理由，对日本的要求表示为难。后来，总算原则上对日军担任山海关以北京奉线守备事不持异议〔28〕。这场日本和英国围绕中国问题上的冲突，最后以满足日本的要求而告解决。

四、对华政策上的意见对立

日本政府和国内各政治集团，无一不试图乘中国动乱之机，强化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权益，进而向中国本土扩张势力。但是，

由于国内外的种种原因及其本身的软弱，日本对辛亥革命的对策既贪婪无厌、极富有侵略野心，又始终瞻前顾后，缺少一贯方针。结果是，不仅他们的预定计划几乎全部半途而废，同时，由于他们对华野心暴露无遗，又失信于中国各政治集团，遭到各方的谴责。

1911年8月30日，桂太郎内阁总辞职，第二届西园寺内阁诞生。当时的驻美大使内田康哉被调回任外务大臣，前海军大臣斋藤留任，其他的阁僚是：内务大臣原敬，大藏大臣山本达雄，陆军大臣石本新六、司法大臣松田正久、文部大臣长谷场纯孝，农商大臣牧野伸显、递信大臣林董等。内田康哉被誉为“外交界的俊杰”。当时的舆论一致认为，任命内田担任外相，完全是为了应付紧迫的外交局面，尤其要应付9月开始的中国的四川暴动（指四川保路运动）〔29〕。10月22日，《东西南北杂志》称新外相内田康哉：

“尤以新外相内田康哉，夙被视为外交界之秀杰，曾被陆奥属意为佳婿。此次被西园寺作为新内阁之明星迎回，其外交手腕当可大显丰彩。据云彼昔为外务（省）一僚属时，即研究清国问题，有人曾质问陆奥，对将来日益多事之清国，可有发挥（外交）巨腕之人物，陆奥则答以唯有内田康哉而已矣。今番康哉新任匆匆，即逢试其锋刃之大问题，此不仅关系彼可否胜任大臣之问题，亦鉴定其果为担此事业之才乎？或不过一徒有虚名（橡皮娃娃）之试金石也”〔30〕。

10月14日，内田由美启程途中，在船上得知中国革命的消息。抵达东京后，他立刻赶到外务省，听取石井次官关于此次清国革命的汇报，接着又抵首相私宅访问了西园寺公望。同一天，内田打电报给驻华公使，第一次表明了日本政府对辛亥革命的态度。这个电报是由与石本陆相、山县有朋及西园寺首相商议后拟定的，十分清楚地反映了陆军的意向〔31〕。它表明日本政府虽然在表面上采取中立的对华政策，但实际上准备援助清朝政府。

列强各国在汉口一共拥有五个租界和十一个领事馆。武昌起

义爆发后，革命军为了避免列强的干涉，在12日就向各国领事通告了有七条内容的对外宣言。13日，又以黎元洪的名义将革命军的对外方针传达给日本驻汉口总领事松村。其内容是：“1.列强在此之前与清国订立的所有条约继续有效，保护各国权益及外国人的在华财产；2.视援助清朝政府，妨碍革命军者为敌人；3.应当承认革命军为交战团体”〔32〕。就在同一天，清政府陆军部也秘密通过日本公使馆武官青木宣纯，向日本政府提出了希望得到讨伐革命军用的武器、弹药的请求〔33〕。10月16日内田打电报给伊集院，答应了清政府的要求。这就是说，为了保卫在满洲的日本权益，获得清政府的信任，实现所谓“日清提携”。日本决定冒重大风险来提供武器。10月24日的内阁会议，基本按照内田意见，通过了日本政府对华外交的根本方针，只是由于它强调了“静观”时局，表面上给人一种“中立”的感觉。

日本政府由最初的决意积极干涉态度转向消极态度、慎重态度的原因，大概有以下几点。首先是内相原敬的反对。原敬主张：“因参谋本部有向贼（革命军）军出售武器，暗中予以帮助之倾向，余言及此事时，西园寺、内田却说十分为难。余以为，过于正直而纠缠于义理，无论对北京政府或革命军，伤害其感情，皆对外交不利……”〔34〕。原敬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政友会的干部，曾任天津领事。第一次西园寺内阁内务大臣任中，他曾去中国、朝鲜旅行了一个月。在此期间，他对中国数年间所发生的变化十分震惊，所以武昌起义后他凭直感对西园寺、内田采取的同情北京政府的立场持有怀疑。他认为：“参谋本部之考虑固不得以而求其次的作法，但余认为此事须予以慎重之考虑。”“今日之形势，无论叛军或官军，情况如何皆属不明，外交上的一边倾倒向，毕竟对我国不利”。另外，他在24日的日记中也写道：“前回之内阁会议情况是：有不予叛军、表以同情，仅对正当政府之北京政府予以同情之气氛；本日内阁会议，已呈认定

上述“正直一边倒”难称上策之举的倾向”。事态的发展，使原敬的态度逐渐接近革命党方面，他认为，在南方派的势力已扩大到今天这样一个阶段，内田外相提出的借款给北京政府或采用立宪君主制的劝告，皆不可取〔35〕。由于内阁中内务大臣原敬的认识开始认同革命党的变化，使日本对华政策中的意见对立日趋尖锐。

另一方面，在陆军内部陆军省和参谋本部的意见也不统一。山县和寺内期待着以立宪君主制来结束革命动乱，因此认为必须积极支援清朝，批判内阁的措施不得当〔36〕。赞同山县意见的陆军省，10月14日由军事课课长宇垣一成起草了一份《关于清国暴动》的照会案（由陆军次官冈市之进致参谋总长）〔37〕。这些对策，都属积极的干涉论，此类对策中，坚持必要时出兵干涉。

而参谋本部的意见则与以山县为中心的陆军省有所不同。其具体内容，则如10月15日参谋本部的宇都宫太郎在《对支那私见》中所概括的，是将中国的南北分为两个国家的计划。在宇都宫看来，当时的日本不可能统治整个中国，但又必须阻止列强各国瓜分中国的企图。反对列强侵略、保全中国的方法，就是把中国分成南北两部分，建立保护国和同盟国〔38〕。所以宇都宫认为，山县和内阁的对华政策没有现实性，日本只能一方面向清朝政府提供武器另一方面也秘密地援助革命军。

如上所述，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内部意见的分歧，主要是对辛亥革命爆发后中国国内形势究竟会向何处发展的认识不同，因而产生对策的分歧。

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处于连绵不绝的社会动乱中，政治局势时起彼伏，极不稳定。为此，日本当局极力想把宝押在最终能统治中国的某一特定的政治集团上的想法，不足为奇。可悲的是，日本政府唯谋取在华特权利益是图，常常举棋不定，而在最后抉

择时，误选病马，步入泥潭。

第三节 财界的“时局对策”

一、辛亥革命初期日本财界对中国时局的认识

关于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财界的研究，至今没能得到应有的重视。尽管，也有人研究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日本财界利用这一时机试图攫取利权的活动，但从武昌起义到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间日本财界对中国时局的认识及其对策的研究仍是个空白。本节拟就财界对辛亥革命认识的变化，作一些探讨。

财界的时局认识，一般通过舆论界反映到社会。当时最主要的经济方面报刊有《东京经济杂志》、《经济时报》、《东洋经济新报》等，另外《银行通行录》、《海外事情》、《新日本》、《太阳》、《日本及日本人》等也常刊载经济方面论文。为论述的方便起见，我们以《东洋经济新报》为线索试作浅析。

武昌起义两周之后，1911年10月25日《东洋经济新报》曾同时发表了两篇社论，即(A)：《清国革命与日本的态度》；(B)：《清国骚乱的经济影响如何》，同时还附录了题为《革命动乱与支那贸易》的统计资料。(A)文的论说重点在政治方面，首先谈革命的性质是：“（即便依据目前到手的情报，也可以得知此次骚乱）决不同于普通暴徒横行之骚乱，而乃大有根蒂之国民运动；”而引起这场骚乱，主要有历史上、政治上、财政上、军事上四大原因，即：一、“政治上排除满洲人，将主权掌握于汉人手中之希望”，长期以来绵延不断的存在，是孕育了革命的第一重要因素；二、近十年来“政治上……激烈之变动”是“助成革命之第二原因”；三、“今日清国与政治觉醒相并行之经济财政上”的改革，是“诱发革命之第三原因”；四、“解散满洲八旗”、编练新军等军事上之变化，给清朝势力以大打击，亦给革命运动以

最大支援，乃孕育革命之第四原因”。文章最后的结论是：对此事件，“他国之干涉皆将破坏其善良之结果，此不可不谨记也”，所以“于东亚舞台拥有最大势力”的日本应当采取的态度是：“唯有彻底坚守中立态度而已。”

(B)文则从经济角度精辟透彻地阐述了对辛亥革命的认识。值得注意的是，它与12月以后日本财界人士相继所作的发言有许多共同之处。文章认为，从经济的方面来看中国的“动乱”，最值得忧虑的是“置全国于无秩序状况”的“骚乱”的长期化。义和团事变时，“我国棉纱之输出锐减。与当时相比，而今对华输出已增长十倍、数十倍，增大后的日中经济关系所受到的打击，“必定非常之惨重也。”这种忧虑，代表了财界大多数人的想法。这个时期内，各大报刊都增设了《清国骚乱及其影响》之类专栏专页，并附加了《对华贸易之地位》等资料栏目。在这种情况下，财界内部对时局发展前途的关切情绪与日俱增。认为“革命军军容愈愈振兴，被列国承认为交战团体，维持与现政府相对立之秩序、得以进行堂堂之战。”“战争对物资消耗力之大无与伦比，换言之即战争对增加物资需求、刺激财界（之作用）无与伦比”，“此状况下，立于最有利之地位者，除地理接壤之我国外再无他人”。

这篇社论没有拘泥于政治问题，以及干涉与不干涉的问题，只是毫无掩饰地道出了日本财界企图获渔翁之利的用意。期望在经济上有密切关系的邻国的动乱长期化，以便从中牟利，正反映了日俄战争之后财界向外扩张的本质要求。最后，这篇社论颇有见地地指出：“总之，受此次革命动乱经济影响（无论利与弊）最大者，实为我日本也”。

在上述的对华认识影响之下，当时财界的认识，大概分为主张原则上严守中立态度，和主张通过扩大战争获取更大利益两种意见。

二、混沌的对应

事实上，财界的对华认识，并不统一。由于日本政府及陆军内部意见分歧，多少影响到财界内部的意见对立，并一直持续到12月下旬。

首先，一部分财界人士眼见中国的战火越烧越旺，担心长久下去，将会影响日本的对华贸易。11月下旬，各报刊就陆续地出现了这方面的文章，如《清国动乱与财界》（1911年11月26日）中说：“清国动乱发生已四十余日，该国财界混乱自不待言，列国亦蒙受极大之影响，而我国贸易上所受之打击，实已波及财界各方面，动乱一日不息，（我国）所受之损害亦将一日不止”。

“我国对清贸易，近年有显著发展，年输出不下八、九千万元，输入亦达六、七千万元之多，约达我贸易总额二成”，考虑到这些因素，就必须承认“笼罩我财政前途之暗云，不仅是对清贸易所受之打击，亦将使我国财政之状态日益陷于不安”之境地〔39〕。

同时，也有人以义和团事件为例，预测日本对华贸易的前景。法学博士田中穗积在《清国事变与对清贸易》的社论中警告说：“……明治三十三年清国义和团事变之爆发，于对华贸易之打击可谓其甚，……虽仅历时不过五个月，而事变前一年之贸易额46100万两，事变当年骤减为37000万两，只及前年64%。翌明治35年虽又渐增至43700万两，亦未能恢复事变前之旧态”。所以“清国此番事变，……我国贸易上恐不免减少约二、三千万两，故对时局之发展，决不可掉以轻心”〔40〕。此外，动乱也会从根本上破坏清国的经济，列强若决定出兵，“则其前途更茫然无定”〔41〕，对时局持不安、悲观态度。

但是，这些不安和悲观论持续时间并不长，随着中国革命形势的发展，乐观论派逐占上峰。12月末到1月初，整个财界态度突然变化，一致认为：“自我国立场而观，一祸乱之平定正乃促

进对清贸易及企业发展之（动力），故企业者须认清并准备捕捉此之‘转祸为福’之良机，并大张旗鼓地宣扬中国革命是日本经济向外发展的‘天赐良机’。〔42〕因此，这时日本财界对中国时局，提出了各种不同的政策主张。

三、对华政策的种种主张

（一）“天赐良机”论

1月1日，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是促使日本财界对华认识转变的主要原因。1912年1月5日《东洋经济新报》登载了一篇题为《支那革命于日本经济之长远利益》的社论。社论强调：“……若论对将来长久之影响，支那革命对支那本身固不待言，对其邻国日本，亦决非可悲观之举，实乃大可乐观之事”。

第一，出现了强有力的新政府，“此次革命之最终结果，乃建立较之以往更有力、更强大之新政府；”新政府实行各种改革后，“假如支那之贸易额至少与我日本达到同一水平，年输出、入总计亦有80亿元之多，就支那前途而观之，此决非空想也；倘若如愿，邻国日本所蒙之利益，实难以估量也。”第二，“伴随政治之革命，必生社会之革命。”第三，“与政治、社会之革命相平行者，乃产业之革命。欲实现产业革命，需要资本，文明知识技术，各种材料。”而这些材料的提供者除日本则无他人，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支那革命于支那及日本经济上之远大利益，如此之巨大”〔43〕。

日本财界对中国形势的判断，更多地侧重经济问题，少有人热衷于政治话题。有人拥护君主立宪制，有人赞成共和政体。涩泽荣一曾说：“这次变乱结果，清国即便建立共和政体，对我中国亦无影响”；大仓喜八郎也说：“……须阐明清国政治将来应如何变迁？如何改革才有益于东洋和平？……”〔44〕。这些认识，与山县有朋、寺内正毅担心“清国革命共与和政府之成立，

或可影响日本统治体制”〔45〕的态度截然相反。因为他们预见到“此变乱一旦平定，一般中国市场之需求必有显著增加”。〔46〕

1月1日，日本财界头面人物几乎倾巢出动，在《中外商业新报》上发表文章，称：“当今之中国，对日本财界来说，亦是千载难逢之良机。”这些财界巨头从不同角度看好中国经济市场。涩泽荣一：《大商战之到来》，益田孝：《支那——世界之市场》，安田善次郎：《千载难逢的良机》，早川千吉郎：《支那财界的觉醒》，大仓喜八郎：《支那发展的起点》，添田寿一：《对清商战的准备》等等。从这些标题即可看出，日本财界对于中国前途的不安情绪，早已不知踪影，反而产生一种强烈的期待，正是这种期待直接转化为日后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扩张的动力。

（二）对中国市场的期待

日本财界人士，普遍认识到中国经济的潜在资源和能力。他们“相信支那此番革命，乃我国经济上最可欣幸之事”。

劝业银行总裁吉村源太郎的认识则为“我国土地狭小，天惠不厚，故资源也决不可谓富饶”，“依我国之国情，则不可不以商工立国为根本方针。即我国只能从输入原料，制成产品并将其输出，来求经济之繁荣。对象则不可不放于东洋，以中支那为首要之市场”这意味着，邻居拥有四亿人口巨大市场的日本要想，“求发展，除制造输出外，别无良策”〔47〕。吉川还认为：“吾辈观此市场，相信支那此番革命，乃我国经济上最可欣幸之事，望我国人充分利用此时机，以无后憾”〔48〕。涩泽荣一也向日本财界呼吁说：“吾辈企业者切勿掉以轻心，值此之际，应充分意识即将在清国市场展开之世界性商战以不误将来之大计”〔49〕。

那末，及时抓住这一“千载难逢的良机”，向中国扩张经济势力，应当如何动作呢？财界的具体考虑，细分为下述两方面内容：

1. 金融机关的完善

要恢复动乱之后的中国经济，最重要的课题就是完善金融机关。关于这一点，1月24日的《大阪财界》指出：“清国之货币制度混乱之极，钱庄既倒，金融机关仅剩外国银行。可促使贸易扩张者，唯有金融机关而已”，强调创立金融机关，是眼下当务之急〔50〕。安田善次郎在《千载难逢之良机，奋勇前进！》的文章中也提出：“其他如有相当身份、地位之人等建立辛迪加，以为清国经济机关之中枢，则我两国国民因之亦可获巨万之富”〔51〕这些议论，与当时以涩泽荣一、阪谷芳郎等人正在筹划中的中央银行设立计划的想法不谋而合。

2. 设立日中合资企业

促进中国经济发展的另一个重要问题，是发展扩大中日合资合营以日中联合经营的方式，创立和开拓中日合作的新天地。辛亥革命时期建立的中日兴业公司就是其产物。关于兴业公司的建立过程，待后章详述，这里简要介绍一下政友会的中日合办公司的计划。

1912年1月18日，政友会政府调查员野口卯太郎、井上角五郎、改野耕三等三人，向政友会提出了一个议案：“日清两国经济有密切之关系，对我国而言，尤为重要者，即设立一公司作为两国经济贸易之机关，政府给予相当之保护，以期达其目的。有关公司组织方法及保护程度等，望调查会速作调查”。〔52〕这个议案，后来似乎一直没有见诸于行动，但涩泽荣一等人计划创办的中日兴业公司，倒是大体上继承了这个设想。进入1月以后，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陷入了迷惘状态，可是财界的态度却极为明朗，开展了积极的民间对华外交，以至日本外务省担心财界的积极活动将会引起中国方面的误解，断然取消了计划1月份赴中国的日本财界慰问团。事实上，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财界的对华外交活动，相当积极。

【注释】

〔1〕 曾村保信：《近代史研究——日本和中国》，小峰书店，1977年，第136页。

〔2〕 该资料目录，可参照野泽丰《辛亥革命与大正政变》的附录。

〔3〕 铃木正节：《博文馆〈太阳〉研究》，亚洲经济研究所，1979年，第26—27页。

〔4〕 同注〔1〕，参见第135页。

〔5〕 吉川尚：《我国对辛亥革命的舆论》，《中国文学》第77号，1941年10月。

〔6〕 野泽丰：《辛亥革命与大正政变》第56页，有精堂，1977年。野泽指出，当时存在过的“大正维新在某种意义上实乃第二次支那革命”（见稻垣伸太郎《支那革命与我国阁僚政治》，载《日本及日本人》，大正2年1月15日号）的观点似乎不久就消失了；其原因有二，一是尽管两者同样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但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二是由于蔑视中国气氛的蔓延，再少有人从比较的角度考察这两个事件。

〔7〕 池田诚：《内藤湖南的辛亥革命观》，《立命馆法学》第285页，1961年。

〔8〕 有贺长雄：《我官民对华中动乱之态度》《外交时报》，第168号，1911年10月17日，社论。

〔9〕 三宅雄二郎：《支那动乱与日本之态度》《外交时报》，第168号，社论。

〔10〕 同注〔8〕。

〔11〕 同注〔8〕，第54页。

〔12〕 浮田和民：《支那青年党之命运如何》，《太阳》，第17卷，第16号，1911年12月1日。浮田认为：此次武汉所兴起之支那革命党，非历来为宗教迷信所驱使之狂奔者，亦与长发贼、义和团大异其趣，故只能命其名曰青年支那党也。”

〔13〕 尾崎行雄：《清国政体非干涉论》，见《雄辩》，第97页。东亚同文书院长根津一当时也持同样意见。他在《太阳》12月号上发表谈话，认为：“官、革两军尚未进行大决战，我国如加干涉，对支那、对我国都

毫无利益，只会带来害处。”

〔14〕 参见曾村保信：《辛亥革命与日本的舆论》，《近代史研究—日本和中国》。曾村的论文概述了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舆论支持革命党的情况，野泽丰的论文《辛亥革命与大正政变》则主要介绍了与此相关的鼓吹干涉论的《报知新闻》及其背景。

〔15〕 同注〔6〕，第54页。

〔16〕 1902年日英两国缔结《日英同盟条约》，条约的基本点在于维护英国在中国及日本在中国及朝鲜的利益，两国相互援助。1905年重新续订，1911年7月又经改订，1922年宣告废除。

〔17〕 日俄战争后，日俄两国针对中国曾四次签订协约和密约。第一次1907年签订，内容规定互相承认日本对朝鲜、俄国对外蒙古各有其特殊利益，并在南北满洲划定各自的势力范围。第二次在1910年签订。第三次在1912年签订，为了准备辛亥革命时期列强瓜分中国时，两国为维护各自在华的殖民利益，双方在内蒙古划分各自的利益范围。第四次1916年签订。

〔18〕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别册《清国事变》，第207文书，内田外务大臣致驻清国伊集院公使电。

〔19〕 大畑笃四郎：《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对应》第60页，1982年。

〔20〕 英外交部登记编号F0—405M205，NB8—141；转引自井胜美：《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反应》，第43页。

〔21〕 同注〔18〕，217文书。

〔22〕 同注〔20〕。

〔23〕 彭泽周：《辛亥革命》，见《中国现代史论集书》第六册，1982年。

〔24〕 臼井胜美：《日本与中国——大正时代》，第2页，原书房，1972年。

〔25〕 栗原健：《对满蒙政策史之剖面——日俄战后到大正时期》，原书房，1966年，第289页。

〔26〕 同注〔24〕，见《美国对外关系文件》1912年，第50页。

〔27〕 同注〔20〕，第37页。

〔28〕 同注〔18〕，第139文书。

〔29〕 内田康哉传记编辑委员会：《内田康哉》第153页，鹿岛和平

研究所，1969年。

〔30〕 《唯有康哉》，见《东西南北》杂志，1911年10月22日。

〔31〕 《日本外交文书》明治44年10月16日发《关于清国革命动乱之际帝国对清政策件及其他》。另见注〔29〕，第155页。

〔32〕 参照《中华民国史》，第275页。

〔33〕 经青木与泰平商会联系，结果是清政府通过这个商会得到了日本政府秘密供应的武器。见山本四郎，《辛亥革命与日本的动向》，见《史林》，491号，1966年。泰平商会由三井物产、大仓商会、高田商会组成，而高田商会是佐渡士族高田慎藏经营的陆军物资贸易公司。见高桥帚庵：《帚之迹》，下卷，第206—209页。

〔34〕 《原敬日记》，第373页。

〔35〕 同上，第374—376页；参见增田毅：《原敬的中国观》，《神户法学杂志》，第18卷第3、4号合刊，1969年3月。

〔36〕 德富苏峰，《公爵山县有朋传》，下卷，779页，原书房，1969年。参见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第92页，东京大学出版会，1978年。

〔37〕 防卫厅战史室藏：《清国革命关系》。

〔38〕 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第94页。

〔39〕 《清国动乱与财界》、《财界前途的不安》，见《东京经济杂志》，第1618号。

〔40〕 田中穗积：《清国事变与对清贸易》，第16—20页。对此，矢野龙溪在《支那改革及对日本之影响》一文中说：“支那此次变乱，其对我事业界、产业界未来所产生之最终影响，未必令人寒心。”

〔41〕 《清国动乱与财界》。三井物产公司理事坂田义一在《清国动乱与对清贸易》文章中，也重申了同一观点。

〔42〕 近藤廉平：《余之对清意见》（下），见《中外商业新报》，1912年1月8日。

〔43〕 《支那革命于日本经济之远大利益》，见《东洋经济新报》583号，1912年1月5日社论。

〔44〕 涩泽荣一：《大商战之到来，战场——支那》，大仓喜八郎，

《支那发展的起点，走向和平》，见《中外商业新报》，1912年1月1日。

[45] 北冈伸一：《日本陆军与大陆政策》，第92页。

[46] 《中外商业新报》，1911年1月1日涩泽荣一文。另《东洋经济新报》585号说：“革命后之支那，经济上当起一大革新，乃无疑矣”。

[47] 吉村源太郎：《革命后之支那与我国之经济政策》，见《东洋经济新报》，第585号，第140页，1912年1月25日。

[48] 同注[47]，141页。

[49] 同注[47]，140页。

[50] 《中外商业新报》，1912年1月1日，涩泽荣一文。《中外商业新报》，12页，题为《日清经济机关》的社论说：“贸易业者为前途着想，已定种种新计划，表示其势力之一端，诚可欣喜者，但万事欲立，先有资金，无金融机关之后援，恐亦危殆。”

[51] 《中外商业新报》，1912年1月1日，安田善次郎文。

[52] 野泽丰：《民国初期政治进程与日本对华投资——以中国实业公司创立为中心》，见《东京教育大文学部纪要 史学研究》，1958年。
《中外商业新报》，1912年1月18日。

第七章

中央银行设立案的成立过程

第一节 背景

1911年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会议选举孙中山为中华民国政府临时大总统。1912年1月1日，中华民国诞生，孙中山就任南京临时革命政府大总统。南京临时革命政府的成立，震撼了列强，被视为眼中钉、肉中刺，急欲拔出而快之。所以自它诞生时起，中外反动派对它的攻击、破坏就一天也没有停止过。帝国主义列强在政治上对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敌视的态度，在财政上也实行了封锁和扼杀的政策，企图置新生政权于死地〔1〕。

一、张謇的《对于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

武昌起义以来，如何筹集武器、弹药及军费一直是革命党面临的重大问题。随着形势的发展，财政问题日益成为革命政府不能不设法解决的紧迫课题。11月10日，张謇在《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中，描述了革命成功后，新政府必然面对的财政形势，预测了重大困难的来临，指出：政府权力，首在统一军队，次在支配财政。而军队之能否统一，尤视财政之强弱为断。今且置军队而专论财政，财政岁出大宗：曰赔款，曰海陆军费，曰行政费。……如是估计，中央政府每年支出，以极少之数核计，须有一万二千万两。……一万二千万两之支出，按月应有一千万两之大款。今临时政府能否得此项巨款，此诚一大问题也。……下走虽不能担任

财政，但有两个问题可资研究。故请诸士采择：

1. 各省代表均集南京，将请以上约计数目及每年所短八千万两，宣告各代表，询问自明年起，每省能担任若干万两，务必确实答复。政府初成立，各省财政，万难统一。只能作两概办法，除该省行政及军队费用外，能以若干供给中央？此不可不预计者也。

2. 孙中山先生久在外洋，信用素著，又为理财专家，能否于新政府成立后，担任募债务一万万两，或至少五千万两。

归纳一下张謇提出的解决财政问题的方案，一是地方对中央的配合，二是依靠外国援助。其中包括，依靠孙中山先生在海外的影响与威望，争取海外财政援助，挽救革命政府财政危机的办法。他认为：“以上两问题，如何立时解决，则无论何人，均可担任临时政府财政之职，不必下走。如其不然，下走无点金术，虽牺牲之而无裨毫末。”〔2〕

当时，关税仍然掌握在帝国主义列强手中，革命政权无法得到分文，各地的税收被各省截留，无法送达中央，财政收入完全没有着落。实际上，早在张謇提出意见书之前，孙中山就一直强调为了建设革命政权，必须解决财政问题，并为之四处奔走。

1911年7月，孙中山在旧金山设立了洪门筹餉局，开展募捐活动。8月10日，他又对后来担任了临时革命政府军事顾问的荷马李说：近日我收到大量来函，催促我尽快东返从速发动起义。当前未办之唯一急务仍在设法为起义筹集必要的资金。……望你从速往访你的英国友人，以便取得为开展我们的工作所需的经费。9月25日，孙中山再次写信给荷马李：至于如何及何时何地可筹得必要的资金，我确难以作出判断。我仅希望越快越好。结束纽约之行后，我将赴欧洲一行，看在英国、法国能否有所作为〔3〕。可以看出，革命爆发以前，孙中山就一直在为筹集革命所需经费而愁思苦想。10月12日，孙中山在美国丹佛得知武昌起

义的消息，立即打电报给在伦敦的荷马李说：黎元(洪)的宣言是难以解释的，突然成功可能助长其野心，但他缺乏将才，无法持久。各地组织情况甚好，都希望我加以领导。如得财力支持，我绝对能控制局势。在我们到达之前，不可能组成强有力的政府，因此贷款是必需的〔4〕。当时，孙中山认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关键决定于英国政府对革命的态度。孙从纽约赶赴英国，试图与英银行团接触，谈判借款问题〔5〕。按照孙中山当时的看法，列强对于中国革命，美、法持同情态度，德、俄反对，日本是民间同情、政府态度不清，所以革命的成败，与英国的对华政策关系极大。其原因是日本一国不可能单独进行决策，英国如对革命表示同情，日本将不再成为问题。为此，孙中山离开了纽约后，没有直接返回中国，去指导国内的革命斗争，而是绕道英国、法国，为筹集军资先从外交方面致力。在英国，向英国外交部提出借款一百万镑的要求，借款的回报，革命军承认英、美两国在华特殊权益。然而，英国外交大臣格雷和驻华公使朱尔典则一直寄希望于袁世凯，认为：中国不管最后是实行共和制还是立宪君主制，实力派袁世凯举足轻重，因此英国外交必须坚持中立的立场，而拒绝了孙中山的要求。

告别伦敦，孙中山又赴巴黎，进行了积极的借款外交。孙中山同法国金融巨头西蒙的会谈，对了解此时孙中山的对外认识很有帮助。

二、孙中山与西蒙的会谈

11月2日，孙中山由伦敦抵达巴黎，在巴黎展开了紧张的外交活动。据法国外交文献，孙中山在巴黎的三天里，分别会晤了各行各业的头面人物，其中尤以政界、财界人士居多。其中也包括东方汇理银行的总裁西蒙〔6〕。

孙中山与西蒙的会谈（11月23日）大概是秘密进行的，据

西蒙事后提交给外交部的详细概要，会谈有以下一些要点：

“孙中山：阁下能否立即或在最短期间内，贷款予革命临时政府？”

西：不行，至少目前无法立刻照办。四国银行团对此态度完全一致。……”

（关于其理由，西蒙在其报告书中作了解释，即：四国银行团及其政府，就中国的财政，已作了严守中立态度的决定，所以不会对清政府或临时革命政府的任何一方提供援助。）

“孙中山：阁下是否同意谈判一项借款，藉使中国偿还庚子赔款？因为赔款的偿付，除了使我们蒙受兑率的损失外，又令我们回想起一段早想抹掉的屈辱历史。”

西：……但无论如何，关于这一点，我们毫无异意愿给你们以满足。当然，问题在于所提供的借款抵押条件必须完全满意！”〔7〕

孙中山还进一步请求法国政府，希望对同盟国的俄国施加影响，使俄国不与日本联合。反映了孙中山对日俄两国的担心。对四国银行团，孙中山也表示了严重的不安，因为四国银行团的目的，是要在中国扩张侵略利权。

孙中山、西蒙会谈的中心，就是争取外国对革命军的财政援助。孙中山认为，解决革命政权的财政问题，决不能缺少外国的援助，而为了巩固自己在新生革命政府中的地位与领导力量，同样少不了外国支持。在这一点上，张謇与孙中山的认识几乎相同。所以他在《新政府财政之意见书》中把向外国借款的希望，寄托在孙中山身上。然而，事与愿违。尽管孙中山不知疲倦地周旋于英、法上层，募集资金，请求援助，结果还是一无所获，两手空空地返回了祖国。

12月25日，孙中山在举世瞩目中返回上海，当时盛传孙携有巨额经费，一时成为新闻报道的中心话题。12月31日，日本驻上

海总领事有吉在致电外务大臣内田康哉时报告了当时的情况：

“孙文已于本月25日乘汽船狄巴马号抵本地港口，同行者有专程赴香港欢迎之我国国人宫崎、山田纯三郎、池亨吉等多人及荷马李夫妇，住所定于向来所居之法租界阿培纽波鲁布鲁娜408号，朝夕接待大量内外客人来访，门庭若市。据传孙氏携回许多活动经费，但其数额并不会太大，（一说为五千万元。）尚属可信。现闻其本人曾亲自告犬养毅有大量之经费，亦有说跟某方面已有密约，将来可得一千万两秘密费用等……确实与否尚未可知……〔8〕

后来，孙中山回忆说：“当予未到上海之前，中外各报皆多传布谓予带有巨款回国，以助革命。予甫抵上海之日，同志之所望我者以此，中外各报馆访员之访问者亦此。”〔9〕

薛君度在《黄兴与中国革命》一书中曾这样叙述：当时，临时政府领导人，面临两个主要问题。一是财政问题，另一个是袁世凯问题。南京临时政府在成立之初，财政上就极度匮乏。孙中山到上海时，是被同志们当作“财神”来欢迎的。大家相信，或是他携有巨款，或是他易于筹集巨款。而江浙联军的指挥官之所以仅推举黄兴任大元帅而支持孙中山任总统，正是他们择肥而噬认为孙中山回国时挟有巨资〔10〕。

抵达上海后的孙中山，在接受《大陆报》记者来访时，曾经有这样一段问答：

主笔：君带有巨款来沪供革命军乎？

孙大笑：何故问此？

主笔：世上皆谓革命军之成败，须观军饷之充足与否，故问此。

孙：革命不在金钱，而全在热心。吾此次回国，未带金钱，所带者精神而已。〔11〕

另外，车田让治写的《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一书中，有这

样一节：“中国革命的先驱者孙文，正好在圣诞节之夜，结束了漫长的亡命之旅，第一次重踏故国的土地。（中略）孙文是为了成为新生的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而归来的。他的腋下，挂着一个大提包。为了建设新中国，需要很多很多钱，必须从外国获得借款，来巩固政治、经济的基础。所以当时没有人不认为，那个提包里，装满了金钱和借款合同。”〔12〕

孙中山就任大总统那天，一位军官甚至直接问孙中山：“公所携自华侨所得捐款究竟有多少？革命军皆等它欢度新年”〔13〕。在这种情况下孙中山总是心平气和地回答：“予不名一钱也，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14〕这种回答，也确实反映了因欧洲借款失败留在他心中的苦衷。

三、孙中山决定借外债

虽然，孙中山对英、法借款的期待落空了，但是，他并没有灰心泄气，就任总统后越发加紧筹划募集外债。从1912年初至同年3月底辞去大总统职务，这期间他使尽浑身解数，试图广募外债，解决财政危机。

早在1911年12月21日，他和胡汉民、廖仲恺的谈话中，就明确指出了募集外债的必要性：“然一俟临时共和国成立，则财政无虞不继，因有外债可借。……（中略）就现实情形论之，必须借外债”〔15〕。12月30日，孙中山又进一步给华侨邓泽如等人发去内容如下的电报：“现为组织中央政府，需款甚巨。委任阁下等向南洋侨商征集大款，国债票日间付上。”〔16〕

实际上，在这个时候，包括日本在内的列强各国，看到张謇行将就任新政府的财政长官，也推测革命政府的财政问题或许会因此出现转机。例如12月27日，日本陆军中校吉川认为：“朝野中久负盛名的张謇，此次成为革命军唯一的重镇——财政长官。今后最引人注目者，是张的财政措施。彼此总揽江苏省盐政为

财政整理之第一步，又与某国人士私下交涉，欲以此盐税吸收一千万元外汇。此举若能成功，或许多少可缓解财政之穷匮局面……〔17〕。”

然而，1912年1月1日新政府组阁时，孙中山拒绝了黄兴推荐的财政部长人选张謇和熊希龄，而任命了自己最信任的陈锦涛。孙中山说陈锦涛曾参加过清廷的币制改革，搞过国际借款，国际上有威信〔18〕。1月2日，日本海军中佐加藤对于精通财政的张謇落选一事深感惊讶，迅速把此事向军令部长作了汇报：“南京政府于1日午后11时举行孙大总统就职典礼，但政府官员的安排尚未确定，程德全及张謇等力辞任命之事似乎已成事实”〔19〕。从这个人事安排，可以看出孙中山考虑到要维持临时革命政府，筹集必要的资金，只有依靠广募外债，他似乎对任命精通国际借款的陈锦涛掌握财政，颇为得意。以为陈任部长，借外债会有办法了。

但是，临时革命政府的财政已面临崩溃境地，任临时革命政府秘书长的胡汉民在后来的回忆中谈到当时的困难时说：“某日，安徽省孙都督的使者来求援，先生已许可二十万。然而，奉命令到财政部，金库仅存十万洋”〔20〕。陆军总长黄兴，为了解决严峻的财政危机，废寝忘食甚至积劳吐血〔21〕。但是，临时政府最终没有办法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决财政问题，不得不寄希望于外债，把它作为唯一的应急措施，以矿山、船舶为抵押，试图在短时间里就集聚大量资金。

在此期间，南京临时革命政府与日本之间进行了汉冶萍借款、苏省铁路借款、招商局借款交涉。向帝国主义寻求借款，当然无异于饮鸩止渴，1912年2月13日，孙中山在致章太炎的信中谈及借款问题时说：“此事弟非不知利权有外溢之处，其不敢爱惜声名，冒不韪而为之者，犹之寒天解衣付质，疗饥为急”，表明了自己不管冒什么危险，有什么困难，也要募集外债的心情〔22〕。

孙中山委托日本方面制定设立中央银行的计划，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展开的。

第二节 问题的提出

一、缘起

建立中央银行，委托日本人代为筹建，此事究竟是怎样提出来的呢？《阪谷芳郎传》〔23〕中有如下记载：“明治44年10月中国发生革命，于南京成立了革命政府。通过无线电得知这一消息的子爵（即阪谷芳郎）时正在从瑞士伯尔尼的和平会议返回日本途中的船上。12月抵达东京不久，被任命为革命政府临时大总统孙文的使者，经大隈（重信）侯爵的介绍，访问子爵。就中国的财政问题进行请教。在谈话中，子爵坦率地说：‘确立中国财政的根本，在于币制改革。要改革币制，首先必须成立中央银行，建立永久之策。’”〔24〕

《阪谷芳郎传》中没有记载孙中山使者的具体姓名，经查阅阪谷芳郎日记，1911年12月28日记有：“何天炯来访，八田裕二郎氏同行。持有大隈（重信）侯爵的介绍信。”〔25〕同一天日记中，还记有“原口要氏〔26〕处来电话，就清国革命的将来财政计划提出询问。”〔27〕据此可知，何天炯作为临时革命政府及临时大总统孙中山的代表，经由大隈重信的介绍，曾就如何解决财政问题一事，请教阪谷芳郎。阪谷芳郎认为：要想真正解除革命政权财政上的危机，建立中央银行乃当务之急。

1912年1月初，孙中山、黄兴派何天炯赴日，就汉冶萍公司借款事，与日本有关方面进行交涉。同时，黄兴委托何天炯分别带信给日本元老山县有朋、井上馨，请求他们对中国革命给予援助〔28〕。当时，为筹集资金解决困难，身为临时大总统的孙中山先生不得不亲自向外国求援，以缓和、摆脱临时革命政府的困

境。孙中山、黄兴等人迫切渴望得到日本政府从政治上给予承认，财政上给予援助，以巩固、维持新生的临时革命政府。

如前述，阪谷芳郎是当时日本财界头号人物涩泽荣一之婿，长期工作于大藏省，历任大藏省的主计局长、总务长官、次官，1906年至1908年任大藏大臣，1912年7月至1914年3月任东京市长。由于阪谷芳郎的身世与经历，故他与日本元老松方正义、井上馨关系密切，并与财政界的胜田主计〔29〕、添田寿一〔30〕等交往很深。阪谷芳郎作为政治家同当时的一些政客、军人一样十分关注中国。早在1903年（明治36年）阪谷身任大藏省主计局长（后升任大藏省次官），为清政府的币制改革，制定了具体方案，提出了建立清国中央银行的建议，为此还受到了清政府的嘉奖。1911年6月13日，上海英文报纸《中国新闻》上登载了阪谷芳郎关于设立清国中央银行的意见书〔31〕。因此，素以“大隈财政”著称，又长期主持过大藏省工作，曾经担任过大藏卿的大隈重信，将孙中山的使者何天炯介绍给阪谷芳郎是有其道理的。当然，在介绍何天炯与阪谷芳郎见面一事上，曾在清末担任过湖广总督铁道顾问的工学博士原口要也起了牵线作用。

何天炯是1911年12月13日抵达日本的。《神户又新日报》曾以《柯（应为何之误）天奎（应为炯）的使命》为题，作了报道：“前日（13），（何）作为黄兴之代理，携带革命党某重大使命，为访问有邻会来日”〔32〕。陆军方面的情报也说：“11月成立的有邻会，曾派同志与革命党联络，中国方面，指派何天炯来访，寻求强有力之援助”〔33〕。12月10日下午9时5分，神户三江公所接到了上海来电，内容如下：“军政府派何、严二君乘‘筑后丸’赴日劝捐……”〔34〕。此外，何天炯随身携带宫崎滔天写给其妻津知子的家信：“忙碌多端，无暇草信，幸何（天炯）兄将归东，万事请向何兄询问……”〔35〕。关于何天炯的使命，滔天于信中也有叙及，“眼下革命军所需物品，乃机

关枪与短枪（俄式）及被服（桔黄色），如能动员日本有志之绅士富豪联合捐赠，实为无上之幸也（或少许资金亦可）。与小生（即滔天本人）经费之事虽未分明，但凡机械问题，望与何天炯兄商谈，如为小生一己之经费，当然不吝相借也。”〔36〕

当时，陪同何天炯在日本四处活动的，主要是神户的实业家三上丰夷。12月中旬，何天炯抵达日本，三上给在上海的萱野长知寄去这样一封信：“有关苏省铁路担保事，与何天炯商议。所命武器及三百万元已装船待发。铁道担保事一经确认，将速回信。三上。”〔37〕在此之前的12月12日，东京木挽町“清流”旅馆的一位叫太田林的人，也收到了一份来自上海的电报：“革命军军舰之弹药正在调查中，有关担保事，何天炯处有黄兴来电，十日与三上就某事商谈”〔38〕。12月15日，黑龙会的本城安太郎在致上原的信中，曾这样谈过何天炯的行动：“何作为黄兴、黎元洪之代表，自然无法与任何人秘密相见”，“何天炯已抵东京，化名中村繁，仓大尉、中井喜太郎和太田信三与之同行。此数日间，在仓等协助下得到野炮五十门、机关枪五十挺及弹药等。”〔39〕

可见，到12月底，何天炯的在日活动，与其说是临时革命政府的驻日代表，不如说是作为革命军黄兴的代表，在日本同各方接触，开展对日求援活动的。

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后，曾任命唐绍仪、何晓柳（天炯）为临时政府的驻日正副代表。因唐一直没有赴任，所以何天炯就起到了实质上的全权代表的作用。〔40〕

12月30日下午1时，在上海的黄兴，收到了三上由神户发来的急电：“东京元老大臣会议结果，确定援助共和政府。何天炯与松方、大隈、阪谷芳郎、三岛正金面谈之后，同意设立中央银行，资本一亿日元。现款筹集办法，向各国广泛招募，分若干次进行。眼下则不发行兑换券。设立此银行，涩泽等人皆愿尽力。近

二、三月中可筹得各国资金。阪谷早有成案。此事紧急重大，望与犬养相商。速复为盼。三上”。〔41〕紧接着，下午3时38分，三上又打电报给已在上海的犬养毅：“想必冈崎邦辅已抵彼地，资金问题应全部委托大隈、涩泽、阪谷芳郎为上策。托冈崎恐生差错。委细已电（告）黄兴，决定后，经孙（中山）名义请阪谷赴彼地，可托何天炯办理”。〔42〕

如前所述，犬养毅赴南京参加临时政府成立及孙中山就任临时大总统仪式后，应孙中山之请，暂留上海。

据阪谷日记：“12月29日，议事，清国银行一事，走访涩泽男（爵）”。翌年1月2日，他又于日本俱乐部邀见原口要、何天炯、八田裕二郎，就建立银行问题，进行了交谈。〔43〕

综合上述记述，可以肯定，12月底，何天炯已经把大隈、松方、涩泽、阪谷等人建议必须设立中央银行的意见电告孙中山。

二、三上丰夷的南京之行

12月24日，三上丰夷访问了内务大臣原敬，接着又走访了阪谷芳郎、原口要等。进入1912年1月后，他更频繁出入于东京的日本政财界头面人物之中，1月6日动身赴上海。三上在东京的具体活动内容虽然无法考证，但据他后来在南京的活动判断，其中心内容主要是建立中央银行，为孙中山借款。1月8日，三上抵达上海。《神户新闻》报道：“8日，三上丰夷抵上海，访问滔天。”〔44〕当时，“太田信三曾云，神户三上乃携带筹措要务而来者”〔45〕。另外，日本海军也探听到，“据确切情报，冈崎邦辅称自己携二千万日元资本，专为设立日清银行计划而来，9日将赴汉口。”〔46〕12月30日，三上打给犬养毅的电报中提到冈崎访华一事。看来冈崎与三上为同一个目的到达中国的。

宫崎滔天曾经这样记载过三上的南京之行，1912年1月11日，“萱野（长知）氏在南京黄氏处热心活动。黄氏表示：‘三上

（丰夷）翁所送之礼品过少’，有担心状，稍许又以此亦乃不得已之事而自慰。后接三上电，精神大振。日前三上翁抵沪，强忍齿痛乘马车慰问犬养（毅）翁于病床（仅感冒而已非大病）。三上翁报告了向银行团借款事”〔47〕。这里所说的“礼品”，指的是三上为革命政府捐助的武器、弹药，因为实际送到的数量比约定的要少，所以黄兴颇为不快。而滔天文中所说的“银行团借款”，大概是指设立中央银行一事。据滔天的回忆录，他对这些事知之甚少。

关于三上在上海的行踪，海军的武部舰长向东京总部做了详细的报告。

1月11日，“据神户三上丰夷谈，若清国之大乱，纷争久而不止，商业必将不振，生计艰难，抢劫四起，恐终有招致外国干涉之虞。故目下之急务，乃早日稳定局面。而今，人心暂离清朝，沉醉于革命之芳香，而尽快平定局面，又有极大困难。此事曾征求诸元老意见。即使此次革命军以失败而终，将来亦必再度重生同类骚乱，我国于华南之贸易必蒙受巨大打击。当此之际，我国若援助官军，华南将发生最恐怖之“抵制”日货事件，故考虑我国利益，莫不如利用此机，援助革命军为上策耳。惟革命军乏于军费，再过二月左右，将遭受灭顶之厄运，故余意以为，当以筹措军费为目的，设立中央银行，筹集武器。

以上主旨，曾与孙文作过交谈，然孙文对日方的菲薄慢待，耿耿于怀，且以为当地的志士集团皆属在野之士，不可凭赖，不承认中央银行之设立。又云若欲救目下民军之财政，望十日内能通融一千万日元。关于其他军费，目下正与美国莫尔根氏电报商议中，彼更狂言，兵力不足时，拟借美国陆军兵士云云。

三上丰夷氏再次访黄兴，诘问雇佣各国兵士、筹措军费果然有利否。黄兴立刻赞同三上氏的意见，以为孙要求十日内融资一千万日元，实过于苛刻。目下之情势乃武装时代，只能依靠大量

输入武器一途。黄允诺负责说服孙。数小时后，携回附有印绶承认设立银行、筹措武器之公文。回沪后，即发出如下电报：

南京孙文致松方侯爵

银行、武器之事已委托天炯办理，望予以关照。

南京孙文致何天炯

设立银行之事已定，急需武器，望与坂（原文如此）谷、原口、大隈、涩泽相商。菽野已归。

南京孙文致大隈伯爵

银行之事已拜托坂（原文如此）谷男爵，银行及武器之事望多加关照。

南京孙文致涩泽男爵

三上丰夷与何天炯商议，设立银行之事望速予实行，如情况允许亦望能光临敝地。武器所需至急，望予以鼎助〔48〕。

这份报告主要提及三上同孙、黄交谈，十分清晰地揭示出了南京政府同意设立中央银行一事的经纬。另外，1月11日海军新高舰长原忠三郎致海军大臣的一份电报，也明确佐证了这一情报：“十日，小川议员与孙、黄会见，冈崎邦辅亦达成以铁道为担保贷付军费，在上海设立银行，出售武器。昨日（11日）午后4时30分，截收到自西京丸发给大濑氏的电报，该船午后三时由上海启程赴大连，孙中山已开始利用商船之无线电与日本知名人士联络。电文如下：

（一）孙文致大隈伯爵。银行之事已委托坂谷男爵，银行及武器事望尽速。

（二）孙文致原口博士。三上丰夷与何天炯所商议设立银行事望速予实行，情况允诺，望光临敝地，提供武器事，亦望尽速办理。

（三）黄兴致木挽町。急需武器，望与坂谷、原、工藤、大

隈、涩泽相商。

(四) 另有致涩泽男爵一信，因信号混杂，内容不明〔49〕。

1月10日，孙中山接受并同意阪谷的提案。第二天，孙中山给阪谷发了下面的电报：“东京，阪谷男爵。阁下同三上丰夷、何天炯所谈设立银行一事，应迅速进行。若阁下方便，乞光临南京。关于急需之武器，乞速关照。南京，孙文。（明治）45年（1912年）1月11日午后5时45分。”〔50〕

这份电报的原件藏于日本外交史料馆，《阪谷芳郎日记》中也记有“1月11日，收到孙文电报”的记载。《电信电报电话往返录》中还记有“11日，电报，孙逸仙。”〔51〕关于中央银行的设立构想，三上丰夷曾向海军的武部这样描述过他与孙中山的交涉：

“自己乘春日丸于7日抵上海，8日晨赴南京，当晚与孙文交谈至12时。（三上说）若欲强化临时政府，则整理财政为莫大之急务。若听任现状发展，阁下纵与英美资本家继续谈判，依目下之情势，若能有人愿意接洽，提供资本等，亦属厚幸。日本维新时，其命运与贵国相仿，当时负责处理财政问题之大隈伯、松方侯等对于阁下之现状深表同情。并具有解决（财政）危机终至达到今日盛况之经验（中略）。现我国元老及愚生在此提供一财政处理办法，欲征询阁下之意见。前接电报，知已蒙阁下之理解，今又亲获接见，不胜欣喜也”。对此，孙中山的回答是：“余现在正与英美之资本家进行交涉，对贵国元老亦不曾忘怀。贵国元老若能明了临时政府之处境，望十日内先通融一千万日元为盼。如此急迫之请求，恐终究亦难办到，但贵国元老若予以同意，当亦不难生出融通之途。”

随后，孙中山问三上丰夷所携带提案的具体内容。听了三上的说明后，孙中山当场就表示了“尚不能承诺”的态度。

三上接着叙述说：

“九日，更找到黄兴，征询对此提案之意见。黄兴表示同意。并说倘不能大量输入武器，严整武备，独以财政问题，革命政府之稳固亦……（不明），故对此提案应立即予以响应。孙文阁下十日内融资一千万日元之要求到底难以办成，可同去说服孙文使其同意此案。黄兴与三上于是同去访问孙文。

黄兴氏力陈日本诸元老之提议为最佳之方案，宜附加输入武器之条款更附加上十日内融资一千万日元之希望。历数小时，终于获得孙文之承诺。

十日，作为承诺之凭证，获得盖有大总统印绶之文书。”〔52〕

以此看来，孙中山之所以同意日本政财界提出的设立中央银行提案的真实目的，主要是为了获得最急需的一千万或二千万日元借款，以挽救革命的危机。经过三上的说项，孙中山正式决定建立中央银行，并立即致电发信给日本财政界的有关人士，希望他们予以援助。在这中间，实业界的三上丰夷，充当了日本政、财界与革命政府之间的联络人。

三、阪谷、原口受聘为临时政府财政顾问

1月3日，南京临时政府发布内阁名单，东京大学教授寺尾亨、副岛义一被任命为法制顾问，犬养毅被任命为政治顾问。1月10日以后，阪口芳郎、原口要也被任命为财政顾问。1月13日海军方面的情报记载：“据三上氏所谈，阪谷氏已被内定为清国顾问……”〔53〕。

1月18日，驻上海的铃木领事也向外务省报告了阪谷、原口两人受任财政顾问的消息〔54〕。

孙中山、黄兴寄希望于与日本方面的交涉，期待接受了日本

方面提出的设立中央银行的提案，可以得到一千万日元的巨款，解决眼前的财政困难。加以此时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就有关招商局借款、苏省铁路借款、汉冶萍借款的谈判正在进行。孙中山等南京临时政府的领导人对募集外债解决财政问题充满了自信。

1月12日《东京日日新闻》又报道了孙中山下述的一段话：“今后两个月内能否得到二千万日元，是件大事，胜负的关键是资金问题”〔55〕。一时新闻界纷纷报道，日本银行与政府就接受南京临时政府一亿元公债贷款事，正在上海进行谈判云云。〔56〕

但是，对于上述日本向革命政府提供贷款问题一事，日本外务省则表示否定。1月13日的《时事新报》，以《仓知局长谈话，否认革命军借款》为题刊载了下述报道：

“北京政府、革命政府目下皆尽全力筹措军费，乃不可隐讳之事实。最近，通过驻上海的日本官吏以孙文、黄兴名义，向我银行家要求贷付资金的秘密申请也有发生，驻上海官吏皆对此等待政府训令，政府目前正在研讨中。此外，风传有革命党提出借款要求。对于上述情况，（仓知）政务局长曰：去年11月前后，有同情革命派的某氏，受武昌革命军委托，向各方面转达筹集资金之请求。此事（政府）并非没有了解。最近，又传此类商议正在进行中云云，此等绝非事实也。观列国现在对官革两军借款申请的态度，此际若供给（彼等）资金，定将使争乱日益蔓延，加剧战争惨祸，故政府首先就不提供资金取得一致意见，尤其对来自北京政府之申请，每次均有异议。各种论据暂且不论，实际上，虽有应供给讨伐革命军费用之见解，但终未成立。对于革命军之北伐，日本政府态度自来动摇，然而，只要清国时局之现状不发生变化，政府当固守历来态度拒绝之，不会向官军提供资金。但个人同情官军或革命军或出于盈利目的提供借款者，其责任当完全由当事者自负，概与政府无关。〔57〕

显然，仓知的这番谈话乃虚晃一枪，故意向外界散布的烟幕，以证明日本政府的“中立”态度。另一方面，一般来讲，当时日本以借款形式向革命政府提供资金，有三大主线，即招商局借款、苏省铁路公司借款、汉冶萍借款。日方向革命军出售武器，多半是在日本政府的默许下，通过三井物产和大仓组进行的。诸多研究证明，上述三项借款谈判，开始于革命爆发后的11月至翌年1、2月间。应当强调指出，关于这一时期革命政府方面的募集外债、借款活动，并非仅仅是上述三项。但严格地说，设立中央银行一事，其借款金额之巨，性质之重要，恰恰是该时期中日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不应忽略。从这个意义上而言，仓知的谈话，是对建立中央银行一事的否定之否定。

第三节 中央银行设立案的具体形成过程

中央银行设立案的形成过程，大致可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为准备时期，双方接触，经商议，就筹建中央银行事达到认同。即1911年12月底阪谷向何天炯提出建议起到1912年1月10日孙中山正式发电报，委托阪谷芳郎筹建止。第二阶段，即完成阶段，方案出笼至送交南京。1月11日起到《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完成之后，原口要等三人送到南京。这期间，阪谷等人排除了来自元老、舆论等各方面的压力，完成了设立方案的草拟工作，甚至还准备好了英、中文译本。2月6日，三上丰夷赴南京，将一切文件交给南京临时政府。

以下，根据阪谷日记为时间线索，试对中央银行设立案的出笼过程作一初步探讨。

一、第一阶段——准备阶段

阪谷向何天炯提出设立中央银行的建议，是在1911年12月末。进入1912年之后，阪谷作为日本方面的组织者，他首先联系了各有关方面（主要是银行界）。1月2日，他在日本俱乐部会见了原口要、八田裕二郎、何天炯（改名中村）、伊志田平三郎（原口之友人），具体商量设立银行事。当晚，于帝国饭店召开的东京实业家新年会上，他在新年致词中又分析了中国革命的形势，指出了日本财界应持的态度以及正确的“实业家之觉悟”〔58〕。同一天下午3时，涩泽荣一从飞鸟山出发抵帝国饭店，参加新年会，并听取了阪谷的上述讲演。〔59〕新年会上，阪谷向添田寿一谈起了设立中华民国中央银行的计划。

1月3日，阪谷向日本银行董事长佐佐木勇之助通告了筹建中央银行计划，随后拜访了涩泽荣一。6日，他又拜访了日本兴业银行的水町、添田二人。前一天（5日），神户的财阀松方幸次郎抵东京，找到三上，商量了一些具体事务〔60〕。10日，涩泽荣一趋车访问外务省见石井菊次郎次官。据猜测，此次是涩泽受阪谷委托征询外务省关于设立中央银行一事的意见。〔61〕此后，对此事，石井不再公开表示反对意见了。

阪谷在第一阶段里所进行的上述这些活动，均可理解为设立中央银行事征求和疏通各方的不同意见。

二、第二阶段——具体展开

1月11日，阪谷接到孙中山打来的委托成立银行的电报，当天，他就于东京开始了正式的筹建工作。

1月12日，佐佐木、原口要、添田寿一打电话给阪谷芳郎，就建立中央银行事，互通情报，交换了意见。随后，阪谷芳郎亲赴涩泽荣一家，汇报孙中山来电托其筹备中央银行一事的经过，

征求他的意见和具体办法。

这次见面会谈中的具体内容，以及涩泽荣一的态度，虽然没有更准确的资料可以实证，但是，阪谷芳郎在见过涩泽荣一后的活动日程表，说明涩泽荣一是建议阪谷将孙中山委托设立中央银行一事，向日本政府有关首脑人物通报。如阪谷芳郎结束与涩泽荣一会谈后，立即打电话给前首相桂太郎、现首相西园寺公望二人，将详情做了汇报。

1月12日涩泽荣一在日记中写道：“阪谷男爵到，围绕设立中国银行问题，进行了多方面的商谈……”接着，他又写到，“荣一作为生产调查委员会，参与设立中国银行一事，将于明日或15日在飞鸟山邸就此问题同阪谷芳郎再度协商；另于17日，访问桂太郎以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就上述问题举行要谈。”〔62〕中午，阪谷芳郎约同后藤新平〔63〕共进午餐，谈设立中央银行事。

1月13日，阪谷芳郎将其拟制的特许状（即指《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状》）分别寄给添田寿一、吉田二人。后藤新平访问了阪谷芳郎。阪谷芳郎将特许状寄给涩泽荣一、佐佐木以及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

1月14日，阪谷芳郎于都饭店同桂太郎、石井菊次郎、安田善次郎围绕辛亥革命的财政问题（即设立中央银行一事）进行了接触、会晤。

1月15日，原口要、八田裕二郎二人会见了阪谷芳郎，再次就设立中央银行的进展情况进行商谈。原口、八田二人走后，阪谷芳郎访问了涩泽荣一。

同日，涩泽荣一在日记中写道：“阪谷芳郎氏来访，就设立支那银行一事提出各种建议。”〔64〕

1月16日，阪谷芳郎收到孙中山的来信。“阪谷博士阁下：谨以中华民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件相托，本日已由电信奉闻，兹更修书申告。阁下能来南京一行，尤为厚幸。专此敬候。孙文。”〔65〕

阪谷把孙中山来函一事，打电话转告涩泽荣一、井上馨。并在日本俱乐部会见了原口要、八田裕二郎、荻野、三上等人，介绍孙中山来函内容。事后，阪谷芳郎又访问了涩泽荣一，发信给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

1月17日，涩泽荣一访问前首相桂太郎公爵，就南京临时政府准备设立中央银行、孙文来函求助一事，举行了会谈。同日，涩泽荣一又访问外务大臣内田康哉，专门谈了有关设立中央银行的问题〔66〕。

1月18日上午，阪谷芳郎访问井上馨，汇报关于建立中央银行的进展情况。中午，于第一银行就餐，同时见了涩泽荣一、佐佐木二人。下午，原口要处来电话，告知犬养毅已从南京回来，并带来了设立中央银行的意见等。

1月19日，阪谷芳郎发信给丰田良平、早川千吉郎，信的主要内容仍然是中华民国的财政问题。

同日，阪谷芳郎又访问外务大臣内田康哉，再一次就建立中央银行一事进行交谈。他们详细谈了什么，不得而知，谈话结束后，阪谷芳郎赴铁道协会，会见刚刚从南京返回的日本国民党领袖犬养毅（犬养于1911年12月赴南京，1912年1月18日返回日本），及原口要、三上、八田、伊志田、何天炯等人。

1月20日，阪谷芳郎去涩泽荣一住宅。中午，又赴第一银行见涩泽荣一、佐佐木。尔后，到经济协会就设立中央银行的具体方针作了进一步的探讨、研究。晚上，与原口要通了电话。

1月21日，梅泽敬作访问阪谷，承担了抄写中华民国政府中央银行特许札的工作。

1月23日，原口要、何天炯、伊志田三人访问阪谷芳郎。阪谷将孙中山的复信交给原口要、何天炯二人，并请他们面交孙中山（据《阪谷芳郎日记》记载：原口要是2月6日离开东京去中国的）。

1月24日，原口要打电话给阪谷芳郎。井上准之助〔67〕、伊志田、中村为三郎等分别就设立中央银行一事访问阪谷芳郎。阪谷芳郎打电话给原口要，将何天炯介绍给涩泽荣一。接着在和平协会的聚会上，阪谷芳郎反复同添田寿一商量的设立中央银行的下一步工作。

1月26日，阪谷芳郎发信给大藏省主计局长胜田主计。

1月28日，阪谷芳郎收到胜田主计回信。梅泽敬作来访，带来了复制好的“特许状”的原、副本。随后，阪谷芳郎发信给长谷川为治、桂太郎公爵、和平协会、银行（应为第一银行），并分别附有建立南京中央银行特许状副本。

1月30日，伊志田平三郎访问阪谷芳郎，请其在译成英文的“特许状”上签字。

2月2日，发信给正在热海避寒的松方正义，内容为设立中央银行事〔68〕。

2月3日，访问外相内田康哉。

2月5日，收到松方正义2月4日回信。打电话给原口要。

2月6日，为原口要氏赴中国一事发信。赴新桥站为访华的原口要、伊志田、村田送行。

原口要赴中国，携带阪谷芳郎1月20日给孙中山的回信以及建立中央银行“特许状”〔69〕（英文及中文译本）。〔70〕

2月8日，三上丰夷到，报告何天炯离日回国，并传达孙中山处来电，取消设立中央银行计划云云。

2月29日，收到孙中山2月16日来函〔71〕。来函抄件现收藏在日本大藏省财政史室的《胜田主计文书》中，现将全文抄录如下：

“阪谷博士台鉴：前请鼎助关于中央银行之事，蒙荷热心，至为深感。惟以缔造之始，需用浩繁，金融机关，刻不能缓，久仪尊教，迫不及待，是以率先成立，因于事势使然，非倏变初议也。今中央银行虽建，惟巩固与否，尚未可

知。异日如有困难，再当求助，谅阁下高怀宏识，必终不我遗弃。专此。即颂起居。孙文叩。”

以阪谷芳郎日记为主要线索，进行上述整理，我们基本上可以清楚了解到围绕建立中央银行一事，日本方面，特别是阪谷芳郎、原口要、涩泽荣一等人所展开的一系列具体工作的全部过程。同时，我们又看到为了建立中央银行，日本政界、财界的一些主要头面人物，上至总理大臣西园寺公望、前总理大臣桂太郎，政界元老松方正义，“财界之神”涩泽荣一，外交大臣内田康哉，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以及井上馨、犬养毅、原口要、添田寿一、胜田主计等都不同程度参与了这一筹备工作。关于这些人到底以怎么的目的参与了这一活动的，我们将在后面详述。这里，我们来看一看，阪谷芳郎等人所制定的设立国立中央银行计划到底包括哪些内容。

中文的设立中央银行“特许状”，至今共发现两个版本。1. 现藏于胜田主计文书中，阪谷芳郎命人译制的中文本。2. 前面已经谈到的1913年5月19日《时报》上刊载的题为《发现南京时代特许日人阪谷芳郎设立国家银行事》的“特许札”（后收入《远生遗著》第三卷）。现将阪谷芳郎写给孙中山的信及“特许状”的全部抄录如下：

阪谷芳郎致孙中山信

“敬启者：接到贵电及中华民国元年一月初十日贵函委托阪谷以贵国中央银行设立之事，是系整顿贵国之财政，增进国利民福，尤重要且紧急，故直当为设立之准备，请将特许札权盖上正式之印，即速送下为盼。然招股份之事，贵国非经列国之承认，甚属困难，故各国承认之日，即拟为发表。特此谨复。孙大总统阁下。法学博士阪谷芳郎。明治四十五年一月二十日。”

“中华国立中央银行特许札

第一条 今次政府为认国立银行设立之紧要，以此特许札，交付于发起人。

第二条 该特许札之有效期限，自交付特许札之日算起，以五十年为限。

第三条 该特许札所定之条规非经政府与该银行协议之后，不能改变。

第四条 该银行即集股有限公司，其资本金定日币一亿（即一万万）元整。但因财政及经济发达之状态，经政府之认许，得增加其资本额。

第五条 资本金一亿元，内金三千万系政府所有之股份。政府所有股份，即全额交款也。交款法于设立银行之际，以常年六厘利息之证券代之。但政府须以相当之官有财产，为此证券抵押。

第六条 资本金一亿元，内金七千万元，于国内或国外随便集股。第一回交款额即资本金十分之一，收齐此交款之后始营业。

第七条 该银行即有限责任而对其负债，虽总归股东之负债义务，以其所有股之金额为限。

第八条 政府除交付政府之所有股三千万之利息外，尚担负于普通股每年七厘利息之责任，以十年为限，但政府为保证支息所收出之金额一年，不得过银行所收股额七厘利息之谱。

第九条 普通股之利益一年，若越过七厘之时，以此越过头，分配政府所有之股，然普通股与政府股之利益皆越过七厘之时，达到一成之利益，平均分配给双方。若越过一成利益之时，折半之，则半额交纳于政府，以半额应分给政府股与普通股。

第十条 该银行定款，由股东总会议定，须经政府认可。

第十一条 该银行总裁、副总裁、理事及监查员之数并选举法等，须规定于定款。

政府暂任法学博士男爵阪谷芳郎为总监，监督总裁以下之事〔72〕。

第十二条 该银行有发行纸币之特权。此纸币系纳租税及海关税其他商业税等，均可通用。须预备与纸币同额之金银货币，准备政府证券、公债证书、商业汇票及其他确实之证券等，而得发行五亿元之纸币。但前记发行税率，有时每次政府定之，关于限制外之发行额，须先得政府许可。

第十三条 该银行发行之纸币，以金银货币兑换。〔73〕但因中国政府整理铸造货币及政府发行纸币之时，则限制其兑换率，或即以政府之纸币兑换。

第十四条 该银行发行纸币之外，则中央政府、地方政府发行之纸币等，或他银行发行之纸币等，一切自令严禁增加发行额，虽既发行额，则一定制限处理收回使之消灭。

第十五条 该银行发行纸币如第十二条规定课税制限外，不另课税。

第十六条 该银行第九条所载交纳政府金以外，所得税、营业税概行除免。

第十七条 国库之岁入及岁出等事，皆可托该银行办理，政府须给相当之实费。

第十八条 内外国债之整理及新招集国债之时，可使该银行办理，政府须给相当实费。

第十九条 以货币之整理及改造，可托该银行，政府须给相当实费。

第二十条 政府收回以前所发纸币及货币等，可照会该银行垫款代办，然垫款政府给出相当之利息。

第二十一条 政府关于国库之收支，可托该银行一时贷

借，若时有资金不足之日，给相当利息与该银行垫款，但垫款之限制，政府须先与银行〔74〕协议后定之。

第二十二條 管理印花紙之出入販賣等事，托該銀行辦理，政府須給相當實費。

第二十三條 該銀行之本店，開設于首府或上海，支店可置內外樞要之地。

第二十四條 政府設定監理官〔75〕，監督銀行之業務。

第二十五條 錄用外國人為理事及委員，自銀行開辦後，限五年內為勤績〔76〕之期，以後除緊要人外，漸次由內地人交替。

第二十六條 政府自該行開業年滿五年之後，于一年以付價得買收外國人所有股份，但無論如何等情，不得以不及股款之金數強買。政府于本條期限之間不能買收，則本條買收權為消滅。

附則

第二十七條 政府認國立中央銀行緊要之設立，委任法學博士男爵阪谷芳郎，選定發起人、設立事務及初次理事及委員等之任免全權。

阪谷創設該銀行之間，使用相當事務員及支出經費，加入創立費，均歸銀行負擔。”〔77〕

阪谷芳郎1月20日寫給孫中山的信及《設立中央銀行特許狀》，原文為日文。在原口要赴中國之前又據日本文譯成中文、英文。此漢譯本系專為原口要一行赴上海所譯。此中文本經與1913年發表在《時報》上的中文本加以對照，發現此兩個中文本，除個別文字在排印時所造成脫誤外，全部相同，顯然《時報》刊出的文本，即是阪谷的中譯本。

日本財界和政界的一些重要人物，對孫中山委託日本人幫助建立中央銀行一事，表現出極大的熱情，據初步統計，參與策劃

此事的不下二十儿人。这些身份、地位不同，对中国有着不同认识，对于孙中山的中国革命抱有不同理解程度的日本政治家、外交官、官僚、财界要人、浪人汇聚在一起，扮演了不同角色，并发挥了不同的作用。

比如1903年开始担任张之洞铁道顾问的原口要，在这次活动中是孙中山同日本财界、政界(阪谷芳郎等)建立联系的中间介绍人，同时自始至终参加了这次建立中央银行的活动。整个建立中央银行的过程中，原口要充当着主要的角色，在某种意义上，他是代表孙中山在向日本方面进行工作的。例如，1月23日，是他同何天炯一起正式接受了阪谷芳郎制定的设立中央银行的特许状。最后，2月6日，原口要同伊志田、村田携带“特许状”等赴中国见孙中山。因此，可以说，在整个活动中，原口要是个主要的组织者。

受孙中山委托，日本方面帮助筹备设立中央银行的是阪谷芳郎，严格地讲，他代表的是日本财界和一部分政界的意见。阪谷芳郎幕后的主要支持者是前首相桂太郎同当时任日本第一银行总经理的涩泽荣一。他积极地为设立中央银行而东奔西跑，其背后是有上述政治家的同意与支持的，其中，包括松方正义对此的积极态度。

松方正义在日本各界，特别是大藏省，有着至高无上的威望，除此之外，松方正义也是日本政界领袖中较为开明的人，他鼓吹侵略中国，却与那些拼命推行臭名昭著的大陆政策的军人、政客、右翼浪人稍有不同。此人一度对中国革命表示过同情，这也是孙中山直接写信的原因。

松方正义对于阪谷芳郎等人的行动是支持、赞赏的。当然，这种同意与支持是建立在扩大日本在华侵略权益的基点上，从维护日本的利益出发而支持孙中山。在这一点上，松方正义的态度同日本军人、右翼浪人的态度是一致的。

以涩泽荣一、阪谷芳郎为代表的日本财界，在这次援助孙中山成立中央银行的活动，发挥了主导作用。他们是设立中央银行一事的倡导者、组织者。这些人中如胜田主计、井上准之助等，几乎都在财界占有特殊地位，拥有相当实力。有这些财界实权派的支持与参加，而由阪谷芳郎出面具体炮制的设立中央银行的“特许状”，应该说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和代表了当时日本统治阶级，在财政金融方面对华侵略的一些设想，因此说“特许状”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件。

日本政界、财界对中国设立中央银行一事之所以如此关注，并不是仅仅为了援助孙中山所领导的中国革命，其根本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的侵略权益。例如关于建立中央银行，在清末即成为日本统治集团内部所关心的问题，早在1903年阪谷芳郎即曾为清政府筹建银行制定计划。日俄战争后，日本为了巩固和扩大它在我国东北地区殖民利益，即感到由于中国货币制度的不统一及中日币制不同（中国为银本位，日本为金本位），从而影响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开展。当时，曾任桂太郎内阁大藏省次官和西园寺公望内阁藏相的阪谷芳郎，就曾设想在满洲要以日元作为“东亚的指导货币”〔78〕。1909年大藏省胜田主计奉首相桂太郎之命，前往中国考察财政、经济和满洲币制问题，胜田认为“中国币制的不统一，使对清国的贸易国蒙受非常的不利”，故而希望清政府能尽快地统一币制。回国后他向桂太郎建议，首先在满洲统一实行金本位货币，“进而推及于整个中国”〔79〕。1911年6月13日上海发行的《中国新闻》刊载了阪谷芳郎撰写的关于改革中国币制的具体方案〔80〕。这一方案，似即为清政府设立中央银行的计划蓝本。阪谷在这方案中，特别强调了要解决中国财政问题，必须实行币制改革，建立中央银行的必要性，具体方法与他提供给孙中山的设立中央银行特许状中各条款的内容，大同小异。以后在1917年寺内正毅内阁时期，日本和北京政府的

皖系军阀勾结，关系密切，当时寺内的得囊大藏大臣胜田主计和西原龟三，也是把在中国进行币制改革及实行金本位货币，作为对华政策的重点之一。此时，北京政府拟聘阪谷芳郎为其财政顾问，就中国的财政整顿问题，阪谷又提出建立银行统一货币的设想，在他根据大藏省的委托所拟定的《关于中华民国实行币制改革的意见大要》中，明确提出“币制改革是以金本位为目的”〔81〕。可以看出，日本企图促使中国建立中央银行，改革现行币制，进而使中国货币变银本位为金本位，这是日本统治集团内部，自日俄战争后对华经济侵略的最重要的战略措施之一。从清末到民国，虽经多次政权更迭，阪谷芳郎、胜田主计等人，始终参与策划此事，指导思想也是一脉相承，其最终目标，是控制中国的财政金融，占领中国市场，倾销日本商品，在华建立日本的垄断地位。因此说，1912年阪谷芳郎为中国建立中央银行所制定的方案，在当时即使有援助孙中山的特定因素，但从日本有关围绕这一问题的前后历史背景和发展线索来分析，阪谷方案的中心目的，是为了维护和扩大日本在华的侵略权益，这是无可争辩的事实。

孙中山之所以婉言取消委托阪谷芳郎建立中央银行，其原因之一，有可能已得悉井上馨反对之情报，进而认为若不能得到一千万日元借款建立银行已无必要。其二，也有对国内形势的估计。当时，孙中山、黄兴为筹措革命军费，于1912年初，以苏省铁路、招商局作为抵押及汉冶萍中日合办为条件，与日本签订了三笔借款合同，但是，消息传出，引起巨大的反对风潮。南京临时参议院向总统提出质问并拒绝承认，临时政府实业部长张謇辞职抗议，章炳麟等革命党人一再上书孙中山、参议院要求废约，立宪派乘机兴风作浪，而英国也以苏省铁路与其在华利权有关提出抗议。在内外压力下，革命党人不得不终止对外的借款活动，有的借款合同虽已订约，也被废除。所以，事实上，孙中山已经失去了建立中央银行的国内基础。其三，并不具备良好的国际环

境。阪谷芳郎一再强调，银行股金之募集，“贵国非经列国之承认，甚属困难，故各国承认之日，即拟为发表（指“特许状”之公开发表）。”显然，根据当时的情况，孙中山对此是很难办到的。更何况国内形势发生了新的变化，清廷于2月12日宣布退位，孙中山已决定辞临时大总统职，让位与袁世凯。事过境迁，成立中央银行一事，已无必要。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取消前议，也就不足为奇了。

第四节 中央银行设立案与 日本国内的动向

如上所述，众多的日本财、政界头面人物参与中央银行设立方案，这在辛亥革命时期的中日关系中实属罕见。当然，这些人参与的程度不同，但“知情者”成分的多样化、身分的高层化，说明了日本方面视此事件非同一般。另外，这些财、政界人士及大陆浪人的地位、政治态度以及对中国的理解各不相同，他们代表各个不同的利益集团，扮演了不同的角色。因而，也为我们理解当时的中日关系，理解日本对华政策的复杂性、多元性提供了极好的素材。

令人遗憾的是，设立中央银行计划，在日本对华政策中如此重要，却一直为研究辛亥革命及中日关系的学者所忽视。这主要是因为，一、该计划几乎是在秘密状态下进行的，知情者甚少。二、有关资料过于分散，不为人们所注意。尽管关于阪谷等人的活动，报界曾有追踪报道，并有所涉及，只是缺乏确凿的实证，以致始终没能引起公众及后人的注意。这样一来，还历史本来面目，就成了时代赋予本文的使命。今天，弄清楚几十年来一直埋没于故纸中的这段中日交涉秘史，将有助于我们客观地、全面地了解辛亥革命时国际关系，认清日本对华政策的本质。下面仅探

讨日本国内各界对中央银行设立案的反响。

一、引人注目的聚会

1912年1月后，阪谷的行动已成为报界注意的对象。1月7日《报知新闻》刊登了下述一则报道：“引人注目的聚会：6日下午1时至3时，日银副总裁水町、兴业银行总裁添田及阪谷男爵三氏于兴业银行内秘密相商。据传闻，阪谷似已被革命军聘为财政顾问，并有于东京发行新纸币计划，彼等所协商之事，大概与此有关。”

对于这条报道，阪谷的反应极强烈，几乎是神经质。他在1月8日的日记中写道：“7日，《报知新闻》报道余任清国革命军财政顾问云云，今晨《国民新闻》反驳，斥其为道听途说、毫无根据。”9日，《国民新闻》根据阪谷的旨意，以《捕风捉影之谣》为题，坚决否定了《报知新闻》的报道：“6日下午1时，水町日银副总裁、添田兴银总裁及阪谷男爵三氏于兴业银行内联欢会。有人传阪谷男爵将任革命军财政顾问，并发行新纸币，三氏聚会乃商议如何在东京出售新纸币的问题。其实，前不久曾弥子爵逝世时，阪谷男爵首倡，并得松尾、水町、添田、丰川诸氏之赞成，有为子爵建碑之计划（中略），（此次聚会）拟择机在片濑建碑，后即散去。当然，因是久别后之重逢，自不免有财政、经济之余谈，但阪谷男爵将任清国革命军财政顾问，在东京出售新纸币等事，皆纯属捕风捉影之流言。”

阪谷的日记上，记载了6日这天访问日本兴业银行，与水町、添田等人见面事。1月8日，涩泽早饭后接见《报知新闻》记者之访问，述改正恶习之见。阪谷、涩泽唯恐设立银行计划泄漏，引起麻烦，直接向《报知新闻》施加压力的同时，又指使《国民新闻》做上述报道，以分散人们的注意力。

此后，日本报界一直关注并连续报道了南京临时政府的借款

动态。不过，由于具体情况不清，特别是以建立中央银行换取一千万借款的交涉一直处于秘密状态下，所以，几件不同的借款谈判往往被混为一谈。例如它们说，是何天炯代表孙中山、黄兴来日本负有借款使命，以至把设立中央银行事同汉冶萍（大冶矿山）借款、苏省铁路借款混为一谈，而后者的交涉是从1911年11月开始的。事实上，1月6日的聚会，正是阪谷就设立中央银行计划同二个银行界首领的碰头会，因此不能不说是一个重要的事件。

二、井上馨与大银行家的聚会

1月16日，阪谷收到孙中山委托他办理中央银行事务的信件后，立即按涩泽的指示拜访了井上馨。两个人当时具体讨论了什么，虽无直接材料加以说明，但当天中午井上就召集大银行家们在内田山聚会，讨论对华问题。大银行家的聚会，引起了报界的广泛注意。当时会议的内容，各报都有报道，如1月19日《万朝报》的消息说：“关于革命军募集军债一亿日元事，经我国某人于东西银行家间斡旋之结果，以年利7%、九七折扣、十年后偿本之条件，已达成三千万日元借款之草约。关于此公债，井上侯曾召集四、五名大银行家计议，扬言反对，大泼冷水，颇有泼妇之状云。”另一方面，也有报道说，16日上午井上听完阪谷报告后，立即召集参与此事各大银行家，表明了自己的反对态度。如17日的《大阪每日新闻》，就以《革命军募债与我财界》为题详细报道说：“16日中午，井上侯召集高桥、涩泽两男（爵）、益田孝、小田切万寿之助等至内田山私邸，恳切言道：‘现今，清国方面屡屡提出要求供给资金，官革双方皆有此要求。此时提供资金，非但危险之至，即便有确实把握，还须顾及与列国之关系，故需要充分注意。当此之际，各位切不可草率行事，沽取功名，而须互相戒告，采取极其慎重之态度，互相联络，一致行

动。日前，何天炯代表革命政府，为创立中华银行，曾得大隈、涩泽、阪谷两男（爵）等之帮助，正在奔走交涉中……。”这里所说的“大银行家”，指高桥是清（财政家）、涩泽荣一、益田孝（三井物产顾问，井上的亲信，当时正通过森恪与孙中山之间进行借款交涉）、小田切万寿之助（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等。井上既是元老，又是财政的“总司令官”。

关于16日的聚会，各大报纸的报道大致相同。革命爆发以来，日本的新闻界一直将其作重要消息重点渲染，日本政府及各界的对应也常常见诸报端。但进入1912年1月以后，这类报道却逐渐减少，正在这时，井上与大银行家们就中国问题举行聚会，自然又大大激起了新闻界的兴致，纷纷将其作为重大事件不厌其详地加以报道。如1月18日《国民新闻》，就以《革命军军资与日本，井上侯之训谕》为题报道说，“据财界实力人物讲，交涉决非一、两件而已，现革命党方面，欲以某铁道作抵借款，或计划成立巨额资本之中央银行。此事曾请大隈伯、涩泽男、阪谷男等人协助。然此类交涉非我一国，且非经持正式委任状代表之手，有甚为不可靠之处，故目下我国实业家之间，尚未达到为此而协商之地步也。”

阪谷16日日记中只简单地记载：“电话，涩泽男、井上侯云云，”等等。为此，有必要重视阪谷等人在16日里的活动。上午，阪谷访问井上。中午，井上召集四大银行家开会，席上，涩泽说明了中央银行的设立目的及进行状况，二时散会。下午，阪谷赴涩泽邸，他大概于此时才得知了井上的态度，并开始考虑对策。

17日上午9时30分，涩泽拜访了前首相桂太郎，就孙中山的设立银行要求问题交换了意见。两人会谈的具体内容现已无从考证，但是从后来日本政、财界对设立中央银行计划的态度，足可说明，由于井上的反对，使参与此事的各个方面当事人的反应，

更加复杂化了。

18日，阪谷访问了井上。显然是汇报关于准备设立中央银行的问题。同一天，井上馨、山县有朋、桂太郎三元老举行会谈。这又是一次引人注目的聚会。事态的发展之快，已经使最高决策层意识到，为了调整在对华政策（主要是设立中央银行及借款）上的意见对立，不得不首先就基本问题取得共识，加以协调。

三、三元老会议

在探讨三元老会议前，先分析一份来自中国的电报。1月17日，驻南京的陆军中佐古川给参谋总长发回了一份有关临时革命政府的情报：“据孙逸仙（中山）秘书池亨吉谈，美国有抢先承认新政府的意图，亦似有应诺借款于新政府之倾向。下官对此正倍加注意。”〔82〕这个情报，提示日本政府，美国将转变对新政府的态度。在孙中山、黄兴看来，自1月10日决定设立中央银行计划以来，一个星期已经过去了，当时提出的条件，即日本方面于十天内向革命政府提供一千万日元贷款，至今没有回音，他们已经再不能等待了。从这个意义上讲，孙中山秘书借古川之口，实际上转达了中国方面的意向和以美国为首的各国的态度，间接地敦促日本早下决断。与此同时，在日本国内，调整统一对华政策已迫在眉睫。18日的元老会议正是在这种内外形势下召开的。

新闻界非常重视三元老这么长时间的会晤。1月20日的《国民新闻》做了较全面的报道。“18日上午10时，福岛参谋次长拜访了桂公（桂太郎），会谈数刻钟后，俩人共进午餐，下午1时辞去。归途中又于官邸拜访内田外相，就某事相商。下午2时40分时，先有井上侯爵驱车抵桂公邸，随即山县公爵到。山县公是17日离开小田原别墅，18日下午乘火车抵新桥站的。三公爵于楼上客厅议论许久。此前，亦请内田外相来见，因有外事不能脱

身，不得已而以石井次官代理。次官于下午3时30分到，于是有三公爵与次官之会晤，次官至下午7时许辞去。山县、井上公侯爵仍留邸中，晚饭后，更议事至8时40分，山县公遂返目白私邸，井上侯回内田山邸，分别告辞。此次会谈内容，目下自不便在此妄加论说，而识者当亦可从此来往状况中判明几分也。而其结果如何，惟待今后事实之证明也。”

此次会谈后，19日山县有朋进宫参见了天皇。1月20日的《万朝报》又就上述聚会与进宫参见一事之间的关系作了评论：“山县及井上侯，曾于18日在桂公邸与主人鼎坐议事，协商某重要事件，石井外务次官亦代理内田外相出席。19日，山县进宫参拜，西园寺首相亦于当日在官邸中与外相有所密议。”

这一连串的活动究竟有何内在联系呢？它们实际上可以说是日本最高决策者之间在对华政策上进行意见交换和修正政策的重要会议。这里，我们虽然没有找到直接的资料证明这一点，但通过1月21日《东京朝日新闻》上刊载的《桂公谈三元老聚会》一文中，似乎可以得到若干启示：“……与山县公、井上侯相聚，非对清问题向政府指手划脚，更无施加压力之意。然余等到底为何聚会？实际不过是余有事欲与之商谈，决非研究对华问题。近关于清国事件，确有各类人因各类目的作各方面之运动，其中亦有手持盖有煌煌大印照会状周旋上下者。对此，我辈自有所准备，不能草率应付。若节外生枝，政府处境亦将不妙。故我辈实乃商谈对进行此类运动者应取之态度也。非为对华问题，而是对运动者问题。……”“非为对华问题，而是对运动者问题”，桂太郎的这句表白，不打自招地泄露了天机。

然而，如前所述，井上于16日与大银行家有过聚会，接踵而至的是这次最高决策者的会议。这无疑证明了三元老会议的目的主要是统一协调对华政策。因此，什么讨论“运动者问题”之说，完全是想掩盖问题的实质。说到底，三元老会谈的目的，是

最高首脑讨论、协调围绕设立中央银行而出现的各种意见分歧，力图找出对华政策最佳方案的一次“高层会议”。其起因大概是16日受到井上反对的涩泽、阪谷等人向桂太郎详细地汇报了此事，争取桂的协助。桂应诺之后，才有了18日的三元老会议，三人就中央银行设立计划等对华政策进行了长时间的交谈，让外务次官列席，征求外务省的意见，也证实了这一点。当然，所说“持盖有煌煌大印照会状”，应该是指孙中山的委托电文等。

元老会议的结果，几位元老们在对华政策上，特别是对设立中央银行一事上的意见基本趋于一致。只有井上，直到最后坚持反对这个计划，反对借款1千万元。

16日及18日两次会议，可以证明日本政、财界的首脑们慎重地讨论了中央银行的设立计划。这两次会议证明了，中央银行问题在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中占据了相当重要的地位。同时也反映出日本政府极为关心的是南京临时革命政府以什么样的条件向日本的哪一种政治势力寻求借款。

日本财界垂涎中国市场由来已久，只是长期以来，没有更大能力，没有机会同列强竞争，扩大其在中国的势力范围。辛亥革命给财界带来了对华经济扩张的良机，设立中央银行的计划，是极便于日本控制中国财政、金融的一个具体步骤。但是，由于财界内部的意见分歧，加之井上的反对，涩泽、阪谷等人不得不搬动在当时仍有参政议政并具有相当影响力的元老，期待得到元老们的支持，来推动计划的顺利进行。

阐明元老们在对外政策制定过程中的作用，有益于理解辛亥革命时期日本的对华政策，下一节将试对这一问题进行专门探讨。

第五节 元老政治与对华政策

要了解明治时代尤其是明治末年日本对外政策的决策过程，

首先就必须了解这一时期日本的政治结构。在日本近现代史上，“阁议决定”通常在决定外交政策时具有相当重要的意义，但是在召集内阁会议时，首相究竟处于什么地位？掌握有多大的权力或权限？则又是一个问题。须知明治宪法与战后宪法相比，首相在宪法上的地位是截然不同的。从辛亥革命爆发的1911年10月到翌年夏为止，正是日俄战争后日本内政由明治时代向大正时代转变的时期，日本的政治权力结构正在发生变化。支配了大半个明治时代的藩阀势力，日俄战争后被逐渐强大的其它各种政治势力所取代。这包括在藩阀势力羽翼下成长起来的政府官僚，通过甲午、日俄战争发展壮大的财界资本家阶级和作为一个独立势力而崭露头角的陆军。然而，此时日本政治的中心仍未形成，诸多政治集团，力均势敌，谁也没有压倒对方及支配全局的力量，因此，政策决定过程混乱异常。制度上，元老由权力的主体转化为权力的象征，是象征的存在，但对内对外政策的制定过程中，有着相当大的影响力。这就是当时日本政治结构的一个特征。元老所发挥政治作用的这种变化决不意味着元老权力的减小。特别是像山县有朋、井上馨、桂太郎、松方正义这样的元老，分别都代表着陆军、财界、内阁等不同的侧面，他们的意见对决定涉外大政，具有决定性的影响。

因此，元老们的意见分歧，总会对外交政策决策过程产生影响，这一点是不能忽视的。从上节提到的井上馨对中央银行设立计划的反对态度和三元老会议，似乎足以说明元老们对涉外政策的制定具有举足轻重的制约力。在国内政治体系已经形成的1911年以后，元老们虽然不再是“政策上、实践上的统率者、领导者”，但实际上山县、井上、松方等人作为陆军、财界、政界的最高领导仍然能够牵制和左右政府的对外政策。但元老们对政府政策的牵制和影响力，已经与日俄战前不同，他们只能通过代理人或通过电话、书简来表明自己的态度。日俄战后到1915年之

间，除了事关国家内外大政的重大政治问题外，一般是不召开元老会议的。

而元老们对设立中央银行计划一事的反应之所以如此敏感，并不仅仅是因为这个计划本身事关重大，更是因为元老们对这个计划的见解产生了分歧。从元老们对这个计划的态度转变过程，我们可以了解到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国内的政治结构，以及日本方面反应的变化过程和特点。

一、政策的转变

武昌起义之初，日本政府的态度是以支持清朝政府作前提与列强协商的基础上试图扩大在满洲（中国东北）及中国内地的侵略权益。如何通过辛亥革命之机，扩大日本在满洲及中国内地的势力和权益。对于这个问题，上述诸多政治集团，如陆军内部、政府官僚内部、财界及资本家内部，都存在着两种对立的意见。即积极的扩张主义论者和消极的维持现状论者，这就是导致日本对辛亥革命反应复杂化的国内原因。

迄今为止，认为1911年10月到1912年1月间，日本政府对清政府支持由积极转向消极的观点，似成定论。而政策的转折点，则一直被认为是1月12日的内阁会议，但是，如果根据新发现的史料，综合这个时期里日本政府的态度，这个政策的转折点，似乎应该提前，即从1911年12月24日的元老大臣会议为界。从这个元老大臣会议起，对华政策的转变已经开始了。

在12月22日的内阁元老会议上，内田外相提出清国的政体问题询问政府的方针。据原敬日记，当时阁议的情形是：“内田外相报告就清国事件，英国转告日本：即便清人拒绝君主立宪之劝告而取共和政治英国亦听任其自由。余虽以为君主立宪为最良政体，却不以为其乃解决时局之最佳方法。因革命党不会同意君主立宪，只徒然使上海之谈判破裂而已，故虽对向英国建议一事无

大异议亦提出放弃此主义为上策。石本陆相等阁僚遂无异议而决定之。”〔83〕这就是说，日本政府这时已经放弃依靠立宪君主制来收拾局面的主张，对支持清朝政府的一边倒政策开始进行修正。在24日的元老大臣会议上决定了支持革命军方面的一项具体措施——中央银行设立计划。一份当时驻华海军舰长武部给海军当局的信件，报告了三上丰夷所谈1911年12月24日元老大臣会议的情况：“44年12月松方侯爵、西园寺侯爵、山本伯爵（井上侯爵缺席）等审议了日本当前的清国动乱之对策后，作出如下决定：1.革命军之瓦解，关系日本之国是。对于以何种手段得使彼等持续今日之势力问题，讨论结果，决定首先给予财政援助。2.鉴于日本财政实力，足以满足其需要，以财政援助，使其建立华南整体经济，巩固革命政府，实为上策。3.关于具体方法，阪谷男爵对此调查数年，颇有成果（请阪谷男爵列席）。4.阪谷认为：欲建华南整体金融机构，当需十亿日元；而欲求解眼下之危，一亿日元足矣。并出示其成案。5.随后又招集有关众议院党魁，说明此项方针，彼等意见亦趋一致，认定有必要与孙文商议。6.担任此项交涉者需不偏不党并熟悉孙文者，筛选后决定委托神户轮渡店主三上丰夷氏。”

此外，内田康哉在12月24日的日记中也记载了这次会议的情况：“九时访桂公，谈清国事件。午后二时半访西园寺侯，报告会见桂公始末。元老会议三时开始，六时结束。出席者有山县公、桂公、大山公、松方侯、西园寺侯、山本伯、斋藤海相、石本陆相。井上侯缺席。”〔84〕

关于三上丰夷，原敬在日记中写道：“神户营轮渡业者三上丰夷，经熟人介绍来访。该人与清国革命党首领有亲密交往，黄兴等人受其关照，此次事变之际革命党屡托三上询问我政府之意向。三上略述事情经纬又问及我政府之态度，余告其我政府决无排斥革命党之意，惟因另有北京政府在，故与其保持关系亦属当

然，若以此举视为忌恨革命党者，则误解也。谅三上将余之所言密报革命党员。但余之直言属外交上之忌，故需严加警醒。”〔85〕

从内田日记来看原敬没有参加元老会议。但从原敬日记中可看到他关于三上的记载来看，三上同建立银行事关系之深，得到旁证。

据《阪谷芳郎日记》载：25日，阪谷打电话给桂太郎、西园寺。26日，阪谷又访问西园寺，27日访问桂太郎、松方，并会晤了内田外相。”阪谷本人虽然没有记载自己是否列席元老大臣会议，但从24日以后他的频繁活动来判断，阪谷分明就设立中央银行事同桂、西园寺和内田进行了多次协商。24日会议后，日政府一改以前对清一边倒政策，转而同时支持革命军设立中央银行，对官革双方采取了两面政策。阪谷为此项计划的具体负责人若没有元老的支持，若不是政府对华政策从根本上发生转变，素来同中国少有交往的阪谷，突然热衷于帮助中国设立中央银行事，就难以解释了。

二、矛盾的对应

12月24日的元老大臣会议是日本政府对华政策的转折点。这种转折，并非是停止支持清政府，转而支持革命军。设立中央银行援助孙中山等革命派财政的考虑，充其量不过反映了日本政府对华时局认识的变化。日俄战后，日本吞并了朝鲜，“日本生命线，已扩大移向中国大陆，尤其是新近获得权益，站住脚跟的南满”〔86〕，日本的对华政策已逐步成了大陆政策的核心内容。辛亥革命爆发后，日本认为这是扩大在满洲、中国内地权益的“天赐良机”。他们支持君主立宪制，以图实现上述计划，是革命爆发初期日本采取对清一边倒政策的目的所在。但是，一旦他们意识到君主立宪制难望成功，便马上开始考虑进行政策上的调整。然而，由于中国形势的复杂多变，由于日本内部对华认识

参差不齐，以致在政策的转换过程中，出现了各式各样的问题。

12月24日，内阁会议决定，在支持清政府同时，亦对革命军给予财政援助。但是，当天及第二天，内田外相给驻华公使伊集院发出与内阁会议精神相反的电报：“帝国政府认为确立君主立宪制度为解救清国时局之最良方策。此点，前已屡曾详电告之，今仍保持原意，并无任何改变”〔87〕。25日的电报中，内田说“昨日元老会议议决事，已以第405号电报告知我公使。但又认为当此时刻亟采取措施，通过背后手段软化革命军，使其以君主立宪为基础继续进行协商，故拟通过与政府完全无关之途径，于近日内密派一两人前往上海，向革命军方面有关人士进行劝说。”由于事关重要，内田再三叮嘱“此事，特以本大臣个人名义密告我公使一人知悉，以供参考”〔88〕。以往的研究认为，内田的这种态度，或许正如犬养毅所分析的那样，有元老们的背景，特别是山县有朋的强大压力。但是，如果24日的元老会议讨论了数种不同的选择方案，中央银行计划也作为时局对策的一个内容受到元老们的承认，那末在采用这个计划的同时暂继续采用支持清朝政府的方针也不是完全不可理解的。

27日的《二六新报》这样报道说：“24日，首相、各大臣及桂、山本、松方、大山诸元老于首相官邸相聚，讨论今后之方针。其结果自不待言，固然是复归历来之旁观态度。按我国目前之情况而言，不便无视日英同盟，一反英国之主张，单独奋力支持君主立宪制，当此之际亦更不可落井下石，旁观大厦之倾覆也。”

同时期，舆论界还出现了讽刺元老大臣们对中国形势判断失误的报道。如31日的《二六新报》写道：“本年度已在邻邦之大骚乱中结束，余辈虽不忍见我邦元老大臣于邻国大灾之际，狼狈不堪之丑态，所幸尚未出现大破绽也”。

尽管元老的地位、作用都相对地减弱，但是在对外政策制定上仍为不可忽视的上方势力。对此，孙中山深知其要，曾想借助

元老力量得到日本的援助。这里还可以再提出两份材料予以佐证，其一是现存于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松方正义文书》中孙中山1月15日寄送松方正义的委托书简（信纸为中华民国公文用笺），其二是松方致阪谷的回信。孙中山致松方正义的委托书简内容如下：

“松方侯爵阁下

中华民国政府设立中央银行之事，已囑托阪谷博士、原口博士，关于此件，当望阁下鼎助实为厚幸。专此。孙文

中华民国元年元月十五日 大总统印”。

对于孙中山的这封书简，松方是如何作答的呢？我们可以通过下面这封松方致阪谷的回信，看出他对中央银行一事的态度。1月30日阪谷给正在热海避寒的松方发去一信，谈了中央银行计划的始末，2月5日，阪谷就收到了松方的回信：“关于孙文所托设立、组织中央银行事，承蒙贵下多方之教示，愚以为实在言之有理。日前，拙宅亦曾收到委托之信函，但不巧正遇余避寒中。所幸有关各君处也皆收到委托信函，若以此事而断，凡向有关诸君请求关顾，谅必可顺利办成也。谨以此作答。”〔89〕这封信表明了，松方对中央银行设立计划的态度。毫无疑问，松方的出发点当然也是想在革命胜利后的中国进一步扩大日本的权益，可是，出于同样考虑而对中央银行计划采取了完全相反态度的元老也大有人在。例如，井上馨的态度便是一例。元老之间的这种意见对立，直接影响到日本政府的对华政策，中央银行设立计划，为此而受到影响。

三、井上的反对

井上为什么反对中央银行设立计划？其具体原因我们将在后面详细分析，这里先介绍下述宫崎滔天的一段回忆，它在某种程度上触及了事实的真象。

松方侯爵肉下

中華民國政府設立中央
銀行一事已為記阪谷博士
原口博士聞於此件一為此
肉下鼎功實為厚幸

中華民國九年秋

孫文



“……第一革命（指武昌起义及各省响应）爆发，南京政府组成，进而兴起北伐军之际，曾与日本资本家间达成一千五百万元之借款，惜乎！井上馨从中作梗，遂忍气吞声与袁世凯妥协，交出南京政府，此亦人所共知之事也。”〔90〕不难看出，滔天是深知此笔借款的重大意义的。那么，井上为什么要反对呢？滔天在另一处回忆说：“政府赞助，实业家出资。实业家们最初谈及此借款时也曾议论是否告知井上公。是时多数实业家以为与井上公相商，必定喧嚷不已，不如先斩后奏，求其事后承诺，不然（井上公）闹起来，则将一事无成。多数意见如此，于是遂进行交

涉。岂料中途有人将此事暗报井上公，公勃然大怒。”〔91〕

根据滔天提供的线索再回忆一下中央银行设立计划的展开过程，尤其是12月24日元老大臣会议，及其后井上的态度，使人觉得滔天的叙述有其道理的。当然，井上之所以持反对态度，首先是出于他对时局的基本认识，但不能不否认这里面多少含有滔天所说的感情色彩。当时的元老，“在政治上掌握至高无上的实权，政府不能无视他们的意见”。作为阪谷，背后虽有一位元老松方的支持，但也难以同元老井上抗衡。直到后来，曾任日本总理大臣的加藤高明一直认为元老涉政是立宪政治的癌，他出任外相后，立即废除向元老呈递机密文件之规定，并对元老的涉政，冷嘲热讽，公开散布“元老想提意见，请到东京来住，不要呆在奥津（避暑地）遥控。”这是当时抵制元老涉政的一个典型例子。然而，在明治、大正交替之际，元老并未退出政治舞台，不可能有人象加藤高明这样公开顶撞元老。

事实证明，有众多日本政、财界人士参加参与的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成立计划，加之元老们的参与，实际上构成了辛亥革命时期日本对华政策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第六节 大陆浪人、三井财阀、井上馨

辛亥革命时期，在中国中部、南部拥有相当重要特权利益的三井财阀，曾积极地向革命派提供过资金援助。在三井财阀和孙中山、黄兴之间穿针引线的，是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萱野长知、内田良平等大陆浪人。这些大陆浪人，分别基于不同的立场接近三井，动员说服他们支持革命派。

其中，内田良平与众不同，他是日本民间对外强硬派的主要代表。他认为政府当局在对华政策上摇摆不定、软弱无力，期待西园寺内阁和山县有朋、桂太郎一派，给中国革命党人以支持是

靠不住的。内田的惯用手法是借用财阀的力量，影响政府的对华政策，进而援助中国革命。内田选中三井财阀，正是出于上述的目的。山田纯三郎则不然，他是受孙中山委托找到三井。当时，他在三井物产上海支店工作。孙中山自欧洲回国时，山田与宫崎一同赴香港迎接。此时，山田受孙之托，开始为革命军筹款〔92〕。经内田斡旋，1月24日内田、黄兴、宋教仁分别同三井物产东京本店以及上海支店签署了一项三十万日元（该契约无担保，为期6个月，年息7分）的借款契约〔93〕。而后，南京临时政府同日本各方面相继签署了三项巨额借款。从客观上来说，1月24日的借款拉开了日中巨额借款的序幕，这几项借款谈判，为何长期交涉不决后竟于几日内迅速签订了合同呢？初步分析大致有如下两个原因：（1）时至1月20日，以成立中央银行，获得1千万日元借款计划已流产。为此，孙、黄为解燃眉之急，不惜任何代价以各种途径求得日本的援助。（2）大陆浪人于革命爆发之初，已同日本各界有所接触，为上述借款谈判及签订合同打下了基础。

1月20日，黄兴向山县、井上发出希望援助南京临时政府的书简。同时命令何天炯和盛宣怀立即签署汉冶萍借款合同。1月21日，何天炯代表南京临时政府致函汉冶萍公司，希望其协助与日方签订借款合同：“汉冶萍公司大鉴：刻接南京政府来电，须将该公司改为华日合办，因等巨款以接济军费，兹请贵公司即日照行，所有后事新政府能一力保护，断勿迟疑可也。何天炯顿首。中华民国第一年正月21日”。〔94〕

为了早日达成借款协议，22日、26日黄兴两次电催盛宣怀：“前由何天炯转达尊意，承允助民国由汉冶萍公司担保日金五百万元，归民国政府用。见义勇为，毋任钦佩，兹特请三井洋行与尊处接洽，商订条约，即日签押交银，公私两益……。陆军部总长黄兴顿首。1月22日”。〔95〕

26日的电报，口气则更为严厉，宣布如果即日内不进行借款

交涉，“民国政府对于执事(指盛)之财产将发没收令也”。〔96〕

黄兴期待如此之殷的汉冶萍借款，最初始于山田纯三郎介绍孙中山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相见时藤濑的提案，其后又由三井物产的常务理事山本条太郎、驻汉冶萍日方代表高木陆郎和三井物产职员森恪等人将其具体化，内田良平在其间也起了一定作用。20日，这项交涉以三井借款一千二百万日元达成协议。但两天之后的汉冶萍股东大会上这项借款契约又被否决。

过去，评论或介绍这些借款的学者，大多数过分地强调了日本财界和大陆浪人为了获得利益而支持革命派的这一方面，有意或无意地忽视了孙中山、黄兴对此也有强烈的愿望的这一方面〔97〕。因此，为了全面地理解这项借款交涉的前后始末，有必要重新追寻一下内田与三井财阀的关系。

武昌起义爆发后，内田良平为了使陆军打消干涉中国革命的念头，曾作过不少说服工作。此外，他又和杉山茂丸一起前往朝鲜，向朝鲜总督寺内正毅和宪兵司令明石元二郎进言。明石为筑前人，与玄洋社交往很密。当时的陆军内部，以山县为首的反对中国革命的势力占压倒优势，寺内、明石也是反对革命的强硬派，只不过在利用此一时机来解决满蒙问题这一点上，他们的意见与内田相同〔98〕。内田在前往朝鲜的途中，恰遇山下汽船公司和满洲运输公司的创业者山下龟三郎。从山下的谈话中，内田知道了太平组合(三井、大仓、高田的合资企业)正企图用山下的船只将大量武器运送给北京清政府的情报。在下关下火车后，内田立即致函三井的益田孝，认为：此次中国革命“决非偶然，乃十数年来支那先觉志士指导、宣传革命思想之结果”，所以“清朝之崩溃，乃大势所趋”。内田指出在此形势下，“日本政府为何将武器给北京政府，现今三井、大仓、高田三家已同北京政府达成4500吨重炮、榴炮弹、机关炮之契约”，“必将招致大多数汉人之不满，给以后带来不利”〔99〕。最后，内田强调“此时

若伤害革命党之感情，不论将来是否对支那实行瓜分，都将给日本国家利益带来极大损害，故望中止向北京政府出售武器”之举。同时他又强调了财界应放弃对清袁一边倒的政策，指出支持已经占领与日本利害有直接关系的华南地区革命势力的必要。而且，“前年以来，黄兴、宋教仁等首领屡入满洲，与马贼及革命党员取得联络，计划一朝南方有事，……满洲亦兴兵举事，以牵制北京”。所以内田又提议，为了不搅乱“与日俄有极深利害关系的满洲之秩序”，“须中止举兵之计划”。〔100〕

益田孝十分重视内田的来信，马上持内田信，访问了井上馨。据益田孝说，“井上看了内田书简，当场表示说：内田言之有理，自己完全赞同，三井的方针可按你（指益田）的考虑去办，但先跟桂（太郎）打招呼，然后跟桂一起去找西园寺，甚至连具体方针也作出了指示”。于是，按井上指令，益田立即访问了桂太郎，而后又跟桂一起拜访了西园寺〔101〕。内田了解了这些情报后，立即给在上海的宫崎滔天打电报，请宫崎转告孙中山、黄兴应致电西园寺、井上、桂等人，“适当表示意愿”。

井上馨授计于益田孝的同时，也让内相原敬看了内田的来信。10月29日的《原敬日记》中说：“井上突然要求见面，遂往访之。有内田良平赴清途中致益田孝书信，言日本卖武器于清国政府一事将严重伤害叛军（指革命党）之感情等等，（井上）示其信且问，眼下当采取相应之措施，即便仍然要送武器去，可否找某种借口予以延缓。余则以尚需与西园寺等相商作答。现居清国南方或与之贸易者之问题虽然亦需顾及，陆相等亦希望卖（武器）于彼等，但庙议已然决定，而今亦只有访西园寺，转达上述井上之意见，求其三思后行。时至今日，恐亦无良策可施。”〔102〕

西园寺和原敬对这一问题的态度是不同的。原敬似乎同意了井上的见解，但西园寺却一味坚持支援清朝的态度。就在上层决策者之间，意见分歧、各不相让时，内田良平等大陆浪人进一步主

张哪怕停止对清援助，也必须从财政上资助革命军。经他们与各方面周旋，终于在1912年1月下旬，达成了前述的三十万日元三井公司的无担保借款。

这项契约签署之前的22日，益田孝又访问山县有朋，报告了三井通过向南京临时政府提供资金以图扩大日本在华权益，尤其是夺取垂涎已久的铜官山、招商局的计划。山县听后极为满意。23日，益田致信井上说：“昨夜向山县公详细转告井上公口信后，公极满意，且云凡能获得之利权如铜官山、招商局等，望速获得之。但未言及其具体行动。另外，公转告，此举与西园寺首相详议，尽量避免损害共和政府感情。森恪抵达后，铜官山问题即可有电报来，可速行事，已遵嘱准备于东亚兴业公司，无论如何办理，当遵嘱不由政府出头，而仅以民间名义实行之。”〔103〕

无庸赘言，益田孝在这个借款交涉过程中通上达下，乃名符其实的幕后策划人、指挥者。内田良平则扮演了南京临时政府、日本财界和三井财阀三者之间的联络员的角色。

另一方面，山田纯三郎在回顾孙中山请求从日本获得借款时的情况说：“12月25日，在香港至上海船中，孙文对我说：‘你在三井那样的有钱处工作，帮助搞点钱吧！’我问：‘究竟需要多少？’‘越多越好’，‘一千万、二千万都可以。’听了这话我目瞪口呆。自己是个小职员，当然搞不来那么多钱。孙文看我面有难色，就鼓励说：‘你还没有去干，怎么知道干不成呢？’山田被孙中山这样信任与诚挚所感动。12月25日抵上海后，立即面见当时三井银行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说明了原委。藤濑说：久闻中山先生大名，可惜无缘相见。不见一面，何谈借款！我把藤濑的话转告孙文。孙说‘那我们马上就见面！’于是二人相会了。会见地点是藤濑公司的住所，当时森恪也在座。会谈进行状况极佳，一周后支店长处就有了回答，这就是后来的五百万元借款”〔104〕。这笔借款，就是1912年1月下旬达成的汉冶萍借款。

与此同时，森恪应萱野长知的要求，据说也未通知本社就擅自作主拿出支店的机密费(有说十五万元，也有说三十万元)，交给了南京临时政府，开了三井援助中国革命活动的先河〔105〕。东京本社的常务经理山本条太郎和益田孝听说后极其震惊，急忙赶赴上海，指责森恪越权行为。森恪拒不认错却向他们滔滔不绝地讲起中国形势，并扬言：“革命成功之后，扬子江一带之利权即可全归三井即我帝国所有，此正是国家兴盛之策也”〔106〕。森恪的想法，明确反映了一部分日本资产阶级援助南京临时政府的真实动机与目的。

财界的头目，在辛亥革命中所持的态度，总的来说，对辛亥革命是积极支援的，虽然他们关心的目的，不是中国革命的成功与失败，而是要将赌注押在未来中国的统治者身上。因此，在具体行动上，他们常常是与大陆浪人、军人中的最积极的那一部分结成一体，推行最具体的大陆政策。

大陆浪人(也称支那浪人)活跃于中日两国之间，他们中的左、右两部分因政策、手段的不同，常常依赖、投靠不同的政治后台和主人，并以其日本后台的政治背景、力量，来同中国方面的“盟友”、“同志”进行交涉，实行他们各自的相差天地的“援助”。例如，辛亥革命初期，内田良平、头山满想乘辛亥革命之机解决满蒙问题，内田良平协助建立南京陆军医院，头山满组成了“中国问题同志会”，目的都是为了解决满蒙问题。川岛浪速为所谓大陆问题到处活动，策划了第一次满蒙独立运动，阴谋成立分裂中国的“满蒙王国”。而宫崎滔天似的民权主义者，却是真心实意援助中国革命的忠诚朋友。大陆浪人辛亥革命期间，大多数周旋于日本政府、财界周围，为革命党人筹措借款，但动机与目的却大不相同，要真正了解和认识他们的思想和行动，还需要我们对此作进一步的客观分析。

第七节 孙中山与日本财界

辛亥革命终因种种原因而失败。笔者认为，在诸多原因中，财政上的困难居首位。通过对中央银行设立案形成过程的考察，或许使我们更认清了这一点。这一节，我们分析孙中山在中央银行计划上的态度，考察孙中山与财界的关系，进而了解孙中山对日本的认识，体会南京临时政府的财政困难。

一、对日本的期待

日本学者藤井升三指出，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经历过一个由依赖到批判的变化〔107〕，也就是说，孙中山的日本观在1919年五四运动之前，主要是对日期待，主张中日提携。那么，对日期待主张中日提携具体表现如何呢？本节准备透过中央银行设立案过程，考察在辛亥革命时期孙中山对日本的态度。

1911年10月23日，经欧美归国前的孙中山向日本表示，希望能给予直接的军事援助的愿望。他在写给旧友管原传的信中说：革命军的指挥官及武器皆感不足，“切望（日本）政府暗助一臂之力，贷我以士官，供我以武器”，还希望管原等“向伊藤侯、星君等力说此事”等等〔108〕。管原后来是否应孙中山的要求进行了活动，现在还找不到具体的材料加以说明，但日本政府后来对向革命军出售武器，采取了默认的态度。

当时，孙中山向欧美各国寻求借款的努力均一无所获，能够给革命军提供援助的国家，只剩下了日本。1912年1月9日，黄兴写了一封长信给井上馨〔109〕。

另外，南京政府还希望通过聘用日本人顾问，而取得来自日本方面的援助。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后，曾任命了八名外国人顾问，除美国人荷马·李之外，剩下七人全是日本人，这七个人即

法制顾问副岛义一、寺尾亨，政治顾问犬养毅，财政顾问阪谷芳郎、原口要，外交顾问内田良平，海军顾问太田佐三郎（未定），犬养当时拒绝了任命，阪谷、原口、内田等人的任命均有正式发表〔110〕。聘用如此多日本人顾问，可以看出孙中山等人对日本所抱的希望之大。

在日本政府方面，虽然最初采取了与英国协调实质上是对清朝一边倒的对华政策，但1911年12月24日的元老、内阁会议承认了阪谷提出的设立中央银行计划，开始向援助革命军这一边倾斜。阪谷的设想经三上丰夷转达给了孙中山、黄兴。孙、黄最后决定同意设立中央银行，并向日方提出了十天内借款1000万日元的条件，他们对日本可能提供援助的期待，自然也越来越大了。

但南京临时政府与日本之间所进行的几项借款交涉都没有实质性进展，新政府的金库仅余二十几两，面临这样严峻的财政危机，孙中山等人急于得到外援的心情是可以理解的。如前所述，1月9日到20日之间，孙中山等人突然又对解决财政困难充满了自信，显得极其乐观，这跟中央银行设立案及随之可以到手的一千万元的借款不会无关。

然而，约好的十天时间过去了，日本方面仍然毫无借款的任何具体行动，孙中山等人心急如焚，对日本由期望转为一种巨大的不安。

二、焦急与努力

孙中山、黄兴等人一直十分重视同日本的关系，希望能够得到理解和支持，对日本政府上层寄予极大的期待。中华民国一成立，孙、黄二人联名向山县有朋发电：“转呈山县公鉴：欲保东亚和平，必得日本赞成民国，我公大力可以主持无任盟。”

迫切要求日本能率先承认新政府，给予各方面援助。山县收到孙、黄二人的电报后，1月15日，在给桂太郎的信中只是说：“关

山縣名公

（後六時着）

轉呈山
運配縣公鑒談保

東亞和平必得日本

贊成民國
尊公大名

以主持無任盟禱

孫文黃興

于清國政情，已向益田孝轉達了孫文的委托。”并没有表示具体意见〔111〕。

由于日本方面对设立中央银行，内部意见分歧，如期实现计划的可能性越来越小。孙中山、黄兴等了解这些情况后，为了尽快得到这笔借款，又作出重大让步，宣布只要能够得到借款，可以向日本提供重大利权。20日，孙中山派特使前往日本使馆，希望日本尽快承认新政府，并说明作为其报酬当给日本以最多的利权，敦促日本方面早下决断〔112〕。

同时在稍前一天的19日晚，黄兴又亲自给山县有朋和井上馨等人发去长信，希望他们承认民国和提供援助〔113〕。这两封长书信，内容大致相同，现全文摘录如下：

“山县先生大人阁下：敬启者。远违教益，时切怀思。迩者民国义军，光复者分过中原之半。新政府成立，余以薄德添任陆军部总长之职，军事旁午，久不奉候，深用歉然。愿念新国建造之基虽已树立，前途辽远，来日方长，幸荷贵国诸大君子推同文同种之爱，自民军起义以后，提倡奖借，不遗余力，以至于今。感激之情，匪可言谕。先生为国中巨

孽，泰山北斗，特望素崇，登高一呼，其应自捷。以鼎力扶助民国，早邀各国之承认，大局一定，可以维持东亚之和平，民国之福，亦东亚之本也。引颈东望，祷与祝，并敬托何君天炯，面达一切。幸惟鉴察。专此。敬请台安。弟黄兴顿首。”〔114〕

“井上先生大人阁下：违教久矣。每怀丰采，心与心藏。缅怀起居多膺吉祉为颂。迺者，民国政府初立，兴以薄德，添受陆军总长之职，任重道远，良困惴惴。民国主旨在革新政治，开中国之新运，以士东亚之和平。贵国士者念唇齿之相依，鼓兴论之相助，寸心铭感，各有同情。尤望先生于民国成立之初，鼎力提倡，俾得速邀各国之承认，大局平定，得以从容布置，奠我国基，我全体国民受惠实多矣。敬托何君天炯代陈一切，希维亮察。专此。敬请伟安。弟黄兴再拜”〔115〕。

日本上层对黄兴情词恳切的书简，反响如何呢？21日，益田孝致信山县有朋说：“中国之情势，议会派也不易为袁所欺，袁无意由公选成为总统，以昨日之电信看又无让位之意，结果恐终将以袁之辞职而结束也。”〔116〕黄兴的信大概是由益田孝转交的，故益田致函山县，为孙、黄的革命事业游说，以取得山县的支持。益田知道，对华借款没有山县的赞同，是很难顺利进行的，但是，历来嫌恶革命派的山县并没有表露出支持的意思。

这个时候，一直在帮助南京临时政府工作的寺尾亨，于1月20日及23日连续打电报给东京的犬养毅、长谷川芳之助、井上敬次郎、涩泽荣一、古岛一雄、大隈重信和小川平吉说：“为承认新政府而派人，时机尚早，然仆当然尽心尽力”〔117〕。

1月21日《时事新报》，入木三分地揭示了日本政府的对华态度的本质是：“随清国时局之变化，日本更对满洲抱领土之野心，此不难预言也。欧美各国也担心日本政府乘虚而入，向外扩

张，包括在内地”。这类观察，可以说是一针见血的。

孙中山、黄兴看到中央银行计划的实现渐无可能时，又向各方面指示，尽快完成自革命爆发后不久就着手进行的另外几项借款交涉。此外，黄兴在20日前后，还以湖南省的锑矿销售权为抵押，向美国提出了借款一千万元的计划，但由于内部的反对而未获成功〔118〕。这样，可以搞到借款的国家，最后还是只剩下了日本。

孙中山、黄兴周围的日本人十分关注临时政府向美国寻求借款的动向，他们纷纷向日本政府传递这个情报，要求日方早日同意革命派的请求。当时就有这么一份电报：“一月二十五日午后零时五分发自上海。致东京邮船近藤男爵。此件昨夜已电告。黄兴、孙逸仙等言，若日本准备马上做保日本承借，此际若无此保证，则将与美国交涉条件更优。故一千万元之借贷，若有可能，望立即予以保证。本契约直接与招商局有关，尤可重视也。待回答。邮船支店长伊东。”〔119〕

这里需要注意的，此时在中国的日本人已经估计到了：如果不想使中国的利权被美国夺走，就应该支持孙中山，提供一千万元借款。中央银行计划受挫之后，他们又打招商局的主意。同样，为了挽救财政的危机，南京临时政府为了获得日本的援助，就必须付出诸如中央银行、招商局、汉冶萍矿山等方面的利权。

三、三项借款重开交涉

①铜官山借款

铜官山借款交涉开始的时间很早，其间的具体经纬虽然不明，但从森恪翻译的条约草案中我们能看出其大概情况：

条约草案

安徽省咨议局及安徽矿务局为甲方，森恪为乙方；特定下述契约：

一、甲乙共同经营铜官山铁矿及泾县煤矿经营炼铁厂，

称为□□有限股份公司。

二、资本定为三百万元，甲乙各出资一百五十万元。

三、甲方将从英国赎回铜官山所需之款及铜官山、煤矿之价格共计一百万元为甲方之出资，下余五十万元由乙方贷与甲方。

四、契约签定前，乙方得以自费派遣技师视察矿山以定其设计。

五、当于支那法律之下设置之。

六、成约后甲乙各推总办一人、董事数人（甲乙方人数相同），经管一切事务。

七、甲乙权力平等，甲方主要负责与支那内地人之交涉事务，乙方负责技术。

八、所需资金甲方向乙方借贷，但年息不得超过七分。

九、每年之利息分为十二份，五份分配股东，五份作归还乙方借款用，余二份由甲乙方所得。

十、国税、地方税等均依支那法律为准。

此上为安徽咨议局员及矿务局总理等在上海时对小生（森恪自指）提出之条件。据今日之来电，留驻安徽之咨议局员亦赞同之，故望日方也速派人来上海，抵岸后尽快签定之。

另上記条约附加条件是以安徽省税金为担保，须向新政府贷款一百万元以充军费也。

一月二十一日译 森恪 [120]

②招商局借款

招商局借款交涉始于1911年12月，其间曾一度中断，翌年1月下旬，交涉又重新开始。1月22日，根据革命党的要求，招商局同意以全部财产为抵押借款一千万元。24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立即将此事报告了内田康哉外相。有吉在电报中分析说，以招商局为担保的借款条约交涉得以再开，背后有革命党的压力。〔121〕

25日招商局借款交涉，最初是大仓组出面，后来转交给邮船及日清汽船公司，最后升级为日本政府与革命党之间的大笔交易。因此内田外相专门指示说：望在“贵官权限内”，尽可能“避开由我公然对革命军供给军费之嫌疑”，要仍以对招商局事业的名义借款〔122〕。

2月1日午后10时30分，上海邮船公司的伊东打电报给井上馨：“昨夜归来即向黄兴力陈承诺我收买之提议，彼虑人民之反对，故今除借款交涉外别无他策。彼要求一千万两，我亦可以年利七分与彼定一千万两之契约。然目下立即与招商局缔结合法之契约决非易事，为排除竞争，似还有于日前与民国政府定暂定契约之必要。但合法契约成立前，我则不负任何金融上之责任。上述各点若无异议，祈急电复小生。股东大会已于本日召开，各要职及三百名股东出席，已通过为民国政府借款一千万两事，一切由主持其事者办理之决议。据告美国财政家斯特莱特氏亦于一月二十九日抵当地，正交涉以招商局担保借款一千万两之事。据外文报载，日前东京电报已传吾现在之交涉。保守秘密乃绝对必须之事，故望切切注意，不再发生类似差错。”〔123〕

这份电报足以说明，井上馨参与了这项借款交涉，而且是其幕后的指挥者。接着，2月2日，伊东又接连发出了两份电报：

“二月二日午（不明）五时十五分上海邮船伊东发电

已与黄兴约妥，明日午后一时赴南京，望在此之前电示方针。据传秩乙商会，HD德里逊公司亦在交涉中。”

“二月二日午后八时二十五分同上发电者

据闻德美资本家已实行联合，以土地（不明）之担保提供一千万两，彼等对之评价为二千万两，条件是立即将旧借款偿还香上银行之土地券供托德国银行，故如不以同金额同条件招标，恐我之交涉将以失败告终。”〔124〕

清政府探听到了这些借款交涉，向日本政府提出抗议。2月7

日伊集院公使遂要求内田外相：“今后准备于华中地方扶植我利权之准备，望以秘密方式劝诱资本家参加此类活动”，以保证消息不致泄露于世间。”〔125〕

③三十万元借款交涉

在这期间，日中双方有关人物，围绕着借款问题分别展开了各种各样的活动，其中内田良平的活动格外活跃。

1912年1月25日，宋教仁致电内田良平，“三十万元借款之成立，多谢鼎力之助。文、吴两氏持呈之一万五千元，虽虽轻薄，望笑纳，以作外交及其他运动费”。翌日午0时10分，内田给宋教仁回电说：“三井借款之谢电已拜见，运动费已送（原文不清）及藤田各五千元，（原文不清）因直接送来时因仆操已份辞退，祈转送喜多氏几分运动费。”〔126〕

稍后，26日下午12时30分，又有一封来自上海的电报寄给内田良平：“五十万借款成立，三人联名之证书等军费票担保。（此处不明）赴日为外交机密费。其余秘密。祈复。”〔127〕

以上两封电报涉及的三十万元借款之事，这里所谈的五十万元借款指什么，至今还不清楚。

④汉冶萍借款

汉冶萍借款是南京临时政府命令盛宣怀洽办的。1月20日，黄兴致信山县、井上请求支援之后，21日何天炯立即发信，期望日方同意向汉冶萍公司借款〔128〕。22日及26日，黄兴两次打电报给盛宣怀，催促尽快与三井签订借款契约〔129〕。

在大藏省贮金部的文书中，有这样的记载：“1912年1月，革命政府驻日代表何天炯依据该政府之训令，访问盛宣怀、李维格，承诺三井方面就日华合办公司事提出之条件，并要求公司向革命党政府融资五百万日元，”〔130〕“革命党对公司融通资金事急迫，颇便于合办问题商议之进行。”〔131〕

1月26日，内田外相指示铃木领事：“已有电报，可确认军

政府关于合办之意向，另盛宣怀在办理此事时，有计划将所得资金中划出若干提供军政府……。”31日，铃木又致电内田说：“孙文已承诺合办之事。……暗中渴望该公司因合办而能补助革命政府之财政。”〔132〕

这样，1月29日，盛宣怀和正金银行的小田切万寿之助在神户终于缔结了汉冶萍公司的合办契约。2月2日，孙中山、黄兴在契约草案的承诺书上，签名同意〔133〕。孙中山同意在“承认日本提出一切条件”基础上合办公司，并要求公司“献出五百万日元以革命党作承认的代价”。

但是，汉冶萍将由日中合办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引起了社会上的激烈反对。2月7日，张謇首先表示反对，认为：汉冶萍“不应当与日人合办”；12日他又以“事前未能参与，前后未能补救”来“自劾”，辞去了实业部长的职务〔134〕。接着，湖南协合协会、江西联合分会、四川协合协会、河南协合会、国民协会、中华民国联合会等组织也发表声明，表示反对合办，当时的报纸《民立报》和《民声日报》也连篇累牍地发表了反对的社论和报道〔135〕。在舆论的强大压力下，22日孙中山终于决定取消合办，归还了借入的二百万元借款。

但是，面对这种批评与反对，孙中山、黄兴仍然暗中坚持向日本借款，在铜官山、招商局、汉冶萍借款均无望成功的情况下，他们又开始与森格为代表的日本方面进行租借“满洲”的交涉。这个交涉当时是在极其秘密的情况下进行的，参与谈判的只有宫崎滔天、山田纯三郎、胡汉民等人，是辛亥革命史上尚鲜为人知的一段史实。

四、租借“满洲”的交涉

2月3日，森格到达南京，第二天早上两次访问孙中山，提出了以租借“满洲”为条件，解决南京临时政府财政困难的方案。

森格提出：“如阁下所知，今日之世界已成黄种人与白种人之战场，欲制白人先锋俄罗斯之南下，保我日本之安全，置东洋和平以磐石之安，则必须认识保全日本在满洲势力之必要。日本为此已牺牲众多性命与资财，且不惜以国运相赌。在俄国企图南下而德人又握有青岛之时，满洲毕竟有保全于日本手中之必要，而以今日形势论，满洲仅靠支那政府之力量难以保全之事实，谅阁下深有同感。而若依日本来看，放手由支那政府来管理，危险至极。满洲之无法由支那政府独力予以保全之事既已为贵我双方公认之事实，满洲之命运，正在于此。显然，革命政府今后还有诸多困难，不依靠地理上、历史上有特殊立场日本之援助，断难成功。若阁下决心舍弃命运已定之满洲，将其委诸日本，作为其代价而欲从日本得到特殊援助，以完成革命之大业，日本必会答应贵方要求，使用必要之手段。日本为保全满洲而不惜发动第二次战争，若能暗中与阁下携手，解决悬之已久之国策大问题，亦可以小努力换避免第二次战争之利益。不知阁下决心如何？阁下所虑若与小生相同，宜速下决心。其实桂（太郎）公亦曾向益田氏透露过这一意图，阁下若有决心实行，希望两人中（指孙中山、黄兴）有一人与小生同渡日本面见桂公，日本可派军舰巡航之于阁下便利之地，而后直航三池港。换特别快车至京都，桂公亦从东京来会。此事若有意进行，往返两国间即可有回音也。”〔136〕

森格在谈话中，有意说明这不仅是自己的意见，更是元老桂太郎的主张。希望革命派接受以出租“满洲”来换取日本援助的方案，并且强调只有这样做，“满洲”才能保全，日本的安全和东洋的和平才有保障。

对于森格的提案，孙中山表示了积极的赞成。他回答说：“桂公果有此决心哉？余等忧虑支那，为黄色人种忧虑亦久矣。为东洋和平着想，满洲必须保留于东洋人之手。故此次举事之初，余等曾想将满洲一任日本之处置，而换得日本对我革命之援

助。惜日本不容余等接近，余于举事之初曾请求栖身日本，日本官府不许余之入国，如此，余遂认定日本政治家实无包容余等之心胸，因远去美国。然无论地理上、人种上言，支那若无日本之同情与援助，必将一事无成，此乃命运注定。余思虑最多者为日本之援助也。结果，虽有众多日本仁人志士为革命政府竭心尽力，日本政府则始终不改对我之态度，余等期待日本之转变久矣。余自欧洲归途中，路经香港时，若知桂公有此意，定会直抵日本截夺。然时至今日，业丧失良机。因当时，革命军之事，全依余与黄兴之方针行事。今却不然，各省皆因赞同余等之说自行举旗革命，加入我政府，我等既少兵权又少金权，余等欲实行所奉主义，大事须决于众议。近日，革命政府财政穷乏已达极点，供给军队之财源无几，几达破产之地步，若数日内无法获得救燃眉危机之资金，或解散军队，或解散政府，命运当此。此时，余等若数日不露面，恐谣言四起，谓余等逃走矣。鉴于上述现状，旧历年前后不拘何种手段，亦要筹足维持军队之费用。汉冶萍断然实行日华合办，以筹五百万元，以招商局为担保借款一千万元等举，皆因此故也。虽费如此工夫，但此类交涉荏苒不决故不得已又考虑出：先与袁世凯定和议，以抑天下之大乱，而后徐筹军资，以图再起，以武力扫平北京重建天下之方针。近日与北方频繁交涉议和协定，与袁之谈判亦渐成熟，双方条件大体一致，而今只待南方之决心，南北即可休战，而余等至今仍对解决财源问题存一线之希望，若有幸可能解决防止军队离乱之足够资金，余等可将与袁和谈延至年后，再筹资金，而后排除袁氏，按当初之计划以兵力彻底扫除南北异己分子，建立共和政体，绝他日内争之根。虽然如此，时至今日，仍无获得金钱之望，倘不幸在此五日内即九日以前、旧历年末前无法获得预定一千五百万元之借款，则万事休矣。革命政府倒台之前，可先发制人达成南北和议，将政权让于袁世凯，而政权一旦移于袁氏之手，今后难发突

变，亦几乎无望履行与日本之密约也。

总之，余等所言者及所要求者，皆出于切迫，日本听余等之言，以为无正义之气亦未可知，但本来根底软弱，唐突之间，俄然举事，以导致今日之穷境，乃固有之势也。但此前并无与日本政权核心接触之机会，担心轻率试之反有暴露内情之虞，故逡巡之间，终陷今日之窘况，故亦有不得已之处也。时机既逸，桂公万一有认可余等之心意，信任余等，有意为日本断然行其志，则请无论如何，为防革命军队之离散，急供军队所需之现金。余等于今日，只要手中有钱，便可获军队之信赖，军队一得稳定，凡事又可照约定办，余或黄兴中派一人渡日，会见桂公，定满洲问题及革命政府之大计。因此事乃余等早应采取之方针，故时至今日不拘何时，但有机会仍为余等须先行解决之问题。只是目下虽感有其必要，因一步亦不远离南京，其理由已如前述，虽觉歉意然无计可出，惟恨君之使命来之过迟也。”〔137〕

然后，孙中山要求森格尽快请日本方面就能否在期限内援助军费问题作出回答。森格也答应在2月8日夜间以前就可否做出回答，可能的话尽快将钱汇来。

会谈之后的3日下午6时，森格立即用加急电报将会谈的内容传达给了益田孝，2月3日下午6时发加急电报“财政困乏支那，年底前若无一千五百万元，将有战争，或革命政府将陷混乱。因与汉冶萍公司已成立五百万元借款。以招商局担保向邮船公司、与英德美国等借款一千万元正在交涉中，若五日以内其借款无望成立，万事皆休，孙、黄当与袁缔结和议，让政权于袁。因孙承认日本租借满洲，日本为防革命军解散，汉冶萍公司五百万元之外若立即再借一千万元，与袁世凯之和议可中断，孙文或黄兴可至日本达成满洲之秘密契约。钱未到手前，军队有解散之虞，若离南京，恐生变事。满洲之事，倘决意实行，祈四日内电告借款一千万元，当中止对袁世凯之和议。”〔138〕

益田接到这份电报后立即用电话通知了井上馨，接着，益田于第二天又给山县有朋打电报，报告了与孙中山会谈的内容，敦促山县速下决心：“敬启者：据南京电信，森恪已即刻作为无责任者进行会见，孙已承诺租借南满之事。但支那元旦以前若无一千五百万元，除将政权让于袁世凯外，别无他途。革命政府财政困乏，实无计可施。对大冶汉阳盛宣怀交涉之五百万借款成立后，尚需一千万元，正以招商局担保与邮船、三井、英德美等交涉中，五日内若无成立之望，万事皆休。若日本承担此借款，已允中断对袁讲和，孙文或黄兴即刻来日缔结秘密契约。已与井上侯电话述及此事，祈答电如下旨：孙、黄两位愿在日本指导下处理对日美关系之意已悉，山县、桂两公处已转致阁下之致意，近日将任命代理人启程等。上述之事关系重大，祈速就此裁决与否商议，并且与政府协商，尽速回答之（下略）。”〔139〕

5日下午，益田给森恪打电报说：“井上侯处尚无回音，甚念。对招商局担保贷款事亦令人担心。另祝成功。益田孝。”〔140〕

与此同时，5日中午益田处也收到了一封关于孙文向森恪请求贷款一千万事，希望日本方面火速答复的电报。6日下午5时，孙中山再次要求森恪：“已将对袁世凯和谈延至9日，故9日前祈有确切答复。”〔141〕2月8日，益田孝却给森恪发去如下一封电报：“致上海森。2月8日下午发电。与袁世凯之和谈虽非可容余等置辞之事，亦请转告对孙、黄深切之同情，余等祈孙、黄在于己有利地位上达成妥协，井上侯难于直接回答。目下汉冶萍之二百五十万，将设法于明日汇出，铜官山明日可有确切答复，招商局借款若成，当亦努力尽快送款。满洲一事，倘能来一人，劝告签定秘密条约，可望得到更多同情。益田。”〔142〕

上述电报里，桂、井上等人虽表示招商局、铜官山、汉冶萍各项借款，有希望如约拿出钱来，但对孙中山要求的一千万借款，只字未提，反而劝“孙、黄在于己有利地位上达成妥协”。

森格仍然不理解东京的真实用意，11日上午，他又打电报给益田，要求为了实现租借“满洲”十天以内尽快汇款一千万元来：

“南京森格致益田。2月11日上午1时55分发。

据孙、黄之所见招商局借款尚有难点，需时日，故不能依赖，军队大有解散之虞。汉阳铁厂借款五百万元之外，支那新年前绝对需要得到一千万元，故彼等在未到手之前，难离南京，因彼等已承诺租借满洲，故请于十日以内供给一千万元，若承认以上内容，黄兴可立即赴日本订结秘密契约，望即刻予以确切答复，乞尽全力以成大业。”〔143〕接到森格来电后，益田于翌日连发两电，说明正在进行的招商局、汉冶萍的事情，指示他尽快促成两借款的达成。电文如下：

“益田致南京森格。2月12日下午1时发加急电报。

为便于即时调拨资金，余等劝孙、黄立即召开招商局临时股东大会，发行附加七分利优先股票，其资本额再增一千万两，其中五百万两由日本人应募之，余五百万两后日可依支那人之希望，以为借款之条件，当由日本人认购。”

“益田致南京森格。2月12日下午4时发加急电报。

接前电，盛宣怀倘有大体十分满足之意，且约定总会决议时以全力相助，我可立即予以实行。目下除上述而外，并无立即筹措资金之其他良策。

议案倘得承认，余相信数日内款额即会汇拨。此电乃与邮船公司商妥之结果，要新政府保护外国人之股票所有权。”〔144〕

这样一来，由于孙中山于2月9日之前未能得到一千万日元的借款，不得不继续与袁世凯的和谈。接着，汉冶萍借款、招商局借款也连告失败，2月12日，南北议和达成，清帝宣布退位。翌日，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并向参议院推荐袁世凯为后继者。15日袁世凯即被选为临时大总统。

向中国东北地区，扩张日本的侵略，是日本军国主义者自日

俄战争以来，对外推行大陆政策的主要目标之一，但为什么此时的日本政府对森恪促成的“租借满洲”的阴谋之举，反映如此冷淡呢？分析起来，道理十分简单。

首先，中国的东北地区，当时尚在清政府控制之下，并非为革命党人所占领，而南京临时政府并未为列国所承认，即使孙、黄与日本签署“租借满洲”的契约，在当时来说，犹如一纸空文。而日本却会因此在国际上遭到空前的孤立，其后果对日本极为不利。其次，从中国国内的形势看，袁世凯控制下的北京政府，在英国的支持下，对革命党人已形成绝对的优势，日本政府无论如何不会在这种情况下，把在华扩张的政治赌注，全部押在孙中山所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这一边。所以，日本政府对孙中山愿以“租借满洲”，来换取一千万借款的要求，反应冷淡。事实证明，此时的孙中山等人，并没有完全看清日本政府、财界对华政策的本质，对日本的期待过高过于乐观了。其结果是，孙中山为了抗争袁世凯，建立共和政党，不惜出租满洲，与日本联手。然而，日本方面考虑的则是，谁能掌握中国政局，是孙中山，还是袁世凯。这种以利益为标准的对华政策，决定了日本政府、财界，最终还是眼看着孙中山交出政权，拒绝向革命党人伸出援助之手。

【注释】

〔1〕 《辛亥革命在上海资料选》，第1001页。

〔2〕 同上。

〔3〕 吕芳上：《荷马李档案简述》，载《研究中山先生史料与史学》，《台北国史馆藏原电文影印件》。

〔4〕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44页。

〔5〕 同注〔3〕。

〔6〕 法国外交部文书NS204卷，106页。东方汇理银行总裁是斯坦尼斯拉斯·西蒙，他与孙中山的谈话内容收录在《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3—566页上，其内容主要是以下四点：1.借款问题与革命前途；2.庚子

赔款问题；3.日俄同盟问题；4.列强与中国财政。

〔7〕 1911年11月23日与西蒙的谈话，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63—365页。

〔8〕 本资料据日本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所藏缩微胶卷。

〔9〕 张振鲲：《辛亥革命时期的孙中山与法国》，《近代史研究》1981年第3期，第360页。

〔10〕 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第110—111页。

〔11〕 《与上海〈大陆报〉主笔的谈话》（1911年11月25日—26日），见《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73页。资料原据《孙中山归国始末记》，另《上海时报》在28日也刊出过内容相同的谈话，估计译自《大陆报》（英文）。

〔12〕 车田让治在《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一书中，曾详细描述了孙中山当时归国的情形，见第233页。

〔13〕 钱基博：《辛亥革命江南光复录》，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7）第56页。

〔14〕 《国父孙文与梅屋庄吉》，第233页。

〔15〕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8页。另外，孙中山也说过这样的话：“中国今日非五万万不能建设裕如”。见上书，第567页。

〔16〕 《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567页。孙中山在经过新加坡、香港等地时，反复强调募集外债的必要性，向华侨请求援助。参见罗家伦编：《国父年谱》，第192页，正中书局，1958年。

华侨大力支援孙中山的革命运动，旅日华侨更是一马当先。1911年10月革命爆发后，旅日华侨开展募捐运动，到12月已募得资金五、六万两。孙中山回到上海后，横滨华侨曾派代表向南京政府提供资金，黄兴向他们赠送了“谊切偕行”的横额。参见《广东文史资料，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1981年，第21页。

〔17〕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外交文书。

〔18〕 《胡汉民自传》，第57—58页。原文为：“克强推荐张謇或熊希龄长财政，先生不可，曰：财政不可授他派人，我知润生（按系陈锦涛字）不敢有异同，且曾为清廷订币制，借款于国际有信用，于是用陈。”

〔19〕 日本防卫研究所收藏《海军关系—有关清国事变文件》。

〔20〕 同注〔18〕。

〔21〕 《中华民国史》，第一编（下），第453页。

〔22〕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85页。

〔23〕 故阪谷子爵纪念事业会编刊《阪谷芳郎传》。

〔24〕 同上，第430页。

〔25〕 《阪谷芳郎日记》，见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阪谷芳郎文书》。

〔26〕 孙中山委托阪谷芳郎建立中央银行事，最初似由原口要从中斡旋的。原口要（1851—1927年）1875年赴美留学，1896年任铁道局建设部长。据原口要遗族宫泽辰雄教授家藏《工学博士原口要氏经历》载，1905年受清湖广总督张之洞聘任铁道顾问。

〔27〕 《阪谷芳郎文书》，1911年日记。

〔28〕 彭泽周，《试评黄克强先生史料及其研究观点》，见《大陆杂志》第69卷第4期。另参见《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别册有关文电。

〔29〕 胜田主计（1869—1948年）长期任职大藏省。1907年任大藏省理财局局长、日本银行监理官，1910年任横滨正金银行监理官，1912年任大藏省次官，1915年任朝鲜银行总裁，1916年任寺内正毅内阁大藏大臣时，与西原龟三一起共同推行寺内援助皖系军阀段祺瑞北京政府的对华政策。著有《菊分根》一书。

〔30〕 添田寿一时任日本兴业银行总裁。

〔31〕 《胜田主计文书》，日本大藏省财政史室藏。

〔32〕 《神户又新日报》，1911年12月14日。

〔33〕 五十岚珠惠，《辛亥革命与日本与日本人》，《史草》，1961年，第18页。

〔34〕 日本防卫研究所，《关于清国事变文书》，第17卷。

〔35〕 《官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377页。

〔36〕 同上，第378—379页。

〔37〕〔38〕 同注〔33〕。

〔39〕 《上原关系文书》，第454页。

〔40〕 何宝松，《何晓柳传》，见《孙中山与辛亥革命史料专辑》第202页。何天炯，1877年生于广东宁县石马乡一个乡村知识分子家庭，

十二岁时，以第一名成绩考取童生，1903年断发离乡，赴日本留学。在东京，他结识了孙中山等人，参加了革命，1905年同盟会成立，何任会计（总理孙中山、协助黄兴、书记吴玉章）。

此间，他与犬养毅、头山满、宫崎滔天等日本人相识。他与滔天交情尤深。1911年3月，黄兴于广州发动起义时，何从日本抵香港，负责香港——广州间军需品的运输工作。

1921年孙中山在广州就任非常大总统时，任命何天炯为驻日代表，戴天仇为代表。1925年7月，何病死于广州，49岁。关于何天炯的动向，1911年12月5日，上海有邻会向东京有邻会总部发电“代理何天炯今日启程。”《小川平吉关系文书》（2），第431页。

何天炯留有著作《山居一年半》，又有诗集《无苑斋诗抄》（次子何承天整理）。

〔41〕 同注〔34〕。

〔42〕 同上。

〔43〕 同注〔25〕。

〔44〕 《神户新闻》，1912年1月9日。

〔45〕 防卫研究所，《海军关系〈关于清国事变文书〉M44—31》，29卷。最上机密第151号/44，明治45年1月8日建部最上舰长致海军大臣关于清国事变警备报告。

〔46〕 同上。

〔47〕 《宫崎滔天全集》，第5卷，第382页，书简，明治40年代。

〔48〕 同注〔7〕。

〔49〕 同上，第151号/46，1月12日。

〔50〕 同上。

〔51〕 同注〔25〕。

〔52〕 日本防卫研修所藏，《关于清国事变文书》最上机密第31卷，建部舰长致海军大臣私信，1912年2月第4回。

〔53〕 同上，第151号/49，1月13日。

〔54〕 外交史料馆藏外交文书《支那银行杂件》第3卷，辛亥革命部。

〔55〕 《东京朝日新闻》，1912年1月12日。

〔56〕 《时事新报》，1912年1月12日。

〔57〕 同注〔56〕,1912年1月13日。在同一时期,无论是清政府,还是孙中山革命军、临时革命政府方面都通过各种渠道,向日本探询关于能否得到大笔借款的可能性。1月初,袁世凯面见日本大仓组天津支店长菊池季吉,声称“愿以官庭中贵珍品为担保借款,贵珍品价值数千万两,借款金额越多越好。”(1912年1月4日,驻天津大仓组支店长菊池季吉致大仓喜八郎电,日本外交史料馆藏《清国令军政府财政关系杂信卷》)。

〔58〕 同注〔25〕。以下各引文,凡引自《日记》者均不再一一注出。

〔59〕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第1,日记,明治45(1912)年,1月2日:“午后三时,赴帝国饭店,出席实业家拜年会,阪谷芳郎就支那(问题)演讲”。

〔60〕 《都新闻》,1912年1月6日载有“松方幸次郎5日由神户上京”报道,松方是与三上一起援助孙中山在日活动的实业家。

〔61〕 1月10日《万朝报》报道:“涩泽荣一9日访问石井(菊次郎)”。

〔62〕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5卷,第12页。

〔63〕 后藤新平(1857—1925年),1898—1906年曾任台湾总督府民政长。日俄战争后为满铁第一任总裁。1910年、1912年先后两次出任内阁递信大臣。1916年任寺内正毅内阁的内务大臣,后任外务大臣。

〔64〕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8卷,第539页。

〔65〕 孙中山此信现藏于大藏省《胜田主计文书》。

〔66〕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8卷,第504页。

〔67〕 井上准之助,日本第一银行副总经理。

〔68〕 《松方正义文书》,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另《阪谷芳郎文书》中,《书信电话电报往复录》中,将致松方函的日期记作1月30日。经查《松方正义文书》中有关记载,松方2月4日收到阪谷芳郎信,即于同日复信,阪谷2月5日收到松方信。因此,《阪谷芳郎日记》中记2月2日发给松方正义是正确的。

〔69〕 日文本为:“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状”,中文本为:“中华国立中央银行设立特许札”。

〔70〕 《胜田主计文书》,现收有英文、中文译本抄件。

〔71〕 孙中山此信,《阪谷芳郎日记》亦记明发信时间为2月16日。

而阪谷芳郎为什么迟至2月29日始收到呢？笔者在查阅有关资料时，发现犬养毅1911年12月19日赴南京，1912年1月18日一度回日本，后又来华，于2月28日回到东京。因此是否可以推测，孙中山2月16日信很可能是委托犬养带回日本，在东京发出的。

〔72〕 两个中文本均误将第十一条最后一段，即“政府暂任……以下之事”25字作为第十二条，故两中文本有两个第十二条。现据日文原本改正。

〔73〕 《远生遗著》本无“但因”二字。

〔74〕 《远生遗著》本无“银行”二字。

〔75〕 两中文本均脱“监理官”三字，据日文补。

〔76〕 《远生遗著》“绩”作“续”，似有误。

〔77〕 《胜田主计文书》，大藏省财政史室藏。

〔78〕 《阪谷芳郎传》，第281页。

〔79〕 胜田主计：《清韩漫游余沥》，转引自胜田龙夫：《中国借款和胜田主计》，第157、131—132页，1972年版。

〔80〕 在《胜田主计文书》中有关设立中央银行的案卷里，第一份文件便是阪谷的这篇英文稿，题为“第一号，关于设立清国中央银行意见。阪谷芳郎男爵”。在资料目录上写有阪谷芳郎的眉批，内容为“此一号与孙文的往复书简毫无关系，而且在方法上、时间上也有差异，但为说明我们想法的一贯性，现将其编在一起”。

〔81〕 《中国借款和胜田主计》，第158—166页。

〔82〕 防卫研修所《海军关系〈关于清国事变文书〉》。

〔83〕 《原敬日记》，第四卷，第420页。

〔84〕 内田康哉传记编纂委员会：《内田康哉》，鹿岛研究所出版会，1969年，第170页。

〔85〕 《原敬日记》，第四卷，428页。

〔86〕 佐藤诚三郎：《协调与自立之间，日本》，日本政治学会编：《国际紧张缓和的政治过程》，岩波书店，1969年，第100页。

〔87〕 邹念之编译：《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第314页，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年。

〔88〕 犬养毅：《话当年》，载岩渊辰雄：《对支外交史论》，第43页，白井胜美：《辛亥革命：日本的对应》，《国际政治》1958年。

〔89〕 《阪谷芳郎文书》。

〔90〕 《宫崎滔天全集》，第1卷，第510页。

〔91〕 同上，第4卷，第309—310页。

〔92〕 关于孙中山在山田纯三郎介绍下与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会见的时间，升味准之辅在《日本政党史论》第3卷第228页引用山浦贯一在《森恪》一书中的说法，是29日，但实际上孙中山是25日回到上海的，当天两个人就见了面。1934年（昭和9年9月27日）在《东京日日新闻》社主办的讲演会上，山田纯三郎曾作了《南京政府之正体》的演说，其演说稿的油印版现藏爱知大学《山田纯三郎文书》中，其中谈到介绍孙中山与藤濑见面是在孙中山回国后抵达上海的当天。

〔93〕 这个契约书收藏在《革命（第一）文献》（内田治氏所藏记录）之三中，除内田良平对三井物产KK借款契约书之外，还包括有关账单两份及原稿附件等。山浦贯一《森恪》一书中也有引用。

契约书全文如下：

今回三井物产公司上海支店以黄兴、朱葆三、陈其美、王一亭、宋教仁、张静江等之联合保证，向中华民国政府上海都督府定贷款金三十万元之契约。

兹因黄君克强为中华民国组织临时政府之费用，向贵行借用上海交通银行银元30万元。约定自交款日起一个月归还，并无抵押物。如还期不如约，推保证人是问。除息率及汇水由黄君别订条件外，特见此书。1月24日。（《南通张季直先生传记》，载《辛亥革命》（8），第51页。）

据李书城在《辛亥前后黄克强先生的活动》，（《辛亥革命回忆录》第一集，第196—197页，）黄兴是托张謇向上海三井银行借款30万元以充24日革命军南京入城后的经费的。

〔94〕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33页，上海人民出版社。另该书附有黄兴给何天炯的委任状，原文如下：“民国陆军总长给何天炯的委任状。兹因军事需财孔亟，特委任何君天炯赴东借募巨款，所有订立条件悉有全权，但不得损失国权及私利等弊。须至委托者何若天炯执据。”

黄兴（天此朝食印）

黄帝纪元四千六百捌九年十月

〔95〕 同注〔94〕，第234页。

〔96〕 同上，第235页，黄兴26日电报内容如下：前电谅悉。至今未得确切回答，必执事不诚心赞助民国。兹已电授全权于三井洋行直接与执事交涉，请勿观望，即日将借款办妥，庶公私两益。否则，民国政府对于执事之财产将发没收命令也。黄兴叩。

〔97〕 中国方面的研究成果，一般认为这个借款条约完全是日本方面为了获得利权而强迫革命党接受的，或者是盛宣怀策划的。日本方面的学者也几乎都持相同观点。确实，以上所提两点对于借款交涉的形式也许具有重要的意义，但中央银行设立计划告吹后，若没有孙中山、黄兴的再三要求，汉冶萍借款在短时间内恐怕也不会成立的。

〔98〕 据山田纯三郎的记录：“听藤濑氏讲，汉冶萍如果能够日华合办，三井方面可以拿出五百万来，我想，即使是五百万，以此为本也可以搞出名堂来的，孙中山亦表示同意。藤濑氏又说明明确答复需要一星期时间。1912年（明治45年）1月1日孙中山前往南京赴任，一星期后藤濑果然如约与我见面，谈定以付汉冶萍产铁铁订货金名义出资五百万元的借款。这份契约的签署是由我拿着它找到孙中山、黄兴，而后交给藤濑的，但其中所说的五百万元最终也未能全部交到孙中山手中，只交了三百万元，剩下的两百万元也就没有下文了”。见《森恪》一书第392页。

〔99〕 苇津珍彦：《大亚洲主义与头山满》，日本教文社，第120页，1965年。明石元二郎生于福冈，同玄洋社的杉山茂丸是青梅竹马之友，与内田也为莫逆之交。他在当时认为，革命军最终必定失败，清朝的基础决不会动摇。他在给森部少将的私信中预言：“革命党徒不远之将来必定绝灭”（见小森德治：《明石元二郎》（上），第478页，原书房，1968年。）关于内田致信益田孝的过程，迄今为止的研究几乎都是依据《东亚先觉志士记传》的说法，但据冈义武编的《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2卷中的两份资料，内田在与山下相逢之前，已经听说了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供武器弹药的消息。根据下面这份资料，可以推测内田是在听到这个消息后，认为有必要立即通知三井，才写信给益田孝的。“十月初旬，革命党正欲在武昌举事，预先派党员潜入山东、直隶及盛京方面各地，以窥当地形势。时有我邦商人三井、高田、大仓等，密供军火弹药于北京政府以谋其利。党员探知，义愤填膺，谋在其卸货地秦皇岛港夺取该军火。事为内田良平

所知，内田忧虑，此举将影响大局，故先派人抚慰之。而党员则颇难首肯，内田于当月下旬抵京城时，重新派人多方慰谕，方得无事”。（关于三井、大仓、高田等出售军火等事件文献，见《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2卷，第397页）。

〔100〕 《小川平吉关系文书》，第2卷，第398—399页。

〔101〕 《东亚先觉志士记传》（中），第440—442页。

〔102〕 《原敬日记》4，内相时代编（二），第382—383页。

〔103〕 三井文库W—4—313，井上馨侯传记编纂会：《井上侯爵家所藏益田书翰》。

〔104〕 山田纯三郎：《南京政府之正体》，第3—6页，1934年。

〔105〕 萱野长知：《中华民国革命秘笈》。

〔106〕 《森恪》一书中详细记叙了这一时期的经过。

〔107〕 藤井升三：《孙文对日依赖到对日批判》，见《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国际学术讨论会论文集》，中华书局，1983年。

〔108〕 藤井升三：《孙文研究》，第69页，劲草书房，1966年。

〔109〕 黄兴致井上馨书简，现藏《井上馨文书》。另外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海军关系》史料中还散见注有“送黄兴信，大阪三井”之类字样的电报。

〔110〕 加藤中佐给海军次官的电报中，曾详细叙述海军顾问问题（防卫研修所战史部《海军关系》）。大田佐三郎是海军大佐，孙中山秘书池亨吉的好友，因而得推荐，但此项任命未公布。

〔111〕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山县有朋文书》、《桂太郎文书》。

〔112〕 中华民国资料《日本外交文书选译——关于辛亥革命》中孙文曾派遣特使，宣布“将给借款于我国者以重大利权”。

〔113〕 驻南京武官曾报告陆军省说：昨20日夜，吉原翻译从陆军副官处探知，1月19日，黄兴亲笔向山县公、井上侯发出长信，恳请承认中华民国。（日本防卫研究所战史部，《海军关系》）。

关于这两封信，彭泽周先生曾先后撰文进行了介绍，参照《黄克强先生给日本井上馨的一封信》（见《大陆杂志》，第39卷，第11期，1970年12月15日）；《试评黄克强先生的史料及其研究观点》，（见《大陆杂志》，第69卷，第4期，1985年10月15日。）但是，彭文认为“由于‘致井上馨书’及‘致山县有朋书’都是由黄兴托何天炯同时转呈的，因此，我的结论是：‘致井上馨书’或‘致山县有朋书’都是中华民国元年（1912年）2月发出

的”。《试评黄克强先生的史料及其研究观点》，第155页把日期搞错了。

笔者认为，不把此二信同筹建中央银行及向日本借款，希望得到日本率先承认中华民国新政府结合起来考察，就不可能理解黄兴写此二信的原由急迫性和重要意义。

〔114〕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山县有朋文书》。

〔115〕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藏：《井上馨文书》。

〔116〕 同注〔114〕。

〔117〕 防卫研修所战史部藏《海军关系》档案。

〔118〕 关于湖南锑矿销售权抵押借款有关的黄兴书简及谭延丰复电，见湖南社会科学院编，《黄兴集》，第105页，中华书局，1981年。

〔119〕 同注〔117〕。

〔120〕 森恪也参与了铜官山借款，契约签定后他立刻将其送往东京的益田和井上。森恪亲笔的二份契约，现分别藏在三井文库的《井上馨侯文书》及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井上馨文书》中。

〔121〕 外务省编，《日本外交文书》，第44卷、45卷别册清国事变（辛亥革命），第190页。有吉24日致内田的电报说：“招商局迫于革命党之压力，承认以财产为担保实行借款千万两”；“招商局关于借款召开临时大会，不外革命党压力与经理中有蔡姓者内通革命党垄断局务之结果也”。

〔122〕 《日本外交文书》，第45卷，明治45年1月26日，内田外务大臣致南京铃木领事电报。

〔123〕 三井文库《井上馨侯文书》中所藏电报。

〔124〕 同上。

〔125〕 1912年（明治45）2月7日，驻清伊集院公使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报《外务部抗议日本招商局借款件》（《日本外交文书》）。

〔126〕 防卫研修所战史部藏《海军关系》档案。

〔127〕 西尾阳太郎《北一辉关于辛亥革命的〈电文集〉及〈报告书简集〉——据内田家资料》，见《史渊》第105、106合辑，九州大学文学部。

〔128〕 《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第233页。

〔129〕 同上，第235页。

〔130〕 大藏省预金部：《关于支那汉冶萍公司借款沿革》，第93页。

〔131〕 同上。盛宣怀24日致黄兴电报及合办契约草案原文如下：

盛宣怀致黄兴电（1912年1月24日）

“电悉。顷日商小田切面称，不愿担借要求合办。何君天炯来函，华日合办政府已许可，而贵电无“合办”字样。合办虽系旧矿律所准，然以法律论，必应政府核准，方敢遵行。究竟民政府主意如何？日代表在此专候，请速核夺电复（见《辛亥革命前后》盛宣怀档案资料选辑之一）。

南京临时政府与日商三井借款续合同（1912年2月2日）

三井洋行代汉冶萍公司备款日金二百五十万元，借与民国政府。所有公文及草约，定于一千九百十二年二月二号经两方面签字认可。

一、在公文及草约内所开办法，及中日合办该汉冶萍公司手续，以及汉冶萍公司由三井洋行备款借与民国政府等情，应由民国政府将上项情形切实知照湖南、湖北、江西都督，并凡该汉冶萍公司所有财产地方，以免各方面阻挠该公司进行方法。

二、汉冶萍公司所借自民国政府共日金二百五十万元，以大冶铁矿作抵，该款将由三井洋行交付民国政府，所有兑换汇水，均由三井洋行自定。

三、以上借款以一年为期，周年七厘行息，每半年一付利息。

四、付利还本，凡关于此次款项事宜均由三井洋行经理。

五、三井洋行当竭力募集日金二百五十万元，借与民国政府（此条业已声明在草约内矣），连前借款共成日金五百万元（见北洋政府财政部档案）。

〔132〕 1912（明治45年）1月26日内田外相致铃木领事电报，明治45年1月31日南京铃木领事致内田外务大臣电报《关于孙文赞成汉冶萍公司合办案》，《日本外交文书》194页。

〔133〕 安藤实，《汉冶萍公司借款》二，见《静岡大学法经研究》，第15卷1、2期。1966年。

〔134〕 郭廷以，《中华民国史事日志》，第1册，第23页。

〔135〕 啸秋，《汉冶萍借款合并之抗议》，见《民主报》1912年2月9日。

〔136〕 森格1912年2月8日致益田孝书简，见《井上侯爵家所交文件》。

〔137〕 同上。

〔138〕 同上。这个电报与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井上馨文书》所藏件相比有若干不同之处，藤井升三关于这一问题的解释是正确的。

〔139〕 《山县有朋文书》。

〔140〕 1912年2月8日森恪致益田孝书简，见《井上侯爵家所交文件》

〔141〕 〔142〕 同上。

〔143〕 三井文库《井上侯文书》中发现有一封益田孝的书简，“敬启者，桂公手边之伊集院公使之报告已拜读，袁氏为自身计而压服孙、黄，惟忌于金力，频对日本转告其愚痴，全出一片利己之心。另附其电信译文，其电已告桂公，公以尽速返电为佳，其与外交上亦稳妥也。谨告。顿首
二月初八

井上老侯阁下 孝拜

另，今夕曾与藏相谈及资金以及铜官山之事，确答以多多为宜，祈电话示下，明日何时可至贵邸参见也”。

另外，还有一封2月12日写的书简，“敬启者，关于招商局借款之致南京电文二通，祈高览。其借款之要求，如附件。

黄兴书简译文已完成，原书简中有望侯从速回书语云云”。

〔144〕 同上。

第八章

辛亥革命后的若干问题

辛亥革命后，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从表面上看似乎辛亥革命期间所进行的一系列借款等交涉，最终都未成立。比如，建立中央银行的设想，由于井上馨等人的反对没能实现，铜官山借款、招商局借款、汉冶萍等都因为中日双方形势的变化而流产。租借“满洲”的交涉也不了了之。但是，由于辛亥革命使日本财界主流顺利地同中国各方面的上层政治势力有了接触，并建立了良好的关系，这种良好的关系既为日后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提供了相当大的政治保证。同时，当时中国国内出现的实业热潮，也为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活动创造了难得的机会。在同欧美列强争夺在华经济利权方面，日本财界充分利用了辛亥革命期间与中国各个方面所建立的关系，发挥中日两国文化相近，地理相邻等优势，抓住一切可乘之机，把日俄战后所设想的对华扩张计划付诸实施，逐步落实长久的日本对华经济政策，在其“满蒙政策”的基础上，进一步推行对整个中国的经济侵略，取得了极大的进展。1913年，以涩泽荣一为首的日本资本家集团，同孙中山之间议定的中国兴业公司，便是其中的典型一例。

辛亥革命后中国政治风云变幻无穷，清王朝垮台后，随之而登场的几个大的政治集团之间的斗争，此起彼伏，新的组合交织着又一次分裂，妥协的背后酝酿着更为激烈的争夺。多变的中国政局，既为列强诸国牟取在华利权带来了一个又一个的机会，同

时也为他们正确判断中国形势的走向，选择最可依赖的对手带来了相对的困难。是坐等时机，待大局稳定后，再插足以图一逞，还是抢在列强之先，采取多元投资，以不变应万变，寻找出路与新的发展。对此日本财界选择了后者，制定了积极进取的方针。中日合办企业——中国兴业公司的构想，其成立及改组过程恰恰是日本财界于辛亥革命后加紧对中国进行大规模的经济扩张活动的一个缩影。本章拟从中国兴业公司的成立与改组入手，探讨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政策的内容与变化。

第一节 孙中山访日与日本财界的设想

中国兴业公司是孙中山于辛亥革命后的1913年访日时，同涩泽荣一等日本财界人士共同商定成立的中日两国合办企业。一方面，这个公司是中日两国政府间（孙中山当时是中华民国铁道总办，日方为日本政府、财界实权派）第一个合办企业，同时也是民国初期中国大办实业，孙中山实业救国思想同日本财界扩大对华投资，加紧对华经济渗透、扩张相结合的产物。另一方面，这个合办企业实质是继1907年日本财界成立的对华投资机构“东亚兴业公司”之后的第二个对华投资公司，是日本对华重要投资机构之一〔1〕。不仅如此，无论是从公司设立的背景、宗旨来看，还是从公司的组织机构、经营内部和范围来看，后者都是前者的翻版。唯一不同的是，“东亚兴业公司”为日本法人公司，“中国兴业公司”则由两国合办，具有中日两国“双重国籍”。正是在这个意义上，首先新公司摆脱了“东亚兴业公司”作为日本法人在中国进行经济扩张时所遇到的障碍，采取中日合办的形式，保证其在中国境内的经济活动一路绿灯，畅通无阻，令诸列强望尘莫及。其次，新公司经营范围之广，几乎一揽日本对华经济活动的全部，成为日本对华经济活动的主要窗口。不少学者，

多从孙中山实业救国角度，来评价中国兴业公司，认为这个中日合办企业的建立是1913年孙中山访问日本的最大成果〔2〕。这固然不错。然而，纵观日本财界自中日甲午战后对中国经济扩张的历史，考察“东亚兴业公司”与“中国兴业公司”之间的联系，认为这个公司是日本财界在辛亥革命之后对华经济活动的最主要内容，似乎并不过分。

一、邀请孙中山访日的本意

1913年2月，孙中山作为国宾访问日本，这是孙中山同日本漫长的交往中的第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孙中山访问日本的目的，名义上是答谢日本各界多年来对其革命活动的支持，实际上是孙中山为实现实业救国，希望得到友邻的理解和经济援助的东游〔3〕。

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之后，提出实业救国的大纲，四处游说、奔波。他认为“吾国种族革命，政治革命俱已成功。唯社会革命尚未着手。故社会革命，在今天非常紧要。”〔4〕在这里，孙中山所说的社会革命，即三民主义中的民生主义。他继续说：

“中国乃极贫之国，非振兴实业不能救贫。仆抱三民主义以民生为归宿，即是注重实业。”〔5〕至于如何致富救贫，实现民生主义，孙中山则指出：“中国最富者莫如煤铁，欧美富强之国，无不重在煤铁，中国汉冶萍为富国基础，倘全国有数百汉冶萍，安得不富。”〔6〕但是，中国缺少资本，因此，搞建设必须依靠外资。对于外资，孙中山说：“论资本一层，外债非不可借，但合办则流弊甚大。”〔7〕“明知借债遗累后人，然不借债，则连后人皆无，故借债为生死问题，非利害问题，譬如有病不食药则死，故明知其苦而食之。”〔8〕对于孙中山来说，实业救国同样面临重重困难。1912年5月，孙中山提出：“要向日人学习，效法日本。五六十年后，则与日本相等。”〔9〕并于6月上旬，通过

日本驻华领事表达了希望访问日本的要求〔10〕。可见，孙中山是把访问日本作为完成他的实业救国计划，争取外资的一个重要手段。因此，孙中山的访日目的中，至少包含两个主要内容：一是他在日本期间，再三谈及的对日本友人援助中国革命的感谢；另一个更重要的就是要获得日本在经济、财政上的支持。

但是，自孙中山提出访日要求到1913年2月15日踏上日本国土，其间由于日本当局态度暧昧加之袁世凯政府的明里暗里的反对，遭到了很多阻力和挫折。首先，日本外务当局认为，孙中山的来访并要求见日本外相、总理大臣，必将给列强诸国以日本支持孙中山之印象，并引起袁世凯的反感。因此，对于孙中山的访日要求，几次表示为难，迟迟不予同意。其次，是袁世凯对孙中山访日特别敏感，一边拒不表态同意，一边向日本政府暗示，尽管孙中山身为政府要员，但是孙此行同中国政府无任何直接关系，并希望对孙中山的个人要求，采取不加理会的态度〔11〕。这样一来，孙中山访日问题，直接关系到日本同袁世凯政府的关系，使得日本外务当局更难下决断。因此，孙中山访日时间一变再变，由最初的8月改为10月，又改为11月，最后改为1913年2月。

孙中山访问日本得以实现，主要同日本政局变化和日本财界等方面的积极努力有着密切的关系。1912年底到1913年初，西园寺内阁总辞职，第三次桂太郎内阁成立，产生了打破藩阀拥护宪政的第一次护宪运动。特别是西园寺内阁下台，取而代之的是对孙中山的大亚细亚主义主张颇有共鸣的桂太郎再任首相，使孙中山访日成为可能〔12〕。另外，三井物产驻上海支店长高木陆郎、所员森格积极向日本财界做工作，计划中日实业界合办中国兴业公司〔13〕。正因为如此，财界成为邀请孙中山访问日本的最为积极的力量。

日本财界邀请孙中山访日是经过森格等人从中联系促成的。1913年1月底，森格向孙中山提出赴日后日中实业界共同创建中

国兴业公司的提议〔14〕。2月2日在东京的高木陆郎打电报给森格：“关于中国兴业公司，订于近期赴日协助筹备一事，请孙中山按上述电文通知这里。”〔15〕3日晚上，孙中山派人到森格处，转达此次访日，一部分日本人中早有计划企图利用自己的担心〔16〕。森格回答说：“一部分人有特殊计划，不足奇怪。问题是只要能识别其人，就不会有任何过失。”〔17〕4日，日本《时事新报》登出“孙中山此次来朝目的，日中共同出资二千万，组织成立经营汉冶萍、招商局、江西铁道的投资公司”〔18〕。5日上海的报纸也刊登出这条关于孙中山可能赴日筹建中日公司的消息后，孙中山马上派马君武抗议，要求予更正。森格则担心，此举反倒引起人们的关注，露出马脚。〔19〕5日，高木电告森格，东京这里《时事新报》已对上述报道做了更正。在孙中山启程赴日前，日本外务省阿部政务局长处，已经了解到孙中山同日本财界代表森格之间就计划成立中国兴业公司所进行的交涉〔20〕。上述的电文内容，充分证明了日本方面邀请孙中山访日用意是早有准备的，是要建立一个中日出资的合办企业。

据《森格》一书记载，创办中日合办企业工作，日本方面大致分以下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涩泽荣一、益田孝等日本财界重镇。第二个层次，山本条太郎、胜田主计、小村寿太郎等政府外交、财政首脑及民间实力人物。第三个层次，主要是高木陆郎、森格、尾崎敬义，三位具体筹办人员。高木、森格、尾崎三人负责联络等工作。这三人的具体分工是，高木配合山本条太郎主要做日本财界及政府部门的说服、动员工作，尾崎配合胜田主计主要同日本大藏省进行联系，森格当时尚未任三井物产天津支店长，主要工作在上海，负责同中国方面要人的接触〔21〕。日本方面极力劝说孙中山，同孙中山之间共同筹备中日合办企业，也是因为他们认为，孙中山仍然是中国的实力派。正如高木所说的那样：“孙中山并没有在第一次革命中失败。他把大总统的位

子让给袁世凯，自己当了全国铁路总裁，下决心铺设10万公里铁路，预定去美国。……我们把他拉到东京，成立中国兴业公司的条件完全成熟了。”〔22〕

2月14日，孙中山一行抵达东京。仔细追踪孙中山在东京的活动，完全可以看出，商议创办中国兴业公司是访日中最实质的工作之一。日本方面则在孙中山抵日之前，在东亚兴业公司的基础上，制定了中国兴业公司的宗旨、章程，并由胜田主计起草了备忘录〔23〕。为了建立这个中日合办企业，日本各个方面都进行了充分的准备，只待孙中山访日，进行双方谈判，以迎接公司的正式登记、注册了。森格、高木、尾崎于孙中山抵日后摄影留念，以纪念中国兴业公司的成立，森格说：“我们三个人一起引中国上钩。”〔24〕

二、中日实业公司草案的出笼前后

孙中山访日期间，受到了日本各界的隆重欢迎。日本财界的接待规模，尤为引人注目。涩泽荣一更是不顾年迈高龄，从头至尾，几乎逢事必到场，阪谷芳郎以东京市长名义举行了盛大的欢迎宴会。这些都使孙中山体会和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亲切和满意，使其逐渐打消了对日的警惕和以往对日的反感。对于孙中山来说辛亥革命期间，虽然没有得到日本足够的援助，但是卸任总统后，到日本竟能受到如此规模的欢迎，他善良地相信此次所谈中日合作，理应都是发自双方内心的愿望。探讨孙中山访日40天的活动，不是本文的目的，但是有一点需要指出，这40天中，孙中山所到之处，无不大谈中日友好，无不倡议中日合作，自始至终，对于日本寄予无限的期望。概括孙中山在日的全部演讲，主要集中了三点内容。第一，他对迄今为止支持他的所有日本朋友表示了最真挚、崇高的谢忱。第二，他高度赞扬了明治维新后日本社会的变化、进步和工业化的建设。第三，他公开地提倡亚

洲主义，呼吁在同文同种的基础上中日携手，开展经济领域上的两国合作〔25〕。也可能出于希望进行经济合作的目的，在日期间，孙中山同日本财界、实业界进行了广泛深入地接触。他参观了一些工矿企业，发表了大量的热情洋溢的观感。日本的报界称孙中山这种专致于实业救国中日友好的行动，“无形中结下了数不尽的联系，特别是他对我实业家的信赖之深，得到了实业家的尊敬，据闻以某男为中心，正在筹划提携，今后的日支实业关系可刮目以待〔26〕。”事实上，孙中山在日期间的一系列讲话，完全反映了此时孙中山的对日思想，即中国要向日本学习，中日两国要友好合作。同时，也迎合了日本人，为日本财界所拟定的中日经济合作，奠定了相互信任的良好基础。然而，日本各界欢迎孙中山，则是有着明确目的的〔27〕。

2月17日，涩泽荣一赴帝国饭店看望孙中山，由何天炯翻译，交换了关于时局和经济问题的意见。中午，涩泽回到自己的事务所，又同山本条太郎讨论了与孙中山交谈的情况以及有关中国兴业公司的看法〔28〕。18日，胜田主计致函涩泽荣一，就设立中日合办企业问题，提出六点意见。

- 1.表面上政府与该公司无关，但是将从背后予充分的援助。

- 2.合办公司的性质，首先仿照东亚兴业，以开拓经营为主。

- 3.公司找到的工作，将其介绍给该部门的专家……。

- 4.公司所有计划由涩泽主持。

- 5.涩泽于适当时机，召集适当范围的银行家、实业家共同筹画。为确保其成功，其范围最初不宜过大。

- 6.东亚兴业公司于江西铁路有牟取中国利权之嫌，在与中方会谈时应回避与其之关系，待公司（中国兴业）成立后，再谋东亚善后之策〔29〕。

胜田主计的六点意见，集中了日本政府对创立中的中日合办企业的基本考虑。由大藏省次官亲自下指示，并明文“政府将从背后予充分援助”，足以说明这个计划本身是在日本政府的旨意下出笼的。从公司的性质及胜田提醒不要暴露中国兴业公司与“日本”东亚兴业公司之关系这一点看，这个公司完全是按照东亚兴业公司的模式来创立，并计划于新公司建立后，考虑东亚兴业公司的后路。东亚兴业公司的主要工作，是为日本企业开辟在华事业服务，胜田建议，中国兴业公司也应如此。此外，胜田明确要求，该公司要由涩泽主持负责，是肯定了该公司的规格，防止一般企业家插手，沦为纯民间事业。涩泽荣一主政，代表了日本财界主流派的介入，表明了日本政府对这一计划之重视程度〔30〕。

19日上午10时，涩泽荣一访问大藏次官胜田主计，协商了同孙中山会谈的内容。随后，又赴日本银行，见高桥是清总裁，征求了关于日中合办企业的意见〔31〕。20日上午，涩泽又同山本条太郎电话交谈了21日与孙中山会谈的问题。晚，于三井物产集会所召开了中国兴业公司第一次发起人大会。日本方面出席者，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安田善次郎、仓知铁吉、益田孝、山本条太郎等。中国方面出席者，孙中山、戴季陶等，由戴做翻译。会上初步定下的两国发起人名单如下。中国方面：孙中山、印锡璋、李平书、顾馨一、张静江、周金箴、朱葆三、沈缙云、宋嘉树、庞春城、王一亭。日本方面：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安田善次郎、益田孝、仓知铁吉、三村君平、中桥德五郎、山本条太郎。21日中午12时至下午3时，中日双方代表在涩泽荣一事务所，就合办公司计划交换了意见，并逐条讨论了章程的备忘录。之后，涩泽荣一提出了关于创立中日合办中国兴业公司的草案，25日下午1时，涩泽抵大藏省将草案交给了胜田主计。3月1日，涩泽又于三井物产集会所召开了日本方面有关人员会议，又一次讨论了草

案。3日上午9时，中日双方围绕草案各项交换了意见，11时30分结束〔32〕。

尽管草案几经修改，但是同东亚兴业公司章程相比，就会发现，除在涉及两国合作的组织、事务所、名称、股份等部分上，有所增补，其他内容几乎完全是东亚兴业公司的再版。即便这些增增补补也只不过是按照胜田旨意不可让孙中山发现、觉察该公司与东亚兴业公司之间联系的，而做的表面文章而已。

东亚兴业公司章程共38条，中国兴业公司章程共41条〔33〕。由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并不了解清末民初日本对华政策中经济方面的主要内容，不可能识破日本于合作友好、共同开发背后的争夺其在华权势的不可告人的算盘。尽管如此，孙中山凭其敏锐的感觉，对英文Exploitation一词表示不悦，指出，兴业一词使用Development更为合适。孙中山反对中日合办企业在中国的境内使用“开拓”，“开发”字样，认为“Development”发展一词为宜〔34〕。遗憾的是，孙中山知其一不知其二，尽管看到了名称上的问题，却没能看到日本方面掩盖在其后的对华经济扩张的计划。

3月3日的协议会上，孙中山就组织、资金、法律三点质疑。这都是极其重要的问题，两方争执不下。日方代表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益田孝同孙中山之间的对话，分别代表了中日双方的利益，也如实说明了日本方面组建中国兴业公司的动机〔35〕。山本条太郎与益田孝一直陪同涩泽荣一出席与孙中山的谈判。

（实际上这两个人，山本条太郎是作为东亚兴业公司的代表，益田孝是作为三井物产的代表〔36〕。）关于日方成立中国兴业公司的动机，只要看一下下面的回忆，便会一目了然。“当时，日本在中国的投资机关，只有山本翁担任取缔役的东亚兴业公司一家。但是，这个公司是日本的法人，受中国的法律约束，外国人除在租界地，开放港口外，任何事也做不了，连搞一个铁路工程

都相当困难，不得不变相成立了一个中国的公司，干了一段，仍觉不便。于是，便筹划日中合办企业，这便是（邀请）孙中山来日的原因，孙中山对该计划深表赞成，日中出资各半，干了起来。”〔37〕真是一语道破天机。

另外，从出资者来看，中国兴业公司包括了原东亚兴业公司的几乎所有股东。甚至连出资的比例也几乎同东亚兴业公司相同〔38〕。

表1

东亚兴业公司股东名单

股数	股东姓名	股数	股东姓名
1000	三井家	100	岩下清周
500	岩崎小弥太	100	原六郎
500	大仓喜八郎	100	浜口吉右卫门
400	古河虎之助	100	服部金太郎
300	原田二郎	100	星野镜三郎
300	大谷光瑞	100	大谷嘉兵卫
300	高桥是清	100	小田切万寿之助
300	村井吉兵卫	100	奥田正香
300	安田善之助也	100	川崎金之助
300	铃木马左也	100	鹿岛岩藏
300	松尾臣善	100	门野重九郎
300	藤田平太郎	100	添田寿一
300	涩泽荣一	100	左右金田作
200	原富太郎	100	中岛久万吉
200	大桥新太郎	100	中井新右卫门
200	神野金之助	100	中桥德五郎
200	高田慎藏	100	山本条太郎
200	根津嘉一郎	100	马越恭平
200	益田孝	100	松方幸次郎
200	古市公威	100	福原有幸
300	日比谷平左卫门	100	近藤康平
200	茂木保平	100	乡城之助
150	早川千吉郎	100	白岩龙平
150	朝吹英二	100	志岐信太郎
100	今村繁三	100	

《东京经济杂志》第90卷第1505，1908年8月。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489页。

表2

中国兴业公司日方股东名单

柳生一义	1000	台银	广冈惠三	200	大同生命保险
住友吉左卫门	700	信友家主	根津嘉一郎	200	东武铁道
大仓喜八郎	700	大仓组	村井吉兵卫	200	烟草商, 村井银行
佃一豫	500	兴银	早川千吉郎	100	三井银行
涩泽荣一	500	第一银行	大谷嘉兵卫	100	制茶商, 横滨七四银行
中川小十郎	500	台银	高峰让吉	100	大日本人造肥料
久原房之助	500	久原矿业	和田幸治	100	富士纺绩
安川敬一	500	明治矿业	武藤山治	100	钟渊纺绩
松方严太郎	500	十五银行	门野重九郎	100	大仓组
藤田平太郎	500	藤田集团	左右田金作	100	左右田银行
萨摩治兵卫	500	绵丝商, 近江银行	福原有信	100	帝国生命保险
志立铁次郎	500	兴银	白岩龙平	100	日清汽船
原六郎	300	正金	原田二郎	100	鸿池银行
若尾民造	300	若尾银行	大石广吉	100	三菱合资产行
高田慎藏	300	高田商会	高木陆郎	100	三井银行
仓知铁吉	300	前外务次官	尾崎敬义	100	三井银行
益田孝之助	300	三井物产业	中野武营	100	东京商业会议所
古河虎马	300	古河矿业	川崎芳太郎	100	川崎造船
赤星太吉	300	十麻生矿业	山本条平	100	三井物产
三村君平	300	三菱银行	马越恭重	100	三井物产
茂木惣兵卫	300	生丝商, 茂木银行	三好总一郎	100	三井物产
井上准之助	200	正金	浅野太郎	100	浅野水泥
岩本荣三	200	大阪市实业家	原富太郎	100	生丝商, 议员
今村繁太郎	200	今村银行	田中源方	100	正金
服部金三郎	200	服部商店	小田切方寿之助	100	日本复写纸
西胁八右卫门	200	太阳生命保险	中村房次郎	100	渡边银行
川崎八之助	200	川崎工业俱乐部	渡边福三郎	100	大阪纺绩
乡中平八	200	日本商, 田中银行	山边丈次郎	100	川崎造船
田中久万吉	200	米谷商, 田中银行	松方幸七郎	100	东海海商
小岛国三	200	古河矿业	福岛浪藏	100	福岛商化
神田藏	200	山一证券	盐原又策	100	横滨制糖
森村左卫门	200	红叶屋(证券业)	安部幸兵卫	100	三井物产
中桥德五郎	200	森村组(贸易业)	森恪	100	三井物产
大桥新太郎	200	大阪商船	佐竹作太郎	100	东京电灯
大山爱辅	200	东京商业会议所	末延道成	100	东京海上火灾
桦山	200	煤炭			

转引自须永德武《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和借款投资公司的活动—以中日实业公司为中心》《经济集志》第60卷第2号, 1990年7月165页。

按照日方的设想, 随着中国兴业公司的逐渐发展, 不断增强日方的发言权和比例, 最终是要把东亚兴业公司所经营的项目全部接管过来, 完成合并〔39〕。然而, 在以后中日间交涉时, 由于第二次革命的失败, 孙中山势力日微, 而日本在华侵略势力不断加强, 致使中国兴业公司的筹建工作完全按照日方的设想进行。

三、公司成立的背景和袁世凯的反应

如前述，对于日本来说，中国实业公司并非什么新生组织，只不过是日本财界于日俄战后成立的对华投资机构《东亚兴业公司》的继续。因此，为了系统地阐述日本财界对华政策的内容，我们有必要对东亚兴业公司成立的前后，作一简要说明。

（一）日清起业调查会

作为一个民族，日本民族具有很多自己独特的历史和文化，虽然她近邻中国，文化上受惠古来中国文明颇多。但是她以勤于吸收外来营养精华著称。在拿来、模仿中善于创造出适我而用的形式，赋予新的生命，同时又不失掉自己本来的传统。在探讨日本近代化的过程中，纵观一百数十年历史，其成功与失败、建设与改革、和平与侵略，无时无地不体现了这个民族的上述特点。财界亦同样，在计划、制定日俄战后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问题上，他们仍然是调查先行，组织人力研究国内外局势与中国市场状况，然后调动财力，集中力量攻几个重要项目，从而使其在与列强竞争在华权益中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意义上说，1907年《日清起业调查会》的成立，正是日俄战后，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扩张的必然产物。

1907年4月，为“调查对清经济事业”，涩泽荣一（第一银行）、益田孝（三井物产）、大仓喜八郎（大仓组）、近藤廉平（日本邮船、日清汽船）发起成立了日清起业调查会，推选白岩龙平（日清汽船、日清贸易研究所毕业生）为干事，涩泽荣一为代表。〔40〕这个调查会，被称为日本最初的对中国投资机构。三井和大仓似乎是该会的核心。因为，三井、大仓正想方设法挤入修建川汉铁路中，这个调查会对中国修建铁路，铺设电话等的借款事项，多次召开会议，报告实地调查情况，但最终未能开展具体实业。调查会成立的动机，主要是建立对华投资机构，从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一书中仅存的资料来看，涩泽主持召开的几次会议，多是讲座清国铁路工程（1907年9月17日）、北京马车铁道（1908年3月19日）这不仅同三井、大仓有关，也是当时日本政府，财界对华经济活动的中心课题。当时的外务大臣林董、大藏大臣阪谷芳郎是这个组织的背后操纵人，他们积极赞同该组织的成立。〔41〕同两年后，以日清起业调查会为母体所建立的东亚兴业公司一样，从成立到运营，日本外务者始终介入并从经营资金上给予了相当大的支助，调查会从外务省领取补助金作为经费，外务次官石井菊次郎和政务局长仓知铁吉经常出席会议，具有浓厚的“国策”组织的色彩。财界、外务当局共同议政，策划对华经济问题，在近代日本外交中，是一个极有意思，又能真实的反映了经济问题在日本对外政策中占据何等重要地位的现象。作为一个对华投资机构，日清起业调查会，没能留下实际的业绩，但是，且不提该会的主要成员，均为日后的东亚兴业公司、中国兴业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以及他们在对华经济问题上所发挥的作用，仅就建立对华投资组织这个形式，和在议定对华投资方向、事业上所留下的可借鉴的经验而言，这个调查会的另一个直接的、最大的遗产应该是后来成立的东亚兴业公司。

（二）东亚兴业公司

东亚兴业公司成立于1909年7月，在筹建期间，原称作“日清兴业公司”，后来或许是觉得日清兴业有限限制日本更加向外发展之嫌，故在正式宣布成立的前夕，才改称东亚兴业公司，在中国，仍使用日清兴业公司的名称。〔42〕东亚兴业公司的核心，除了旧日清起业调查会的原班人马外，还有东京、横滨、名古屋、大阪、神户的大实业家代表，队伍比以前壮大，包罗了上面几个地区的主要实业家。该公司以涩泽荣一挂帅，八名发起人为：涩泽荣一（第一银行）、近藤廉平（日本邮船、日清汽船）、大仓喜

八郎（大仓组）、益田孝（三井物产）、山本条太郎（三井物产）、大桥新太郎（东京商工会议所）、古市公威（前递信次官）、白岩龙平（日清汽船），都是日本知名的企业家，财界的骨干。1909年6月22日，〔43〕第一次发起协议会上，首相桂太郎、外相小村寿太郎亲自参加，秘密进行演讲，希望集资一百万的“我（日本）资本家的清国企业”早日降生。7月20日的协议会上，在政府的旨意下，经涩泽荣一的提议，选举了社长、副社长，通过了公司的章程。公司的目的是，对清国内的铁路、土木、矿山、造船、电气等各种事业，进行调查设计，并接受委托，进行直接间接的事业投资，提供资金。公司成立时共有四十九位个人股东，代表九千七百股，每股二十五元，余下三百股由台湾银行负责。递信省次官古市公威出任社长（涩泽记载由古市担任社长是小村外相的主意），副社长小田切万寿之助、山本条太郎、门野重九郎（大仓组）、岩下清周（北滨银行董事长）、白岩龙平。〔45〕就这样，一个集各家财阀为一体，代表日本财界总体利益的对华投资公司诞生了。

日本急于设立对华投资机关，似乎主要有两个方面的原因。一是民间资本，特别是三井、大仓财阀在中国本土的积极活动，致使建立对华投资成为当务之急。〔46〕另外，当时列强诸国集中于长江流域争夺在华权益，江西及其附近的区域，成为日本覬覦的主要目标。日本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渡边省三在给日本外相的一份报告中，认为“当前列强惨淡经营，欲扩张本国势力，莫不到处试图飞跃。虽然如此，幸江西之地至今尚未遭到外国侵蚀，有超然居于势力圈外之象，且与畴昔帝国约定不得割让之福建相联接。一衣带水之间，隔福建而通台湾新领土，广袤七万里之沃野，尚未开发之富源颇多，洵极其适于培养我国利权之一大疆域。”“帝国必须远瞩大局，”“以经营铁路为序幕，而展开远大之计划。〔47〕”东亚兴业公司的成立，完全是为了实现上述

的进军长江流域，独占对华铁道、矿山投资等目的。从公司成立后的几项大的对华投资，充分可以看到尽快建立日本自己的对华投资公司是何等地急迫。

二是中国形势的变化。中国的形势，使日本产生强烈紧迫感的原因，大致有两个根本对立的方面。首先是列强对华的激烈争夺，促发了中国朝野的排外思潮，回收利权运动如火如荼。自1905年江苏、四川、江西、安徽、广西、河南等省由官民一体的自营铁路公司的建立，把日本企图伙同列强取得中国铁路铺设权的路堵得越发窄小。同时，正是出于对欧美列强争夺利权的反抗，中国国内一部分当权者中，出现了一股以张之洞等人为代表不大不小的联日思潮。这种事态同上述排外思潮相呼应，反给日本提供了插足中国的良机。东亚兴业公司的成立，正是抓住了这样一个机会。东亚兴业公司在对华扩张中虽然也碰到了这样那样的问题，比如日本法人，无法打入内地，公司不得不买通中国商人，挂羊头卖狗肉，暗中渗透日本的资金，来寻找途径。但是，总的来说，公司的成立为日本财界的对华经济扩张提供了经验，开辟了道路。东亚兴业公司上承日清起业调查会，下接旭公司，（旭公司是东亚兴公业司中派生的一个分支。）因此说，东亚兴业公司的成立是清末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扩张史上的一个重大事件。

（三）中日合办企业论

辛亥革命后，围绕中国的国际格局出现了变化，日本于帝国主义列强中，日益加大其对华问题的控制能力，开拓了谋求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个可能性。1912年2月1日，涩泽荣一找到内相原敬，讨论对中国投资问题，提出有必要扩大与加强现存唯一的对华投资机关——东亚兴业公司〔48〕。涩泽的建议是当时日本财界对华政策的最有代表性的意见。辛亥革命后，日本上下都在大谈如何对华扩张，如何修正对华政策的问题。在各种各样的议论

中，财界人的目标具体且明确，不少人提到了建立中日合办企业的问题，涩泽荣一等财界领导人更是极力赞成。

《支那》杂志连载文章《日支合办事业论》，具体阐述了中日合办企业的必要与紧迫，唤起了更多人的注意和支持。文章开门见山地指出：“为迎接革命后中国所出现的实业热、企业热，日本应采取的对策中，同中国合办企业，乃十分重要。”文章认为鉴于中国缺少资本，缺乏经营事业之才，特别是鉴于应付蓬勃兴起的中国工业，防止中国人的反抗，鼓励中日合办企业是当务之急。文章分析：（1）中国资源丰富，但是由于中国缺乏资本，久不得开发，因此列强诸国热衷于对华投资，以牟巨利。然而，外资流入后，必然出现企业热，在这种情况下，同借资获利相比，应取合办经营之手段，打入中国企业。这样，在与列强诸国竞争中，日本将兼收投资者、经营者之两大利益，实为不可多得之妙计也。（2）此次革命所带来的后果，主要为实业热、企业热。不过纵观中国历史反复发生的收复利权运动，新兴的企业热、实业热同样面临着中途夭折的危险。所以，仅投资放手不管，有着相当大的风险。为保证不出问题，参予经营，授其经验、技术，以我长补其短，彼此得利。（3）我国狭窄，以商工业为立国之大策。然而，要完成商工业立国大策，不可缺少西邻中国这一消费市场。中国在日本（海外）商工业市场中具有举足轻重之地位。此次革命后商业升降波动，足以说明制定对华政策乃燃眉之急。以中日合营为主（之工作），已不容犹豫。加上使用支那原料和支那劳动力，加上日本丰富的资本，同样是对抗欧美列强的一大法宝。（4）随之外人、外资的侵入，中国的排日风潮必将日盛，日本人在华各种事业中必将招致中国人之反感。采取合办形式，以中国人名义，或说服中国商人，利用中国人镇压风潮，实不可缺少，此一作法，有利无弊。

关于中日合办企业的现状。该文从现有的17家公司入手，指

出合办可以避免不必要的纠纷。从总的情况来看，合办的公司经营状况良好，年年有利。但是，这种合办公司的分布，主要集中于中国东北、北京一带。其他地区甚少，是一大缺欠。要解决这个问题，尤其是中国排外的国民情绪，尽管现阶段有兴业困难的一面，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越困难，（在同欧美竞争意义上）越是日本插足的良机。该文反复强调，眼下日本对华经济扩张，首举中日合办企业。认为，只要日本人于中国各地与中国资本家及企业家建立关系，积极进取，策划中日合办企业，将无往而不胜。文章最后大声呼吁，如此绝好的机会，将不会再来，望从速考虑我立国大计，策划中日合办事业〔49〕。

这篇分两次连载的文章，可以看作是涩泽荣一等财界领导人思考对华经济问题上的一个极为重要的依据。涩泽荣一在谈到成立中日合办企业建立中国兴业公司的目的时，就反复强调日本与中国有“同文同种的关系，因自古以来历史的联系，于思想、风俗、趣味、习惯上具有共通之处，在任何一个方面都高列强一筹，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然而在开拓中国市场上，却败给了列强一筹。他认为，日本的组织太小，多个人公司。即便是横浜正金银行、三井物产、大仓组等也无法同欧美相比，个人能力有限，规模小。因此，比如像交通机关或其他的大规模工业，需要巨额的资本，非设立大公司难以成其事也。他为日本在争夺在华权益上而败于欧美诸国深感遗憾。另外，他还指出，在开拓中国富源之际，最紧缺的是交通机关的完备，缺乏对各种大型企业提供资金。这就是，涩泽于辛亥革命时期，向原敬建议加强东亚兴业公司的思想基础。基于上述认识，涩泽说：“经济无国境，实业无南北”之分，创立中国兴业公司，乃为两国之无上幸福。随着其各种事业的开展，必将为两国经济界作出颇大的贡献。〔50〕

怎样在中国内乱期间，扩大日本的经济势力？日本财界的看法，似乎不谋而合地达成了—个共识。其目的颇为明确，就是要首

先巩固原有基础，扩大对华投资，加强东亚兴业公司，利用中国企业家，实行合资合办，求真正的进展。1912年6月，白岩龙平代表日本东亚兴业公司决定向黄兴贷款一千万后，白岩在给大仓组的报告中说，“此时对孙逸仙、黄兴等多少表示同情，以便促进我们对南方的经济政策，同时，这也是确立我国政府一大方针——在江西建立根本政策的难得的机会”〔51〕，不难看出，日本财界在同中国交往所进行的每一笔交易，都是经过周密算计的。

正是基于要纠正对华事业上日本财界势单力薄，无大企业集团考虑的偏向，涩泽荣一等人最初设计中日合办企业计划时，就是想打破三井、大仓之别，一心要建立一个可与欧美抗衡、超然个别财阀利益，以国家利益为中心、能够代表财界整体的“国策公司”。所以在筹建中国兴业公司的过程中，三井物产系统、三井财阀参与者过多，给人以三井财阀色彩过浓的感觉，以至大仓财阀的白岩龙平几次写信给涩泽荣一，提醒不可被三井财阀一家垄断〔52〕。但是，涩泽荣一毫不介意，并一再强调，兴办中国兴业公司，决非三井一家之事，乃关系到日本国利益的整体大业。因此，尽管三井系统的森恪、益田孝、山本条太郎为主要筹建人，但是，这项工作从其开始，就得到了财界整体的认同，得到了日本政府的支持〔53〕。简言之，在涩泽荣一看来，之所以不必担心三井财阀一家垄断，完全是因为，作为财界筹建这个公司，其目的，就是要把它建成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窗口。据后来日方统计，参与该公司的日本企业、财阀、银行主要有下述18家：台湾银行、三菱财阀、三井财阀、大阪商船公司、日本兴业银行、日本邮船公司、十五银行、大仓财阀、住友财阀、第一百银行、南满铁道公司、保善社、第一银行、久原财阀、古河财阀、安川财阀、藤田财阀、涩泽财阀〔54〕。如此之大的队伍，几乎包括了当时日本财界的全部主力财团，正因为如此，这个计划从一开始就得到日本政府的大力支持。如1912年3月7日，牧野外相于公司

设想刚一形成后，立刻向在华日本使领馆发函，通告日中双方筹建中国兴业公司一事，并附上有关资料〔55〕。5月6日，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写信给涩泽荣一，要求日方筹备委员，提供有关中国兴业公司的组织计划〔56〕。同一天，牧野又致函在华日本公使伊集院，担心在南北决裂之际，如发表日中合办中国兴业公司的消息，将为孙中山利用，助长孙中山声势。此事公布，势必引起北方猜疑，要求探知北方的反映〔57〕。日本为了与中国南北方势力保持友好关系，决不愿为建一个公司而失去另一方。尤其在孙中山失势日趋明显的情况下，更不可能冒然妄动。

日本在关注袁世凯北京政府动向的同时，加速中国兴业公司的筹建，涩泽荣一积极进行组织工作。6月5日召开日方发起人大会，议定协议13项，决定召开创立委员会，依据日本商法，进行筹建，事务所设在东京〔58〕。6月19日召开创立委员会，讨论明确组织机构、人事安排、公司经营内容，预定7月下旬召开创立总会〔59〕。

（四）袁世凯的反应

当然，袁世凯政府最初从中反对和破坏孙中山与日本财界合办中国兴业公司，后来看到中国兴业公司筹建已具规模，又急忙派出使者同日本财界接触。日本财界巧妙地利用双方的矛盾，顺利平稳地完成对中国兴业公司的控制。

如前述，袁世凯对于孙中山访日一直持不冷不热，表面应付，背地里反对的态度。当然，袁不同意孙以公家名义出访，也反映了在对日问题上孙、袁两个人的意见分歧。在孙中山提出访日要求后，1912年11月13日，袁世凯致函孙中山云：“顷与国务院商议，念谓日人忌我共和，恐受影响，我公往说，似应申明我之改革是民族问题。与日本万世一系者迥别，除国体外，所有行政计划多向彼国取法，盼其赞助，应可免其猜忌。至联日一节，目前尚未承认，如以公家名义前往必不能正式接待，若以私人名义

试探日政府意向如何，恃公德威，较易为力。”〔60〕且不论袁世凯明里暗里阻挠孙中山访日，仅就如何处理辛亥革命后中日关系的认识而言，袁强调国势强弱为联合同盟之根本，乃颇有见地之言，认为但唯有联日一节，尚需慎重。理由是“体察现在国势，只可以情谊相感，若与联盟，时期尚早，至攻守同盟，强弱相形，尚难唇口，仍候卓裁。”〔61〕

但是，一旦孙中山访日成功，并把中日合办企业工作提到日程上，袁世凯不断给日本施加压力，公开表示孙不代表政府。到了四、五月后，熊希龄内阁成立。袁一面派专人赴日本同日财界接头，牵制日方的动作，一面由熊出面召见日本驻华使馆官员，说明孙的状况，以阻挠中国兴业公司的及早成立。

孙中山同日本的密切关系，令袁世凯不安。袁担心日本站到孙中山一边，支持其倒袁。1913年4月26日，袁政府陆军部秘书长访问日本陆军少将青木宣纯（北京政府聘任的军事顾问），转达段祺瑞希望能急速从日本购买100门最新山炮之意。青木问及原因时，答曰，以备南北冲突。同时提出：据闻有孙中山已向三井申请400万的借款，三井正在积极筹措的消息。对日本援助南方一事，深表不悦〔62〕。5月4日，总统府秘书长梁士诒会见在上海日本总领事，谈及南方以宋教仁暗杀案为由，向日本借款，转达了袁世凯认为事态不稳，一旦局势变化〔63〕，拟采取坚决措施，并于5月3日以大总统令通告南方革命军。但是，由于不少日本浪人积聚在南方孙中山、黄兴等革命党内，望日本政府能对这些日本浪人的行动给予关注，以保证北方政府恢复秩序，维持和平〔64〕。

为了使日本政府在南北之争中，持中立态度，不从政治、特别是经济上支持孙中山。袁世凯于7月初派特使孙宝琦、李盛铎赴日打着加强中日实业联系的招牌，同日本财界接触，了解孙中山同日本筹建中国兴业公司的虚实，准备日后夺回中国兴业公司

的代表权〔65〕。此后，袁世凯政府处处给孙中山与日本关系上泼冷水，同时，频频向日本递送秋波，极力促使日本重新调整对华政策。在这种情况下，中国兴业公司问题便成了中日关系的焦点。

袁世凯为削弱孙中山革命党人与日本的关系，突然向日本表示要积极发展中日经济关系。6月20日，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向牧野外相报告了19日会见袁世凯即将派往日本考察访问的使节孙宝琦、李盛铎的谈话内容。孙、李谈了他俩人赴日计划和袁世凯的对日意见。孙宝琦、李盛铎着重强调了此次赴日的目的，主要是同日本财界接触，发展中日经济关系，希望能建立中日实业协会。同时提出关于中国兴业公司，如果因为孙中山方面没有出资保障而搁浅，袁政府愿意动员中国实业家出资，负责把其办下去。若孙中山已尽力在办，则希望能进一步加强扩大这个公司。袁世凯同时还表示，对于日本方面想方设法要拿到手的南浔、萍乡铁路，待时机成熟后，可由中央直接管辖，那时可以依靠日本、英国资金合办。长春至热河之间的铁路同样愿接受日本投资建设。谈话中，孙、李再三申明，两人赴日及同日本实业家建立联系，既不具任何政治意义，也不想排斥孙中山〔66〕。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孙、李俩人转交了袁世凯请阪西利八郎陆军大佐（袁世凯的军事顾问，也是日本情报机关总头目）代为起草的，给准备考察日本实业特派员的训令。训令有四项内容：（1）征求日本政府当局及实业界对中国实业的意见。（2）考察日本实业界、金融界与中国的关系。（3）调查中日两国合办企业的情况，以及今后发展的方法。例如，合办所需的机关、银行、公司、商会或协会，以及日本人出资金额的数字、支付方法。（4）了解能胜任在中日联合后工作的人材。阪西代笔的这份训词，与其说是袁世凯对日政策的基本大纲，倒不如说是这个时期，日本对中国问题的要点〔67〕。因此，这个训词请阪西利

八郎代为起草，耐人寻味。袁世凯的用意不是真正地考虑同日本财界合作，完全是出于对孙中山与日本财界结手的恐惧，而采取投日本所好，对日本作出让步，以破坏孙中山同日本结盟，行釜底抽薪之计，防孙中山靠日本力量反袁之患于未然。袁世凯对日本政策的让步，派专人同日本财界修好之举〔68〕，引起日方的强烈重视，使得涩泽荣一等人不得不又一次推迟召开中国兴业公司创立总会。

实际上，袁世凯的一系列反应，同当时中国驻日使馆对孙中山访日情况的报告，对孙与日本财界合办中国兴业公司的判断有着十分密切的关连。孙中山访日期间，与涩泽等财界人接触，大部分于秘密状态下进行，外部难知道内情。虽然3月下旬，俄国就对传闻中孙与日人合办企业时表示强烈的关注，1913年3月13日的《申报》转登圣彼得堡电：“俄外部日与日本驻俄公使议阻日本政府与孙中山订立中日协约。”〔69〕19日，该报又转载北京电称：“国权报谓中日交亲乃中国阻止俄国于远东进取之第一步，俄人永远盘踞蒙古，日本殊难容忍云”〔70〕等等。但是，袁世凯一直没能得到有关孙中山与日本联手的准确情报。现在能够看到的是1913年6月23日以后，驻日本中国使馆就孙中山与日本筹建企业打给袁世凯的电报，以及袁世凯对这一问题的批复。6月25日，民国政府公府秘书厅发函称：“准驻日本汪代表电称，日本天皇创议设中国兴业公司，专贷资华商，为与办实业之用，请密呈等因，相应照录原电函送贵厅，即希转呈大总统核示。”〔71〕遗憾的是，现在无法看到6月23日，赴日汪代表的电文，不能得知其内容。但有两点可以从25日电文中得到证实。〔72〕（1）汪误报此公司由天皇创议，估计是考虑到涩泽荣一的特殊地位而做的推测；（2）既然是日天皇创议同孙中山合办，此事关系重大，故必须向袁世凯直接汇报。那么，袁世凯是什么态度呢？27日，外交部向驻日汪代表转达大总统袁世凯的意见：“二十三日电悉。”

政府向持联日兴业政策，华日商人合办之中国兴业公司，极端赞成。应由驻日公使，一面与该公司重要人物切实接洽，一面将公司实在情形，如华股已否开募，已有华股若干，应募者何方面居多，华总理、副总理等职员如何选派等，详探电复，以凭筹办等因。”

〔73〕袁的态度首先强调中日要修好，再次关心的是同日合办者中方孙中山的情况，命令了解公司详情。那么，在孙已与日方订立合办时，采取何等措施，更为适宜。汪大燮经过接触日本财界代表，建议说“燮近与公司创办人相计论，彼甚愿我北方商人加入华股之内，办法专贷资华商，为兴办实业之用。华总裁一席，并另加意选择……，日人近来渐知吾国内情，此亦有见风转蓬之意，下月内开成立大会，如我亦表赞成，乞迅电示，俾於开会前切实接洽。请密呈。再北商字样，会意，我须插手，方易操纵。”〔74〕不难推测，背着孙中山，袁政府驻日代表及后来7月到达日本的特使孙宝琦、李盛铎等与日方有过多次数交涉。比如，什么北方商人加入的问题，总裁人选问题，中方资金问题等等。对于袁世凯来说，目的就是要破坏孙中山与日本之间的联系，同时加深与日本的亲密程度。后来7月4日、7日，汪大燮、孙宝琦、李盛铎两次拍长电，向袁世凯汇报，在东凉见日各界代表，所谈中日问题的情况，并就中日兴业公司和抓紧拉拢日财界人，提出不少建议。〔75〕对此，袁世凯两次回复，原文如下：“支阳两电悉。日政府优待欢迎，已向伊集院道谢。政府优礼孙、黄，视日本笼络岛津诸人，有过之无不及。如孙、黄无不轨举动，必能如友邦劝告之意，保其名誉。总视彼等自身之作为，与人民真正心理何如耳。中日同文之国，其亲睦由先天而来，若能结合，亚洲大局方安。实业银行与两国博览会，极表同情。长春至洮南铁路，前经交通部与小田切曾开谈判，因俄事未了停顿，当飭部详筹再定。东省方面苟无影响于主权者，本望与同洲之国，厚结和好，共同经营，此意可婉达之。”〔76〕关于

汪、孙、李提出“加入股本若干，或另扩张改组”建议。袁表示“加入股本，易滋隐患，不如另组实业，使日人知所注重，即是隐消彼约孙事，当出于婉宕，容回京再议。游历各埠，可探真正商人意见如何。”〔77〕袁主张另组实业，对加入股本不甚积极。这便是导致该公司始终未能如日人所期望的那样有更大发展的原因所在。应该指出，袁世凯对日工作的重点，只不过是在排斥孙日同盟意义，至于日本财界为何建此中日合办公司的真正打算，袁等人同孙一样，也不清楚。结果是，袁的插手，恰恰为日本在华兴业，扩大在华权益，选择联盟的对手，创造了一个充分思考的时间。由于袁世凯同日本财界有约在先，从这个意义上说，孙中山又被日方筹建人蒙在鼓里，一厢情愿地期待着来自日方的合作。

1913年8月，孙中山领导的反袁二次革命爆发。此时，日本财界正与袁世凯北京政府，就成立中国兴业公司事达成谅解（孙宝琦、李盛铎赴日访问时，已表示北京政府并不反对创办公司之意），而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斗争败局已定，对于日方来说，为成立中国兴业公司而怕得罪南北双方的障碍已不存在，日方召开公司创立总会的条件业已成熟。1913年8月11日，中国兴业公司创立总会在东京正式举行。

对外宣布该公司的正式成立。创立总会的会场设在东京商工会议所，出席股东总数（委任出席84人）共4万5千9百股，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中野武营、三村君平、大桥新太郎、山本条太郎、门野重九郎、仓知铁吉、尾崎敬义、高木陆郎、森恪等11人〔78〕。由于中国方面无人参加，森恪作为中国方面代表〔79〕。一个中日合资合办企业，竟然在无一中方代表参加的情况下，举行成立大会。会议改选了6名董事（中日各三人）、监察役（中日各一人），决定仓知为代表董事兼任副总裁，专务董事由尾崎敬义、印锡璋担任。另外选出12名顾问，全部由日方的银行家、实

业家担任。涩泽荣一为顾问，总裁空位（原内定由孙中山担任，日本为慎重计，故空）〔80〕。

日本成立中国兴业公司的宿愿，终于在中国国内革命党人与袁世凯的矛盾与斗争中，顺利达到了目的。

早在筹划公司之前，日本财界就已经对孙中山在中国政局中的地位与前途作过基本的估计。但是，随着形势的变化，当孙中山向日本方面提交了中国实业家代表名单后，日本外务省专令在华领馆调查这些代表的政治、经济实力〔81〕。同时，袁世凯派代表赴日本时，日本财界不仅热情接待，对于熊希龄提出的停止与孙中山联系的要求，既不拒绝也不表示接受，而静观事态发展，巧妙地利用中国孙、袁双方对中国兴业公司的重视及相互间的矛盾，为日本财界创造掌握主动权的良机。

第二节 中国兴业公司的成立

中国兴业公司，从其发起筹建到创立，始终处于中国政局不定之中。但是由于孙中山实业救国的迫切愿望，与日本财界急于尽快占领扩大中国市场的强烈要求一拍即合，因此，围绕创立中国兴业公司的一些具体问题，在短短几个月的时间里，便取得了实质性的进展，1913年8月11日，中国兴业公司正式成立〔82〕。

从孙中山访日，与日本财界达成共同筹建中国兴业公司的协议后，到8月11日，中国兴业公司的成立，在此期间中国政局发生极大变化。革命党人在中国国内政治斗争的受挫，迫使孙中山与日本方面交涉中，无法坚持强硬的态度，对几个原则性问题（如总公司设立地点是东京还是上海的问题，是依照中国法律还日本法律等问题）不得不采取明显的妥协。同时，出于反袁斗争的需要，虽然孙中山执意迅速创立中国兴业公司热情未减，但是，孙中山的积极态度背后，主要的注意力已经开始从实业救国

转向借创立中日合办企业，以取得日本财界支持其反袁斗争及第三次革命上。与此相反，中国的激荡的政治时局，对于日本财界来说，既感到是向中国进行经济扩张的“千载难逢”的时机，同时，在难以预料的中国国内形势面前，又不得不采取稳中求进的慎重态度，千方百计地在孙中山与袁世凯之间踩“中线”，为促进公司的顺利成立取得实质性发展。

两者相比，孙中山处处被动、事事退让，于紧张的对内斗争中，已无暇认真地考虑和制定中日共同创办企业的原则和细节，而是将其拱手交给日方，让日方能够于本来就准备充分的基础之上，掌握更大的主动权。日本方面则分工明确，内外配合（森恪驻外，涩泽等守内），政府、财界合为一体，待孙中山返回上海后，遂一手包办。荒唐可笑的是，8月11日的成立大会，无中方代表参加，中方代表竟由森恪代理〔83〕。进入9月后，袁世凯逼迫孙中山完全断绝与中国兴业公司的关系，日本方面得渔翁之利。在中国方面孙、袁相争中，结果是，日本方面蓄意已久的打入中国经济市场的计划，却借孙中山之手得到实现。中国兴业公司成立前后，基本上是以孙中山的妥协为特征的。

1913年3月20日，宋教仁于上海北火车站被刺遇害一事，导致南北决裂，成为孙中山发起第二次革命的直接原因。因此，孙中山3月25日回到上海后，主持中方实业界代表讨论有关中日经济合作，筹建中国兴业公司的活动，恰恰是在上述的宋案发生，对袁斗争已经展开的大背景下进行的。

3月25日，孙中山自日本抵达上海后，马上投入处理宋案的工作。对于筹建中国兴业公司事，孙中山发电给涩泽荣一“由于政变，中国兴业公司交涉暂停”〔84〕。在如何处理宋案问题上，孙中山同黄兴意见分歧。孙中山表示“如果袁世凯用武力对付议员，我方也用武力对抗，南方已有这一决心”〔85〕。4月1日，在与日本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的谈话中，孙中山指出：“袁奸满

不足恃，尤以近来鉴于袁愈益讲求收揽权力之策，若现时不能敌彼，则他日彼之势力愈益巩固，势将难以抗衡。”〔86〕在迎接新的对袁斗争的形势下，孙中山认为“联日为重要问题，决意亲往接洽”〔87〕。其理由是“联日之举，盖所以孤袁之援，而厚吾党之势也。日国亚东，于我为邻，亲仁善邻，乃我之福。日助我则我胜，日助袁则袁胜。”〔88〕因此，孙中山急于在尽可能短的时间里，结束同日本所进行的谈判，筹建中国兴业公司，加强与日本财界、政府的联系，争取可能大的援助和支持。

4月1日，孙中山找到森恪，谈起重开中国兴业公司谈判事。3日，在孙中山所辖的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所内，孙中山召开了筹建中国兴业公司中方第一次发起人会议。出席会议的代表有：南京临时政府时期司法部长王宠惠、实业家王一亭、张静江、印锡璋等4人，日方代表森恪列席。会上，首先由孙中山介绍了筹建中国兴业公司的由来，并对具体的章程进行了讨论。孙中山说明了该公司本应由中国各省实业家参加，但因革命成功日浅，暂时同上海的主要实业家商议，由上海实业家承担中国方面第一次应支付的资金，剩余部分，孙中山负责筹措。一旦公司成立后，到了适当时期，孙中山将这部分资金分配给各省实业家代表。与会代表对孙中山提示的有关建立中国兴业公司的宗旨和章程草案，表示了基本的赞同。会后，马上同商务总会主要代表协商，随即召开了下一次会议。

5日下午，孙中山召集了中国兴业公司中方发起人第二次会议。出席代表有：周金箴、李平书、张静江、印锡璋、顾馨一、宋耀如、庞青城、王一亭、王宠惠、陈锦涛，日方代表森恪，包括主持人孙中山共12人。会议的主要议题集中在决定中国方面第一次出资金额的分配上。中国总计承担的65万5千元之中，上海实业家代表共承担其中20万，余额45万5千元由孙中山负责筹集，到下次会议时，再决定每位实业家所应承担的具体数字。由于新

增加了代表，又对设立公司的有关规章，进行了逐条议定，交换了意见。高木陆郎向山本条太郎汇报了第二次会议的情况。为了强调中国政局的激烈变化将不会影响中日合办事业，7日，孙中山又以电报告之涩泽荣一：“尽快设立中国兴业公司，竭力不受政治上影响，请放心。”

9日下午，于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所，召开第三次协议会。出席者共15人，李平书、印锡璋、顾馨一、庞青城、张静江、周金箴、朱葆三、王一亭、宋耀如、王宠惠、陈锦涛、谭兆鳌、谭维镇、孙中山、森格。孙中山主持会议，并首先向森格说明，这次会议为中方的正式集会，并要求森格把会上讨论的七项内容向东京的涩泽荣一、益田孝、大仓喜八郎、山本条太郎等汇报，委托森格代表孙中山同日方协商。这次会议上的七项议题如下：

(1) 设立宗旨；(2) 公司名称；(3) 法律；(4) 营业内容；(5) 资金；(6) 事务所设置问题；(7) 干部。七项议题中，分歧较大的仍然是法律问题以及与其有关的事务所的设置地点问题。东京的涩泽荣一、山本条太郎也相当关心中方筹备会议进展情况。13日，涩泽荣一和山本条太郎分别打电报给高木陆郎和森格，对中方筹建会上的一些具体问题做了指示。14日，高木、森格到中国铁路总公司事务所见孙中山，转达了涩泽荣一、山本条太郎电文内容，强调“(1) 由于日本承担公司资金的绝大部分，公司依据日本法律有其道理。(2) 在中国法律尚未健全时，也应依据日本法律。(3) 因此本公司(筹建)依据日本法律似无不便之处。希望中方能同意日方意见。”18日，高木陆郎，同横滨正金银行上海支店长儿玉、三井物产上海支店长藤濑政次郎与森格等共同拜访孙中山，就日方提出的几项建议，同孙中山、王宠惠进行协商，交换了意见〔89〕。孙中山首先要求，他本身承诺的45万5千元先由日方代为垫付，关于法律问题考虑到应尽快成立公司的需要，同意按照日本法律，但其前提是，待以后中国法律制定

后，应马上改为遵守中国法律。为防止以后出现纠纷，附上一部《创办中国兴业公司应适用中国法律之理由》〔90〕。理由书主要内容有三：（1）按照本公司性质，唯有适用中国法律为宜，反之不便。（2）中国法律多取日本法为内容，与日本法大径略同，无大冲突，适用日本法律也同样适用中国法律。（3）若保证本公司在中国境内创办各种实业，唯有以中国法律为依据方可得到保证。孙中山在坚持上述原则的同时，作出了暂时的让步。

孙中山为了使日方减少因中国政局不稳而对筹办中国兴业公司的担心，再三保证，中国方面于5月15日以前交付中方应付资金。5月1日，以中国方面发起人代表名义致电涩泽荣一，“中国兴业公司不会受政变影响，中方预定于15日前向正金（横滨正金银行），支付预定资金，请按高木应诺的条件，尽速成立公司”〔91〕。孙中山以同意依据日本法律、同意按期支付资金及公司事务所可设在日本为条件，催促日本方面于近期内成立公司，孙中山的妥协退让态度已经十分明显了。

此时，孙中山对袁斗争方针基本明朗，反袁斗争的进行，不可缺少国际舆论的支持和外部的援助。所以，孙中山频繁同日美接触，自4月下旬发表了《致各国政府和人民电》后，5月2日，孙中山为宋案以英文撰写《告外国政府与人民书》，并致函伦敦康德黎博士，请其代为发布，希望康德黎博士将其提交英国政府、国会及欧洲各国并公诸报端。孙中山积极向外界揭露袁世凯参与谋杀宋教仁之阴谋，呼吁各国停止大借款，停止对袁世凯的援助。同时，孙中山也在积极争取外部的理解，其中对日本寄予极大的希望，以为经过辛亥革命以及2月至3月访日建立起来的关系和影响，一定会得到实质性的支持。他不断从各个方面向日本传递他的打算，希望有相应的反响。孙中山认为：“假如列强或其他三数国家根据南方形势之实际情况，从人道问题与时局大势，认为袁之退让为得策而插手干预，则袁必退让，大局上之幸运，

当无过于此”。他希望日本政府能同英美同步，采取抵制袁世凯之政策，以助南方执政〔92〕。

4月28日，孙中山托高木转电日本外务省政务局长阿部守太郎，劝告日本当局不应借款援助袁世凯，指出：“宋教仁谋杀案证据已由江苏都督程德全君通电宣布，确系政府主谋，袁即为最要之主名。现全国皆愤，国会亦大反对。袁若不退，必酿战祸。若借款一成，袁得经济上之援助，必不肯遽退，而国民大起反抗，则非至全国流血不止。于是中国秩序紊乱至极，非一朝一夕所能治矣。故为东洋和平计，此项借款必不可使之成立，此日本当局者所当审慎者也。”〔93〕

5月25日，他在同日本驻华公使山座圆次郎的谈话中，再次强调：“和平方法终究不能抵抗袁，不求日本援助，只要日本尽力不让其他国家援袁就满意了，希望日本牵制列强。”〔94〕5月1日，孙中山致电胡汉民表示：文本拟日间重赴东洋，倡联中日，刻因宋案吃紧，尚难定行程〔95〕。5月17日，孙中山写长信给井上馨，揭穿袁世凯制造暗杀宋教仁案，专制诡诈的种种罪行。斥责袁世凯“引虎入室、以盗保家，生命财产、宁有全理。所惧者，旧派之人，惟利是视，虽卖国有所不恤，且将凭借欧洲之势力，以排斥我利害与共之友邦”。指出：“袁氏诡谋，贵国人士向所深悉，此次传闻与俄人隐相结纳，尤将为东方之不利。袁氏而得志，岂独非敝国之福乎”。“即如交款一端，于人道关系甚大，现虽业经开始交付，苟能限制不许充为战费，则袁氏或不致残民以逞”。希望对袁借款一事持慎重态度，断袁财政之后路〔96〕。

可见，孙中山积极促成中国兴业公司成立，不惜做出较大的让步和妥协，这是因为孙中山的目标是企图保证反袁斗争能在日本的支持下进行，因此，筹建中国兴业公司，已逐步失去设想当初那样的意义了。从当时孙中山所处的国内政治形势与地位来考虑，孙中山的选择似无可厚非。但是日本方面则充分利用了中国

内政局对立、激变，始终抓住扩大中国市场的良机，当日本方面看到孙中山已不具有实力可以支撑该公司时，便果断及时地同袁世凯政府拉手，抛开孙中山，改组中国兴业公司。

第三节 公司改组与涩泽荣一访华

中国兴业公司对外宣布正式成立后，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二次革命的失败已成定局。孙中山、黄兴等人纷纷逃亡到日本，同涩泽荣一等日本财界有过几次接触，但是，他们之间的话题再也不是中国兴业公司一事，已经转入请求日本财界能否对中国南方革命以财政援助问题上了。

孙中山此次逃亡到日本，再也没有上次赴日本时受隆重欢迎的气氛了。1913年11—12月间，孙中山写信谈及在日情况：“至于经济一层，不特目前无进行之款，即同志中之衣食亦多不能顾者。前日大雪，在东之亡命客中，竟有不能向火而致疾者。”孙中山十分清楚，“这些（日本）我们的友人们，在日前或今后，会站到我们一边的可能性很小，因为我们确实处于劣势。”〔97〕但是，在8至10月里，孙中山曾三次拜访涩泽荣一，提出给予经济援助的问题〔98〕。

孙中山向涩泽荣一表示：“我等同志卧薪尝胆，筹积军用资金，不久若能到手，将再度举事讨袁，希望能借先生之力量，尤其希望说服陆海军省，给予后援。”涩泽则认为，孙中山此时应慎重行事，劝阻不要再度活动〔99〕。孙中山频繁同日本财界的接触，引起了北京政府和舆论的注意。10月19日，民国政府外长孙宝琦电令驻日代办马廷亮：“探闻□□（孙文）、□□（黄兴）、李烈钧、胡瑛等逃窜东洋，秘密聚会，且有运动日商，合办中国实业事情。诚恐外人受其所愚，致生枝节。应由该代办向日政府声明，凡中国乱党运动日本实业家合办中国内地实业，政

府概不承认。倘日商来署探询，亦即据实阻止，以杜奸谋，是为至要。”〔100〕10月21日，中国驻日代办马廷亮致函牧野外相，转达北京外长声明，对于孙、黄等人在日活动中日实业运动，政府不予承认。态度强硬，给日本以压力〔101〕。对此，涩泽荣一否认日本实业家为孙中山等提供活动资金之事，否认以黄兴为首的南方派领导人同日本实业家有过接触〔102〕。

由于孙中山逃亡日本，其作为中日合办公司的主要发起人，中方代表及拟保之公司总裁一职，已不再适宜。孙中山十分清楚自己的处境和立场，他在同涩泽荣一的谈话中，正式表态：“由于本人不能不筹画革命，无暇经营公司，愿将自己所持之股票转让北京当局。”从孙中山之口，说出公司改组，正中日本财界之下怀。改组公司之事，既然孙中山已表同意，下面剩下的只是具体的手续和日程安排了。几乎在同一时间，中国北京政府方面提出邀请涩泽荣一访华，共议两国经济合作大事。在安排涩泽荣一访华和公司改组问题上，日本方面作了周密的商讨和布署，以求与袁世凯北京政府合作完成改组公司的任务。

一、公司的改组

1913年9月1日，日本驻中国公使山座圆次郎向外务省报告了熊希龄对中国兴业公司的意见以及希望涩泽荣一访问中国的要求。熊希龄首先提出：“孙中山已不适宜继续担任中国兴业公司总裁，从贵我双方利益考虑，应该（对中国兴业公司）从根本上进行改组，重新召集中国方面主要的实业家。”接着，熊希龄对日本方面委托三井物产一般所员负责与中国方面进行联络，大为不满地说，希望能请在中国有威望的大家，如涩泽荣一男爵来访，与其当面交换意见，则最为理想。特别是，恰值南方实业重镇的张謇近期以工商总长身份入京，时机难得，万一涩泽男爵本人无法成行，尚望涩泽荣一派遣适当代表，也无妨〔103〕。

10月15日，熊希龄又向横滨正金银行小田切万寿之助表示，希望涩泽荣一访华，并说明涩泽荣一访华一事已征得内阁的一致同意，袁世凯也期望涩泽荣一能近期成行。另外，张謇将于一、二天内抵京，若决定涩泽荣一访华，11月上旬最为适宜。山座公使认为中国方面极富诚意，竭力促成涩泽荣一此次访华。山座还传达了熊希龄强调涩泽荣一访华对于加强中日两国经济界的交流与合作具有举足轻重的意义，并提醒如果涩泽荣一只访问北京一地会引起内外各界注意的话，建议可以观光旅游的名义来遮人耳目。至于路线，可先经满洲，再北京，后赴南方，以视察南北两地，单纯的旅游观光面目出现，只请仓知铁吉男爵同行，其他随行者不要有同中国兴业公司有关者为宜〔104〕。

怎样才能把涩泽荣一访华与向袁世凯靠近勾结的色彩冲淡，以取信于南方，既不遭致孙中山等人的怨恨，又不影响日本推进对华经济扩张政策。10月16日，山座公使向牧野外相提议，关于改选中国兴业公司中国方面人选的讨论，应放在涩泽荣一访华后更为妥当，并希望牧野向中国兴业公司日本方面解释〔105〕。接到山座公使的电报后，10月19日，仓知代表中国兴业公司，以副总裁的名义向外务省政务局长小池张造表示，同意山座公使建议，暂停讨论改选中国兴业公司人选问题。电报说，由于中国方面选出的印锡璋等4人中除印外，已全部辞职，现已内定由周金箴、朱葆三两人为理事，补选张謇、盛宣怀为股东。然而，现在重要的问题是涩泽荣一访华，关于上述人事的变动，将按阁下意见暂停〔106〕。重视涩泽荣一访华，其实就是重视发展与中国北方政府的关系，以便加强双方的经济联系。10月27日，外务省召开综合协调会议，就中国兴业公司的股份、任务、改组，以及建立中国银行，包括对铁路、石油、币制顾问、福建铁路、安正铁路等正在进行的对华经济项目讨论，明确日本方面应持态度、政策中心。这是一个由外务次官、大藏次官、外务政务局长、大藏理

财局长、日本主要银行董事长、涩泽荣一、山本条太郎、仓知铁吉参加的高层次的协调会〔107〕。同时也是为涩泽荣一访华进行的事前准备。不难看出，政府和财界都把这次涩泽荣一访华作为开展中日两国经济合作，发展中日双方经济关系的一个重要行动。

1913年11月初，涩泽荣一老病复发，经医生劝阻，不得不取消年内访华计划。经征求北京政府同意，日本方面决定由仓知铁吉为涩泽荣一代表近期赴北京同中方交涉〔108〕。18日仓知铁吉离开东京，经朝鲜、沈阳，28日到达北京。12月3日，中国兴业公司协议会在北京召开，会上通过了补选杨士琦为总裁，改组公司为中国企业公司（后为实业公司）等一系列决议。否决了设本店于天津的计划〔109〕。但是，考虑到支店设在上海，不利于与北方中国政府的联系，同意在天津设支店，兼中国总局，总管全中国事务。这项设本店于天津的提议，完全是出于对森格的考虑，当时森格刚从上海调到天津，升为三井物产天津支店长〔110〕。

仓知同工商总长张謇及杨士琦等协议大要如下〔111〕：

1. 公司改名，由原来的中国兴业公司改为中国企业公司（后又改为实业公司）。

2. 许可问题，订为要经中日双方政府批准。

3. 在北京或天津设支店，为中国总局，统管该公司中国境内各支店。

4. 总裁的职权问题。

5. 孙中山名义下的股份由中方袁世凯政府代理人接收。

6. 登记问题。

7. 在中国境内享受同中国公司一样的待遇。

8. 干部配备问题。

9. 中方增设顾问。

10. 改组中方股东。

就改组公司，双方达成了协议后，12月7日，仓知同杨会谈中，

日本方面进一步要求中国方面，能够尽快办成一两件事，提出了接手交通部五年计划架设电话的项目，希望中方大力协助。中方则提出，为了促进公司早日完成改组工作，决定派代表回访日本。双方在如何接管、改组、发展中国兴业公司上，基本意见一致〔112〕。

总之，仓知的访华圆满地完成了预定设想。山座公使认为，仓知到北京后，同熊等人接触，特别是同张謇、杨士琦进行几次会谈，交换意见，使北京实力人物对中国实业公司印象极佳，有意认真地办成这个事业。组织机构也将按仓知同杨协商进行。在获得利权方面，仓知颇为巧妙地向杨提议架设电话一事，现尚未有具体方案，其后事已拜托小田切万寿之助去办。对仓知的工作给予相当高的评价〔113〕。

仓知回日本不久，1914年1月上旬，张謇向森恪提出，中国方面决定派刘崇杰为杨士琦的代表于1月12日出发，经中国东北、朝鲜，赴日本答谢访问〔114〕。1月19日，刘崇杰携熊希龄、张謇两人手书，抵达东京。刘崇杰在东京同涩泽荣一等日本代表具体商定了中国兴业公司改组大会的内容与日程〔115〕。

继仓知访华后，森恪在北京的活动更为积极了。仓知的访华，明确了中国兴业公司在华机构，明确了森恪在公司内的日本全权代表的身份，使森恪的活动如鱼得水。3月31日，森恪向山座公使汇报了关于召开公司改组总会的日程和计划，以及中方代表预定于4月20日前后到东京出席会议的情况〔116〕。

4月5日，山座公使向牧野外相建议，经征得中方意见，为减小舆论的注意和外界的反响，关于涩泽荣一访华日期，待参加总会中方代表抵日后，再决定为宜。

4月20日，出席总会的中方代表孙多森等人到达东京。25日，中国兴业公司改组总会于东京商工会议所召开。会上，通过了改名、增补干部、修改章程、重新分配股份等项议案，袁世凯政府成功地完成了接管中国兴业公司的工作。4月30日，涩泽荣一电

告日本股东各方，说明公司改组及修改的章程，宣告公司改组工作的结束〔117〕。新改组的公司干部成员如下：

总裁	杨士琦（新任）
副总裁	仓知铁吉（留任）
专务董事	孙多森（新任）
专务董事	尾崎敬义（留任）
董事	周金箴（新任）
董事	李士伟（新任）
董事	男爵中岛久万吉（新任）
董事（现在中国）	森恪（留任）
监察役	胡宗瀛（新任）
监察役	大桥新太郎（留任）

二、涩泽荣一访华

涩泽荣一访华一事反复数次，最后经北京、东京、日本外务省、财界的几方面商议，终于在1914年4月下旬落实下来。具体日程是，5月2日离开东京，途经上海、汉口抵北京，再去济南、天津、沈阳、抚顺、安东，由汉城过釜山，6月17日抵下关。全程约20个城市，水陆兼程，共40天左右。访华团除涩泽荣一外，随员7人，同行者4人，共12人〔118〕。

别小看这支12人的访华团，这是自1877年中日两国建立外交关系后，日本财界派出的第一个有最高领导人参加的对华实业视察团。由于涩泽荣一身分特殊，代表团组成，行将出发的消息传开，引起海外各方的瞩目。

考察涩泽荣一访华过程，有助于我们了解辛亥革命后复杂的中日关系，了解日本对华经济扩张的主要内容，同时，从袁世凯政府和涩泽荣一等人对待中国兴业公司的态度上，可以看到中日双方的不同打算。

漫游与利权

自1913年下半年，涩泽荣一访华提到中日关系的日程后，日本方面则千方百计，力促涩泽荣一能早日成行。

涩泽荣一访华，主要是出自急于巩固发展日本在华的经济扩张与地位。关于这一点，在加藤外相给驻北京山座公使的电文中讲的十分清楚。“关于去岁来计划的涩泽男爵访华一事，如果支那方面仍希望继续邀请的话，请抓紧时间安排。涩泽访华，若能促进电话事业早日签约，促进正在进行中的中国实业公司早日改组，宜抓紧时间，落实涩泽荣一访华计划。并望了解支那方面意向。”3月3日，山座公使向孙宝琦提起涩泽访华计划，孙表示要请示熊希龄后方可答复，因为这关系到究竟要把中国兴业公司办成一个什么样公司的大问题〔119〕。12日，山座面见熊希龄时，熊表示欢迎涩泽荣一近期访华，以解决中国兴业公司等问题。随后，山座在给牧野外相电报中说：“虽然涉及中国兴业公司的人选，股份分配等问题尚未落实，但是，涩泽访华的重点仍放在促成一两件具体项目或更为有益。如制造业或矿山开采，眼下电话事业则更为急迫。”〔120〕

日本政府极其重视涩泽荣一赴华视察。4月30日，加藤外务大臣电告在上海领事上村，要求涩泽荣一抵达后，各地领馆全力以赴接待，提供服务。加藤外相又向在华公使及南京、杭州、苏州、汉口、天津、奉天、长春、吉林、安东10个领馆，再次重申关照涩泽荣一访华，并附上涩泽整个日程。同一天，又向在外八个领馆，英国、德国、法国、俄国、奥地利、意大利、美国、纽约、汉堡等使馆、总领馆，通告中国兴业公司改名改组，举行第一次股东总会的情况，提醒各方注意外部的反应〔121〕。

涩泽荣一访华受到中国各地的隆重接待。所到之处，规格高、气氛浓，使涩泽一路兴奋，不顾年迈高龄，忙于应酬。涩泽到处宣称，这次访华目的有二，一是游览中国名胜古迹，二是会

见中国兴业公司中方代表，想方设法淡化此次访华与争夺中国利权的关系。涩泽一行的日程安排，也是出于这个考虑。第一站是上海，随后是杭州、苏州，游览山水胜地，吟诗挥毫，谈古论今，摆足一付游山观水的架式。但涩泽的日记及当时的报纸、杂志，特别是外交文书关于涩泽与中国袁世凯、杨士琦等人的会谈，记录了涩泽荣一牟取利权、计较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利益的痕迹。

素以健谈著称的涩泽荣一，在近40几天的访华期间，共做了15次以上较正规的讲演，（其他，每天午餐会、晚餐会、参观访问、答谢等即席讲话，则不包括在内）〔122〕。走一路讲一路，宣传中日友好、鼓吹加强中日经济合作。涩泽讲：“中国物产丰富，欧美人望洋莫及，利用此等资源乃当务之急。开发中国，要从发展实业开始，兴办中国兴业公司正是要达到这个目的。除了要促进中国实业进步别无他图。”〔123〕

自从踏上中国土地后，涩泽荣一竭力宣传中日两国实业交流之必要。到了北京，见到袁世凯政府大员后，涩泽便再三说明组建中国实业公司目的，纯属出于发展两国实业往来之愿望，与孙、黄等人无政治上交往，以消除中国方面对日本的误解。对于这一点，涩泽本人认为取得了相当大的成果。旅行接近尾声时，涩泽对《时事新报》记者说：由于中国兴业公司最初同孙中山商定，引起了种种误会，影响了事业的进行，但是通过面见袁大总统以及各部长，说明日本的态度，日中实业关系同诸外国实属不同，决不是可以离开政治，仅仅追求双方利益的商业关系，解除了这些误会，双方达到了意见统一〔124〕。

在南京，涩泽拜访了盛宣怀，转达了井上馨的问候。在汉冶萍问题上，涩泽荣一说，中日两国间的合作根本在于实业联系，但是，两国间高喊友好，却无实际行动，实在令人遗憾。认为象汉冶萍公司借款事，有利于两国利益，不应该因为有人反对而停止。涩泽提出，汉冶萍公司的发展，直接影响中日两国的前途，

因此，该公司若进展顺利，必将成为一个样板，导致中国官民积极主动要求日本的援助。

在与袁世凯的会谈中，袁说：应认清中日两国关系源远流长，非一朝一夕之事。欲保持巩固两国的亲善友谊，必须紧密其经济上的联系，这也是我赞成中日实业公司，派杨士琦主事的缘故。对此涩泽荣一极力赞成：“阁下之见与敝人平素抱负相同，众所周知，中日实业公司也是蒙大总统的关怀。前日正式成立以后，将照循尊教，奋励发展，为两国实业建设鞠躬尽瘁。”〔125〕

涩泽在同杨士琦的会谈中，拿出事先准备好的关于中国实业公司要办的项目，一个一个地向中国落实。涩泽向杨士琦表示，中日实业公司，最低限度要包括：（1）电话事业，（2）四平街洮南线，（3）电灯矿山经营三项内容。对此，杨回答说：电话事业，交通部同德国西门子公司正在交涉，现在中日实业公司想插手，实属困难。四平洮南工程，已处预算阶段，现在看来，有一半把握可以交给日本。至于电灯矿山的经营可放心，不存在任何困难〔126〕。

会谈中，涩泽向杨士琦提出了中日实业公司应从事事业的备忘录，全文如下〔127〕：

- 1.就中华民国政府计划的电话事业，同日本国资本家之间的借款协议，进展顺利，令人满意。这个项目对于民国颇为有利，望迅速恢复原计划，由合办公司承担借款业务。

- 2.关于中日两国间合同中就铺设满蒙铁道合同中的，从四平街至洮南府的线段，其铺设工程最近已经动工。该铁路铺设工程及材料器械的订购来源，有明确的规定，本公司应定为主要单位。此事若成功，将有利于本公司的发展。

- 3.本公司为调查煤炭、铜、铁等将向民国各方面派出技术人员，前日，被派往赴长江沿岸的技师认为，（此地大有希望）应立即同矿山所有者签订草约，或向该官有矿山迅速

提出挖掘申请，以备今后本公司的合办经营。

4. 本公司内设电灯部，对于民国内未设电灯之城市，按需要，进行直接或间接的投资。

从上述备忘录中，可以看出日本方面十分重视加强实业公司的权限。在业务范围内，更重视资本输出(借款)、修建铁道、开采矿山等所需调查的技术人员的派遣；以及插手电力事业的发展。显而易见这个备忘录，主要遵照的是1913年10月27日，日本各方面关于强化中国兴业公司和中日经济关系协调会上所制定的方针原则〔128〕。

在整个会谈中，日本方面要求中国方面承认中国实业公司的特殊地位、给予极大的特权，野心勃勃，其欲望溢于言表。在谈及电话事业归属问题时，杨士琦不得不表示，要争取这个权力，即便征得交通部的同意，迫徐总理认可，再向袁大总统陈述，也极度困难，难保成功〔129〕。但是，日本方面要获得中国的权益，不惜同德国发生正面冲突。日方的态度明显地反映出，此时，日本帝国主义对华经济扩张已进入一个十字路口，进入一个不得不同老牌帝国主义之间，进行重新瓜分中国势力范围的争夺。

日本报纸以“涩泽大成功”的标题，评说了涩泽的中国之行，结尾云：“据中国报纸，涩泽此行给中日实业关系带来了极大的效果，解除了北方实业家的误会，双方气氛良好。”〔130〕涩泽有诗云：“未必机心委死灰，此行何啻水云媒，笑吾论语算盘说，怱愿中华企业来。”〔131〕

中方的反应与外电的批判

正因为涩泽荣一此行是日本实业界最高层次的视察团，所以东道主的接待规格之高以及周边诸列强注意程度之烈，也是不足为怪的。

从表面上看，涩泽这次赴华视察所受到的欢迎是空前地热烈。所到之处，不是乐队相迎，就是爆竹相接。警卫森严，十步

一哨，几步一岗。无论是观光，还是访问，总是警卫开道，前呼后拥。这种专车相候，专员伴随，使涩泽本人受宠若惊〔132〕。当然，中国方面的这种热烈欢迎背后，深藏着明显的动机和用意。

辛亥革命后，围绕中国的国际形势极其恶劣，列强诸国在孙、袁之间举棋不定，特别是日本国内各种势力长期以来支持孙中山的革命运动，在1911年10月武昌起义后，给孙中山相当大的援助，尽管日本政府最后选择了有实力，可平定中国局面的袁世凯，然而，孙、黄等人于二次革命后，大批逃亡日本，企图以日本为基地，图东山再起，夺回被袁篡夺的政权。为了实行安内攘外之策，袁世凯不得不重视同日本的关系，力图以联日来压孙、黄，截断孙、黄的后援。袁世凯积极开展日本外交，主要同下面三个问题有关。（1）取缔逃亡日本的孙、黄革命党人。（2）施加压力，迫使日本民间同情孙、黄势力减少活动。（3）诱使日本从经济、财政上支持袁政府，转变对袁的政策〔133〕。在这个意义上讲，袁世凯方面对于涩泽荣一的热列欢迎，是可以理解的。

实际上，袁世凯的这番用心，经袁政府高级官员之口，转达给涩泽荣一。涩泽回国后，在《龙门杂志》上发表日本与中国的商业关系的文章中说：“在中国期间，一政府高级官员持流畅日语，阐述了对中日两国商业关系的意见，指出两国间意见隔阂，特别是日本报纸，对于袁总统，不分好坏，一味非难，（中略）尽管袁总统本人不介意，但这种作法有伤国民感情。接着，又提到在日中国政治逃亡者，说，对于潜逃日本的中国政治逃亡者，希望日本国民不要采取煽动这些人从事革命运动的措施，……一些日本人中的所谓‘支那革命党人’，煽动支那革命者，以获个人权益。这乃本人最感遗憾之处。”涩泽表示，他对这位中国大员的一席话深表同感〔134〕。

一个多月的中国旅行，特别是同袁世凯的会谈，使涩泽荣一中国的认识，对袁世凯的认识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如认为，

“同袁世凯30分钟的会谈，是此次北京之行，此次中国旅行中最重要会谈”〔135〕。涩泽称袁“不单是军人政治家，也是近世少有的实际经济学家”〔136〕。可能是受了上面那一袁政府大员之启迪，5月23日，涩泽感叹地说：“世间所谓论者有三种，（1）不平之徒，（2）无责任之辈，（3）无智者。今日报纸虽然所论之处有异，却没有触及日本同中国人的真正看法，希望中国人看日本人应以同文同种之厚谊，一致协调，共同为东洋的和平发展而努力。”〔137〕接着5月26日，涩泽召见日本记者说：“日本报刊的评论，不可人云亦云，尤其是对袁世凯总统，动辄谩骂遣责，不但有失礼仪，更有碍于国事，切当注意为是。”〔138〕

也可能是为回答中国方面对日本的对华政策的不满，涩泽荣一曾于旅途中多次专题谈到日本的外交问题，指出日本外交多元倾向的弊病，妨碍了两国间的交流和理解。涩泽指出：“日本外交有三种：‘一种是外务省外交，一种是军人外交，一种是浪人外交。’对中国外交不振之原因，在于其不统一。此三者常互不相容，结果不仅给欧美诸国以可乘之机，又往往酿成招致中国方面误解之祸根。”〔138〕涩泽认为，在这种情况下，实业家应该保持的态度，就是要密切同中国的经济关系，以真挚行动，促进中国实业界的发展。现在开发支那乃为连结中日经济关系的大事〔140〕。特别是在5月21日，袁世凯接见后，涩泽荣一进而表示，总统一番激励之词，实在感谢之至，今后将不辞老躯，尽微薄之力促进中日两国实业发展〔141〕。

由于一些报纸，认为涩泽中国之行是谋求中国利权的报道，5月31日，涩泽又对记者说：“本人此行与英文北京日报所说牟取利权一说毫无关系，……我见到袁总统也表示，我决不是那种利权者，右手拿着算盘，左手隐藏着炸弹，此行，我是右手拿着算盘，左手拿着账本到北京的。总统很理解我的来意，欢迎我的访问，北京停留期间受到了徐总理以下中日官吏实业家的热烈欢

迎”〔142〕。

对于涩泽荣一访华，外电的反应是十分严厉与冷淡的。在涩泽尚未正式出发前，3月13日，英文《日本广告》以“日本在中国”为题，评论了涩泽访华的消息。认为“涩泽荣一身为中国实业公司日本方面的总裁，为牟求利权，专程去北京，实属罕见。这一事实驳斥了认为日本政府同日本资本家没有与列强诸国竞争在华权益之说，纯属愚蠢之见”。文章从几个方面分析了涩泽此行的目的，一、认为“不幸的是，由于日本非富强之国，很难同列强诸国齐肩，保持所谓支那魁人（即居高临下之意）之地位，因此，涩泽及其同僚不得不步欧美诸国之后尘，开展牟取利权之运动。”文章指出：“最近设立的中国实业公司所要求获得扬子江沿岸的利权，不仅仅是铺设铁路，其中含有更重大意义，据吾人所见，这次牟取利权运动，是日本决心在已被列强承认的在华英国势力范围内，进行瓜分之争”，呼吁英国及英国人注视涩泽荣一的一举一动。并警告说：“英国对日本在南满洲的特殊地位，以同盟国的关系曾表示了理解与尊重，同样，日本应对长江沿岸英国的特殊地位给予同样的尊重。反之，英国对此提出警告，是必然的，如果涩泽等人的活动，确实有具体计划，英国方面一定会以某种形式提出警告的。”文章指出，日本对华政策的独特性，认为日本常常打着同文同教的招牌，宣扬东洋相互提携，对付西洋。但是，这种政策在中国人之中缺乏信任。究其原因，是与日本时而傲慢，时而亲善的两面性有关。因此，这种对华政策招致中国的抵制是正常的；遗憾的是日本政府的反对者们，又以此为借口，攻击外务省软弱，认为应该像处理南京事件那样，对中国采取更为强硬的态度，那就一定会在扬子江沿岸的利权问题上，取得比今天更为多的机会。

这篇文章又指出：“日本染指长江沿岸目的有三个：一、在政治上同列强争一高低。二、在经济上扩大日本的产品贩卖市

场。三、日本陆军强调台湾同长江有密切关系，海军则认为福建沿岸得一良港，意义如何之大。”文章认为日本不具备与列强竞争之国力与条件，涩泽荣一访华目的是彻头彻尾的帝国主义对外侵略，奉劝日本改弦更张，把精力放在日本国内，留意日本内部之发展，巩固日本国建设本身之基础〔143〕。

上述外电的尖刻批判，引起了涩泽等人的注意。第二天，涩泽召见该报记者，全面否认赴华牟取中国利权一事，说“本人虽参与了中国实业公司的建设，但是现在实际上已经完全脱离关系。另外，近期予定赴中国一事，只是观光，漫游，无别目的”。记者寸步不让，追问：“据闻，中国实业公司受日本政府援助一事，是否真实”。涩泽回答：“中国兴业公司是以增进中日两国经济利益为宗旨的合办企业，需要得到日中两国政府的好意援助，特别是实业家在投资外国时，遵循本国政府对投资对象国的方针，不与之背道而驰，这决不意味着中国实业公司即为半官方企业。”否定了日中两国政府对中国实业公司的参与，涩泽又说：“我已年迈，因此不带任何公干访华。”〔144〕涩泽想通过这一系列表白证实他虽为日本财界巨头，但已年老，因此不问政治，更无意获取中国利权。

对于涩泽荣一访华，没有发现孙中山有什么反应的史料，或者至少迄今没有见到孙中山对这件事有过什么评论。但是，孙中山并没有完全沉默，而是通过致函（1914年5月11日）大隈重信的间接形式，揭露了袁世凯的种种骗局，指出其反革命两面手段，提醒日本警惕袁世凯。在涩泽荣一访华期间，孙中山致信大隈重信，殷情切切，长文叙述了中日关系现状。信中开门见山地指出：“今日日本，宜助支那革新，以救东亚危局，而支那之报酬，则开放全国市场，以惠日本工商”。袁世凯“外佯与日本周旋，而内阴事排斥，虽有均等之机会，日本不能与他人相驰逐。

（中略）设其地位巩固过于今日，其对待日本必更甚于今日，可

以断言”。对于日本积极向袁政府靠拢，深为不满。孙中山在信中没有直接涉及涩泽荣一访华及中国兴业公司改组之事，可能有以下原因。一、涩泽等人在公司改组方面得到了孙中山的事前许可。二、孙中山一直对日本期待过高，不愿得罪日本。在同一封信中，孙中山表明：一旦日本助革命军成功，“支那可开放全国之市场，以惠日本之工商，而日本不啻独占贸易上之利益。是时支那欲脱既往国际上之束缚，修正不对等之条约，更须藉日本为外交之援”。孙中山把中日关系之前途比喻为英国同印度之关系，谓“今使日本无如英于印度设兵置守之劳与费，得大市场于支那，利且倍之，所谓一跃而为世界之首雄者此也”。“支那之物产日益开发，即日本之工商业日益扩张”〔145〕。孙中山的对日政策，是要中日结盟，互通有无，以拥日本为亚洲盟主作为条件，希望取得日本对革命党人的支持。三、同当时孙、黄之间，在建立中华革命党，开展第三次革命等问题上发生矛盾，内部对立濒于分裂有关。此时孙中山无暇顾及涩泽等人在中国的活动。尽管如此，孙中山信中仍对袁世凯进行了强烈抨击，对日本加紧拉拢袁世凯的行为深表不满。

然而，由于孙中山企图用高出袁世凯几倍的报酬，满足日本的奢望，以换取日本对中国革命的援助和支持。其结果，使日本于孙、袁中得渔翁之利，在谈判桌上桌下，始终处于优势。这种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为一方向以袁世凯为首的北京政府为另一方，各自出于不同的目的，都向日本寻求支持，构成了当时中日关系中的一个重要特点。

辛亥革命以来，围绕着中国问题，帝国主义列强和新生的亚洲帝国主义国家日本，在资本输出、重新划分在华势力范围等一系列重大利益冲突面前，进行了一场你死我活的殊死之争。

日本并非金融强国，经济基础薄弱，在与列强诸国较量之中，先天不足，始终处于劣势地位。但是，中日地理相邻、文化相

近，加上清末来一大批改革之士逃亡东渡，隐居日本，颇受日本官民“有志之士”相助等原因，特别是，武昌起义后，孙中山、黄兴等南方革命党人成为中国政治中一重要力量，更使得久与孙中山有千丝万缕瓜葛的日本，在同列强诸国抢食中国这块肥肉时，找到了一条可捷足先登的“捷径”。辛亥革命后，日本总结经验教训，扬长避短，以各种非欧美式的“日本独特”的作法，来牟取新的利益，开辟自己新的势力范围，获得了预想不到的成功。

“中日合资合办”就是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内容。1914年中国兴业公司改组为中日实业公司后，逐渐发挥了日本对华投资机构的作用，由于中日合办，使得日本财界直接打入中国内部，能够在本身不具备足够资金实力的情况下，获得优先权利。

“中日合办事业”是日本对华投资中一个主要的形式。日本学者樋口弘在《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一书中指出：利马氏没有把合办企业的投资作为一个项目，而是包含在直接投资中。但是，在日本的对华投资中，由于“合办企业”已形成一个有力的事业形态，其投资额已达到相当大的数字，因此（有必要）把其专列一项。这是在对华投资上，日本同其它列强国家的区别所在〔146〕。

当然“合办企业”，这个方法，起源于日本对朝鲜的经济蚕食中，在不断加强对中国东北地区，对中国南部进行经济扩大侵略的过程中发展、完善。因此，无论是在日本对朝鲜的经济侵略史上，还是在日本对中国的经济侵略史上，都留下了“日韩合办”，“日中合办”的痕迹。事实上，发展所谓“中日合办”企业，已经成为扩大日本在华经济势力的重要手段。1916年5月，日本制定抛出了《日中企业株式会社法案》，其中详尽地规定和阐述了中日合办事业的目的、性质和作用〔147〕。从内容上看，这个法案，是1913年6月中国兴业公司及中日实业公司章程的延长和发展，从结果上看，中国兴业公司成立、改组的整个过程都为这个《法案》的制定，提供了不可多得的宝贵经验。中日实业公司在后

来的发展，正是对“中日合办”形式的意义与地位的最好注解。

对华借款是第一个大项目。中日实业公司的对华事业中，森恪认为“（在中国）英国抓了税关，法兰西拿到了邮政行政，作为日本无论如何有必要在重要问题上插进去”〔148〕。森恪把对华电话借款作为一项政治交易，作为与其它列强较量的大事。他调动了台湾银行、朝鲜银行、兴业银行三个特殊银行，加上第一银行、住友银行、古河银行三个普通银行，以三井、住友、古河为材料供应基点，很快就电话借款同北京政府签定了合同〔149〕。

这一大笔交易的成功，增强了中日实业公司的信誉。随后，在森恪的努力下，中日实业公司又以各种手段，顺利地同中方签定了几项较大的契约。这几项契约是：1. 山东实业借款150万；2. 直隶水灾借款500万；3. 汉口造纸厂借款500万。值得注意的是，这几次借款的中国对手，都是清末民初同日本打过交道的知日派。如汉口造纸厂借款时的财政部长是陈锦涛，水灾借款时的财政部长是梁启超等。就这样中日实业公司又把中日两国间的新交旧知连结在中日提携、发展实业的大旗下。

另外，中日实业公司在其它方面也有长足发展。1914年10月，森恪代表中日实业公司同桃冲铁山的裕繁公司签订了铁矿石合同。为了保证日方能尽快得到产品，森恪软硬兼施，不择手段，暴露出他的日本帝国主义经济别动队的丑恶面孔。首先，森恪向中国政府施加外交压力，迫使中国政府批准。同时，在日本海军的护航下，压制了安徽省军队的反抗行动，修建了运矿铁道〔150〕。1917年，日本财界成立了东洋制铁，经由中日实业公司，在二年内向裕繁公司提供了224万贷款，为此，日本方面得以每吨4.8元的低价购买了大批的铁矿石〔151〕。

如上述中日实业公司于短短的几年里，在对华经济扩张方面，取得了一个又一个丰硕成果，进一步确立了其在日本对华政治、经济关系中的重要地位。

种瓜得豆。经孙中山先生创办的中国兴业公司，从其诞生伊始，完全背离了创始人“发展实业，建设中国”的初衷，蜕变成日本对华经济扩张侵略的桥头堡。这一沉痛的历史教训，要求我们，总结辛亥革命的历史遗产，必须正视这个时期中日关系演变的形态与过程，找出带有规律性的东西，还日本财界在对华问题上的真面目。

【注释】

〔1〕 坂本雅子认为，在日本对华投资问题上，“东亚兴业公司”和“中国兴业公司”之所以不可忽视，主要基于以下三个方面。（1）作为对华投资机关从事了相当多活动的，只有这两个公司……。（2）1930年当时，东亚兴业借款5800万元、中日实业4400万元。即使在量的方面，也在日本对华借款总体中占据重要的位置，两者合计近1亿元，仅次于日本帝国政府，日本兴业银行、台湾银行、朝鲜银行的投资银行团和南满铁道株式会社三个机构。（3）两个公司的股东，网罗了主要的日本财界人士。见坂本雅子著《对中国投资机构的特质——以东亚兴业、中日实兴的活动为中心》，见国家资本输出研究会编《日本的资本输出——对中国借款的研究》多贺出版，第173页，1986年。

〔2〕 最早考察中国兴业公司成立过程的论文有三篇。（1）大石（嘉）演习组《中日实业公司的设立过程及活动——191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进出中国的考察》，东京大学经济研究生演习（经友论集委员会）《经友论集》，1976年9月（第17号）。（2）野泽丰《民国初期的政治过程与日本的对华投资》，东京教育大学《史学研究》，第16号。（3）彭泽周《中山先生与中国兴业公司》，见《中华民国建国史讨论集》第1册。

〔3〕 只要认真分析1913年2月孙中山访日的动机，特别是访日期间孙中山的对日言论与行动，不难看出，这次出访前后，孙中山对日认识的一显著特点是，对日本官方与民间的对华友好寄与过高期待。

〔4〕 《孙中山全集》，第2卷，第335页。

〔5〕 同上，第339页。

〔6〕 同上，第340页。

[7] 同 [4]，第340页。

[8] 同上，第350页。

[8] 同上，第368页。

[10] 《驻广东赤塚领事致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电》，1912年6月19日，第60号，见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档案。

[11] 《内田康哉外务大臣给驻上海有吉总领事电》，1912年11月5日，第123号，见日本防卫研究所藏档案。

[12] 俞辛饴：《孙文的革命运动与日本》，参照东京六兴出版社，1988年版，第211页。

[13] 山浦贯一：《森恪》，原书房，1982年版，第203页。

[14] 同上，第203页。

[1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970页。

[16] [17] [18] [19] [20] 同上书，第970—972页。

[21] 《森恪》，第203页。

[22] 同上，第203页。

[23] 同上，第206页。

[24] 同上，第213页。

[25] 《申报》在评论孙中山的访日时转引路透社东京来电“孙中山君定本月离此（东京）。孙君因民国尚未得各国承认，故此行并非正式。表面上似专为申谢日本之扶助革命而来。然有识者多谓，孙君此行，实系代表袁总统，且谓孙君之实在目的系提介中日两国商业上之联系，并使两国作政治上之提携。孙君演说之处，甚多力言中国欲维持远东和平，领土完整，建设健全政府，振兴工商事业，自当唯日本是赖。”见《申报》，1913年3月3日。

[26] 《熊本日日新闻》，1913年3月2日。

[27] 同注 [13]，第206页。

[28] 涩泽青渊纪念财团龙门社编辑刊行《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1《日记》，1966年，第758页。

[29] 同注 [13]，第206—207页。

[30] 同上，第207页。

[31] [32]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别卷1，《日记》，第758—

762页。

[33] 《东亚兴业公司章程》，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486—489页。《中国兴业公司设立之宗旨及其计划概要》，见于《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05—1009页。

[3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975页。

[35] 同上，第975—984页。

[36] 同上，第972页。

[37] 山本条太郎翁传记编纂会：《山本条太郎》，原书房，1982年，第282页。

[38] 参照《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490页、528页。

[39] 同上，第524页。

[40] 《涩泽荣一日记》1907年7月13日。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483页。及《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设立沿革并创立、旨意的概要》，同上，第494页。

[41]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龙门社，第512页。

[42] 同上，第486页。

[43] 《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融通金沿革》上、大藏省预金部编《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507—508页。

[44] 《东亚兴业株式会社》，《东京经济杂志》1907年7月，《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485—486页。

[45] 《东亚兴业株式会社创立总会》，《东京经济杂志》1907年8月，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492页。《东亚兴业株式会社设立》、《银行通信录》1907年8月见《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486—487页。

[46] 参照坂本稚子论文，第179页。

[47] 日本驻汉口代理总领事渡边省三致小村报告附件，1909年12月8日；中国社会科学院经济研究所所藏日文档案，转引自宓汝成《帝国主义与中国铁路—1847—1947》，上海人民出版社，1980年，第193页。

[48] 原奎一郎发行：《原敬日记》，第5卷，第27页，1951年，乾元社。1912年2月1日，“涩泽荣一来访，谈起前些天，井上馨提议，为了加强对清国投资，可否扩大现存的东亚兴业公司一事。”

〔49〕 松本忠雄：《日支合办事业论》（上），见《支那》第3卷，第8号，第4—6页。同书（下），见《支那》，第3卷，第8号，第3—7页。

〔50〕 涩泽荣一：《中国兴业会社的目的》，《龙门杂志》第360号，龙门社，第14—17页。

〔51〕 白井胜美：《日本与中国一大正时代》，原书房，1972年，第33页。

〔52〕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935—941页。

〔53〕 同上，第54—542页。

〔54〕 日本外交史料馆藏，《中日实业会社关系杂纂》，第2卷。

〔55〕 同上。

〔56〕 同上。

〔57〕 同上。

〔58〕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520页。

〔59〕 同上，第523—524页。

〔60〕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2056页。

〔61〕 同上。

〔62〕 〔6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349—350页。

〔64〕 1913年5月3日袁世凯发布通令，诬各方对宋案及善后大借款之强大舆论为“直欲酿成绝大风潮，以遂其倾覆政府，扰乱大局之计”；令各省都督，民政长“通行晓谕”，不容“散布谣言，坐贻实祸”。

〔65〕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996—997页。

〔66〕 同上，第996—999页。

〔67〕 同上。

〔68〕 1913年7月孙宝琦、李盛铎访日。

〔69〕 《申报》，1913年3月13日。

〔70〕 《申报》，1913年3月19日。

〔71〕 《发公府秘书厅公函》，见《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料（路矿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第13页。

〔72〕 关于6月23日的电文，上述资料后面标明（缺）的字样。同一资料第25号为“收驻日本使馆函，民国2年7月2日”。不过电文说明“为日人创设中国兴业公司事，于23日晚发一电如下”等等，从内容上看，可

推测为23日的电文，只是不知何来7日2日，同上，第16页。

〔73〕 《发驻日本汪代表（大燮）电》，同上，第14页。

〔74〕 《收驻日本使馆函》，同上，第16页。

〔75〕 见上书，《发大总统电、7月4日》、《发大总统电、7月7日》，第16—17页。

〔76〕 见上书，《大总统复电、7月11日》，第17—18页。

〔77〕 见上书，《大总统复电、7月14日》，第18页。

〔78〕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537—538页。

〔79〕 同上，第535—536页。孙中山为此曾致函涩泽荣一，原文如下：涩泽男爵赐鉴：迩来时当夏至，溽暑蒸人。遥想起居佳胜，至为企颂。关于中国兴业公司，屡辱赐书，敬悉业经该公司原定股银如数清缴，并设立办法手续，进行庶几完备，并由森恪君面聆前情，不胜同庆之至。前议有由尊处派遣代表来沪商议办法，嗣知尊处暂为罢议，即拟由敝处，遴派发起人六名赴东，商同办理该公司设立事务，适上海有南北启衅之事，未能如愿。因在中国愿认该公司之各股东，均是沪上主要实业家。当此南北开始争端之际，因当极力维持市面秩序，一时不克分身，想邀执事原谅。惟从速成立该公司以图谋发达事业，固系万难延宕。故敝处为早成立该公司起见，特将所有敝处意见及关系一切文书，托请森恪君回东，代为鄙人等与执事暨诸君筹议办法一切。森君到时，务请执事会同商酌妥善办法，并代为鄙人开创立总会，是为感佩。当初与执事商议以来，鄙人等设立该公司，全系巩固中日两国实业上之联系，以图发达为念，始终不渝。是以此次南北启衅，情形如何，与该公司毫不相涉，无待赘言。一俟该公司成立后，应由鄙人将该公司设立宗旨等，通告各省都督商会暨殷富实业家，劝招分认股份，以便在各地方发达该公司事业。嗣不论南北人士，如有愿认该公司股份者，均听其便，诸执事预先俯允，且现各股东均表同意。俟将来市面稍归静谧，各股东自当为该公司事业竭尽热诚，以资发达亦足以纾廛系也。月前对于五国借款交款问题，辱蒙贵国人士多方之同情，敝国人民殊深感激，是即系承执事指导居多，为鄙人所深感佩者也。将来尚祈赐以教言，以资敝国国势之发达，是所翘望。鄙人现因要事，今日起程赴粤，匆匆裁书，拜托森君转呈左右，统仰鼎力，得以就绪，是所切盼。并请执事将所述鄙怀，于创立总会转告贵国股东诸君是荷。

即 顾近祺。孙文 中华民国二年七月二十八日

〔80〕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537—538页。

〔8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00页。

〔82〕 《龙门杂志》，大正2年8月，第303号，第54页。

〔83〕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537页。

〔8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987页。

〔85〕 《日本外交文书》，1913年3月29日，驻上海总领事有吉明致牧野外相电，第33号。转引自陈旭麓、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上海人民出版社，1990年，第204页。

〔86〕 同上，第204页。

〔87〕 罗刚编著：《中华民国国父实录》，第3册，台湾正中书局，1988年，第2123页。

〔88〕 同上，第2123页。

〔89〕 4月6日至18日会议及谈判情况，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987—993页。

〔90〕 同上，第993页。孙中山指出的中国兴业公司必须依照中国法律一件，特意撰写一理由书，现全文摘录如下。

创办中国兴业公司应适用中国法律之理由

创办中国兴业公司当开办之始中国各种法律尚未完备自可暂时适用日本法律以便公司之成立而资事务之进行至将来中国民律商律及诉讼律等公布后本公司即宜同时适用不宜再适用日本之法律现在此项草案业经送交贵创办人查阅兹更将来公布后应适用中国法律之理由略述如左

一。适用日本法律即属外国公司性质按照条约不能自由在内地营业而本公司之性质贵能广及内地而后可以实行振兴各种实业若适用中国法律则与中国公司同一待遇当然不受限制此宜适用中国法律者一也

二。中国改良法律多是取法日本民、商、诉讼各律草案均由中国聘请之日本诸法学博士代为起草自与日本法律同一渊源即于日本人权利关系与日本法律上之地位大略相同此宜适用中国法律者二也

三。适用日本法律若发生事实问题时专从日本法律解决事实上必多困难且在内地兴业贵得人心之倾向若适用法律与中国公司不同或致渐生歧视于公司之发达恐有妨碍此宜适用中国法律者三也

总之适用中国法律并非为中国体面计乃纯然从营业上之利益着想现在彼此诚心组织此公司必无丝毫意见责创办人洞明事理当蒙采纳鄙言也

- [91] 同上，第995页。
- [92] 陈旭麓、郝盛潮：《孙中山集外集》，第207页。
- [9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994—995页。
- [94] 同注〔47〕，第211页。
- [95] 同上，第460页。
- [96] 《孙中山全集》，第3卷，第60—61页。
- [97] 同上，第71页、75页。
- [9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429页。
- [99] 同上。
- [100] 《驻日本马代办（廷亮）电》，《中国近代史资料汇编·中日关系史料（路矿交涉）》，中央研究院近代史所，第35页。
- [101] 同上，第428页，《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810页。
- [102] 《森格》，第213页。
- [10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14页。
- [104] 同上，第1018—1019页。
- [105] 同上，第1019页。
- [106] 同上。
- [107] 同上，第1020—1021页。
- [108]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4卷，第549页。《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21页。
- [10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27页。
- [110] 《森格》，第171—190页。
- [11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29页。
- [112] 同上，第1024页、第1029页。
- [113] 同上，第1026页。
- [114]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591—593页。
- [115]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55卷，第8页。
- [11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592页。
- [117] 同上，第592—596页。

〔118〕 涩泽荣一访华团成员是：涩泽武之助、明石照男、秘书增田明六、大泽正道、医师堀井宗一、野口米次郎、堀江传三郎、大日本麦酒株式会社社长马越恭平、社员仲田庆三郎、东洋生命保险株式会社社长尾高次郎，社员辻友亲。朝鲜银行理事三岛太郎。关于涩泽荣一的日程安排见《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602—605页。

〔119〕 《中日实业会社关系杂纠》，第1卷，日本外交史料馆藏。

〔120〕 同上。

〔121〕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602—605页。

〔122〕 〔123〕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32卷，517—540页。

〔124〕 同上，第558页。

〔125〕 同上，第542页。

〔126〕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618页。

〔127〕 同上，第620页。

〔128〕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2年，第2册，第1020页。

〔129〕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618页。

〔130〕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33卷，第585页。

〔131〕 同上，第558页。

〔132〕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33卷，第558页。

〔133〕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第410页。

〔134〕 《涩泽荣一传记资料》，第33卷，第581页。

〔135〕 同上，第605页。

〔136〕 同上，第546页。

〔137〕 同上，第543页。

〔138〕 同上，第557页。

〔139〕 同上，第543页。

〔140〕 同上，第541页。

〔141〕 同上，第543页。

〔142〕 同上，第566页。

〔143〕 同上，第495—497页。

〔144〕 同上，第498—501页。

〔145〕 1914年5月11日致大隈重信函，见《孙中山全集》，第3卷，

第84—85页。

[146] 樋口弘《日本的对华投资研究》，生活社，第339页。

[147] 《日支企业株式会社法案一提出理由、法案、法案说明》，见日本外交史料馆藏，《中国兴业公司关系杂件》。

该法案是我们研究日本对华经济扩张实行“中日合办”的第一手史料，至今未见有人使用，现摘译其宗旨部分供参考。

日本企业株式会社法案提出理由

我对支经济势力的增减，与我国民利益休戚与共。保全支那领土乃我帝国之国策。保全（支那）领土和开发（支那）富源有待日支两国民提携之处颇多。日支两国民之提携，只有以彼此利害与共的经济关系为基础，密切发展相互之关系，方能初见成效。

回顾我对支经济设施，资金少规模小，活动上坎坷不顺，同英、美、法、德、奥诸国投资机构的雄厚财力，日趋扩大的规模，灵活大胆的活动相比，颇感逊色。因此，有必要设置日支企业株式会社这样资金雄厚，规模庞大的投资机构，作为我对支经济设施上尚待建立的各种合办公司的总公司，以利于驰骋于国际投资竞争中。该公司，掌管投资，负责向在华各种企业提供资金，同时，边扩大事业，边作为普通贸易银行，从银行业务上，满足企业家的希望，投资于迄今难能插手的领域。从专门从事扩大在华企业、投资的两个方面，成为密切日支经济关系的火车头，指导机关，以求我经济界在华的发展。增进支那国民福利，进一步加强日支亲善。（同上，第1—2页）。

[148] 《森路》，第226页。

[149] 同上，第227页。

[150] 《日本外交文书》，大正3年，第2册，大正4年，第2册。

[151] 同上。

第九章

结论——近代中日关系的特征

关于日本财界的研究，可以有多种不同的视角和方法。由于视角和方法的不同，其结论可能相距甚远。本文通过考察以财界人为主的几个日本民间团体的对外经济战略，财界人的大陆经纶，财界的朝鲜政策，以及辛亥革命前后日本财界与中国，特别是同孙中山等人的联系，通过考察日本财界“协助”孙中山制定中华民国中央银行案的过程，1913年孙中山与涩泽荣一共同筹办中国兴业公司的过程、探讨了日本财界在推进“大陆政策”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同孙中山、同中国的关系。大量事实表明，日本财界在日本帝国主义形成过程中占据着极其重要的地位，在推进“大陆政策”方面所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财界作为日本对外经济活动的主体，在推行“大陆政策”的过程中，同军部赤裸裸的高压政策，大陆浪人的策划于密室点火于基层的行动方式相比，更注重经济问题，实行中间政策，谋经济实惠，不拘形式。从中日关系的角度而言，正是财界对外活动的这种特色，构成了近代中日关系的多面性与复杂性。

一、日本财界与大陆政策

1840年的鸦片战争，给邻国日本以极大冲击。中国败北的教训，迫使日本不得不正视“西力东渐”的现实，不得不格外警戒来自海外的威胁。明治维新后，新生日本的发展及向海外扩张与

来自外部的危机，互为表里。如何紧跟世界潮流，实现“殖产兴业”、“富国强兵”之宏愿，成为明治日本的最紧急课题。这个基本国策的选定，要求日本在对外扩张、对外发展中，必须以较短的时间，赶上欧美列强，加入其瓜分世界殖民地的行列。

大陆政策，是近代日本谋求对外发展、对外扩张的种种议论、政策、主张之一。仅就东亚地区而言，其具体内容表现在日本对于朝鲜、中国的领土、市场、权益的要求，成为近代这一地区国际关系的主线。大陆政策的发展史，也从另一个侧面反映了日本帝国主义形成、发展、消亡过程。这是因为，第一，从时间上看，大陆政策中的“朝鲜政策”“满洲政策”的顺序排列，恰恰同标志着日本进入帝国主义的1894年甲午战争与1904年的日俄战争相吻合。第二，从内容上看，日本大陆政策内容的确定，表现了日本从商品输出走向资本输出的特征。日本侵略、占领朝鲜以及中国东北原料市场、商品市场，正是满足日本国内资本主义生产发展的需要。大陆政策中，对中国本土的利益要求，既是日本大陆政策中，朝鲜、满州、中国三部曲中的一部，同时也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到不得不同其他列强重新瓜分中国势力范围时的必然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日本的大陆政策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到一定阶段的必然产物。

从本质上讲，日本财界的利益既是日本国家、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利益。这也是在日本对外发展以及大陆政策中，日本财界之所以始终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的原因所在。强调日本财界是日本资本主义发展的牵引车，是日本经济建设的司令部，其理由如下。首先，抚今追昔，我们发现，在明治以来的日本外交政策中，对它们经济利益的追求从来没有被无视，至今仍不失为日本外交思想的灵魂。在对外关系中，这种经济利益，表面上表现为财界的利益，实际上，不管是军部也好，还是政府，或是大陆浪人，他们谋求的最终利益，都同财界的根本利益一致。其次，考

察曾充满于日本内外政策中的“生命线”“利益线”“主权线”等口号时，我们不能不看到，这一口号提出的时代背景与价值标准的认定无不和日本的经济利益紧密相关，无论是“南进”，还是“北进”，最终都归宿于实现“富国强兵”与对外扩张侵略的基本国策上。事实上，围绕对外发展战略问题，日本国内的几个政治团体之间，只有策略上之争，没有战略上的原则对立。

基于上述种种原因，日本财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一经登上日本的政治舞台，就显示出其生机勃勃的政治生命力。同军部、大陆浪人的风格相比，尽管财界的行动略显迟缓，但它以其成熟的政治经验，迅速地活跃于内外政治舞台，特别在对外经济活动问题上，更表现了其政策的具有长期目标，求实稳进的特点。关于财界的特点，简单归纳，大致有这样几个方面。第一，目标明确。涩泽荣一式的财界领导人，有着经济人特有的气质，他们亲身经历了明治维新的变革，又饱受欧风美雨外来文明的影响。他们之所以弃官从商，就是要以在野的身分，投入建设日本资本主义之中。涩泽多次拒绝入阁，再三表示给总理大臣也不干，立志终生在野。正是由于日本财界领导人集团中，集中了一批涩泽式的人物，才带来了其领导人的素质高和干部队伍的相对稳定，保证了财界于内外事业中，长期立于不败之地。其次，财界的目标明确还表现在其政策的有计划性。由于大多数的财界领导人都兼营企业，是实际的经营管理者，具有这样那样的专业知识，因此，一般来说，财界对外经济政策的最大特点就是可行性强，无论是中日甲午战争后的战后经营，还是辛亥革命时期的对华经济政策，都说明了这一点。所谓大陆政策的三部曲，先朝鲜，再满州，后中国本土的顺序排列，正是财界从对外经济扩张整体战略中总结的经验。第三，善于抓住时机，勤于总结经验。普遍而言，务实是财界人的另一个特点。日本财界在制定对外经济政策时，始终能坚持从实际出发，既有中长期计划，又不失短期安排，少蛮

干，不费无用之功。这也是为什么自中日甲午战争以来，财界关于对外经济发展的意见基本上都被政府采用的原因。在这一方面，无论是军部、还是大陆浪人，都不是财界的对手。当然，拿出强有力的政策，不仅证明了财界队伍的素质，更重要的是逐步巩固了财界的政治地位，增强了财界的发言权。第四，于复杂的国内外环境中，认清国际形势，妥善地处理好与国内各政治集团间的关系。在对华问题上，政府与军部，大陆浪人与政府，大陆浪人与军部之间，经常出现摩擦，奇怪的是财界与各方面的对立，极为少见。甚至有人把财界与军部的关系比喻成“唇齿辅车”。不仅如此，财界还能吸收各种不同人才，不断地扩大自己的队伍。弃官经商，解甲经商，外交官转而经商，浪人转而经商，这种经商热，同一般所说的全民经商不同，而是反映了财界吸收各种优秀人才的能力。正是这种现象带来了财界的第五个特点，即财界的国际感觉。财界的国际感觉，具体表现在三个方面。首先为制定对外政策时的考虑。把握世界局势的动向，是财界思考问题的前提，特别是财界领导人中一些国际派力量的成长，正是财界多年来注重国际问题的结果。其次，财界特别重视对欧美外交，涩泽荣一身体力行，多次赴美进行旅行，同美方经济界交流意见，求同存异，打开了一条日本对美国的经济外交之路。再次，在对华经济活动时，财界打着亚细亚经济主义的旗帜，鼓吹两国友好，企图以中日合办的形势来减弱中国国内的反日情绪，在与欧美列强争夺中国利权之中，取得优势。

总之，日本财界推进大陆政策的过程，既是它积极而有计划地向海外扩张、侵略的过程，也是它在这一过程中不断调整其位置，同军部、大陆浪人默契配合，逐渐发挥主体作用的过程。这过程，反映了在对外问题上，军部、财界、大陆浪人三者的关系，同时也使我们对日本对外经济活动的全貌有整体的认识。此外，财界与大陆政策的关系，说到底，是日本财界在近代日本对

外扩张、侵略过程中的地位及其作用的问题。认为“明治维新以来日本一跃而为世界三大强国之一的背后，有作为日本资本代表的财阀的巨大力量”，“由街头商人白手起家的三井、三菱、住友、鸿池、大仓、安田等之所以成为不亚于世界水准的财界，其直接原因就是战争和军备扩张”的观点是有一定道理的。

以涩泽荣一、阪谷芳郎等为代表的日本财界领袖，所推行的对华经济扩张的计划，如参加南京临时政府中央银行的设立，中国兴业公司的成立与改组，涩泽访华之行与袁世凯会谈所提出的经济合作项目，无一不是反映了日本财阀集团，开拓海外市场，掠夺和确保原料产地，加强对外经济扩张的要求。这些都是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华侵略所获得的特权利益。事实证明，所谓日本财界的大陆政策，简言之，就是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所有内容的总和。辛亥革命后1914年，横滨正金银行总经理小田切万寿之助，曾致函井上馨，提出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扩张的具体要求，此信件为我们理解财界的大陆政策的内容提供了最好的注解，现原文摘录如下：

“关于对支实业之意见摘要

革命以后我国获得之利权

革命以后我国于支那获得之利权，仅下述二项而已：

甲：参加支那政治借款，最终确保我对支那财政之地位。

乙：决定满蒙铁路借款获得该铁道之利权。

此外对汉冶萍公司及江西铁路借款虽也成立，但均是革命以前已下手者，革命后新又（以下脱漏）

我国对于此问题，曾计划获得：（一）延长石油；（二）奉天省农业、矿业；（三）福建、江西地方铁路；（四）南京湖南（即宁湘）铁路之利权，但（一）、（二）、（四）均未成功，惟（三）至今仍在运动中。与南方孙、黄及其党缔结契约所获之利权，至今尽已云消雾散，故本邦所获之权

利与他国相比，相形见绌也。

我国计划失败之原因

我国计划之所以多以失败告终，固由于本邦资本不润泽及外国中伤过多之故，但相形见绌之结果，仍有另外特殊之原因，概举之则如：

(一) 我国对革命之态度，尤其有援助革命党之形迹，故支那不再信任本邦；

(二) 受满洲、汉口、南京、昌黎等各地发生事件之影响；

(三) 我国实业家无视支那官场习惯，模仿各国之惯用手段，徒以空举，希图获取利权；

(四) 我国一部分实业家观察形势有误，无选择支那方面对手之明；

(五) 利权获得之事，我国之运动者未得其人。

我国欲在支那获得其利权，以下之方法当最可采择：

(一) 尽全力使袁世凯信赖本邦；

(二) 与驻华公使以较自由活动之权利，使其手段可得充分之发挥；

(三) 为补助支那财政之贫乏，依需求贷与其资金；

(四) 予支那实业家及支那新闻记者建立密切关系。

获取利权之时机

支那政府之财政已达从未有的困难、复杂之局面，而欧洲之战乱又削弱了列强对东亚之注意，此际正乃我国可以尝试进行一大活动之难逢良机也。据最近电报，英国萨米尤尔革命后已定一千万镑之借款契约，想其中一百万镑乃至二百万镑须作预付金立即由政府支出也。我国可说已失去最好之机会也。

利权之种类

我国要求利权之种类如下：

(一) 汉冶萍公司问题之解决；

(二) 电话发展借款；

(三) 福建、江西地方铁路之铺设；

(四) 南满洲之水田经营。

此外当然尚有许多，但于此之际不可多求，而需深求。

占领胶州湾，结果会予我邦单独或与其他列强共同获得利权之机会，但却需依欧洲战争结束状况而决定，欲速则不达，但目下则需尽快派人调查山东方面情况，以备万一时应用。

在野之实力者所提倡东亚经济共同机构问题，此际有在朝鲜加以慎重考虑之必要。小田切万寿之助。”〔2〕

二、日本财界与孙中山关系的实质

孙中山在近四十年的革命生涯中，曾十四次出入日本，旅居日本期间合计十余年，大致占他革命生涯的三分之一。然而，孙中山作为日本政府的客人受到欢迎却只有一次。十余年的旅居生活多数是处于“违法”“逃亡”的状态中。几次还曾被日本当局应清政府要求驱逐出境。在近四十年的岁月中，历届日本政府都未曾真心援助过孙中山，相反却不断地支持着孙中山的敌人——清政府、袁世凯及北洋军阀。因此孙中山对日本越来越失望。即使这样，孙中山仍多次称日本是自己的第二故乡。关于孙中山与日本之间这种关系，一位外国学者阿纳斯特·P·扬格(Ernest P. Young)教授指出：中国的领袖们之所以希望与日本保持紧密联系，有四个理由：(1) 亚洲主义的思想意识；(2) 寻求援助的意向；(3) 领袖们自身政治上的软弱；(4) 紧急状态下不得已的选择。这四条大致可以说明孙中山力图建立巩固中日关系的一般原因，但却没有触及孙中山为什么一厢情愿，不顾日本政府的一贯敌视态度，始终寄希望于日本的具体缘由。事实上，日本政府虽然一贯反对孙中山，辛亥革命后过去的一些友人如大陆浪人内田良平等虽然疏远

了孙中山，但是涩泽荣一、阪谷芳郎等日本财界人士却通过辛亥革命与孙中山建立了亲密的合作关系，宫崎滔天、萱野长知一类的大陆浪人也始终在支持孙中山，这些史实极为重要。正是因为有这些财界的友人，才使得孙中山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的期待。

如前述，帮助过孙中山的日本人，政治主张各异，动机也大相径庭。1890年至1911年间他们曾结合起来支援过中国革命，但辛亥革命以后，除了在政治主张上与孙中山志同道合的宫崎滔天等人外，多数人由于种种因素就随着形势的变化纷纷离散了。

辛亥革命后，日本财界仍与孙中山保持一段密切关系，并合作筹建中国兴业公司的主要原因，可以归结为三点：（1）追求日本的在华利权；（2）亚洲主义的思想意识；（3）私人间的友情。

日本财界人士中亚洲主义思想色彩较重的主要有涩泽荣一、大仓喜八郎、阪谷芳郎等人，他们在“为了对抗欧美列强，亚洲（中日）务必携手”的基本原则上是一致的，但在各个时期侧重点却略有不同。中日甲午战争前，涩泽荣一认为中日两国应互相取长补短，但是随着日本国力的发展，在他的亚洲主义思想中，中日两国的关系应以日本为盟主。到了辛亥革命前后，涩泽荣一所思考的日本财界对华政策，亚洲主义的重点，两国合作，共同发展思想，仍不失为一种原则，只是它突出地反映了财界中大多数人所主张的以日为主、中国为从（即日主中从）的思想。对此，大仓喜八郎、阪谷芳郎等人毫无例外。此时，在他们的价值观念中，所谓的中日携手，共存共荣，成为“日本利权”的代名词。他们所主张的亚洲主义思想中，一直没有放弃对日本国利益的追求及日本财界在华利益的追求，所以他们与孙中山之间的关系，正包含了“近代民族国家所具备的国家的利己心……那样一种东西”〔4〕。所以他们没有也不可能像宫崎滔天那样无条件地支持孙中山，不谋求任何利益，附加任何条件。财界的亚洲主义思想基础，由于完全受日本资本主义发展、对外经济扩张的制约，而具

有较浓厚的功利色彩。

因此，日本财界中一部分人与孙中山始终保持关系的原因，同追求日本在华权益是有着重要关连的。他们看好孙中山主要是出于对孙中山日后的政治期望较高，并且这种期望完全是以日本的权益为目的的。当他们觉得孙中山革命有可能成功，便积极努力协助共同建立中央银行，表示愿意提供财政援助。例如涩泽荣一等人邀请孙中山1913年访日，联合日本大财阀资本家，制定了建立中国兴业公司的计划，成为尔后日本对华进行经济侵略的一个重要准备。但是，孙中山同袁世凯公开对立后，出现明显的劣势时，日本方面则同袁世凯勾结起来，改组公司，由孙中山与日本的合作，变成了日本与袁世凯的合作，断绝了日本财界与孙中山革命党方面的实质性联系。他们判断孙中山的价值标准，是“得势”还是“失势”，亚洲主义思想中的共存共荣，已失去任何实际意义。如果即便还注重互相援助，共同发展的话，那也只能是必须服从先日本后中国这一原则。阪谷芳郎在协助孙中山筹办中央银行计划流产后，他给胜田主计大藏次官的信中就十分强调了这一计划本身将为日本对华经济扩张打下一个基础。〔5〕当然同涩泽荣一、阪谷芳郎相比，大仓喜八郎、森恪等却是长期在华从事经济扩张活动的，他们的思想与日本极端军国主义分子相一致，对追求利权，更加赤裸裸地不择手段。在对中国的经济侵略中，始终扮演和发挥着急先锋的作用，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交往中也不例外。

三、亚洲主义与近代中日关系

亚洲主义思想是近代日本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思想意识形态，曾发挥过十分重大的作用。纵观近代中日关系的历史，亚洲主义思想随着时代的变迁，其主张者、形态以及内容，都在发生着变化。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财界主张的亚洲主义思想的主要内容，首

先是日中唇齿辅车论之类的东西，但更具体地来说，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试图通过援助中国革命，推进日本大陆政策，使其正当化。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后，陆军曾经提出了“亚洲主义”思想的对华政策，其目的是破坏外务省坚持的欧美协调外交，认为只有使中国走上亲日化的道路，才能在中国获得更大的经济、政治、军事特权。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亚洲主义思想更进一步发展扭曲、变质成为所谓“大东亚共荣圈”，这一向外侵略扩张，最典型国策思想的理论基础，变成日本侵略军为建立日本的亚洲盟主地位，不惜任意践踏他国主权，屠杀无辜亚洲民众的理论依据，精神鸦片。

因此，有关近代中日关系史的研究，必须对亚洲主义思想的形成、发展、转变过程作一充分的说明和概括。如前述，亚洲主义的初期形态完成于明治时期，但其萌芽时期却必须追溯到鸦片战争前后，而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财界的行动，恰恰是近代中日关系上亚洲主义思想表现的一个范例。

所谓亚洲主义思想，简而言之就是日本从清政府败北于英国的鸦片战争中产生了危机意识，为寻找解除危机的种种对策中提倡日中同盟，共敌欧美的一种主张。中日甲午战争、日俄战争后，大陆政策被作为日本的国策加以确立，亚洲主义思想转而变成注解、美化大陆政策的理论基础。1911年10月辛亥革命的爆发，为实行日本大陆政策中的中国政策，提供了千载难逢的良机，一部分日本财界人士基于亚洲主义思想中“中日共存共荣”的理念，出于对孙中山革命运动的理解和共鸣，采取了各种形式参与了以民间大陆浪人为主体的援助孙中山革命政权的活动。虽然日本财界作为一个政治集团不具备像日本陆军那样强大的组织，也没有造成像大陆浪人那样大的声势和规模，但是作为日本对外经济扩张，日本大陆政策的主体集团，日本财界的行为具有更本质，举足轻重的意义。这是因为，无论是日本陆军也好，还是

大陆浪人也好，他们的大陆政策的主张和目的，最终要反映在日本的对外经济活动中，落实在日本财界的大陆政策的每一个具体行为上。辛亥革命时期日本财界的活动，大陆浪人及一部分日本陆军向革命军提供援助与日本政府支持清朝当局的政策形成鲜明对照，其结果不仅导致了对华关系上的二元外交或三元外交，同时由于他们在对华政策上的认识分歧，还直接造成了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各政治集团间的对立。考察辛亥革命后的中日关系史，似乎可以说，每一项对华政策的出笼与实施，都可以从日本人的亚洲观，日本各政治集团的亚洲主义思想的认识中找到出处与理论注脚。

研究近代中日关系史，对日本政治结构进行分析同样是必不可少的。研究、阐明日本财界在推行大陆政策过程中的作用，将为我们提供一个新的视角，有助于我们对近代日本政治外交史进行较全面的理解。近代日本外交政策决策者所谓的“中国问题”，说到底日本对自身问题的认识，进而言之，分析阐明在对华政策上日本各政治集团的认识，在执行大陆政策中每个集团的不同作用，是我们从事中日关系史研究的前提。因此要历史地、客观地检讨日本财界大陆政策的起源、形成与实行过程，弄清楚他们与中国的关系，无论是从时间上讲，还是从内容上来看，选择中日甲午战争后日本对朝鲜政策，辛亥革命后的对中国政策为研究对象，都是具有典型意义的。

日本财界作为一个独立的政治集团出现在中日关系史上并参与对华政策的制定，始于甲午战后，突出表现于辛亥革命时期。虽然所处立场和政治地位与日本陆军、大陆浪人不同，在中日关系史所起的作用不同，但是财界对亚洲主义思想的认识和对大陆政策的理解，却与大陆浪人没有太大的差异。财界人士对中国问题的认识与我们迄今所了解的大陆浪人等有着惊人的相似之处。他们也把辛亥革命看作“千载难逢的良机”，企图通过中央银行计划，通过建立中国兴业公司继续扩大对中国的经济扩张，在与

列强争夺在华权益中，取得优势。但是，这一时期日本财界的对策虽然相当积极，与大陆浪人相比，却带有计划性，显得慎重，加之他们始终把中国视为日本长期的海外市场，其对华交涉反映出长期利益与短期计划结合并存的特点，具有连续性。而且财界在执行大陆政策过程中，更注意取得政府的支持。因为，如果财界背后没有强大的政治势力支持，他们的目标仍然无法实现。辛亥革命时期由于政界一部分人的反对，有关设立中央银行的计划最终夭折就是一个实例。日本财界对华经济扩张的基本主张，几乎都包含在日本对华要求之中，所以随着辛亥革命后中日关系“日强中弱”结构的确立，日本财界的大陆政策中的对华要求，取得长足进展，堪称硕果累累。

但是，应该指出，日本人的亚洲主义思想，是决定日本对华认识的最本质的东西。亚洲主义思想中包含着中日两国同文同种、一衣带水的近邻情感，包含着日本人对中国的古老历史、灿烂的传统文化的憧憬之意。这些情感意愿的结合，构成了亚洲为一个整体，中日两国命运与共的中日联盟思想。遗憾的是，在现实中，中日两国命运共同体的思想又往往无法体现在日本应采取的对华政策上。非但如此，日本人中对江河日下的中国，歧视态度与日俱增。这样一来，传统的中华文明世界和现实中“反面教员”泥足巨人中国之间的乖离，构成了自鸦片战争以来形成的亚洲主义思想中的“怪圈”，其后随着日本在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中的胜利，两者间距离日愈增大，后者终于与日本的大陆扩张政策结为一体。这种矛盾的中国观，在近代日本对华关系上，在日本人对华认识上不胜枚举，可随手拈来，成为中日关系中的一大特征。即使在今天，恐怕也很难断言上述的“怪圈”不复存在、彻底根绝了。

近代日本人中国观中的上述特点，构成了亚洲主义思想中最复杂的一面，进而促使它发生质的变化。鸦片战争中清政府对英

国的屈服，对日本人来说既是个巨大的冲击，又是影响他们的中国观发生动摇变化，产生亚洲主义思想萌芽的要素。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日本人又重新对中国抱以期待，与孙中山的亚洲主义思想产生共鸣。但是，鉴于不久之后孙中山等人对袁世凯的妥协和革命的失败，主张中日联盟思想曾一度热起来的中国观，马上又发生了逆转。内藤湖南的《支那论》则生动描绘了当时日本人中国观的变化，这种变化与日本人亚洲主义思想的变化相呼应，形成了近代中日两国多方位、多层次的复杂关系。同时，也为我们，为今天乃至21世纪的中日关系留下了丰富的可供研究总结的历史。

【注释】

〔1〕 堀田庸村：《日本的反省》，第48页，青年文化振兴会，1946年。

〔2〕 日本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藏《井上馨文书》。

〔3〕 Ernest P Young 《Chinese Leaders and Japanese Aid in the Early Republic》 Edited by Akira Iriye 《The Chinese and the Japanese Essays in Political and Cultural Interactions》。

〔4〕 卫藤沈吉：《日本人的中国观——以铃江言一为中心》，见《思想》，1961年7月。

〔5〕 参照青渊资料馆所藏有关孙中山的资料。

后 记

献给读者的这部著作，是我毕业论文的一部分，同时也是我在东京大学五年里，学习近代中日关系的一个小结。

近代中日关系史，起于1840年鸦片战争，结束于1945年的日本败战，达百年之久，跨两个世纪。这段交织着战争与平和的中日交往史，记载了两国人民在‘西力东渐’的大势下，走向近代化之路的不同选择与经历，为今人后世留下了无比深刻宝贵的经验与教训。现代中日关系史，风风雨雨又过去了近50年。当20世纪的年历，所剩无几，21世纪既将到来之际。我们抚今追昔，深感总括百年中日关系史，是时代的需要，是承上启下，关系到三个世纪的、具有十分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课题。在修改和完成这部著作的过程中，我隐隐约约地感受到，历史地、全面地考察百年中日关系史的时机，业已成熟。跨学科、多层次地检讨百年来中日往来中所涉及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诸问题，是我们义不容辞的责任。从这个意义上讲，本书包涵了我对近代中日关系史一些问题的基本思考，是我研讨近代中日关系史的尝试之作。

我最初研究当代日本政治与国际关系，后转而学习近代中日关系史，这期间终始得到导师东京大学教授平野健一郎先生的启迪和鼓励。东大时代的导师、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亚细亚大学校长卫藤沈吉先生给予我的帮助，更难忘怀。

同时，泽登晴雄先生、国泽高明先生、斋藤哲市先生、古岛和雄先生、佐藤明先生、熊野可文先生、隅谷三喜男先生、渡边



慎介先生、岛田忠先生、菅沼元治先生、故峰村千代子女士等所给予的支持，也是极为珍贵的。

本书的写作得到了国内外不少前辈和学者的帮助与指导。东京大学教授石井明先生、东京大学名誉教授中村隆英先生与波边昭夫先生、电气通信大学教授藤井昇三先生，是我博士论文的指导教师。他们从题目的选定到完成，一直给我以极大的关怀。日本女子大学教授久保田文次先生和夫人博子的好意和指导，至今记忆犹新。还有东京大学的木间正道教授、电气通信大学的梶浦笃教授、台湾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张启雄教授，国立国会图书馆伊藤一修先生，始终鼓励我完成这部书。国立国会图书馆宪政资料室的广瀬顺皓先生，无论在史料方面，还是在论文的构思方面，都给著者以大的帮助。此外，东京经济大学的村上胜彦教授、东京大学三谷太一郎教授、滨下武志教授、哈佛大学的入江昭教授、傅高义(EZRA F. VOGEL)教授也就本书的部分章节提出了宝贵的意见。在此，谨向他们致以衷心的感谢。

本书得到了丰田财团的研究出版助成。财团的山冈义典以及久须美雅昭等先生对著者的信赖与理解，难能可贵。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章伯锋、庄建平等先生和庚欣先生，为本书的改正与出版付出了极大的辛劳。他们的友好与信任，使我感佩不已。

最后，这部书献给为我尝尽辛苦，教我热爱中国的父母，患难与共的妻子。

李廷江

1993年8月25日

于美国哈佛大学

1993
8月